

◎ 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叢書 第四種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
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王良卿 著



◎ 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叢書 第四種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
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王良卿 著



序 言

創立於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的中國國民黨，為近代中國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團體，其成立歷史長久，其革命與執政經驗最豐富，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最顯著。一百餘年來，其組織、活動，與中華民國的創立、發展，息息相關。是故中國國民黨史當視為中華民國國史的骨幹，從事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自然無法避免牽扯到中國國民黨的人與事。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蔚成風氣，其中極大部分是屬於中國國民黨史的範疇。

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適為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週年之期，本會為獎勵青年學者對中國國民黨歷史作學術性研究，期對中國國民黨之歷史地位作客觀公正之評價，乃公開徵選優良黨史著作，凡以中國國民黨各時期之發展史實與重要人物動業，及中國國民黨對外關係為主題之學術性著作，均可申請獎勵。由本會聘請著名歷史學者及專家三人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應徵著作經評審通過者，計有林玲玲女士所著「廖仲愷與廣東革命政府（一九一一——一九二五）」、王凌霄先生所著「中國國民黨的新聞政策（一九二八——一九四五）」兩本論文，

於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假中正紀念堂公開頒獎。兩本論文經作者依據審查意見，酌情修訂後交由本會編輯出版。

本會鑑於近年來國內青年學者博碩士論文頗多佳作，惟限於種種因素，無法出版，以致影響其研究意願，乃決定持續主動徵求各相關研究所推薦優良博碩士論文，經評審通過後逐年出版，每年以一至二種為度。總其名為「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叢書」。值茲叢書刊布伊始，特誌數語，略敘原委。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

蔣 序

讀了王良卿先生所著《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書稿後，使我直接的感觸，就是孟子的一句話：「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這個「家」字如換個「黨」字，便是「黨必自毀，而後人毀之」了。

抗戰初期，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先生在黨的體制之外另行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团），原期團結革命青年，造成新生力量，結果反使黨團關係糾纏不清，彼此對立，發生鬥爭，最後走上合併的途徑；但彼此的對立和鬥爭，並未因此而終止。終於使這個具有五十多年歷史的國民黨，退出了中國大陸的政治舞臺。

蔣中正先生自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件」後，一直主導國民黨，雖然遭遇到黨內不同派系不斷的挑戰，但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被推選為黨的總裁後，其在黨內的領袖地位趨於鞏固，權勢亦達頂點。為何此時卻在黨的體制之外另設三青团呢？此在著者所引證的資料中，可以很清楚的找出答案，那就是蔣先生一再指出國民黨已經衰老腐敗，黨部已變成衙門，黨員已變成官

僚，不堪改造；如果以它來吸收青年，徒害青年。所以要另外設立三青團，來承擔革命事業。

事實上，國民黨黨員非僅有變成官僚者，而政客、軍閥之流亦充斥其間。三青團成立後，蔣先生既任團長；但被目為「衰老腐敗」的國民黨，仍然存在，使黨的地位，至為尷尬。三青團形同「新寵」，國民黨似乎成了「棄婦」。但這個「新寵」似乎亦不夠爭氣，在作風上似乎與黨成了「難兄難弟」，即如著者所引用當時的幾句「順口溜」所形容的：「黨部官化，團部黨化；黨員官僚化，團員黨員化」。

國民政府政權的存廢，實以國民黨的分合興衰為條件。三青團的成立，對國民黨的分合興衰有無影響？是有助國民黨的新生？還是加速國民黨的分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如從著者研究的結果來看，顯然是屬於後者的情況。過去我們通常把三青團的創立，說成是中國革命青年的第三次大結合，而與第一、二次的大結合相媲美，這顯然是一種主觀的期待，實際上恐非如此。所謂第一、二次的革命青年大結合，係指孫中山先生一九〇五年成立中國同盟會和一九二四年的國民黨改組，確曾帶來革命的新生力量。但這兩次均為黨內的改造，而非黨外的「另起爐灶」。即以改組國民黨而言，孫中山先生對中共人員的加入，堅持「

容共」方式，不使黨中有黨。但其結果，仍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終致造成一場血的鬥爭。而三青团與國民黨的關係，形式上既是黨外有黨，實質上又是黨內有黨，這對一個所謂「衰老腐敗」的國民黨而言，是福是禍，歷史事實已有答案了。

三青团的成員，既以新生力量以自許，來凸顯國民黨人的「衰頹腐化」，使人覺得留在國民黨內的，不是官僚、政客，就是軍閥、老朽的人物了，此將不待敵黨的摧毀，已被三青团列為革命的對象了。不論如何，所謂官僚之類的人物，乃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支持國民黨的支柱。更何況此類人物的認定，亦難有科學的根據，正如共派人士把反共異己者列成「右派」，或反共者一度以共為「匪」類，同樣的都屬主觀的認定。其實這類人物有時發生的作用，往往是一般常人所難比擬的。當年孫中山先生爲了推翻滿清，不惜以總統之位相讓，來爭取大官僚大軍閥袁世凱；護法時期，結合的國會議員和地方軍人，差不多都是官僚、政客或軍閥；改組後的國民黨，對此類人物，也並非完全排斥之。中共爲了推翻國民黨，國民黨中的此類人物，幾乎成了中共統戰的「寵物」。這一歷史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深切的反省和思考。良卿這部有深度的著作，正是提供了我們反省和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四

思考的良劑。

蔣永敬

一九九七、十二、

自序

筆者對黨團關係的認識，源自幼時讀過的一部文學作品。

在長篇小說《長夜》裏，作家王藍透過主角康懇的口，道出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該書由紅藍出版社於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印行兩刷，繼由純文學出版社在一九八四年重排發行。書中敘述一位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三青團）團員的愛情與報國故事。儘管《長夜》對於黨團關係著墨有限，但我們仍然可以在兩個相隔二十四年的版本裏，發現時代環境施予寫作意志的烙痕——讀者可以在「純文學版」當中，讀到一些描寫黨團關係較為激越的新句子。

《長夜》不是王藍最膾炙人口的創作（讀者一定會想到極度風行的《藍與黑》）；然而按照王藍的說法，《長夜》卻是他「最喜歡」的作品。理由很簡單，這部小說在虛實之間充分反映出作者本身的經歷：王藍正是三青團的一名團員。

根據三青團二全大會的檔案，王藍曾是一九四六年這次全代會的河北支團部代表，他也出席了本書所談到九月六日那場有關三青團前途的大辯論。對於不少

的三青团成員而言，在廬山召開的二全大會永遠令人記憶猶新。好些黨團幹部的日記與回憶錄裏，提及全會中的組黨風潮；一名出席者多年後曾在報刊撰文回憶他與團長蔣中正在全會一次點名中的短暫接觸，且引為至高無上的光榮；至於王藍，則選擇記憶了河北支團部因為吸收成員不力，被團中央考評為丙等的一段往事，並將它反映在《長夜》這部小說裏。

小說針對團務考評一事表達了不平之意，對於所謂「親打親，打斷脊樑筋」的黨團之爭，亦表失望。今天我們可以對此給予同情性的理解。舉一個例，根據三青团中央在一九四五年提出的數據，每七名團員當中，就有一名湖南籍的成員；雖然這些湖南籍團員並非盡由湖南支團部所徵納，但湖南的團部肯定招納了其大多數成員。試看這團務表現向來優異的湖南（一九四六年，湖南支團部團務績效即經團中央核定為甲等），儘管「於團有功」，但是誠如本書所揭示的圖象：該省黨團衝突之烈，隨之亦呈現正比。人們很容易發現，三青团與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甚至在不少的省份裏，「團務進一步，黨團關係退一分」。

何以致之？

本書隨時準備回答這個隱藏式的問題。在邀請讀者閱讀正文之前，首先應該闡明三青團在黨團關係中的雙重面向——這將是理解本書寫作架構的基礎——即三青團一方面以派系身分投入國民黨內的政治競爭，為黨內派系政治的參與者（中央尤其是）；一方面則以自主性組織的身分同國民黨時相頡頏，為國民黨的有力政敵（地方為最）。

這種模稜兩可的雙重面向，使得黨團關係長期陷於低迷，識者咸表憂慮；三青團的地位亦始終無定，團員不免苦悶。然而不容諱言，這個灰色地帶也便於國民黨政權（而非黨機器）藉由三青團（一個被賦予國民革命新血輪使命的嶄新組織）來擴充它的基本隊伍，包括為數眾多的青年，以及一些不太可能由黨機器吸納到的政治不滿者。當然，三青團也在這灰色地帶當中，從容遊走，相對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只不過當三青團作為黨內派系（暫可視為黨內之黨）、黨外自主性組織（暫可視為黨外之黨）的雙重面向發揮到極致時，一方面勢必加深人所詬病的黨內派系主義，一方面也強化了團在黨外的離心力。這時，那些三青團「自己的」政治利益與其所吸納的政治不滿者，似乎不可能立即成為國民黨的有形資產，而只能是內戰時期的負債。

還需向讀者說明的是，儘管本書強調復興社勢力在三青團裏的可視地位及其

承接關係，但並不意味著復興社勢力「百分之百」壟斷了後起的三青團。如同人們慣稱二陳攬持國民黨組織重權，事實上，特別在地方，CC的操控也沒有百分之百達到從心所欲的地步。一些概念化的語言可以讓我們便於掌握言說客體的基本現象，迅速建立範型，俾利於歷史解釋；另外一方面，卻也對那些內層現象的複雜脈絡，要麼視而不見，要麼敷設了認知的陷阱。如果不是注意到這一點，本書也就不會耗費筆墨論及種種派系糾合之舉和政治競爭了。

三

本書由筆者的碩士論文小幅增潤、修改而成，全篇基本結構則未更動。這項研究能夠完成，與筆者及讀者所置身的開放年代有關，我們或多或少均從中成長、獲益。當然，這本書的每一個段落，都反映出筆者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學習經驗與所得。在此衷心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林能士老師。林老師對國民黨既往派系政治的持續關注，是催生這項研究的第一動力；老師對論題大方向的掌握，以及給予許多珍貴的批評，也使得初稿若干未臻成熟的分析與措辭，盡可能避免出現在讀者的面前。指揮家伯恩斯坦曾經感謝其師庫塞維茲基給予他「充分的自由」與「必要的限制」，筆者此刻草序為文的心情，與伯恩斯坦並無二致。

沒有「充分的自由」，青年伯恩斯坦勢必無法在看似單調如苦修的指揮生涯

中，還能維持澎湃不已的熱情，以及悠然自得的樂趣。沒有「必要的限制」，青年伯恩斯坦則永遠不可能在看似隨性如天馬行空的指揮動作裏，真正學習到這門藝術的深邃理念，以及作爲一種專業的說服技巧。

本書原論文口試（一九九六年）渥蒙張玉法老師、蔣永敬老師指導，謹此再度致謝。筆者在修改本書時，已納入兩位口試委員的若干意見，部份則將是日後進一步檢討的重要依據。在一九九五年三月與五月兩次論文發表會中，張哲郎老師、胡春惠老師、周惠民老師，與東海大學歷史系張榮芳老師提供了寶貴的論點與建議。學長李道緝曾在筆者醞釀題旨之初給予方法上的提示。在研究與寫作的過程裏，南京大學歷史系陳謙平老師、國史館卓遵宏先生，以及張力、李道緝、張建偉、陳曉慧、陳進金、簡秋慧、周維朋等學長姊、同學，分別指引或提供了若干重要的資料；楊維真、張建偉、陳進金三位學長特別給本書增添了更多有力的思考角度；也要感謝吳翎君與吳淑鳳兩位學姐的不斷鼓勵，從律己的角度說，也是鞭策。

特別要對幾年來在木柵與南港兩地諄諄施教的諸位師長，與辛勞的李素瓊助教表達最真摯的謝意。在形塑個人的中國近現代史，以及國民黨黨史知識的過程當中，幾位教育家的名字應該在此提出：李雲漢老師、蔣永敬老師、呂實強老師

、陳存恭老師、呂芳上老師、胡春惠老師、林能士老師。但願本書沒有辱沒了他們劬勞作育的心血。

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間，拙稿復承蔣永敬老師、陳存恭老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黃堅立老師先後給予深刻的意見和批評。本書編校之際，又蒙蔣永敬老師慷慨賜序——事實上，這篇序文足可作為本書的導言！筆者的感激無從言說，姑引宋人秦觀詞句：「任青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對拙稿而言，蔣老師的大序是「一枝如畫」，筆者只能「為君沉醉」了。謝謝永敬師。

承蒙台北與南京的一些檔案機構協助筆者蒐尋史料，特此用申謝悃。讀者可以在徵引書目當中找到這些檔案機構的名稱與筆者援引的史料。在南京的日子令人記憶深刻，這得要謝謝中研院近史所沈懷玉女士的費心安排，與南京大學歷史系陳謙平老師的在地照拂。也謝謝法務部調查局第四處惠予查閱資料，對於徐建農先生的熱忱接待尤表銘心。

特別要向一些朋友敬禮：陳振淦、鍾嘉惠賢伉儷，以及史威、楊諳宜、張菁華、徐敏蕙。他們在各自專業領域的堅持與見解，感動、啓迪筆者殊深；當然，就「過日子」的角度言，他們也餽贈了最最無私、高貴而華美的時光。也要謝謝我的朋友賴治怡，她引導筆者來到學術的領域學習，同時也促使體會記憶的本質

本書承蒙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納入「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叢書」出版，謹申謝悃；並感謝未署名的審閱委員提供珍貴意見；劉維開、林宗杰兩位總幹事分別指引、協助借調進一步的檔案，以供增益本書內容，盛情隆誼，最是可感；高純淑專門委員協調全書編輯出版事宜，辛勞經久，筆者永誌於心；詹明棧總幹事、謝瑤琴女士協助照片攝製，筆者敬表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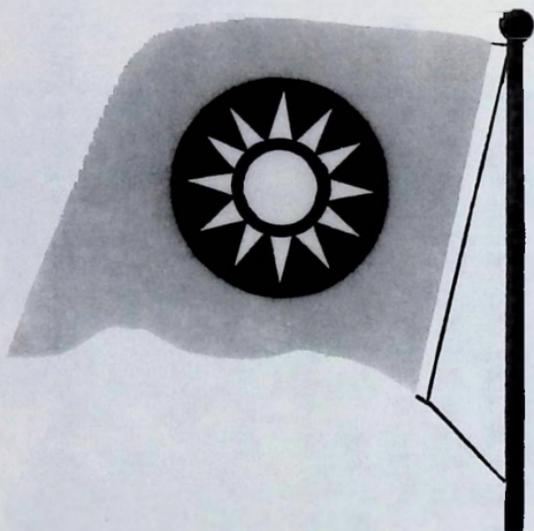
感謝這些笑靨如花的名字。本書勢有不逮之處，筆者一應負責，尚祈學者先進不吝指正為禱。

最後，謹以本書獻給我的父母親：王正皋先生、卓金鳳女士，並紀念三青團成立六十周年。

王良卿 謹識於木柵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 (底紅·徽圓日白天青) 旗團團年青義主民三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團定名為三民主義青年團

第二條 本團以團結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義捍衛國家復興民族為宗旨

第二章 團員

至廿六歲

第三條 凡中華民國之青年年滿十八歲以上者不分性別由團員

二人之介紹填具志願書經當地分隊之通過並呈由分團

部審查轉呈中央團部核准得為本團團員

第四條 凡團員入團時須舉行宣誓其誓詞如左

一 青年團員不
受上述年齡限制

團長蔣中正年齡問題上採取折衷立場。將他年入團年齡規範
在十八至三十歲之間，但各級幹部人員則不受上述年齡限制。



一第)日九月七年八三九一，影留會大立成團年青義主民三
蔣長圓、苓伯張、芳啓臧、隱豹陳、夫立陳、誠陳：起左排
。(等倫家羅、驛家朱、杰世王、正中



復興社末任書記長康澤掌
。握了三青團的組織重權。



蔣中正由康澤（左三）等陪同，在北碚檢閱夏令女學員。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



媚明景風在多址營營令夏
武文受接須必員學，地之
毒防為圖。程課類各育體
。賽比船划、習演



或許多所別是補救這個意思不妨放在老債裡面

陳惕虛

（貴州）

中央立法之制變時候似乎猶欠鄭重以致

引以下面發生大毛病毛痛蔣全以後能因是自私有利不能

令作這是不合事實的青年團所以束蔣全問題太多了也

有青年團設置根本沒有用抑以的為個整黨部是執青年

團對立的青年團古也有把年紀很大的士青年伸拉進這

為批黨部對立的力量所以我們不妨參考嘉應黨大刊的办

法這個不僅是年數問題而已因為青年團是青年黨之

三十八歲於是有入說黨員都應廢老朽之輩這程即象則

民間這才是很不好的

朱叔書

長 剛才各位所提出的意見關於文章上的修正可以

斟酌採納其何處這分則之意(一)省黨部委員由中央直接考

核關於之作用若考核有主服委員也要參加不過現在主任

常非得變經已就爭之氣意的方變團黨，年一到不立成團青三
談班練訓政黨期二第在盛惕陳委省州貴黨民國為圖。了重嚴
。錄紀言發的會話

不稱書長朱師長

張書記長 康處長

現在各地黨團間仍不斷發生磨擦以致減
 弱本黨之力量反授異黨以機會言之殊堪痛
 心若長此以往團部不僅無益於黨而徒為黨
 部之累則團部不如取消以免貽患于將來
 以後不論任何地區之團部皆應取消當此

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用章

的眞算打不並他段階現過不，話重了說年二四九一在正中蔣

。團青三消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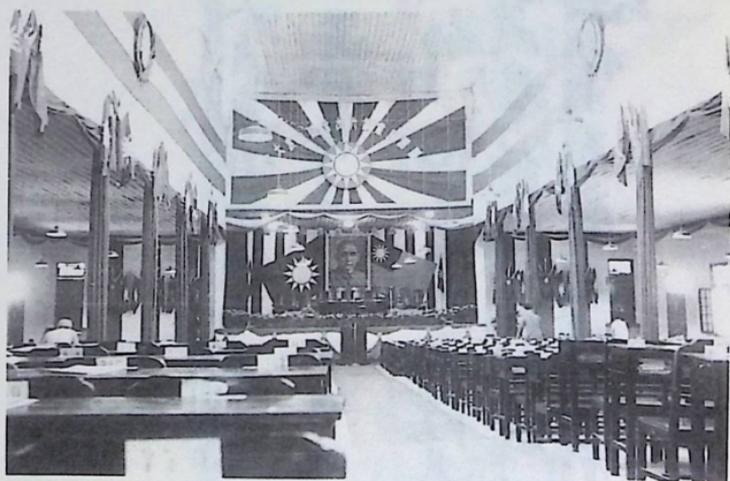
達凡各地團部不無人員應即撤調為要

忠
一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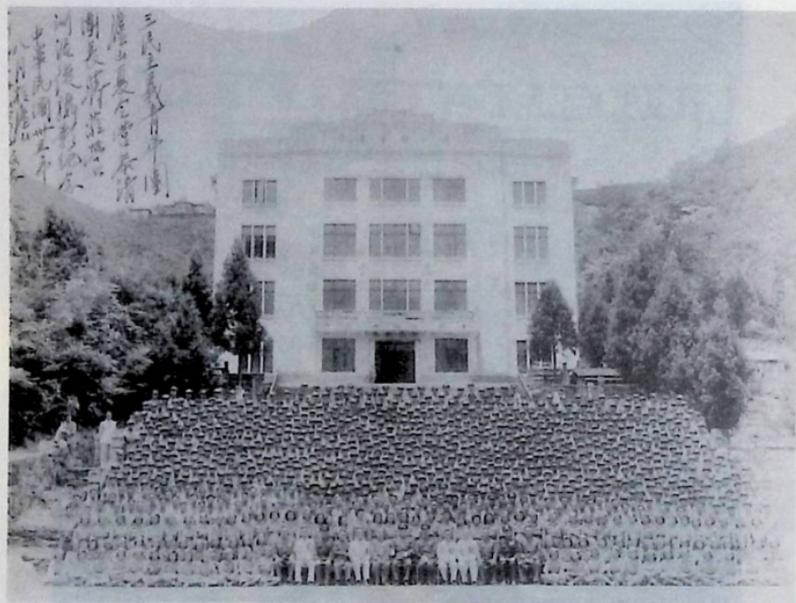
以原^{各級}黨部之團部紀念週應改為
每星期一上午十時舉行以免妨礙
星期一上午十二時工作可否如此應研
究公決為要 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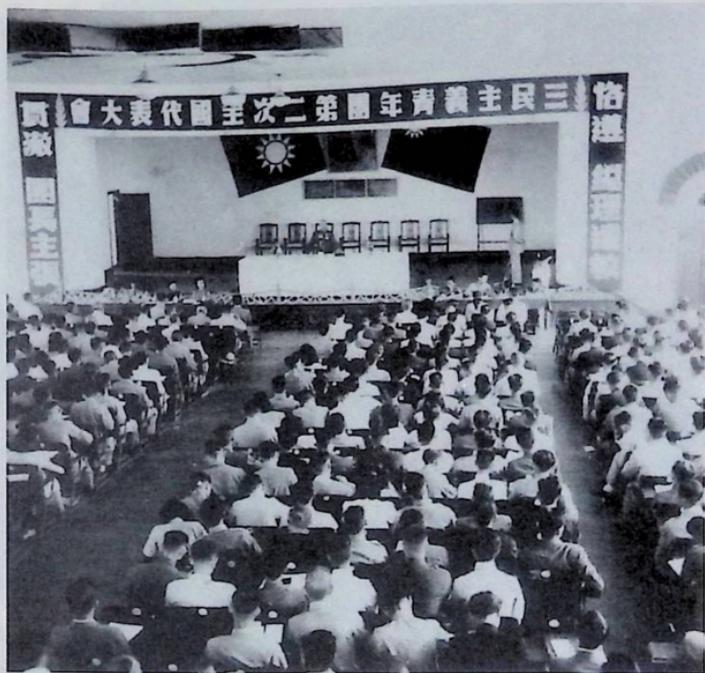
體會大全一團青三的年三四九一，說來同認體集的者席出從
。場會會代全為國。抗對的識意位本方團和方黨出現



召下景背的配分力權種兩在是會大全六黨民國的年五四九一
則面方一；聲呼的「民於政還」內國應順了為面方一：的開
場會會代全為國。狀現應適以整調行重須亟源資力權內黨係
。景內



全二團青三以員學份部，後之訓結營令夏年青山廬年六四九一
學習傳於影合生員營令夏為圖。山廬留續份身的表代席出會大
。前之舍



長圖爲圖。辯論的名著開展題問途前團該就曾會大全二團青三
。詞致會代全臨蒞正中蔣

告 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1228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呈 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由 呈為關於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案查修正三中全會交下修正修正黨及黨團關係條例案

批 示

發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客，許自者革改以雖上觀主團青三，下之作動諫施的黨民國在局內國與力壓內黨對面正中蔣。認共所內黨為則結團礙有上觀。應回資以作動力有種某取採須勢，化變勞

立法院昨選正副院長

董冠賢劉健羣當選

將於二十八日正式就職

立法院第二會期可能延長



董冠賢

劉

【本報訊】董冠賢昨（廿四）日下午，在立法院第二十二次會議上，以一百九十六票多數當選立法院長，劉健羣以一百零二票當選副院長。董氏接受夫人道賀時說：「不勝惶恐。」劉氏則說：「我雖是希望不被當選的。」

（本報訊）當選立法院正副院長，將於廿八日，在立法院開式典禮時正式就職。即任院長，現任行政院長蔣行，而僅於廿日出席立法院開式典禮。因有若干議案未及討論，立法院第二會期頗有延長之可能。

（本報訊）立法院昨（廿四）晚九時舉行第二次會，因院長係劉及副院長係陳立夫均係用新法，故公推陳繼任臨時主席。宣讀孫中山遺囑後，劉院長即舉行臨時會議，討論董冠賢與劉健羣當選正副院長事，即時進行改選。

董冠賢與我們革命的增進，深悲和信念。各位同志，深悲和信念，革命軍人既以身許國家，以身許主義，那麼我們就必須為了國家的復興，為了主義的實現，在危險的時候，應盡我們努力，殊途一致，達成我們所負的歷史任務。若有酒醉的，這種悲心，這種信念，應使我們革命軍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各位一定要將這種悲心與信念守不虛，發揚光大，即國家和民族的復興。

不並但接間，裡導報舉選則首的行五佔僅在《報日央中》京南。度態諷嘲的選勝人二群健劉、賢冠董對們他了達表的蓄含。



由立法院長改選看國民黨前途

新行政院組織成功，孫科辭去立法院長職務，立法院長的繼任人選問題，頗為關心政局的各方人士所注意。在京的立法委員，最近幾天也紛紛聚會，交換意見，展開競選活動。國民黨中央常會，日前決議仍照上屆提名人辦法，並推定李培基為立法院長候選人，副院長候選人。昨日下午投票選舉結果，魚冠寶竟以一九六票當選為院長，劉健群則以二〇二票當選為副院長，使這一問題獲得圓滿非凡的答覆。

國民黨提名的立法院長候選人未能當選，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無庸諱言，現任立法委員中，大多數都是國民黨黨員。站在黨立場，黨員須受黨的約束和指導，國民黨提名的立法院長候選人應獲得國民黨立法委員的一致支持，不致有落選的可能。照近說，李培基的落選，當然是一種意外。為什麼有這種意外發生？我們以為凡屬今日國民黨的中央幹部以所有黨員，都應發生深切的反省和警惕，像過去那樣的粗疏傲慢、紀律鬆弛，黨員互相猜忌，爭執缺乏正確領導，互信不立，共信不生，共信不

生，團結不固，團體與個人中間的權利義務，都不去絕對的，自然要有種種不合理的意外事情發生。例如：本屆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選舉，國民黨中央對於候選人的提名，事先雖曾經過長期的考慮，周密的計劃，甚至有非正式候選人退讓辦法的規定，而選舉結果，仍有政黨提名的若干正式候選人未經當選，發生許多糾紛，使國民黨中央終於變遷過去的一切決議，採取「票多當選」的原則，承認各地方當局所呈報的選舉結果。由此可知，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對於有黨籍的選民僅為一種參考，並不能發生嚴格約束作用。立法委員的選舉如此，立法院長的選舉自然也不能嚴格要求。就組織方面說，國民黨內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就壞的方面說，這顯明國民黨已經失去發現控制全體黨員的能力。

立法院是全國性的民意機關，一般立法委員都有相當高的知識水準，和普通公民大不相同，立法院長的選舉，應當成為普通公民選舉的模範。同時，立法院是會議制而不是領袖制，每位立法委員都應有政治的抱負和底蘊，都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份，院長在開會時當主席，本是服務的性質，對於立法院的決策和行動，並無絕對大影響，由老成持重態度超然一點的人物擔任，自然比較相宜。

224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證，事一選落基培李，出指則《報日平和》京南舌喉團青三前
。力能的員黨體全控掌去失經已黨民國明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 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目 錄

序 言	一
蔣 序	一
自 序	一
影 集	一
緒 論	一
第一章 國民黨派系對峙的延續	一五
第一節 復興社與CC的競爭	一六
第二節 組織的統合與新造	三〇

目 錄

—

第三節 三青團權力結構分析……………三九

第二章 雙軌競進的黨團體制……………八七

第一節 新血輪意識的形成……………八八

第二節 組織關係準二元化……………一〇〇

第三節 成員來源的相疊性……………一〇八

第四節 團務政治性格深化……………一二三

第五節 調整黨團關係措施……………一三一

第三章 革新聲中的派系權謀政治……………一九五

第一節 本位意識與三青團一全大會……………一九五

第二節 實力政治與國民黨六全大會……………二一五

第三節 革新運動中的派系運作……………二二九

第四章 二青團一全大會的組黨風潮……………二七三

第一節 別立新黨的背景……………二七四

第二節 組黨的呼聲與頓挫……………二八六

第三節	進向新的權力版圖	三〇五
第五章	黨團統一與黨權鬆落	三三七
第一節	合併的線索與前奏	三三八
第二節	統一的形式與實際	三五三
第三節	國代立委選舉摩擦	三六五
第四節	行憲聲中人事杌障	三七〇
第五節	國民黨改造的先聲	三八五
結 論		四三七
徵引書目		四四七
索 引		五〇六
附表頁次		
表一	三青團中央重要人事職名派系屬性分析(一九三八、七一—一九四三、四)	四四
表二	三青團地方團部籌備處領導人派系屬性分析I(一九三九、七)	五一

表三：三青團地方團部籌備處領導人派系屬性分析Ⅱ（一九四二、二）	五三
表四：一九三九—一九四四年間三青團青年夏令營營隊、學員數量	九六
表五：黨員團員累積人數與黨員團員比例（一九三八—一九四七）	一一六
表六：三青團團員職業成分統計（一九三九—一九四五）	一一九
表七：三青團團隊數量統計（一九三八—一九四三）	一九七
表八：第一屆中央幹事、候補幹事派系屬性分析（一九四三、四—一九四六、九）	二〇四
表九：三青團省市團部領導人派系屬性分析（一九四四、三）	二一一
表一〇：各地三青團團員競選各級參議員當選人數統計	二七九
表一一：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一九四六、九、一一—一二）	二九八
表一二：第二屆中央幹事、候補幹事派系屬性分析（一九四六、九—一九四七、九）	三〇九

緒論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向黨內的中央常務委員與中央政治委員發表重要的政策性談話。這次談話除了要求與會者研究應否明令討伐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之外，另一談話重點則旨在解決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三青團）①九年之間微妙而公開的緊張關係，蔣中正說：

我認為青年團與本黨再不許容有兩個形式的存在，必須青年團與本黨合併統一。決不能像現在那樣於黨部之外，另立組織，另成統系。我們如不把青年團與本黨合併，則不僅同志之間意志分散，減損實力，而且有的地方甚至互相摩擦，互相攻擊，……②

國民黨與三青團的緊張關係及其伴隨的政治紛爭，長期以來考驗著兩個團體同一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政治智慧與國民黨政權的穩定性。可以認為，一部黨團關係史即是蔣中正力謀更張、尋求新局的歷史。③一九三五年國民黨五全大會之後，逐漸步向權力顛峰的蔣中正對黨務與黨人的批評即有持續增加與更為嚴厲的傾向；中日戰起，憂危愈切。一九三八年五、六月之間，甫成爲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曾提出「改造」的初步念頭，儘管蔣個人對此尙無任何具體方案，但他明白指出「如有必要，寧使目前將黨部停閉，從新改造」，可見其視黨務如沉

痼，已有挹注猛藥的決心。④一個多月後，三青團正式成立，蔣中正自兼團長。蔣曾經寄望這個嶄新的組織能夠重振業已遭致部分黨人遺忘的革命精神，並配合中日戰時統一領導的構想，招納更多熱情且無利益色彩的年輕人，俾利於擴大政權的社會基礎、延續政權的活力。然而三青團的表現未能完全符合蔣的預期，更不堪的是，黨團難能共濟，反成水火，不啻又為政權添一沉重政治負擔。

就黨團關係而言，一九三八年三青團的成立之舉，原係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遂行改革的堅強表示，旨在對黨形成刺激更新的作用。惟三青團一方面以派系身分投入黨內政治競爭，為黨內派系政治的參與者（中央層級尤是）；一方面則以自主性組織的身分同國民黨時相頡頏，為國民黨的有力政敵（地方為最）。⑤職是之故，黨團關係日趨緊張，黨的革新難以大幅開展，團的身分地位亦始終無定。迨至中日戰後，中共及其軍事勢力急速擴張，上述政爭不得不求取全面解決的途徑，以資禦外，此即一九四七年的黨團統一。然而，黨團合併之舉未能挽救國民黨退出中國大陸的命運，對此，蔣中正於一九五〇年的國民黨改造說明中，公開指責原黨團同志無法和衷共濟，致使統一的政治革命作用無從發揮，語間頗以紀律蕩然為痛。⑥四十四年後，在國民黨改造過程中形遭貶抑的CC系領導人陳立夫在個人回憶錄裏則表達了不同意見，他認為蔣好使部屬對立，這是黨與團橫生糾紛、力量相抵的根本原因，是「領袖的錯誤」。⑦

相異的見解說明了人們對於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詮釋心態，並從而反映其政治經歷與立場。學界與政局當事人對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原因的衆多解釋，向來極難避免功過論斷，如此很有可能陷入二元對立的單線思考，以致模糊、甚至扭曲了歷史事件的複雜結構與連結關係。三青團與國民黨的結構關係正是長期爲人所忽視的一個歷史環節。直到今天，人們對於這項論題的認識，仍不比它在中國現代史與國民黨史研究裏的少許學術成果來得多多少。❶如此有限的認識與研究數量，並不符合相關史實發生當下所已博取的時人視線和輿論份量，因此，後人也就難以評估相關論題的歷史地位與影響。

事實上，在抗戰與國共內戰的年代裏，黨團關係動見觀瞻，恆與政局交相倚伏。由於三青團兼具黨內派系與黨外自主性組織的雙重面向，因此，對三青團與黨團關係的分析，將有助於了解國民黨政權的內在基礎與政治運作的多元面貌。再者，正是因爲三青團乃一具體、公開的組織，使得團方雖具派系之實，卻可便利學者跳脫一般派系研究流於抽象之苦。當然，本書仍不免涉及國民黨中若干內情尚未全面明朗化的派系，❷但就論題範圍來看，黨團關係已是國民黨派系競爭的適當分析領域，足以提供豐富訊息。

此外，迥異於政治上的實質發展，三青團在形式上始終徘徊於青年組織與政治團體的二極之間，亦即三青團的性質十分模糊難辨。這種模稜兩可的地位未能隨著諸多書面辦法與公開聲明而稍有澄清。從三青團性質未定及相應的各類爭辯內容出發，可以發現不同的政治勢

力對國民黨的各式期望與觀感；也就是說，黨團關係其實自始即已暗伏不確定的因子，且延至戰後，這就為國共內爭下的國民黨政權增添一道來自政權內部的可慮難題。在政權自中國大陸潰走的過程中，這道難題所發生的作用顯然應該獲得後人的正視。

由於三青團與國民黨共享政權的部分政治資源，重要團務幹部大多兼有黨籍，唯本位意識頗為強烈，因此，筆者視三青團為國民黨內奉蔣中正為最高領袖的龐大派系；同時，三青團具有自成一格的組織與動員能力，實際上與國民黨分據體制，多數團員未有黨籍，是以三青團也具有黨外的自主性組織身分。三青團從事廣泛的活動，青年為其主要下層基礎，政治為其實際興趣與伴生利益的所在。本書以三青團與國民黨的關係為論述範疇，筆者關切兩個關鍵的問題：一、黨團衝突的結構性原因；二、黨團關係在國民黨政權潰敗過程裏所形成的作用。其他若干重要的問題均將納入這兩個無形的區段裏進行討論與謀求解決，從而為區段裏的終極標的——兩道最高問題——提供有益的解釋。

上述區段中存在著十字形態的寫作脈絡。以黨團衝突的結構因素而言，筆者以三青團的建立與戰時發展為經，以三個線索：權位利害之爭、心理基礎與體制設計等形成緯線。首先，學者發現意識形態與權力爭奪是觀察派系起因的兩個重要依據，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尤其強調權力爭奪為國民黨派系形成的主因，^⑩所以本書第一章對三青團權力結構的分析將有助於了解派系(團)的本位意識與共同利益形成的必然性；同時，經由一九三〇年代

的國民黨派系政治競爭（特別著重復興社與CC系）的角度，可以看出三青團無非是延續派系對峙的又一領域，也就是說，在三青團成立之前，某些歷史背景可能足以影響其後團的本位意識與集體共同利益的形成。首章「國民黨派系對峙的延續」即旨從派系政治的面向考察黨團關係自始欠缺穩定的原因。

其次，儘管易勞逸認為意識形態在國民黨派系成因中極其微不足道，但我們不能忽視三青團成立時確曾被賦予增補國民黨活力與革新國民黨政治的功能與地位，黨與團正是在這種老邁、新生的對比中日漸產生隔膜，甚至對立。另外，黨團體制分割不清造成工作範圍、成員來源等方面的交疊事實，也可能給黨團活動埋下相互衝突的因子。心理基礎與體制設計將是第二章「雙軌競進的黨團體制」的關注焦點。第一、二章的討論試圖替黨團衝突的結構性肇因勾勒出簡明的輪廓，並發展出具體的歷史敘事，從而導入三青團有關政治活動的陳述。

筆者視三青團介入政治之舉為一種現象，而非黨團衝突的結構性、根本的原因。然而，戰後三青團的政治參與行為終不免與國民黨政權潰敗的歷史產生連結。在後續的章節裏，筆者引三青團尋求自主獨立的過程為論述縱深，輔以戰後中國政局與國民黨的潰象為橫軸，從中尋繹黨團關係失控的史實，及其在國民黨政權退出中國大陸的過程裏所產生的作用。

第三章「革新聲中的派系權謀政治」以中日戰爭結束前後為斷限，舉三青團與國民黨的兩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革新運動為例，說明團方與黨內各派系之間的政治操作與利益分配

第四章「三青團二全大會的組黨風潮」則具體描述三青團欲將多年來渾沌的黨團關係作一徹底解決的努力。在一九四六年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獨立組黨是最受多數出席代表歡迎的方案，本章以二全大會為主體，將深入探討組黨的背景、言論內容與挫折，兼及全會閉幕後嶄新的權力格局。第五章「黨團統一與黨權鬆落」旨就蔣中正解決黨團摩擦的決心進行歷史分析，並對黨團統一的辦法與其後原黨團雙方仍分軫域的實情多所著墨。原團方對於黨機器(machine)認同的疏離，以及原黨方視團為庶出的心結，直接體現在接踵而至的國代、立委選舉過程中。黨團參選人的爭執是全國性的，並隨著當選人進入行憲政府體制，進一步衍成壁壘分明的對抗態勢，於茲政權危殆之際，黨機器指揮不靈，黨權已成鬆落危局。這一章將與前述章節產生相互辯證的效果，以便說明黨團關係在國民黨退出中國大陸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一九五〇年蔣中正在台灣實施黨務改造的歷史背景。

本書以黨團關係為範圍，輔以團務發展與人事遞嬗，內容涉及派系政治、權力分配，此出於學術需要。檔案、憶述文獻與報紙期刊提供了本書敘事與分析的主要基礎。筆者檢視大量國民黨與三青團的會議紀錄、工作報告、統計資料、小冊子、專刊與報紙雜誌等，不少材料在此係首度由研究人員引用，部分適於筆者研究期間經度藏機關解閱限制。這些典藏於台北、南京各檔案機構的文件經排比解讀之後，將較為清楚且合理的解釋論題範圍內的史實與筆者提出的問題，並且對不同政治立場的當事人於多年後發表的憶述文字給予適當的互

校機會。

另一方面，在檯面下運作的派系政治內情顯然必須仰仗豐富的新聞報導與憶述文獻才能窺其底蘊。但是，基於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的敘事差異，和報導人非刻意所造成的文字錯誤，運用這些資料時應該極為謹慎，並且採取綜合判斷的方式；對於太過瑣碎而又難佐以旁證的報導，筆者暫時保留於本書之外，以符合嚴謹的學術定規。

註釋

①一九三八年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決議通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中，明載該組織簡稱「青年團」，此後黨與團官方的書面文字與公開談話均一體遵照。這個名詞有其本位性與正統性的暗示，但顯然並未普獲黨、團員與社會各界的刻意遵循。「三青團」是另一個盛行的稱謂。由於三青團字眼同時被部分批評人士使用，以致間接蒙上負面色彩，因此團中央屢次申令不得、不宜引用。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總裁、副總裁交議，中國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李雲漢（主編），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年），頁六一二；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革命文獻第七九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八年），頁四四五；〈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

一年來工作報告》，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以下縮寫為「黨」），五一九／一二三；三民主義青年團直屬第二區團部籌備處團員通訊編輯委員會（編），〈團員通訊〉，第五期（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頁七八；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歷次常會重要決議案，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史資料第一輯初稿〉，上編（南京：編者印行，民國三十五年），頁二七五，以下簡稱〈團史資料〉。一九四一年，戴傳賢在三青團幹部訓練班講演時，特別指出「三青團」一詞係對團的敵視、別具用心，他引〈封神演義〉中的「老子一氣化三清」故事，表示該簡稱很不好，如果必用簡稱，則以「青年團」較妥適，戴傳賢並且糾正團內人士好用「鬥爭」二字的習慣。當時擔任青幹班訓育幹事的陳開國寫下了這段往事，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七四輯（北京：一九八一年八月），頁五四—五五。在這裏，爲了有別於中國現代史上其他黨派的青年團組織（如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等），並給予學術研究上的等視角度起見，筆者簡稱三民主義青年團爲三青團，此外無意涉及任何價值判斷成分。

② 蔣中正，〈當前時局之檢討與本黨重要之決策〉，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中央聯席會議講詞，〈黨團統一組織重要文獻〉（南京：黨內刊物，民國三十六年），頁一二。

③ 國民黨黨史裏的「黨團」一詞主要有二義，其一指在秘密、公開或半公開的非黨團體（如工會、俱樂部、會社、商會、學校、各級代議機關）之內，國民黨黨員所組成的黨組織，其目的係在非黨團體中

擴大黨勢力，並指揮活動，見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總章，第一三章第七七條，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集〉「革命文獻第七〇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五年），頁五四；其二為國民黨與三青團的合稱，亦即本書所指涉者。

④ 蔣中正，〈救國必須救黨〉，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在武昌出席擴大紀念週講詞，與〈革新黨務鞏固黨基〉，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在武昌出席各省市黨部委員聯席會議講詞，二文均見：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五（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頁二七〇—二八一，二八七—二九二；阮毅成，〈民國二十七年武漢半年日記（下）〉，〈傳記文學〉，第四三卷第三期（台北：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頁五六。詳見第二章第一節。

⑤ 將三青團視為一個派系的作法當然是一種研究範圍的切割。事實上，團內同時也存在一些次級派系。根據不同的因素，這些次級派系仍然可以往下繼續劃分成更小的單元。基於將論題單純、集中化的考量，除非涉及黨團關係或論述需要，否則這類次級派系與更小單元的內部面貌及競爭情事將不會是筆者的首要關注對象。

⑥ 蔣中正（講），〈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臨時會議附件，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台北：編者彙印

，民國四十三年），頁九三一，「黨」未製號，以下簡稱《六屆中常會紀錄》。

⑦參閱陳立夫的中文回憶錄，《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三年），頁二二六—二二七，三六六，四五六—四五七。全書敘事直接明言蔣中正個人錯誤之處唯「青年團成立始末」一節。值得注意的是，陳氏在此批評的口吻雖然溫和，責任歸屬卻十分直接明白。

⑧美國學者易勞逸《毀滅的種子》書中的專章，可能是最早採取嚴格的學術格式，以較獨立的篇幅論及三青團的作品之一。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84), pp. 89-107. 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先後出版中譯本，台灣所出版本內容與稍早面世的中國大陸譯本相同，唯書首改附不同的圖片，另增李敖自撰引文。迫於時間壓力，可能也因為史料名稱還原不易，大陸譯者自行刪除了大部分的註釋，台灣版因襲了這項缺點。「美」易勞逸（原著），王建朗、王賢知（等譯），《蔣介石與蔣經國》（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九）；《蔣介石與蔣經國——毀滅的種子》（台北：李敖出版社，一九九〇）。必須注意的是，中譯本內有關三青團的專章另由未掛名的賈維翻譯，王賢知校對。在另一本令人注目的英文專著中，作者黃堅立替易勞逸上述先驅式作品添增了更多重要的細節，黃堅立並且將三青團與國民黨學運政策作一聯繫性的考察，Huang Jianli,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Peter Lang, 1996)：關於三青團，讀者還可以參閱下列專文：

樊中原，〈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大專院校活動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五年）。全文合計二五二頁，附論文提要、組織人事團章等圖表條文。

王培智，〈抗日戰爭時期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運動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南京：一九八七），頁五七一—六三。

卜萬平，〈從黨團關係看國民黨內部各派系的矛盾〉，《民國檔案》，一九九〇年第一期（南京：一九九〇），頁一一七一—一九。

朱高影，〈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七）——國府爭取青年運動領導權之努力及其挫敗〉（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一年）。全文合計二六八頁，附組織人事年表口述訪問稿等。

蔣永敬，〈三民主義青年團與抗戰建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一五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八十二年），頁五〇七—五四九。

陳希亮，〈三青團述論〉（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畢業論文，申請碩士學位，一九九三）。全文合計四二頁，附中英文內容提要、圖表。

Huang Jianli, "The Formation of the Guomindang Youth Corps: An Analysis of Its Original Objectives," in *East Asian History*, 5 (June 1993), pp. 133-148.

賈維，〈三青團的成立與中共的對策〉，《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北京：一九九五年三

月），頁二二—二四二。

賈維，〈三青團的結束與黨團合併〉，《近代史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北京：一九九六年一月），頁七七—一〇三。

賈維，〈國民黨與三青團的關係及其矛盾之由來〉，《近代史研究》，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北京：一九九六年七月），頁一〇〇—一一九。

馬烈，〈三青團與蔣經國〉，《江蘇教育學院學報》，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馬烈，〈試析蔣介石成立三青團的原始動機〉，《民國檔案》，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南京：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頁一〇七—一一三。

陳進金，〈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湖北（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一期（台北：國史館，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頁一五一—一六八。

王良卿，〈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組黨風潮為中心的探討（上、下）〉，《近代中國》，第一一九—二〇〇期（台北：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八月），頁九一—一〇〇（第一期），頁一三〇—一四九（第二期）。

另應注意者，由李雲漢撰寫，一套極富學術價值的國民黨黨史著作（一九九四）裏，分三節敘述了三青團的成立、發展，與黨團統一經過，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頁四四六—四五六，五四六—五六三，五九六，六七三—六

整體而言，三青團的相關研究數量仍然有限，並且存在著「青運團體」與「政治組織」的兩條解釋路線。台灣學界以往多就青運團體的角度多所發揮，並給予高度評價；中國大陸學者多以雙線並論，近年且已注意到三青團的抗日貢獻，唯對於三青團反共之舉則例表抨擊。至於黨團關係的相關研究數量更少，此中涉及資料不足且失之片面，時代環境限制、輔助性學術成果有限……等因素，不過近年來研究條件已見大幅改善，本論題當有長足之發揮空間。

9 譬如朱家驊在國民黨內的跟隨者人數與實力仍不易給予學術研究者具體而全盤清晰的印象。

10 蘇嘉宏的一本著作裏對各家學者所下的派系定義與派系模式特徵有較多的介紹，蘇嘉宏，〈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一年），頁六七—七二，八二—一〇一。陳明通則綜合多名學者見解，對派系概念、派系政治特質，與派系結構變遷理論等作了條列分析，他特別注意到了派系裏的人際網絡特性，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頁一三一—三四。易勞逸認為國民黨的派系旨在攫取權位，至於意識形態與政見差異則是微不足道的，見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5), pp. 303—306;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 p. 145.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第一章 國民黨派系對峙的延續

國民黨自一九二八年取得中國政權以來，即實行一黨訓政的黨治政策，因此，有關政治權力的競爭，主要並非存在於整個社會，而是來自政權內部。這種政治權力的分配，主要仍係基於個人的決定，或漫無限制的私誼關係，換言之，「宗派主義」(Factionalism)是政治競爭的主要憑藉。①黨內派系頗多，以領導人爲劃分標準，計有親蔣中正、胡漢民、汪兆銘(改組派)、孫科……等能夠一直開列下去，並得以呈現繁複如枝桠的人際網絡關係；以地方勢力劃分，則有粵系、新桂系、晉閩……等地域派別，特色爲自樹武力，和中央保持若即若離的局面。其中，隨著蔣中正逐漸樹立起威權統治的地位，幾個以鞏固蔣領導爲重要目標的派系從而獲得人們的矚目；根據一般的看法，這些派系至少包括了黃埔系、CC系、復興社、政學系。特別是復興社與CC系，相對於黨內其他派系，頗具有近乎全國性的群眾基礎與組織能力。

然而，儘管復興社與CC系均以擁蔣爲職志，但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各地，雙方積不相能，交鬥日烈，本章即以描繪兩派在一些地方、領域的競爭景況作始。②以地方和領域而言，復興社與CC系的惡性競爭至爲廣泛，並且延續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以後。這樣

的情勢必須謀求解決，否則無以面對戰時團結的要求；加上一些特定的背景與因素，蔣中正在一九三八年明令解散復興社與CC系勢力下的祕密組織，轉而代以一個性質公開的新團體——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是戰時團結人心、爭取青年，用以對國民黨形成良性刺激的產物，其幹部來源甚至包括了黨內其他派系成員，但是這些成員與CC系在團內的數目、力量均屬有限，前復興社勢力從一開始就取得了團的主要領導地位。最後，CC系和復興社對峙的局面在三青團成立之後獲得延續，並且轉化為更富組織能量的黨團之爭。本章將以復興社／三青團為主軸，探討其間流變過程，以及黨內派系生態反映在三青團初期（一九三八—一九四三）人事問題上的面貌。

第一節 復興社與CC的競爭

復興社在一九三二年初組成，^③領頭組織者幾乎全數來自黃埔系早期學生，^④他們對國家和國民黨的狀況感到憂心：當時日本正在侵略中國的領土；中共雖經反覆圍剿卻仍然存在；或許最令他們震驚的是，國民黨的組織已經變得脆弱，成員已經變得腐敗——至少在復興社分子的文字資料中顯示，這意味著革命已經失敗，民族已深陷危難。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部分幹部反對蔣中正的聲浪行動始終不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之交，蔣中正才剛經歷過個人政治生涯的第二次下野，當時蔣在個人日記記載裏，對黨內政敵難遏憤懣之情，並於

返里後總結教訓認為「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余不能自主」，同時「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偵探」，「乃遂陷於內外夾攻之環境，此皆無人扶翼之所致也」。⁵

這些來自各方分裂勢力的威脅使蔣中正與黃埔學生意識到，必須樹立起一個值得信賴的新政治力量，確立蔣的領導權威，方能進而完成真正的國民革命理想。⁶因此，在蔣中正的許可、經濟支持，以及起碼是形式上的領導之下，由包括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滕傑、戴笠……等一群青年軍官組成了包含三個層級的金字塔型組織。組織的最高層居於領導支配地位，稱為三民主義力行社；中層為革命青年同志會、革命軍人同志會，分別吸收文人學生與軍職員生；其基層成員來自軍隊的下層、學生以及政府、社會機構等較為普遍的範圍，組成了中華復興社。⁷「復興社」這個名詞往後成了該金字塔型組織的通稱。⁸

青白團、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的成立原因與黃埔系領導的復興社同出一轍，只不過是由擁護蔣中正的另一重要派別CC系所策畫建立。CC系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領導，他們的二叔陳其美和蔣中正曾有金蘭之約，因此蔣與二陳兄弟之間具有準叔侄的關係。在蔣中正的支持下，二陳先後多次主掌國民黨的組織工作，於是逐漸在各地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範圍；根據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這股勢力在初期就有了組織基礎，即一九二七年成立的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但除了口耳相傳與一些憶述文獻之外，這項說法從未得到有力證實，數十年來二陳也始終否認該組織的存在。⁹俟復興社成立，二陳得蔣支持，也建立了幾個

和復興社一樣，同為縱向聯繫，而無橫向流動的祕密組織：青白團、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用以肆應時局。^⑩此時，黨內擁蔣的兩大文武派別CC系與黃埔系均已成立具體核心組織，並分別向地方開展組織動員工作，這對蔣中正正在黨內地位的提升與實力強化，當有一定的促成之功。^⑪

復興社與CC系具有若干共同的目標，諸如擁蔣、反日、反共，肩負情報收集與制裁所謂奸宄等任務，但雙方合作紀錄非常有限，反而在組織活動的領域上迭起衝突。復興社裏的黃埔系菁英原活動範圍在於軍事，特別是軍隊黨務、政治訓練、各地保安部門等範疇；CC系則活躍於黨務機構、教育、民政等領域。^⑫兩派權責看似分明，事實不然。復興社將勢力逐漸推展至各地的同時，也就難以避免的和具有地方實力的CC系形成緊張而全面的競爭關係。造成這種態勢的原因非常複雜，不過大致可以歸納為成員心態與利益爭奪、蔣中正的態度等角度以利分析。

復興社的領導菁英主要來自黃埔軍校學生系統，該校學生曾經創造了著名的「黃埔精神」，即使連一位對國民黨政權成就抱持負面見解的西方學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些軍校生以無畏的戰士見稱，其中許多人在一九二〇年代的革命戰爭裏犧牲；國民黨在他們入校時無法供給舒適的前程，相反的，卻只有打仗或是死於革命的機會。^⑬許多黃埔學生和蔣中正的往來涉及濃厚的個人成分與中國師徒的忠誠關係，學生離校多年之後，仍可稱蔣為校長，而不是

其他軍官或國民黨官員口裏的「委員長」或一九三八年以後的「總裁」。這意謂著他們與蔣維持一種深遠而又難以取代，甚至超過一般上下層級制式的從屬關係，^⑭質言之，黃埔系恆以「嫡系」自居，^⑮復興社成員則自命為蔣的親兵，為革命新生力量。^⑯這種優越感使得復興社與在地方上替蔣中正的黨權基礎扎根經年的CC系互生疑忌，嫌隙繼起，終而必欲堅決排之。

單只站在蔣中正一邊的立場看，以「嫡系」將黃埔系軍隊（中央軍）與其他地方軍隊區隔開來的用意可以令人理解，但是在這裏，顯然「嫡系」定義的應用範圍已經擴張至國民黨全面的政權，而非限於軍隊。復興社成立後旋即顯露出廣泛的政治興趣，在地方上尤其不憚權限，汲汲於實際行動。此與組織的生存資源有關，更重要的，蔣中正促成了復興社的廣泛企圖。一九三二年五月，亦即復興社組成甫滿兩月後，蔣在勵志社召集各師政治工作人員會議；軍隊政工多由黃埔系經營，因此會議的舉行時機頗耐人尋味。蔣在會中以師生的相對立場發表講話，演說首先稱許這次政工會議的召開情形比先前結束的黨工會議來得好，繼稱：「希望今後能夠定出一個健全的組織，嚴密的系統，使工作格外發生效力，軍隊日益進步，以至恢復從前黃埔時代的革命精神，來挽救黨國當前的危險。」^⑰揆諸前後文，所謂「健全的組織，嚴密的系統」似隱指方經成立的復興社。蔣中正接著強調，國民黨在一九二四年以後的革命勢力係由黃埔所造成，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也是黃埔力量所戰勝的，但國家現在還沒有

脫離割據分裂狀態，「反動派」對黨及政府、黃埔肆意詆毀攻擊，此乃黃埔莫大的恥辱：

我們黃埔學生要知道，除了黃埔力量，沒有那一個力量配得上使本黨發展，配得上擔負國民革命，如果沒有黃埔的力量，國民政府就不能夠統一中國。……在這時候要恢復我們革命的精神，保全我們革命的力量，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那一個都不能擔負起來，能夠擔負這責任的還是我們黃埔學生；……我們受到這樣一種無謂的恥辱，遇到這樣一種無謂的晦氣，而我們犧牲的同學至少有二千多人，殘廢的還不在內，我們這樣為革命辛苦奮鬥，反要天天受人家咀咒，……。

蔣中正認為黃埔學生「並沒有那一個人發了幾多財，那一個人陞了怎麼大的官，更沒有一個做部長、省主席、中央黨部的委員、國民政府的委員」，然而「一般官僚政客」一旦陞官發財，「一切的罪名都統統是我們黃埔來負擔」，「我們要怎樣洗雪這種恥辱，怎樣完成我們的責任和使命，這就是我們黃埔學生當前一個最重要而最值得考慮的問題」。¹⁹在蔣中正看來，這問題中間最大一個癥結，就是以往「我們黃埔的力量自己運用的錯誤」，黃埔師生只知對軍事有興趣，這是革命失敗的主因：

因為我們專門普遍在軍事上頭用功，對於軍事以外的一切政治經濟社會，卻完全沒有一點力量；軍事這東西，只是一個手段和工具，可以為掃除革命障礙的一时的力量，而還不能算是革命整個的力量，革命整個力量乃在社會經濟與政治，我們軍事的力量，

已經擴充到全國，而我們政治的力量，社會的力量，以至經濟的力量，卻都一點沒有基礎，尤其是黃埔學生個人腦筋中間，都以爲軍事工作爲有興趣，怎麼有興趣呢，可以耀武揚威，可以陞官立功得快，而視政治社會工作卻是倒楣（楣）而沒出息的事情。……這種心理，就是使得黃埔失敗，使得革命失敗的一個最大原因。²⁰

蔣中正正在談話中要求黃埔學生擔起復興革命的責任，指出：「現在軍事力量的基礎已經穩定，以後最好最優秀的人（黃埔學生），應從最需要方面去做政治黨務社會方面的工作，用政治去革命。」²¹儘管這番談話並未勾勒出新方向的具體工作內容，但不啻已明示未來應該嘗試擴展工作範圍，對於黃埔系及其甫組成的復興社而言，此應具有政策宣示的意味，自難無動於衷。惟蔣雖力促參與政治，恐亦無意鼓勵復興社和CC系互起摩擦，前文所言「反動派」實指黨內外反蔣勢力，亦非關CC；然而復興社在地方伸展組織觸角的結果，勢必與CC有所交疊，加上兩派心態已見猜忌，遂導致齟齬叢生，難能共謀。最後，當一九三四年復興社和CC系關係緊張之際，蔣中正只對這相競爭的兩個派系做了分工：CC系在黨內，復興社在軍隊裏致力工作。蔣的處理如非蓄意敷衍，那麼就違反了兩年前他曾對黃埔學生發下的指示，然而無論如何，復興社跨足軍事以外的腳步已難收回，蔣在一九三四年的裁決僅只短暫有效，復興社與CC系的敵對仍然持續著，²²並且，這種情勢隨著兩派深入競爭，在地方政局上更產生了難以估計的惡劣影響。

以河南爲例，復興社的發展和黨政矛盾、CC系內肇分裂密切相關。由於緊握軍政大權的省主席劉峙與黃埔學生有師生情誼，因此對復興社採取親善態度，復興社遂賴以伸展勢力，其他軍政負責人見狀亦紛採復興社路線。²⁴據當地社員的憶述文獻表明，當時省府各廳處較重要的人員，各級學校教職員，全省的專署、縣府、區署等機構人員，駐河南軍師團營連軍官，多被吸收進入復興社，即使連河南的國術界與青洪幫也大都加入其外圍組織忠義會。²⁵河南的復興社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急遽擴張的結果，終而取得地方的絕對優勢地位。²⁶這種優勢在一九三六年全國國大代表選舉中獲得了充分檢驗，復興社於河南省囊括六十六名應選名額中的六十席（席位占有率九成一），CC大敗。²⁶總的來說，復興社在河南的積極活動除了與劉峙刻意優容有關，另外，當地CC系領導人李敬齋和陳泮嶺的內爭直接造成黨權日下，無力應付復興社異軍突起的變局，當也間接促成了社方的勝利，甚至在國民黨省黨部裏，復興社也占有三名常委中的一席，²⁷可見社方活動之殷。最後，國民黨內複雜的派系政治助長了復興社坐收漁利的機會，此即政學系和CC系之間的政治角力。

政學系與復興社、CC系不同，相對而論，他們沒有堅實的組織和廣大的群眾基礎，只是非正式的由一群政治觀點相近的朋友或具連帶關係者所凝聚成的一個無形派別。這個派系與復興社、CC系最爲接近的一點，可能就是對蔣中正抱以支持的立場。政學系成員行事一本技術經驗和官僚制度下的職業作風，並不追求意識形態的教條。許多省份的官員與政學系

有關，他們一直被描述為政府與黨的知識分子；多數的成員具備圓融的任事風格及協調能力，有時遂不免遭致「官僚政客」之譏評——在黨內，批評主要來自掌握黨權的CC系。根據一種普遍的看法，黃郛和張群是政學系的主要代表人，其他常被提及的名字有楊永泰、王世杰、熊式輝、吳鼎昌、吳鐵城、何廉、陳儀、吳國楨、沈鴻烈、熊斌、楊綽庵……等人。²⁸其中，在一九三〇年代前半葉，楊永泰是中國最有權力的政治官僚之一。²⁹

CC系與政學系積不相能，楊永泰尤遭CC所嫉；³⁰在戰前，兩派的對立以剿共時期最烈，即所謂「融黨於軍政」、「融政於黨」之爭。楊永泰時任豫皖鄂贛四省剿匪總部祕書長，為避免政出多元，乃強調集權於剿匪總部一身，融黨於軍政。此議獲蔣中正支持，於是透過剿匪總部把河南四省市國民黨組織變更：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由當地軍政大員兼任，下設書記長，多具私人關係；各縣設書記長。不論省縣均由書記長總縮實務，編制縮小，工作報告逕送剿匪總部黨政處，經費由總部發給。此後河南四省黨務機關漸成地方軍政領袖附庸，黨權也逐步自CC系移至政學系一方。為抗衡計，CC系提出融政於黨的辦法謀求反制，並發起護黨運動，爭取黨內元老奧援，最後終得以收回黨權，但組織形式不變，書記長負責制進而推展到其他省市。³¹CC系經此風波，銳氣大減；復興社則獲利許多。當「融黨於軍政」政策盛行之際，復興社乘機將勢力打入上述四省黨部，河南省黨部即曾一度受復興社在豫主要領導人蕭瀛控制；同時，隨著CC系政治地位削弱，復興社相形勢張，以河南、湖北

、安徽三省爲例，就有半數的縣黨部書記長加入了復興社或採接近立場。³²

復興社對各地黨務部門具有普遍的參與興趣，至於成效如何則視復興社、CC系與地方勢力三方面的互動消長而定。在開封，復興社挾河南全省優勢地位對該縣黨權持進取態度，一九三七年冬，社方與CC系競相爭奪縣黨部領導權，雙方久持不下，經調解由局外的國民黨元老派郭仲隗出任開封縣黨部主任委員，兩名副主任委員則由復興社的蕭灑及CC系王芸青分占。³³在山東，復興社山東分社書記秦啓榮兼具省黨部委員身分，由於韓復榘掌握該省軍政實權，復興社與CC系的競爭重心乃集矢於黨權方面，秦多次意欲在省市縣黨部安插社方勢力，但直到中日戰前仍無重大成就。³⁴在福建，復興社於一九三六年以前的處境困難，黨務部門完全由CC系有效掌控，其他領域則因國家主義派頗受省主席陳儀信任，復興社力量亦屬有限；經盱衡形勢後，社方力求避免和CC系正面衝突，至一九三八年復興社解散前，社方才取得了部分縣黨部的領導權。³⁵

在復興社與CC系爭奪政治資源的過程中，地方派系不失爲一項可資援引的強有力背景。湖南對此提供了顯著的例子。何鍵長期擔任湖南省主席一職，亟思掌握全省黨權，浸而導致反何、擁何之爭。反何者以彭國鈞、張炯爲首，實即CC集團，是爲「甲派」；擁何者以劉岳厚、毛飛爲首，反對彭、張等人，是爲「乙派」。兩派各樹勢力，鬥爭範圍幾乎遍及全省。復興社進入湖南後，爲發展基礎起見，於是積極爭取乙派；何鍵爲求奧援，對復興社在

湖南作爲亦傾向放任。俟一九三七年何鍵調任內政部長，結束湖南近九年的統治後，乙派頓失依附，形同瓦解，其骨幹份子大多被復興社所吸收，名詞上的甲乙派之爭至此告終，轉而正式代以復興社與CC系的組織對抗。^{⑤6}

除了黨政部門，爲了爭取知識分子和思想領導地位，文化界也成了復興社和CC系對峙情況嚴重的一環。復興社介入文化領域源於「民族復興運動」。^{⑤7}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復興社在南昌成立「中國文化學會」，推蔣中正爲名譽會長，鄧文儀爲理事長，蕭作霖任書記長；該會主張「以三民主義爲中國文化之最高原則，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吸收各國進步文化，創設新中國文化」，所謂「各國進步文化」，主要仍指新興的德意志民族運動。^{⑤8}中國文化學會的成立，象徵復興社有朝著一般文化領域擴張的趨勢。黃埔學生脫逸軍隊政工格局的行止，對在文宣方面早植根基的CC系而言自難漠視；況且，中國文化學會爲建立影響力，迅即選擇在上海建立分會，以帶動全國視聽，然CC系在該地文化界經營已久，兩造衝突似已不可避免。

一九三四年二月，復興社到滬籌組文化學會分會，獲市長吳鐵城及若干高等學校校長支持。未滿一個月，分會已招收會員七、八百人，其中半數以上爲各大專院校學生，大學教授占百餘人，餘爲中小學校長、教師、機關職員和少數作家、新聞工作人員。^{⑤9}CC系有文化經營權，卻無一全國性的統轄領導組織，面對復興社積極涉入文化領域，實備感壓力。三

月，由陳立夫等組織的「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在上海成立，陳立夫為理事長，潘公展任秘書長。該會主張發揚固有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在適應中國特殊國情的「中國本位文化」的基礎上，實行文化統制政策，建設新的文化體系。上述見解與文化學會並無顯著差異，究其實際，意在反制。^⑩在上海，雙方首先在大學教授和文化界之間展開人員的爭奪。包括市長吳鐵城在內的不少知識分子同時加入了兩會，但是復興社的文化學會擁有大批活動力較強的大專學員，聲勢一時凌乎其左。在暨南大學裏，復興社與CC系甚至爆發武力衝突事件。學生中復興社分子較多，本即佔有優勢，加上社方指派領導行動者出身黃埔，該員按軍隊建制將校內復興社的力量進行編組，公然在校內部署戰鬥行動，親CC系的學生難以抵禦，遭包圍封鎖無法出校。最後，經吳鐵城出面協調雙方談判，乃獲和平解決。據參與談判的蕭作霖指出，復興社的上海組織經此事件聲勢益壯；然而，可能由於陳立夫向蔣中正提出控訴，蔣重新對復興社的任務分工進行思考的結果，成立約八、九個月的中國文化學會旋即奉命解散。^⑪

復興社經此挫折並未中止伸展觸角的決心，前文所提黨政領域可徵其一，即以文化界而言，復興社對學校人事、青年群眾的爭取也未有輕怠。常見的情況是，復興社與CC系在各級學校競立小組織以吸收師生，兩派時相攻訐，「共黨、異黨分子」是習見的構陷理由。^⑫在河南，復興社於一九三二年成立分社後，立即吸收教育廳兩名科長王公度、簡貫三入社，以作為連絡文化界的橋梁，對於大學、中學的教職員生也大量吸納。一九三四年教育廳長魯

蕩平欲撤換省立第一師範校長田恩沛，由於田是復興社在豫省教育界骨幹，社方於是在開封集會示威請願，要求免魯職務，此係復興社和CC系在河南文教界的初次交鋒。接著，雙方競逐焦點移往河南省最高學府河南大學，社方勢力在河大成長迅速，最後迫走立場親CC系的校長。復興社河南分社控制了河大，教育廳也爲之囊括，其後在河南文教界發展順遂，CC已莫能與京。⁴⁵

復興社與CC系在各省教育界的競爭不僅是單純的組織對峙，同時還涉及存在已久的學派之爭。這些地方上的學派主要以院校出身爲劃分，平日嫌隙已深；復興社、CC系投入地方競爭後，各學派或主動攀附，或由復興社、CC積極援引，既往各地教育界的派系爭執於是轉爲組織間的對抗。以湖北教育界爲例，素有北大、武高、北高、一師等派系之爭，每年六月與臘月的校長任免調遷內情至爲複雜，當地人稱「六臘之戰」。一九三四年秋，復興社利用湖北女子師範學校撤換校長風潮，大舉吸收全省教育界成員，至一九三五年秋爲止，已能和省黨部、教育廳廳長爲代表的CC勢力相頡頏。據復興社吸收的一名女師教員回憶，當時湖北各級學校校長、主任及重要教員，幾乎非屬CC即爲復興社，超然兩派之外者僅占極少數；即使如CC系掌握廳長一職的教育廳，復興社也在各股長、督學裏從事發展，儼然形成一廳兩派之局。從此，自廳內到各校，雙方壁壘分明，過去學派成見之爭變爲組織意識的對抗。譬如一九三五年湖北省教育會理、監事改選的競爭即甚爲尖銳，選舉結果，復興社

擊敗了CC系。^④

國民黨各派系發展下層基礎時，對青年學生階層一向給予高度重視，復興社、CC系如此，改組派亦然，其原因不僅在於吸收、動員較為便捷，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執事者普遍具有「誰有青年，誰有將來」的心理。^⑤以CC系而言，忠實同志會成立後即紛紛赴各地憑藉原地方資源之力建立外圍的青年組織，這一類的組織一律稱社，上冠以不同字眼，其中最為後人所熟知者厥為一九三四年十月正式成立於北平的誠社，主要吸收北平各大學院校學生，成員最多時達二百八十多人。^⑥相對來說，復興社吸收青年學生的能力可能更為驚人，這主要是因為該社掌握了全國的軍訓管道。在中央，職司軍事訓練的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就是由復興社負責，復興社幹事潘佑強、杜心如等先後擔任處長；在地方，各省市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均由中央的軍教處委派，社方色彩濃厚；派駐各大、中學的軍事教官則幾乎盡為復興社成員。復興社本係一祕密性組織，軍事訓練的工作卻全屬明朗公開的範圍，因此，藉軍訓教育從中培植成員的作法應可獲事半功倍之效。其中，每年一度的學生軍事集訓特別提供了復興社便利的選拔甄別管道。

中國自一九三五年開始，連續三年在四至七月間，以省為單位，由當地國民軍訓委員會主辦學生軍事集中訓練，高中以上的學生必須經過這種包含軍事訓練及政治教育的集訓活動，才能參加全省會考取得畢業文憑。憑藉著與軍訓系統的連結關係，復興社各省市分社的書

記及幹部控制了各地學生集訓總隊的領導人事權，並從中甄別學員思想，以便於組織吸收。這個每年一度的大規模集中訓練，的確有助於厚築復興社的下層基礎，黃埔一期生、亦屬復興社的曾擴情就曾指出該活動是動員青年學生參加復興社組織的「大好時機」，一名江西的復興社分子則回憶道：「『復興社』在這個時候，達到了惡性膨脹的程度。」^④就政府而言，具官方活動性質的學生軍事集中訓練有其事實需要，否則不足以肆應內憂外侮迭生的變局；對性質仍屬祕密的復興社組織而言，這類公開活動場合卻翻轉成爲人力資源的選拔庫，對社務推展饒有裨益。

學者易勞逸認爲，復興社從未實現控制國民黨，以便將一種靈魂或一種新的革命精神注入這個老政黨的初衷。但是，復興社在國民黨和整個社會裏的影響力儘管難以估量，卻是巨大的。^⑤誠然，在一九三五年國民黨五全大會上，產生至少在形式上是最高執行機關的一百八十名中央執行委員、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名單中，復興社成員似乎只占了三個名額；^⑥在地方上，雖然復興社在少數黨部的人事上有突出的表現，但整體而言，仍難與以地方黨部爲主要根據的CC系相埒，復興社仍以軍隊黨部爲主要勢力範圍。不過，黨務部門的表現並不能完全盤反映出復興社的實力。在衆多陸續發表的憶述文獻中顯示，作爲一個活躍於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組織性派系，復興社的社會基礎與動員能力的確曾經受到人們低估。事實上，復興社與CC系是一九三〇年代國民黨政權下，最富組織能力與群衆基礎的兩大派系。^⑦二者均

以鞏固蔣中正的領導地位為職志，但彼此交鬥日烈，界線分明；這種惡質的競爭迄至中日戰起一年後仍未稍歇，部分地區且帶有武力色彩。^①在戰起前後全國力求團結的呼聲中，如何解決復興社與CC系的紛爭，遂成了兩造共同的領袖蔣中正必須深思熟慮的課題。

第一節 組織的統合與新造

國民黨自北伐統一全國後，內戰外患未能卻除，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的國民革命兩大使命始終難竟全功。在內外交迫的局勢下，國民黨的政策為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忍耐待時，即先安內，後攘外。^②這種重視內在基礎力的觀點，是蔣中正藉以回應外來挑戰的重要參考之一。然而，作為一個執政的主體而言，國民黨積弱成習的諸多毛病卻使得蔣陷入深沈的憂慮之中——如果革命失敗，國民黨是否還有再起的機會？^③站在一個國民黨員的革命立場，蔣在一九三三年的剿共行動中就曾表達他的危機意識：

隨著（北伐）軍事勝利，我們已在國內又造成一種革命的新形勢，可是我們仍舊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轍，接著軍事勝利，而無政治的改革，即不能乘時乘勢將舊的社會，改造成為一個新的社會以繼之。所以幾年來，我們革命的成績，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到今天已顯然證實我們幾年以來的革命又失敗了！至少也只能說是正在存亡絕續之秋。^④

蔣中正在文中認為「國際的環境，已不容許我們再失敗一次」，「改革政治，是目前起死回生救亡復興的唯一良方」。⁵⁵類似這種直接坦率的批評並非興之所至，偶一爲之；而且，至少在國民黨官方編定的一套蔣中正言論總集的內容裏看來，蔣於一九三五年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對黨務缺失的指陳有持續增加與更爲嚴厲的傾向。⁵⁶依照蔣的看法，正是因爲外在的挑戰不斷加劇，作爲內在基礎力的黨務與黨員更應祛除過去「因循弛懈，蔑視黨紀」的積弊，以勇於犧牲的精神作基礎，完成革命的責任。⁵⁷但是，蔣認爲國民黨人沒有切實負起這個責任。在五全大會閉幕後中央黨部第一次總理紀念週上，蔣中正力促同志從此猛省覺悟：

外國有革命黨，我們中國也有革命黨；何以外國的革命黨能夠建國，能夠成大功；我們有革命黨，國家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呢？……我以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一般黨員辦事不負責任，沒有精神！不能自動努力來研究改善與創造一切以報效黨國！……現在國家如此危急，如果本黨不能及此振作，領導全國國民起來共同救國，我敢說黨和國家決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來搖動我們黨國的基礎！我們的黨和國家就會要滅亡！⁵⁸

對於黨喪失了革命精神，「只存了一個軀殼，不成其爲理想的革命黨」，蔣中正深以爲慮，一再提請黨人注意。⁵⁹中央組織部在中日戰爭之前的兩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工作報

告中，均曾對此現象作過自省，認應設法糾正；⁶⁰然而，直到一九三八年，蔣中正仍然對國民黨深表失望。這一年三月在武昌舉行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發出了幾年以來口吻最為嚴厲，心情最為沉重的警告：

我請各位嚴重注意：我們的黨差不多已成爲一個空的軀殼而沒有實質了，黨的形式雖然存在，但黨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說這句話，心裏很悲痛，很難過，但是現在的情形，我們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敗。本黨既達到艱難而快要消失了，此時如不說，將更沒有說的機會，我們此時不懺悔，將更沒有懺悔的機會

。 61

在蔣中正看來，黨最顯著的缺點就是組織鬆懈，紀律廢弛，以致黨的精神衰頹散漫，黨的基礎異常空虛；而多數黨員意態消沈，生活鬆懈，興趣淡漠，工作懶散，尤其團體意識薄弱，個人成見私見甚深，以致不能切實作到爲國犧牲，爲民服務，爲主義奮鬥。這樣的黨「在平時已有不能存在的危險，何況在此嚴重艱難的局面之下，更如何負得起非常的責任？」⁶²

三青團正是在上述國民黨的形象欠佳、有失革命活力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組織；另一方面，三青團又是爲配合戰時統一領導的構想所建立的組織。關於此構想，就國民黨外而言，係指蔣中正有關黨派合作的提議：學者指出，一九三七年七月召開的廬山談話會即爲黨派合作的開端，國防參議會的設置即是容納各黨派一致抗日的具體行動，蔣甚至有與各黨派合組

爲「國民革命同盟會」的表示，到武漢後也曾對各黨派領袖表示其「化多黨爲一黨」的希望，但最後未能實現。⁶³儘管如此，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國民參政會還是非常符合蔣中正的願望，在蔣的領導之下，這個代表著不同政治派別利益的協商性組織，確把若干非國民黨的政治派別團結了起來。⁶⁴

另就國民黨政權內部而言，爲了便於對全國進行政治動員，政府嘗試加強蔣中正的權力，並在同時使他贏得更多民衆的支持。從戰爭開始以後，中央到地方黨政軍接連的改組事實可以充分見證當局的行動決心。⁶⁵此外，蔣中正還認爲，黨本身的整頓改造將是吸引國內其他黨派參與合作的先決條件，因此，蔣顯露了要求黨內各派青年幹部進行統一合作的企圖：「如過去黨部方面（意指CC系）和力行社以及改組派兩部份的青年幹部都要聯合起來，打成一片，立定一個重心，從新成立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⁶⁶事實上，這就意味着蔣中正預備將黨內幾個重要派系予以統合，並攝入一個新造組織的打算。

這項計畫有其合理性，因爲復興社與青白團等幾個以擁蔣爲主要目的的組織，現在隨著蔣中正的領導地位逐漸獲得黨內及舉國的一致承認而到了階段性功能結束的時候；同時，依照一些人的看法，國共在戰時開展的第二度合作氣氛，也使得以往因推動民族復興運動致與中共橫生摩擦的祕密組織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⁶⁷然而，這項計畫也有其矛盾處：如果三青團被賦予了革新國民黨積弊、增補國民黨活力的任務，那麼多年以來參與中央、地方黨務

甚深，理當為黨的缺失負起相當程度責任的CC系何以又能成為三青團的組建力量之一呢？

多年以來，蔣中正正在一些黨內場合從不掩飾對黨務的失望之情，這可能就是本文下節即將述及三青團實以未在黨務方面負責實際責任（軍隊黨部除外）的復興社為重心的主要原因，其目的係用以向國民黨發揮良性刺激的功能，而以CC系在團內扮演適度節制復興社勢力的角色。根據三青團中央編定的團史記載，三青團的實際籌備工作始於一九三七年五月，惟團史對此再無說明。⁶⁹事實上，所謂籌備工作可能意指復興社的改組行動。復興社首任書記滕傑

⁶⁹認為是時改組復興社的理由有三：一為國家已經統一，但青年組織尚未統一；二為國民黨組織與復興社之間的摩擦，已然對黨形成極大的傷害；三為復興社內的同志已不可能團結。約在五、六月間，蔣中正似乎即已授意某些復興社重要幹部草擬改組計畫，賀衷寒於六月二十二日赴廬山謁蔣，目的之一就是呈遞一份改組計畫書，其意見為後來的三青團所採納；⁷⁰康澤也曾研擬一「中國青年挺進隊」的計畫覆命，之後三青團參酌了其中的精神與作法；⁷¹另外，滕傑與左鐸二人也經社內幹部公推起草方案，據滕傑晚年回憶自己的計畫正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案」，此經復興社幹事會直接通過，眾人推舉了書記長鄭介民在七月初將滕、左兩份較富公意基礎的案子帶到廬山呈報蔣中正等候裁奪。⁷²

蔣中正一向認為國民黨對於全國民眾，特別是對一般青年富有領導的責任，但是他頗懷疑黨吸引青年、讓人民誠心服從領導的能力，他表示這主要還是黨員剋虧職責，黨「衰老腐

敗」的緣故。⁷³復興社有意改組為青年團正好可以救黨之窮，蔣難能毫無所動。這是因為建立一個青年團的構想，明顯的係承繼自蘇聯、德國、意大利、土耳其等國統一組訓青年的啓示，而非英美政治意味較低的青年團體模式；蘇聯等國的建設經驗向為蔣中正和復興社社員所留意，對青年團的功能成效當能有一定的了解，⁷⁴況且在中國，中共與中國青年黨先行藉自己的青年團來吸納年輕成員的歷史，或者亦可對沈痾漸深的國民黨發揮若干引導作用。⁷⁵可能基於如上，或許還有更多的考量，蔣中正終於決定成立青年團；在此同時，或更前一段時候，蔣打算組織三青團的消息已不脛而走，並且至少在某些傳佈消息者的認知裏，這將是一個政黨。⁷⁶

迨中日戰起，蘇嘉國防線被日軍突破，南京形勢緊張，蔣中正深感青年團有從速建立，以加強國民革命繼起力量的必要，於是在秋天於南京中山陵園召集陳立夫、劉健群和康澤三人，表示抗戰方興，過去祕密的小組織形式已不合需要，要來一個大組織，把黨部的（指CC）、同學的（指復興社）和改組派（指汪兆銘方面）都團結起來，並以此為中心，再求各黨各派的團結和全國的團結。此後，四人每三天或一周集議一次討論相關事宜，設置青年團的構想似乎這時才在復興社與CC系之間獲得意見交換的機會。最後，蔣中正在校官邸召集CC、政學、黃埔、復興社等派系重要人物，含陳立夫、吳鼎昌、何廉、何應欽、康澤等人，會中蔣公開宣布將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並解釋其目的在於讓三青團吸收那些擁戴三民主

義為建設新中國基本原則的青年。吳鼎昌隨即建議將該組織改稱為「蔣介石青年團」，以求名副其實，蔣微笑不語。這樣，蔣中正組織三青團的構想於是正式傳達給了黨內幾個擁蔣立場鮮明的派系。^①

事實上，CC系對設置三青團一事存有若干不同的意見，這主要是與團的組織方式及名稱有關。根據三青團團史記載，這些異議可分為三類：一、主張在黨內設青年部，不必另設青年團；二、以為青年團不必冠以「三民主義」字樣；三、以為團的組織應與俱樂部相似。^②幾個月來，再組黨之說未絕如縷，CC份子對蔣中正設立三青團的真實意圖勢必有所疑慮，上述第一、二類意見旨在讓新機構納入黨的體制，以示層級有序，第三類意見則求新機構的政治色彩減至最低，然均未被蔣中正接受。據康澤回憶與蔣中正、陳立夫、劉健群討論至新組織的名稱問題時，康、劉二名復興社幹部主張用「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夫說：「黨裏面有幾個人的意見要加上『中國國民黨』幾個字。如果用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中正未待陳說完即表示：「有你這『中國國民黨』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義來號召的好，用我的名義來號召的好。」^③可見蔣思慮所在。

另一方面，統合黨內各派以成立三青團的消息經康澤透露給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與改組派極有淵源的谷正綱。經由谷正綱的管道，汪兆銘獲悉這項消息。^④接著，

至遲在十一月，CC系、復興社、改組派三方在南京開始會商三青團的籌組事宜。⁸¹不過因為戰事吃緊，國民政府人員分別向武漢和重慶撤退，三青團的初期籌畫工作也隨之暫告停頓。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國民黨五屆第六十六次中常會鑒於「國難嚴重，負荷艱鉅」，決議於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⁸²二月五日，蔣中正正在武漢召集復興社高級幹部舉行一場可能是自西安事變過後一年多來首次較具規模的社內幹部會議。會中蔣坦陳復興社諸多缺失，「其中最壞的一個現象，就是內部自相磨擦，招致外人攻擊，或者是幼稚驕傲，債事招怨」，⁸³蔣中正憂心忡忡的告誡他的學生：

大家試回想自民國十三年，本黨革命的力量和國家統一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就是組織這個團體的黃埔師生所造成的，……現在我們是處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武力壓迫之下，我們的敵人擁有近代新式的武器，對我有長久的侵略準備，而且他以外族入侵，兇橫殘暴，無所不用其極，不僅要亡我們國家，而且要滅我們種族，我們如果不夜以繼日，竭智盡忠將國家的事情拿來研究，將困難的問題設法解決，則不僅不能革命，而且將使國家民族在我們手裏整個斷送！⁸⁴

蔣中正於國民黨甫決議通過舉行臨全大會後二日即召集復興社幹部進行內部會議自有其深意。在逐一批評社方各種缺點並要求社員「朝夕警惕，埋頭苦幹」後，蔣中正迅即掉轉話鋒，表示臨全大會將屆，「這一次會議應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是關係抗戰建國根本大計的國內各

黨各派的問題」，而「我們要統一或聯合國內各黨派，首先就要使本黨自身加以整頓改造」。蔣中正認為成立三青團正是改革國民黨的一項具體措施，該團成立時機尚未定奪，但蔣要求大家應在此期間就團的問題「多多商議，總要形成黨內有一個重心，有一個精神，來管束支配指導一切。」⁶⁵換言之，蔣中正在這篇自稱是「西安事變以來（對復興社）第一次最重要的訓詞」⁶⁶裏，賦予復興社兩項主要的任務，其一為整頓社務，力戒昔日缺失；其二係替即將設置的三青團擘畫獻策，開創新局。然而三青團既是取代過去幾個祕密小組的公開團體，未來復興社等組織似無繼續存在的可能，所謂整頓社務，無非是為將來轉化成公開的新團體做準備，此當為蔣中正召集復興社重要幹部進行會商的要旨所在。

大約在二月底或三月初，蔣中正交下三張人事手諭，含即將於臨全大會後新置的黨務委員會、訓練委員會名單，與三青團籌備委員會名單。康澤回憶，蔣自稱設立黨務、訓練二委員會的用意在於「臨全會沒有選舉，黨裏有些幹練的青年不能選為中委，因此提出這些人組織黨務委員會、訓練委員會增加組織部和訓練部的力量」。這樣，原本在黨中央未能占有份量的復興社份子，在黨在團均有了若干議事的地位；並且，就三份名單的內容看來，至少在形式上頗能落實蔣中正近來一再提出統合黨內派系的企圖。⁶⁷這些舉措為即將舉行的臨全大會營造了有利氣氛，並且符合戰爭開始以來朝野空前的團結熱情。臨全大會於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殉國紀念日」起，在武昌一連舉行四天，蔣中正獲出席代表推選為總裁，自

此確立了個人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同時，為反映黨派合作的現實需要，大會決議設立國民參政會；另外，出席大會的黨代表也通過設置三青團。⁸⁸

設立三青團的規定係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提〈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裏，作為改進與調整的原則之一。案文稱：「本黨應以執政黨之地位，訓練全國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義，故應設立青年團，將預備黨員制取消。」並規定該團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設之，辦法另定。本案在三月三十一日舉行的臨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中付諸討論，四月一日凌晨決議通過。⁸⁹國民黨從一九二九年三全大會第二次修正總章始，另劃預備黨員的作法至此宣告結束；⁹⁰三青團經由大多數國民黨的全會代表舉手同意設置，⁹¹並在國民黨修正後的總章中取得了法源依據。⁹²在這份黨的最高章程裏明文規定著「本黨為訓練青年設青年團」，就黨的立場，已充分流露其間統屬的高下關係，但事實不然，新造的三青團形同自主，此與復興社掌控團務全局、蔣中正統合黨內各派系的聲明未能成為事實有關。

第二節 三青團權力結構分析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次夜，即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晚，蔣中正面召陳誠與復興社、青白團重要幹部多人，著令取消兩組織，表示今後活動一切公開。⁹³這次非正式的集會底定了復興社與青白團的存廢命運；接著，緊隨臨全大會舉行的五屆四中全會於四月六日第一次會

議裏通過了〈黨內不許樹立派別與任何小組織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案〉等和復興社、青白團息息相關的決議，⁹⁴此舉可視為黨務機構進一步落實蔣的面諭的努力。事實上，國民黨關於「黨員不得有小組織」的禁令始自一九二九年的三大大會，禁止結派的條文從此具體載入黨的總章，⁹⁵然派系本為政治運作下的自然產物，因此總章的相關規定不啻形同具文，復興社、青白團均成立於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即為一例。基於實際的黨務運作經驗，五屆四中全會對派系組織的禁令很可能又將是一次空洞乏味的決議案，然而現在懷於蔣的強力要求，⁹⁶當初為鞏固蔣的領導地位而成立的兩大派別組織不得不以蔣的意志為轉移，遂著手結束組織。

兩個組織著手結束是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同步進行的。近三十名復興社中央級幹部至少在湖北省書記干國勳位於武昌的家中集會了兩次，共商社務善後事宜。為開誠佈公、齊一步伐計，蔣中正特派非社員的陳誠、陳立夫二人參與指導，陳誠執行了會議的主持工作。⁹⁷另一方面，在三青團於七月正式成立之前，復興社在武昌還召開了一場為期三天的全國代表大會，⁹⁸來自總社中央及各省分社代表參加了此一收場意味濃厚的會議。黨內各派系要人奉蔣之命亦列席其中，含陳誠、陳立夫、戴傳賢、王世杰、朱家驊、張厲生等。會議由賀衷寒、劉健群、康澤等人輪流主持。會場自始即瀰漫著一股浮動不安的情緒，這種氣氛同時又被禮堂裏幾對白布黑字標語給激化了起來，致有「進入會堂如孝堂」、「奉安會議」之譏。幾位

先後擔任過總社書記長的大會主席顯然沒有充分控制住會議秩序，當一名前書記長在政治報告中鼓勵與會者踴躍加入即將成立的三青团時，會場各角落逐漸匯集傳出一陣鞋底磨地的聲響，代表們用此無言的抗議表達對組織結束的感想，而復興社各領導人並未立即阻止這項行為。⁹⁹

復興社爲一祕密性組織，團體與蔣中正之間呈現一種類似直系血緣的緊密關係，在以擁蔣爲最高前提下，組織成員彼此存在著一體共生的信念；然而組織一旦取消，今後代之以公開如三青团之類的機構，姑不論復興社與CC系前此六年間閱牆行爲不斷，其他派系的混合加入勢必對原派系的一體感有所妨礙，復興社思慮如此，¹⁰⁰CC亦然。經妥善安排後，陳果夫、陳立夫二人在漢口召集忠實同志會及青白團成員代表們開會傳達解散組織命令，會議由陳立夫主持，陳果夫進行報告。如同復興社的結束大會一樣，二陳對會場秩序也不能完全掌握，某些CC成員爲保護派系利益而起的叫嚷聲與顯著的肢體行爲暫時打斷了陳果夫的口頭報告，會議至少一度失控。¹⁰¹

儘管復興社成員哀歎組織解消，並對今後前途普遍感到迷惘，但是蔣中正正在國民黨通過設置三青团前，早已屬意由原復興社勢力執行這個嶄新、公開化組織的較多實際事務。蔣意念形成的時間不易精確判定，然而在蔣反對三青团冠以國民黨之名時似已可粗見端倪。一九三八年三月初，距臨全大會舉行前不到一月，復興社書記長康澤請示蔣是否可移植該社「

精神」至即將成立的三青團裏，及各地復興社同志能否根據自我意願率先入團等事項，均獲蔣肯定答覆。臨全大會閉幕後，康澤在一次謁見的機會中再度提出三青團問題，請蔣考慮確定團的「核心」，蔣稱：「當然復興社是核心。」康澤復請定一人為重心，蔣答：「當然你是這個工作的重心。」¹⁰⁰可見蔣立場所在。

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案〉，¹⁰¹密集的籌備建團工作旋即展開。¹⁰²蔣中正指定譚平山、陳立夫、康澤等人起草三青團的章程，最後，由康澤主持，復興社宣傳處幹部協助擬就的草案成爲六月十六日團章正式頒布的主要藍本。¹⁰³三青團團章公布的日期寓有深意，一九二二年這天陳炯明對孫中山實行叛變，即國民黨史所稱「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日」；一九二四年同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象徵孫中山與國民黨爲避免重蹈覆轍，思以主義爲信仰，尋求自樹武力的決心；而日後的復興社正是由這所軍事學校的畢業生所倡議組成。從團章頒布日期的角度觀察，三青團與黃埔系、復興社在某一種形式上產生了連結關係，這種關係又因康澤主導團章的成形而更加增強了。

復興社研擬的團章大致與國民黨之間維持一種模糊不清的距離，人們難以在其中發現黨團具有任何明確的統屬關係；且儘管有些CC分子反對，但最終三青團在團章中仍享有較寬鬆的入團年齡規定。這些制度面的不安因素從而預示了將來黨團爭執的伏筆。而六月十六日團章頒布當天，蔣中正特以團長身分發表〈爲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全國青年書〉，文中揭

聚三青團產生的三點意義：一、爲求抗戰建國之成功；二、爲求國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三、爲求三民主義之具體實現。一些人開始揣測所謂「新的力量之集中」是否即意味著三青團將是在蔣領導之下，繼國民黨而起的一個較富革命熱情之政治性組織或政黨。凡此種種，均對即將開始運作的黨團關係妨礙甚巨。^①最後，隨著三青團組織人事的逐步開展，復興社取得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團務重要支配地位。

六月十六日，蔣中正選派中央臨時幹事卅一人，以陳誠等九人爲常務幹事，並以陳誠爲書記長，組織中央臨時幹事會，於七月九日（北伐誓師紀念日）在武昌正式成立。蔣中正自兼團長，幹事會下設書記長辦公處等七處，處以下分組或室。臨時幹事會成立甫兩月，書記長陳誠因肩負前方軍事重寄，蔣乃加派中央黨部祕書長兼三青團中央臨時幹事會常務幹事朱家驊兼代書記長職務。團中央各處組室組織其後迭有變動，此處不贅。而爲配合團務實際發展，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中央幹事會正式成立於重慶，蔣中正選派陳誠等卅五人爲幹事，程思遠等十五人爲候補幹事；並指派陳誠等九人爲常務幹事，仍以陳誠爲書記長。一年後，即一九四〇年九月，陳誠復以軍政事務繁忙，無暇兼及團務爲由，呈請辭職，且另辭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一職，專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蔣令調張治中爲政治部部長，兼三青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央幹事會幹事任期屆滿，蔣重行選派張治中等四十九人爲幹事，毛慶祥等十九人爲候補幹事，書記長張治中。^②

以上為三青團自一九三八年成立到一九四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間的中央幹事會機構與人事的變遷概況，該會可視為團中央權力重心所在，其地位等同於國民黨內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團的常務幹事則等同於黨的常務委員。對中央幹事會人事派系屬性的分析，將有助於了解復興社在三青團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茲表列如下（表一）：

表一：三青團中央重要人事職名派系屬性分析（一九三八、七—一九四三、四）

◀中央臨時幹事會（一九三八、七、九正式成立）				
職 銜	姓 名	派 系 屬 性	備 註	
書記長	陳 誠	黃埔教官	（一九三八、七、九—一九三九、八）	
書記長代	朱家驊	朱家驊派	代理（一九三八、七—一九三九、八）	
幹 事	陳誠等 三一人		（復興社：五；親CC：一〇；親陳誠：五；政學：二；親新桂：三； 粵：二；孫科派：一）	
常務幹事	陳 誠	黃埔教官		
常務幹事	陳立夫	CC		
常務幹事	朱家驊	朱家驊派		
常務幹事	譚平山			

書記長	張治中	黃埔教官	(一九四〇、九、一、起)
幹事／候幹	陳誠等		(復興社：一四；親CCC：一一；親陳誠：一〇；改組派：二；政學 ：一；親新桂：二；晉：一；粵：二；孫科派：一；夫人派：一)
五〇人			
常務幹事	陳誠	黃埔教官	
常務幹事	陳立夫	CC	
常務幹事	譚平山		
常務幹事	張厲生	原CC，親陳誠	
常務幹事	段錫朋	原CC，親陳誠	
常務幹事	賀衷寒	復興社／黃埔一期	
常務幹事	黃季陸	胡漢民派	
常務幹事	鄭彥棻	粵	
常務幹事	李惟果	復興社	
組織處長	胡宗南	復興社／黃埔一期	辭職
組織處副	康澤	復興社／黃埔三期	
組織處副	程思遠	新桂系	
組織處副	鍾天心	孫科派	
訓練處長	王東原	親陳誠	

◀ 中央幹事會(一九四一、二—一九四三、四)				職銜	姓名	派系屬性	備註
訓練處副	戴之奇	復興社／黃埔系／ 親陳誠	辭職				
訓練處副	梁化中						
訓練處副	徐君佩	復興社					
書記長	張治中	黃埔教官					
幹事／候幹	張治中 等六八人						(復興社：二四；親CC：九；親陳誠：九；改組派：三；親朱家驊：三；夫人派：二；粵：二；孫科派：二)
常務幹事	張治中	黃埔教官					
常務幹事	陳立夫	CC					
常務幹事	段錫朋	原CC，親陳誠					
常務幹事	張厲生	原CC，親陳誠					
常務幹事	賀衷寒	復興社／黃埔一期					
常務幹事	梁寒操	孫科派					
常務幹事	李惟果	復興社					
常務幹事	范予達	改組派，親朱家驊					

常務幹事	陶百川	CC	
常務幹事	谷正綱	CC	
常務幹事	何浩若	復興社	
組織處長	康澤	復興社／黃埔三期	
組織處副	湯如炎	復興社／黃埔四期	
訓練處長	倪文亞	復興社	
訓練處副	張桓	復興社	

備註：保守的說，各勢力所占幹事、候補幹事名額可能比本表所示略多，但實際上與筆者提供的數字不會相差太遠，也無礙於後文進一步的解釋。

資料來源：職名的部分參見李雪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二三二—二四三；人事派系屬性的部分依據本書所列徵引書目相關內容編製而成。

上表呈現了若干訊息。首先，書記長（地位等同於黨的中央祕書長）一職主要由黃埔系教官系統擔任。再者，復興社（含黃埔系學生系統）未在常務幹事會中占據多數席位。第三、三青团成立伊始，復興社在（臨時）中央幹事會裏所占人數少於CC及其親近勢力，其後復興社人數比例日高，CC勢力與黨內其他派系（如新桂系、政學系等）已難能望其項背。第四、團中央責任最重，負責實際組訓責任的組織、訓練兩處基本上由復興社掌握。

整體而言，三青團中央人事實質上由復興社占優勢，形式上則頗能妥協黨內各方，兼顧各派系勢力。從復興社未能掌握書記長與常務幹事會、初期幹事人數少於CC及訓練處長由親陳誠的王東原擔任等方面觀察，可以視為對該社在團內勢力的適度牽制，但這種牽制隨後即獲得相當程度的抒解，復興社所占幹事名額遽增及取得訓練處負責地位就是最好的例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復興社末任書記長康澤全盤掌控了團的組織要權，並在地方支團人事問題上持有相當份量的決定權，儼然蔣中正所謂團之「重心」所在。^⑩

康澤，四川人，黃埔軍校第三期生，一九二五年受甄選赴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修習，一九二七年返國後歷任中央黨務學校訓育員、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總司令侍從室侍從參謀、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訓處主任、陸海空軍總部宣傳大隊長、總政訓處第一宣傳大隊大隊長、《中國日報》社長，富組訓、宣傳才能。一九三二年與黃埔軍校早期學生發起組成復興社，曾任該社宣傳處幹事。一九三三年出任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總隊長，推動民衆組訓、情報偵查、軍事特訓等工作。康澤受蔣中正特達之知，中日戰起，已身兼多項要職，含復興社書記長等，一位復興社成員即指出，「此為康氏一生中，『權勢』與『責任』最繁重的時期」。^⑪此言大致不虛，但事實上，其後三青團組織處長（地位等同於國民黨的組織部長）一職更遠能促使康澤在中國各地得到發揮其優異組織能力的機會。人們對康澤的評價呈現兩極化的現象，美國駐華使館人員視其為與戴笠並稱的中國兩大「謎樣人物」(mystery men)，以優異的

組織長才見稱；⑩一位復興社幹部且指出：

青年團……負組織實質者以康澤同志為最久而專，康責任心頗強，魄力幹勁亦足，康澤乃成了青年團中央組織的重心，渠為力行社最後一屆書記，日後成為青年團的重心，其來有自也。⑪

三青團成立後，原復興社社員轉為團員與否悉聽自由，有的成員歸入戴笠主持的軍統局，更多的人隨著康澤參加了三青團。⑫在客觀態勢上，由於三青團的「社方」色彩過於濃厚且掌握了可觀的力量，於是多數復興社社員的主觀見解上，多將後起的三青團視為復興社的繼續與延長。⑬這對於和復興社同遭解散的青白團等CC系組織而言自難謂公允，一名CC份子，在多年後的回憶中仍不禁坦率指陳「復興社借屍還魂，青年團至此變質」；⑭CC系領導人陳立夫則逕指康澤動機可議，將康的任事風格視作「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團是（有別於黨的）另外一個組織」，陳並批評蔣中正助長了這種「兩個組織」的風險。⑮

由於蔣中正控制三青團中央與地方重要人事的最後決定權，因此，復興社在三青團中比CC或其他派系占據優勢的情況和蔣的意向有著密切關係。⑯這種優勢在地方團部裏更能充分彰顯。在武漢時期，各省支團部⑰刻正籌畫成立，CC系曾提出一些地方負責人名單，但幾乎全遭否決。⑱同時，由於康澤執組織處實權，便於將三青團工作人員訓練班（簡稱青幹班）第一期結業學員大量安插到地方基層開展團務，與CC系有關的學員相形之下絕難占據

有力職位；一九四一年第二期起，康澤並負起青幹班實際責任，這對康澤的核心地位自有鞏固作用。①根據一份一九三九年三青團成立一周年工作報告所臚列地方團部重要人事的名單分析，復興社(含黃埔系)在各地團部籌備處主任、書記的位子上，最少取得了過半數的優勢(表二)：

表二：三青團地方團部籌備處領導人派系屬性分析(一九三九、七)

團部名稱	主任(派系屬性)	書記(派系屬性)
廣西支團部籌備處	黃旭初(新桂系)	程思遠(新桂系)
山西支團部籌備處	——	——
山東支團部籌備處	秦啓榮*(復興社/黃埔六期)	——
貴州支團部籌備處	黃宇人(復興社/黃埔四期)	鄭代恩(復興社)
廣東支團部籌備處	蔡勁軍(復興社/黃埔二期)	李國俊(復興社/黃埔四期)
甘肅支團部籌備處	胡維藩*(復興社/黃埔六期)	寇永吉(復興社)
青海支團部籌備處	王文俊(親朱家驊)	原春輝(CC)
四川支團部籌備處	任覺五*(復興社/黃埔四期)	李天民(復興社/黃埔系)
重慶支團部籌備處	陳介生(復興社/黃埔系)	余琪(——)

陝西支團部籌備處	谷正鼎（CC）	葛武榮（原復興社／黃埔二期，親CC）
長沙區團部籌備處	劉業昭（復興社）	羅正亮（——）
直屬西昌區團籌處	陳志明（——）	季福生（——）
直屬成都區團籌處	任覺五*（復興社／黃埔四期）	李天民（復興社／黃埔系）
直屬蘇北區團籌處	——	——
直屬蘭州區團籌處	胡維藩*（復興社／黃埔六期）	寇永吉（復興社）
直屬第一區團籌處	桂永清（復興社／黃埔一期）	孫伯齋（——）
直屬第二區團籌處	唐冠英（黃埔教官）	胡軌（復興社／黃埔四期）
直屬洛陽區團籌處	王汝泮*（復興社／黃埔四期）	馬紹強（復興社）
江漢區團部籌備處	——	——

備註：一、名後有*號者曾擔任復興社在該省分社書記一職

二、——：資料來源空白

三、——：資料不明或派系屬性不明顯

資料來源：各團部與職名的部分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一年來工作報告》；派系屬性的部分依據徵

引書目相關資料編成。

如果說復興社在三青團中央仍得面臨其他派系的些許制衡，那麼這種制衡力在各省市地方可能要更爲有限。以上表爲例，復興社在廣西本即未能立足，^⑭新桂系囊括團的領導權並不爲奇。^⑮陝西的情況則涉及康澤與當地胡宗南的政治角力，最後，胡宗南及其親信楊爾瑛獲得了陝西支團的領導地位，由於胡、楊二人亦均爲復興社分子，陝西的團務實際仍由復興社取得優勢。^⑯復興社的優勢地位不僅限於一地，而且非只活躍於一時，在一九四二年的一份名單上可以發現，復興社（含黃埔系）繼續至少保持了過半數的省市團部領導權（表三）：

表三：三青團地方團部籌備處領導人派系屬性分析Ⅱ（一九四二、二）

團 部 名 稱	主任（派系屬性）	書記（派系屬性）
重慶支團部籌備處	包華國（復興社）	羅才榮（復興社／黃埔系）
四川支團部籌備處	任覺五*（復興社／黃埔四期）	李四榮（黃埔系）
湖南支團部籌備處	李樹森*（復興社／黃埔一期）	劉業昭（復興社）
湖北支團部籌備處	張伯謹（親陳誠）	鄧維漢（復興社）
廣東支團部籌備處	李漢魂（粵系）	李國俊（復興社／黃埔四期）
廣西支團部籌備處	黃旭初（新桂系）	粟裕蒙（新桂系）
江西支團部籌備處	蔣經國（蔣經國系）	胡德馨（親朱家驊）

福建支團部籌備處	黃珍吾*（復興社／黃埔一期）	韓文溥（軍校高教班二期）
河南支團部籌備處	王汝泮*（復興社／黃埔四期）	李名章（復興社）
陝西支團部籌備處	胡宗南（復興社／黃埔一期）	葛武榮（原復興社／黃埔二期，親CCC）
甘肅支團部籌備處	胡維藩*（復興社／黃埔六期）	寇永吉（復興社）
青海支團部籌備處	王文俊（親朱家驊）	原春融（CC）
雲南支團部籌備處	裴存藩*（復興社／黃埔三期）	劉志寰（黃埔四期）
貴州支團部籌備處	黃字人（復興社／黃埔四期）	季天行（黃埔六期）
西康支團部籌備處	陳志明（——）	——
山東支團部籌備處	秦啓榮*（復興社／黃埔六期）	朱永寶（——）
山西支團部籌備處	薄毓相（——）	谷深甫（——）
安徽支團部籌備處	萬昌言（親張治中）	孟民希（復興社）
浙江支團部籌備處	官鐵吾（復興社／黃埔一期）	陳奮正（復興社）
綏遠支團部籌備處	趙仲容（親傅作義）	王明德（——）

備註：一、名後有*號者曾擔任復興社在該省分社書記一職

二、"——"：資料來源空白

三、"——"：資料不明或派系屬性不明顯

資料來源：各團部與職名的部分見《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務概覽》，頁三八—四〇；派系屬性的部分依據徵引書目相關資料編成。

復興社在多數逐步開展團務的省份都建立了一套「社」與「團」的銜接模式，以確保既有基礎不致急速流失，並謀力量轉化與擴充。觀察上列二表可以發現，秦啓榮、胡維藩、任覺五、王汝泮、李樹森、黃珍吾、裴存藩均曾分別擔任復興社原山東、甘肅、四川、河南、湖南、福建、雲南分社書記，^⑭地方基礎雄厚，三青團中央成立後即陸續肩負起當地籌備建團任務，原復興社資源自然大量挹注其中。以王汝泮主持下的河南團務為例，直屬洛陽區團部籌備處於一九四〇年五月改組為河南支團部籌備處，團中央派王汝泮等七人為籌備幹事，內五名係復興社份子，且占有主任、書記職位，餘兩名幹事名額中，一名具軍事背景，CC系僅占一名，點綴意味濃厚。^⑮除了掌握地方團部重要人事之外，復興社既有的地方組織資源，含各人民團體（商會、工會、學生會……）等，也透過「社」、「團」的銜接程序，轉換成三青團的團務發展和社會動員基礎，^⑯這對於復興社而言係實力的保存與再造，對三青團來說，的確也提供了工作推展的便捷管道。

就團體利益的角度論，復興社轉移原組織資源的心理不難令人理解。舉復興社最重要的出版機構拔提書店為例，自然也順理成章的轉移到三青團內。^⑰一個有趣且意涵豐富的問題是：何以復興社的書店進了三青團，而不是CC系轄下的出版單位（例如正中書局）進來？讀者經思考以後，可以領略復興社解散後所受壓力似乎要比CC系青白團來得大，後者仍有黨為腹地，前者則非團不能接續原組織利益。這樣一來，三青團經由復興社原有資源擴展而成

的結果，使得兩個團體之間具備令人注目的、廣泛程度的承繼關係；這種關係讓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八年間復興社與CC系的政治糾葛獲得了延續——以三青團為化身的復興社，和以國民黨黨務部門為根據的CC系重演了以往的對峙狀態，並且還要隨著本文第二章即將探討的黨團雙軌體制問題而愈見嚴重。

註釋

① 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p. 141-142.

② 由於相關專著缺乏這方面更多的情節，因此，第一節對復興社和CC系競爭的分析將是初步的，不過，筆者引用中國各地自一九八〇年代以降陸續發表的大量文史資料文獻，將有助於讓此論題較以往獲得清晰印象的機會。

③ 由於組織層級多元，本書所指的復興社除極少數個別狀況外，均為通稱。復興社的成立日期說法不一，且各層組織成立日期也有分別，其中，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是較常被提出的日期，成立地點為南京，蔣中正親自主持；同一天，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開幕，蔣中正並未出席。

④ 關於黃埔系，參見：張智強、陳勇（編著），〈鐵血黃埔〉（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陳寧生、張光宇，〈蔣介石的戰爭機器〉（台北：偉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較簡明的概說可參考：李松林（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頁六

11 H. - 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72), pp. 52-54;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The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 105.

⑤楊天石摘引蔣中正〈日記類抄〉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內文，楊天石，〈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讀蔣介石〈日記類抄〉〉，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民國八十五年），頁三七。該日記類抄係由毛思誠根據蔣中正日記原本摘錄，文革時期搜出，現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楊天石認為蔣中正下野的真正原因為當時內外交困的政局不利於蔣所致，並非如蔣自云「余不能自主」使然，不過，蔣中正這番看法以及日記其餘多處對黨內政敵的忿懣言論，均足以高度展現蔣個人在思想上的性格化層面。參見：台北〈聯合報〉，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

⑥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 143. 鄧元忠，〈民族復興運動在民國史中的意義〉，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三冊（台北：編者出版，民國七十年），頁二五二，學者胡春惠在會中的討論發言；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台北：實踐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頁三二一五七。一本由廣東反蔣勢力編著，一九三四年初版的書籍對歷來各方的反蔣運動作了史實的敘述與文獻的提供，中國青年軍

人社（編著），《反蔣運動史》，上、下計二冊（台北：李敖出版社，一九九一）。

⑦ 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 143.

⑧「藍衣社」是另外一個盛行的稱謂，這個名詞多半緣於人們對該組織抱著一種神秘、不明底蘊的見解所致，並非組織的正名。有關復興社的研究作品，鄧元忠與易勞逸、張俠的論述較爲人所熟知，三人除了就該團體爲題研撰的多篇論文外，尚有二本重要專著，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Maria Hsia Chang,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Fascism and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在台灣，還有幾本以復興社爲主題的學位論文，王進義，〈三民主義力行社組織與策略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九年）；劉慶祥，〈力行社與安內攘外政策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七年）；並參見：馮啓宏，〈法西斯主義對中國三〇年代的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至於簡明的概說，參見：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二四〇—二四一；秦孝儀（主編），〈中國現代史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現代史辭典——史事部分（一）〉（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頁二一九；李松林（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頁六一；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 200—201;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66), pp. 97—98;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p. 54—65.

9 「CCC」之名即從“Central Club”一詞，或二陳姓氏英文字首而來。陳果夫、陳立夫從未公開承認中央俱樂部、CC系的存在，見：淑文，〈陳立夫談CCC〉，〈新聞天地〉，第二〇期（上海：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一日），頁一三；上海《字林西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第一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九），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頁二二四；陳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間從事黨務工作的回憶〉，陳果夫（著），陳果夫先生遺著編印委員會（編），〈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冊（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四十一年），頁八二—八三；陳立夫，〈我所知道的先兄果夫〉，陳立夫（著），弘毅齋藝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毅齋藝文集〉，下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八年），頁五〇六—五〇八；陳立夫，〈成敗之鑑〉，頁四三五—四三七；〈陳立夫先生來函〉，台北《自由時報》，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陳立夫，〈駁陳訓慈「先兄陳布雷雜憶」文中所捏造故事〉，〈傳記文學〉，第七一卷第三期（台北：民國八十六年九月），頁五七；張正非，〈CCC集團在江蘇的勵進社〉，〈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二〇輯（南京：一九八七年六月），頁一二七；承紀雲，〈我所知道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五輯（南京：一九八四年九月），頁九七；董霖，〈六十載從政講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年），頁一一一。William L. Tung, *Revolutionary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1926-194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pp. 149-151.

10 偶有一些憶述文獻提及這些組織，至於詳細的情況還不是很清楚。有關CCC系的專著如：范小方，〈

二陳和CC）（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范小方（等著），《陳果夫與陳立夫》（武漢：武漢出版社，一九九三）；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四）。簡明的概說，參見：大小（撰），〈關於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諸派系的若干考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頁二二—一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以下縮寫為「二」），七一（六）／一一八，手稿；C. J. Spiker,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Chungking*, Jan. 24, 1943, in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Vol.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pp. 235—237;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 201—202;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p. 47—52.

⑩ 譬如復興社在參與甚深的民族復興運動當中，積極提倡擁護領袖之義，實指蔣中正個人；一九三五年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基本上由CC系掌握；一九三八年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因時地困難，仍續由五全代表出席，蔣中正會在會中被授與總裁的職銜，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

⑪ 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 142;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 64.

⑫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 37.

⑬ *Ibid.*, p. 38. 何廉（原作），〈簡述國民黨的派系——何廉回憶錄之七〉，《傳記文學》，第六二卷第六期（台北：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八七。

15 蕭作霖，〈復興社述略〉，〈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一輯（北京：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五五；陳寧生、張光宇，〈蔣介石的戰爭機器〉，頁五〇四。黃埔六期生，復興社幹部之一的蕭作霖在前引文裏，把黃埔系、CC系、政學系三者關係視作蔣中正的嫡子、螟蛉子、師爺（或管家）。

16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二四〇—二四一。

17 蔣中正，〈軍隊政治工作對革命失敗與復興的關係〉，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在勵志社對各師政治工作人員會議講詞，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〇（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頁五四八。

18 蔣中正，〈軍隊政治工作對革命失敗與復興的關係〉，頁五四九—五五〇。

19 蔣中正，〈軍隊政治工作對革命失敗與復興的關係〉，頁五五〇—五五一。

20 蔣中正，〈軍隊政治工作對革命失敗與復興的關係〉，頁五五一。

21 蔣中正，〈軍隊政治工作對革命失敗與復興的關係〉，頁五五二。

22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 83. 一九三四年的緊張情事主要指的是暨南大學事件，復興社在校進行軍事編組，對CC分子實施包圍，此後文即將述及，參見：蕭作霖，〈復興社述略〉，頁五六—五七。

23 兩名分別來自復興社及CC系成員的回憶，艾經武，〈復興社河南分社的片段回憶〉；張仲魯，〈回憶CC與復興社鬥爭的一幕〉。二文蒐入〈河南文史資料〉，第五輯（鄭州：一九八七年三月），頁

一一〇—一一一；一一九。

24 艾經武，〈復興社河南分社的片段回憶〉，頁一一一。

25 艾經武，〈復興社河南分社的片段回憶〉，頁一一〇；張仲魯，〈回憶CC與復興社鬥爭的一幕〉，頁一一七。曾經擔任復興社河南分社書記（省級最高負責人）的蕭作霖提供了更豐富的例子，並指出「河南省的實權，可說基本上掌握在復興社之手」，「CC團在河南實際上只占有著一個空空洞洞的國民黨省黨部以及等於虛設的各縣縣黨部」，蕭作霖，〈復興社述略〉，頁五七—五八。

26 選出的代表最後仍需交由國民黨中央圈定，河南分社在南京透過程序運作，確保了當選名單的完整性。關於這次選舉在河南省的詳情，參見：艾經武，〈復興社河南分社的片段回憶〉，頁一一—一一三；艾經武，〈一九三六年河南省國大代表選舉中復興社與CC派的鬥爭〉，〈河南文史資料〉，第一九輯（鄭州：一九八六年九月），頁二二—二九；邢漢三，〈我參加一九三六年國民黨國大代表選舉的簡況〉，〈開封文史資料〉，第四輯（開封：一九八六年八月），頁二二—二七。鄧元忠視這次各地的國代選舉為抗戰前復興社「參與建國活動的另一顯著成績」，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四六八—四七二。

27 張仲魯，〈回憶CC與復興社鬥爭的一幕〉，頁二六—二七，一一九。

28 關於政學系的概說，參見：江漢鐘（編著），〈中國黨派內幕〉（出版地不詳：新中國出版社，民國三十五年），頁三五—三七；左派人士的觀點：大小（撰），〈關於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諸派系的

若干考察》，頁四一八；美國駐華使館在中日戰爭期間的報告·Spiker,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 238；政學系分子的說法：何廉（原作），〈簡述國民黨的派系〉，頁八八—九〇；CC分子眼中的政學系：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一七二；董霖，〈六十載從政講學〉，頁一一四—一一七；學者部分：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頁七二四；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 144;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 203;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p. 65—71.

29 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 144;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 69；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CC”團〉，〈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四五輯（北京：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頁二四八；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五九五—五九六。

30 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一六五—一六六，一六八，一七一—一七二；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一八六；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 204。CC系幹部曾在南京向蔣中正申說「以黨治國」之意，指出訓政時期當由忠實黨員擔負重要責任，其意在排拒與黨機器並無太深淵源的楊永泰，蔣聞後不悅，董霖，〈六十載從政講學〉，頁一一五—一一六。

31 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頁二四九—二五〇；夏廣英，〈漫話CC派〉，〈安徽文史資料〉，第

二一輯（合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頁二〇二—二〇三；劉鳴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概述〉，〈湖北文史資料〉，第一四輯（武昌：一九八六年四月），頁六一；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一八八—一九〇。王學慶的專著還提供了戰前政學系和CC系其他主要對立事件的情節，頁一八一—一八八，一九〇—一九二。

⑫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頁二五一；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一六八—一六九，一八三。

⑬王華農，〈中國國民黨開封市（縣）黨部簡記（一九二四—一九四八）〉，〈開封文史資料〉，第五輯（開封：一九八七年四月），頁一一六。

⑭張鳳吉，〈國民黨復興社和“CC”派在山東的明爭暗鬥〉，〈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四輯（濟南：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頁一三九—一四〇。中日戰起，秦啓榮受命擔任軍委會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少將縱隊司令，因而掌握地方武裝，CC難能抗衡，復興社在山東獲得較大的發展。

⑮李景春，〈復興社在福建的組織與活動〉，〈福建文史資料〉，第一八輯（福州：一九八七年二月），頁八。至於應付國家主義派，復興社福建分社一面揭露其弱點，使失去陳儀信任，一面則請求總社予以有力打擊，據稱這是爲了避免「重蹈過去容共的覆轍」。大體而言，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是復興社在福建活動力最強的時期。有時，爲了地方黨部的人事任命和控制，復興社與CC系幹部間也有暴力相向的例子，如漢口等地，*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 72.

36 曾任復興社湖南分社書記的仇碩夫以及乙派領導人劉岳厚描述了甲乙派之爭的詳細情節，仇碩夫，〈中華復興社在湖南的活動〉，〈湖南文史資料〉，第三二輯（長沙：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一七一—一八；劉岳厚，〈國民黨湖南甲乙派的鬥爭〉，〈湖南文史資料〉，第三輯（長沙：一九六二年十月），頁一—三九。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是：乙派結束後整個加入了復興社。劉岳厚對此予以否認。他指出乙派成員中「個別加入復興社誠有之，整個轉入則未也」，況且其中也有人投入CC陣營，但劉岳厚仍表示乙派重要幹部多人的確加入了復興社（可能有些人的入社時間尚在乙派解散之前）；仇碩夫則說：「何鍵離開湖南後，乙派的骨幹份子大多被復興社吸收了。」關於湖南的甲乙派之爭，參見：賴景湖，〈何鍵和張治中——抗戰時期在湖南的一點回憶〉，〈湖南文獻〉，第九卷第一期（台北：民國七十年一月），頁二二—二三。

37 民族復興運動係蔣中正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間，所採用基本救國建國的政策和推行政策的秘密組織方式的統稱，目的在繼續孫中山的革命志業，故又稱「第二期革命」，其急務一在推行「安內攘外」政策以統一國家，一在樹立「民族精神」以作為救國建國的基礎，參見：鄧元忠，〈民族復興運動在民國史中的意義〉，頁二二七—二四七。

38 有關中國文化學會，參見：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二一四—二二〇；蕭作霖，〈復興社述略〉，頁三二—三三，三八—四三。

39 蕭作霖，〈復興社述略〉，頁三九—四〇。

④ 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一六三—一六五；李松林（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頁六六。

④ 蕭作霖，〈復興社述略〉，頁四二—四三，五六—五七。

④ 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頁二五一—二五二。據劉不同的回憶，這類的爭端有時還涉及綁架、暗殺，文中舉了中央政治學校三名學生遇害的例子。

④ 艾經武，〈復興社河南分社的片段回憶〉，頁一一四—一一五；張仲魯，〈回憶CC與復興社鬥爭的一幕〉，頁一一九—一二三。立場親CC陳泮嶺的張仲魯認為：「河南省立學校骨幹之成批投入復興社，文教界之被復興社徹底滲透，始作俑者厥惟王公度、簡貫三。」復興社的艾經武則指出王、簡二人的橋梁作用。

④ 經選出的復興社、CC系、無組織者的理事席位比為五：四：二，監事名單中復興社與CC系分占三、二席。有關本段落述及事件的詳細情節，參見：王益昶，〈國民黨統治時期湖北教育界派系組織明爭暗鬥〉，〈湖北文史資料〉，第一〇輯（武昌：一九八四年九月），頁九八—一〇二；劉鳴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概述〉，頁六三—六四。

④ 胡夢華，〈CC外圍組織誠社始末〉，〈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一四輯（北京：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一五三；武靈初，〈國民黨改組派在山西的活動〉，〈山西文史資料〉，第一三輯（太原：一九七九年六月），頁一九〇—一九一；續約齋，〈也談國民黨改組派在山西的活動〉，〈山西文史

資料》，第三八輯（太原：一九八五年三月），頁一八六一—一八七。

④關於誠社，參見擔任誠社副書記的胡夢華，〈CCC外圍組織誠社始末〉，頁一四七—一六五；誠社成員梁尚德，〈我所記憶的“誠社”〉，〈文史資料選輯〉（山東），第二〇輯（濟南：一九八五年九月），頁二〇五—二一八。

④曾擴情，〈何梅協定前復興社在華北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一四輯（北京：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一四〇—一四一；席懋修，〈我在“軍統局”十四年的回憶〉，〈江西文史資料〉，第三〇輯（南昌：一九八九年三月），頁一二七—一二九；許鶴，〈簡憶江西復興社組織〉，〈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五輯（南昌：一九八七年九月），頁八一；龍步雲，〈中華復興社內幕〉，〈湖南文史資料〉，第三二輯（長沙：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八一—九；仇碩夫，〈中華復興社在湖南的活動〉，頁一五一—一七；蕭作霖，〈復興社述略〉，頁四七—四九；李景春，〈復興社在福建的組織與活動〉，頁一〇—一一。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p. 64-65. 復興社在每年這種場合吸收的學生人數因地而異，根據曾任復興社湖南分社書記，並負學生集訓總隊責任的仇碩夫估計，這三年湖南社方在該活動吸收到的社員絕不會少於歷屆受訓學生總和六千人的二分之一，換言之，即至少三千人。蕭作霖則說復興社在一九三七年河南省兩千名集訓學生當中，吸收了兩百餘人。福建省一名社方幹部指一九三六年二十餘名學員被吸收，一九三七年四十餘名學員被吸收，這個數字與前述湖南、河南相差甚多，資料來源並沒有提供這兩年福建省集訓學生總數，因此無從知悉社方吸收的比

例。

④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 64.

④ 他們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擴情、賀衷寒、劉健群。

⑤ 鄧元忠在一九八一年發表的〈民族復興運動在民國史中的意義〉一文稱力行社組織連同兩同志會和復興社，即廣義的復興社，最後發展到十萬人之數，頁二三五；這項估計隨後獲得擴充，鄧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三民主義力行社史〉中指出，力行社社員約有三百人左右，廣義的復興社社員則有五十萬人，頁一三，二五；易勞逸綜合了鄧元忠不同時期的意見，提出了十萬到五十萬人的上下限數字，易勞逸（原撰），陳謙平（譯），〈藍衣社的建立〉，易勞逸（著），陳謙平、陳紅民（等譯），〈流產的革命——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三九〇—三九一。復興社最後一任書記長康澤回憶指出共有五萬餘人，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二）〉，〈傳記文學〉，第六七卷第四期（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月），頁五一。讀者不宜視五萬至五十萬人為過少，事實上，以一九三七年底國民黨黨員數為例，亦不過六十一萬餘人（不含海外及軍隊黨員），隸屬CC系各內外圍組織成員數當遠在此之下，中央組織部統計室（製），〈中國國民黨黨員近十年來之發展趨勢〉，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黨」四九五／一〇八；另據CC系分子王新衡回憶，CC系核心組織之一的青白團計有五十餘人，同屬CC系的洪陸東則說青白團有二百多人，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第七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九〇），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頁二五一—二五二。雖然復興社成員的確切數目仍待深入討論，CC系分子的量更不可稽，但是相對來說，二者確是一九三〇年代國民黨政權內比較具有接近全國性的群眾基礎與組織能力的派系。

51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頁二四一；張鳳吉，《國民黨復興社和“CC”派在山東的明爭暗鬥》，頁一四〇—一四七。

5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六二三。

53 蔣中正常用革命已到最後關頭，不容再有失敗，否則勢將自招滅亡之類的話語來惕勵黨人，在本書後續的篇幅中會陸續引用這些警言，從這裏可以發現蔣中正個人對黨國強烈的憂患意識。

54 蔣中正，《革命成敗的機勢和建設工作的方法》，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對南昌行營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全體會議講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頁六一一。

55 蔣中正，《革命成敗的機勢和建設工作的方法》，頁六一一。

56 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卷開始的部分，可以看到蔣中正的講詞大多向軍隊、政工人員、各種訓練講習單位發表；一九三五年五全大會之後蔣對黨中央的講話增多，對黨務的批評也隨之增加。

57 蔣中正，《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三，頁五二四—五二六。

58 蔣中正，《如何創造黨國的新生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講詞，《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三，頁六〇四—六〇五。

⁵⁹ 蔣中正，〈增進工作效能的方法〉，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出席中央總理紀念週講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四，頁五九。

⁶⁰ 中央組織部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五屆二中全會、一九三七年二月在五屆三中全會的工作報告，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頁六三，九八—九九。

⁶¹ 蔣中正，〈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講，〈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紀錄〉，一九三八年，頁一〇三，「二」七—（五）／一五九。

⁶² 蔣中正，〈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頁一〇四—一〇七。

⁶³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四三九。關於這段時期黨派合作的折衝經過，見：盧國慶，〈抗戰初期的黨派合作〉（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國民黨與中共就合作事宜所展開的直接談判還要更早，參見：王功安、毛磊（主編），〈國共兩黨關係史〉（武漢：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三九〇—三九七；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五〇二，五〇五—五〇六，五一〇。

⁶⁴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89.

⁶⁵ 具體的例子見：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p.

558-559：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六六六。

65 蔣中正，〈對高級幹部的期望〉，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在武漢講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五，頁一一七。參見：陳敦正，〈動亂的回憶〉（台北：元霞書社，民國六十八年），頁六一；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四〇輯（北京：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頁一九七。

67 參見：張朋園（等訪問），張俊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八年），頁一一九；蕭作霖，〈復興社述略〉，頁七〇；黃雍，〈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變〉，《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一輯（北京：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二；鄧元忠，〈民族復興運動在民國史中的意義〉，頁二四四—二四五；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六二九—六三五；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 79.

68 〈團史資料〉，頁一。

69 復興社中央設書記一名，由蔣中正指定，功能實形同幹事會的秘書長與執行長；一九三四年，劉健群出任該職時，改稱為書記長，以後循之。歷任書記（長）依時間先後排列為：滕傑、賀衷寒、劉健群、鄧悌、劉健群、鄧文儀、鄭介民、康澤。康澤對歷任書記（長）人選的回憶有誤。康澤，〈復興社的緣起〉，《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三七輯（北京：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頁一四三—一四四；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一三五；鄧文儀，〈冒險犯難記〉，下冊（台北：台灣學生書

局，民國六十二年），頁八五，九五—九六；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頁四四。

70 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六六九—六七〇。參見：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頁四三—四四。

71 這個計畫由康澤授意陳敦正執筆，陳敦正，〈動亂的回憶〉，頁六一。

72 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頁四四；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六六九。

73 蔣中正，〈如何創造黨國的新生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講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三，頁六〇六；〈青年團的組織精神和根本任務〉，一九三八年，

「二」七二八（四）／一二。

74 賀衷寒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在甘肅省府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行動精神〉為題，對蘭州全體團員演講時指出：「現在任何國家，尤其是正在復興中的國家，多有一個極偉大的青年組織，蘇聯、土耳其、德意志、意大利，均大規模組織全國青年，就是我們敵人，也有青年組織，……我們直到此刻才開始組織，在理論上事實上稍覺慢了一些，所以要急起直追。」青年出版社（編），〈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一，二合集（重慶：編者印行，民國三十一年），頁五四；康澤也說：「各國青年訓練之趨向於統一化，亦為必然之結果，此種趨勢表現最著者，厥為德意志意大利蘇俄等國。」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訓練〉，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部籌備處（編印），〈團員訓練〉，第二卷第一六期

（耒陽：民國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頁三。並見：朱家驊，〈青年團團務之進展〉，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詞，「二」七二八／三二一。

75 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

76 何廉（原作），〈簡述國民黨的派系〉，頁八三。

77 資料來自康澤、何廉二人的回憶錄。康澤有關首次陵園四人會議時間的記憶並不一致，一說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一說大概是在十月間；何廉說官邸的各派會議在八月的一個雨天舉行。個別來看，康、何二人所述事件的時間彼此無法顯示合理的連貫性，也令人懷疑所記時間是否正確；但就事件本身而言，並無太大的互斥性。筆者在時間的問題上採取保守的處理態度（代以「秋天」一詞），其餘則作了較符常情的綜合陳述。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一九七；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傳記文學〉，第六八卷第一期（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一月），頁一〇一；何廉（原作），〈簡述國民黨的派系〉，頁八三—八四。參見〈團史資料〉，頁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六九五。

78 〈團史資料〉，頁一。

79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一九七—一九八；並見：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二）〉，頁四九；〈康澤自述（五）〉，頁一〇一。其後對於三青团團員的年齡限制問題也起了爭議，見第二章第三節。

80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一九八；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五）〉，頁二〇一。

81 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上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十八日，頁五九—六三。

82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彙印年份不詳，頁一八四，「黨」未製號，以下簡稱〈五屆中常會紀錄〉。參見：頁一八七，一八八。

83 蔣中正，〈對高級幹部的期望〉，頁一一一。

84 蔣中正，〈對高級幹部的期望〉，頁一一六—一二七。

85 蔣中正，〈對高級幹部的期望〉，頁一一七。

86 蔣中正，〈對高級幹部的期望〉，頁一一八。

87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〇；參見：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五）〉，頁一〇一。據康澤回憶三青团籌備委員有陳誠、陳立夫、朱家驊、譚平山、段錫朋、張道藩、張厲生、谷正綱、谷正鼎、賀衷寒、劉健群、康澤、盧作孚、甘乃光。〈團史資料〉則稱「團長指定陳誠、陳立夫、賀衷寒、谷正綱、康澤等為籌備員」，頁二〇。六大大會前的黨務委員會、訓練委員會名單，見：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頁一五七—一六三。

⑧關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研究論文見：李國祁，〈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華學報》，第四卷第一期（台北：民國六十六年一月），頁八一—九二；林泉，〈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與抗戰建國——從幾件重要決議案分析探討〉，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三冊——抗戰建國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七六一—一〇〇。並見：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四〇九—四七七。史料彙編最豐、最富學術價值者當推：李雲漢（主編），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下冊。

⑨李雲漢（主編），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冊，頁二五三—二六一，二六五。為防日機空襲，臨全大會自預備會議起，均於晚間舉行會議。

⑩三大大會修正後的總章第一章第二條載稱：「本黨黨員分黨員及預備黨員：（甲）黨員 凡年齡在二十歲以上，並曾為本黨預備黨員，受黨的訓練一年以上，由區分部呈請區執行委員會考查合格，經縣市執行委員會之審查，及省執行委員會核准者，方得為黨員。（乙）預備黨員 凡年齡在十六歲以上，由本黨黨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填具入黨志願書，經向所請求之區分部黨員大會之通過，區執行委員會之考查，及縣市執行委員會之核准，方得為預備黨員。」第一章第三條：「黨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預備黨員只有發言權。」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集〉「革命文獻第七〇輯」，頁七八—七九。並參見同書〈中國國

民黨總章第二次修正（三大大會）前後條文對照表》，頁九三—九四。

91 李雲漢（主編），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册，頁二五七。

92 臨大大會第三次修正總章時取消預備黨員制相關條文，於第一章第五條明定：「本黨為訓練青年設青年團，其辦法另定之。」《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集》，頁一一八。並參見同書《中國國民黨總章第三次修正（臨大大會）前後條文對照表》，頁一三四。

93 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上册，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頁七九；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頁二二六。當晚謁蔣的人有陳果夫、陳立夫、陳布雷、陳誠、賀衷寒、康澤、張道藩、張厲生、周佛海等。CCC分子齊世英回憶這天晚上該派系二十餘人曾有一場集會，由陳果夫主持，陳立夫也在座，會中各員主動要求解散己方的組織，當夜且立即推二陳先後謁蔣，但證諸同為CCC成員的周佛海日記記載，齊世英的回憶似有不確，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九年），頁二一一—二二二。事實上，蔣取消小組織的意向早已為康澤、陳立夫等人所悉，康、陳均曾順勢向蔣請求解散組織，但解散之舉應非康、陳本願，參見：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四；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二二四—二二五。

94 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五二五。

95 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集》，頁九一

；並參見同書〈中國國民黨總章第二次修正（三全大會）前後條文對照表〉，頁一一五。

96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通告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應恪切遵守四中全會的決議案，「如有違犯，從嚴制裁」；四月二十九日，蔣總裁申令全體黨員稱「方今寇患方殷，內憂未已，而本黨適已改制，領導有人，時勢既殊，步伐宜齊，嗣後本黨以內再不得有所謂派別小組組織，舉凡以前種種小組組織一律取消」。參見〈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九七；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四四九；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五二六；漢口〈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

97 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與干國勳，〈關於所謂「復興社」的真情實況〉二文，見：干國勳（等著），〈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頁九九，一〇五；干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台北：私人發行，民國七十五年），頁一六二。

98 關於這場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仍有爭議，鄧元忠根據陳敦正的回憶，認為是在六月初，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六七一；陳敦正，〈動亂的回憶〉，頁二七，六一；陳敦正，〈元霞閣叢稿〉（台北：元霞書舍，民國七十二年），頁一九〇。唯陳的說詞也無法自相連貫，參見〈動亂的回憶〉，頁三八。兩位出席會議的幹部回憶稱在夏初，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一〇〇；龍步雲，〈中華復興社內幕〉，頁一三。另外，綜合白瑜、龍步雲、康澤三人的回憶推斷，大會很可能是在四月下旬至五月上、中旬之間舉行，參見：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五；康

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二）〉，頁五一；〈新的「百年戰爭」之覺悟〉，漢口《大公報》，社評，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根據唐縱日記的記載，似又以五月中旬的可能性為高，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衆出版社，一九九二），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頁七四。

⑨可能也是復興社各領導人默許出席者抗議的緣故。出席代表黃通指出是賀衷寒做了政治報告，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頁一七三；但根據湖南分社幹事兼助理書記龍步雲的回憶是劉健群，見：龍步雲，〈中華復興社內幕〉，頁一三。

⑩鄧文儀指稱復興社宣告取消組織之時，「幹部同志曾有不少人在武漢集會，彼此痛哭流涕，為革命建國前途而悲傷」，鄧文儀，〈冒險犯難記〉，下冊，頁一一〇。這樣哀歎組織更迭的情事在國民黨黨史裏也有類似的例子，譬如一九一二年中國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合併改組為國民黨時，「同盟會黨員聞之，多有痛哭者」，羅家倫（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民國初年之國民黨史料〉「革命文獻第四一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五十六年），頁三；邱錢牧（主編），〈中國政黨史（一八九四—一九四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二七二—二七三。

⑪范小方，〈二陳和CC〉，頁二四九。陳立夫對復興社與青白團成立、解散的說法見：陳立夫，〈成

敗之鑑》，頁二三一—二二五。

⑩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四—二〇五。

⑪康澤對該案起草人選的說法有兩個版本：一、陳布雷起草，康參與意見，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五）〉，頁一〇一；二、由陳布雷、陳誠和康澤三人起草，見：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一。組織要旨全文見：李雲漢（主編），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册，頁六一—二。

⑫關於三青團的籌備經過，參見：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一—二〇三；〈團史資料〉，頁三一—二〇。

⑬〈團史資料〉，頁三；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二；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五）〉，頁一〇一—一〇二；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九九。協助康澤起草團章的是任覺五、白瑜、魯學瀛等人。謝然之特別強調譚平山所擬章程在正式團章的形成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謝然之，〈三民主義青年團往事瑣憶〉，〈傳記文學〉，第七一卷第四期（台北：民國八十六年十月），頁一九—二〇。不過謝文所述譚案內容並未出現於正式公布的團章當中，因此筆者對謝文所述暫時保留態度。

⑭筆者在第二章裏將做更詳細的討論。關於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公布的團章全文，見〈團史資料〉，頁三一—四；杜元載（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抗戰時期之青年活動

（一）「革命文獻第六二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二年），頁四—一五。〈爲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全國青年書〉全文見：漢口《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黃埔出版社（編），〈總裁建國言論選輯〉，卷上（重慶：編者印行，民國二十九年），頁七一—七八；青年出版社（編），〈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一，二合集，頁一—八；〈團史資料〉，頁一四—一九；〈抗戰時期之青年活動（一）〉「革命文獻第六二輯」，頁一六一—二一。

⑩ 這個時期更詳細的情況（諸如中央幹事、候補幹事的名單，團中央各處組室編制的變遷，以及和中央幹事會處於平行地位的中央監察會的介紹，各地團務發展），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一年來工作報告〉；〈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一九四五年，頁二—七，「二」七二八／一六二；〈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二」七二八／〇一六；〈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二十九年度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一月，「二」七二八／〇一七；〈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務概覽〉，一九四二年二月，頁一—六，「二」七二八／〇一五；〈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報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七二八／〇一八；〈團史資料〉，頁五五—七六，九三一—九六；並參考：蔣永敬，〈三民主義青年團與抗戰建國〉；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中央團部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分設中央幹事會、中央監察會，除個別情形外，本書所提三青團書記長一詞，均指中央幹事會書記長。

⑪ 初期康澤在三青團內的主要競爭者是陳誠。關於陳誠在團內的重要性，一般有著不同程度的見解。陳

誠先後擔任過三青團首、未任的書記長，唯在位時間合計起來並不長，其他兼職過多，而且相對來說，陳誠未如康澤般擁有復興社那樣厚實、廣泛的組織資源與人力。但是，身爲一名黃埔系教官且擔任三青團書記長，陳誠在團內有其相當尊榮的地位，並且在團中央與地方也不乏跟隨者。參見：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三—二〇七；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一三四—一三六；范小方，〈二陳和CC〉，頁二五〇—二五一；Donald G. Gillin, "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the Kuomintang,"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4 (Aug. 1970), pp. 835-850;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1. 由於陳誠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職，因此，湖北成爲陳誠較具勢力的一個省份。關於陳誠和康澤在湖北團部人事的角色，見：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一六—一一七，一二〇—一二一，一二六—一二七；梁上賢、田秉德，〈三青團在湖北的組織與活動〉，〈湖北文史資料〉，第七輯（武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頁六〇—六一；易演道、鄧中敏，〈三青團湖北省支團始末〉，〈湖北文史資料〉，第一四輯（武昌：一九八六年四月），頁九七；鄧中敏，〈三青團〉在武漢始末〉，〈武漢文史資料〉，第一八輯（武漢：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頁五九。

④陳敦正，〈元霞閣叢稿〉，頁一八八。有關康澤一生經歷，最權威的敘述要算是他的一篇極有價值的

憶述文獻，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傳記文學》，第六七卷第三一六期，第六八卷第一一五期（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八十五年五月）。康澤在這篇自述當中，特別提到他在人們所關切的別動總隊裏的經歷。這個特務色彩濃厚的組織使得康澤與戴笠齊名。有關康澤一生的介紹，除了本書引用的另外幾篇康澤親述文獻之外，還可參見：秦孝儀（主編），中國現代史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頁三一—九；蘇聞時，〈康澤蔣介石恩怨錄〉，《江蘇文史資料》，增刊（南京：一九九四），頁三二；蔣光明、白中培，〈另一則康澤的故事〉，《傳記文學》，第六八卷第一期（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一月），頁九六—一〇〇；以及一本包含康澤簡短自述與他人記述康澤的文獻彙編，潘嘉釗（等編），〈蔣介石特工密檔及其他〉（北京：群衆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一二八—一六三。另見：潘嘉釗（等編著），〈康澤與蔣介石父子〉（北京：群衆出版社，一九九四）。

⑩ "Biographies of Chinese Military Personnel," *Chungking*, Nov. 17, 1943, in *The Amerasia Papers*, Vol. 1, p. 286.

⑪ 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頁五二。

⑫ 鄧元忠，〈民族復興運動在民國史中的意義〉，頁二五一；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六七四；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一〇〇；李景春，〈復興社在福建的組織與活動〉，頁一四；Spiker,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 240. 不是所有

的復興社社員都加入了三青團，滕傑認為原因有二，參見：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頁四五。

⑬ 康澤，〈康澤自述：我和蔣介石集團的關係〉，潘嘉釗（等編），〈蔣介石特工密檔及其他〉，頁一三一；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頁五一；于國勳，〈關於所謂「復興社」的真情實況〉，頁一〇五；鄧文儀，〈「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序言〉，〈湖北文獻〉，第八二期（台北：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頁八〇；蕭作霖，〈復興社述略〉，頁七〇；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頁四五。

⑭ 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一二。曾為CC系骨幹的劉不同也說：「三青團在形式上是五花八門的大雜燴，而實質是黃埔系軍人的集團，是復興社的化身。陳立夫、陳果夫、朱家驊、譚平山等不過是些幌子。」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頁二五四。

⑮ 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二二六。

⑯ 各支團部籌備處幹部入選，含指導員、幹事兼主任、書記、幹事等，都需呈奉團長批准，〈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黨」五一九/一一九·二。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一年來工作報告〉，其他工作概況頁一一二。

⑰ 三青團地方團部建制依序為支團部、區團部、分團部、區隊、分隊。簡單的說，省市設支團部，縣設分團部，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間所成立的各級團部均加稱籌備處，俟一九四三年三青團一全大

會召開之前，各級組織率多舉行代表大會，選出幹事，始在名義上完成所謂籌備程序正式成立。

⑩夏廢英，〈漫話C.C.派〉，頁二〇四。

⑪青幹班於三青團成立後不久隨即開訓，歸於中央訓練團編制，初陳誠曾主導該班的領導人事，復興社分子、受陳誠支持的桂永清擔任班主任，另一復興社成員戴之奇充任副主任。但經蔣中正安排，康澤自一九四一年第二期開始取得實際負責地位（班主任張治中，副主任康澤，康負責），直到一九四四年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成立，蔣經國擔任教育長一職為止。參見：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五—二〇六；徐炳煊，〈我所知道的蔣經國的「幹校系」及其活動〉，〈安徽文史資料〉，第一七輯（合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頁九三—九四；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四二，五三；陳敦正，〈動亂的回憶〉，頁八一—八二；陳敦正，〈元霞閣叢稿〉，頁一九二—一九三。有一種說法稱，一九三八年青幹班第一期受訓生誼屬C.C.系者只有少數被派為分團主任，並且，很快也被排擠掉了，鄧中敏，〈「三青團」在武漢始末〉，頁五三—五四，五九；康澤則自謂：「C.C.方面所選送「受訓」的人，以各級團部尚未普遍建立，一時派不出去的理由，一併送軍委會政治部「暫時」分派到軍隊裏做政訓工作去了。這是我所決定這樣做的，是阻止C.C.有計畫的派一批人來佔領三青團的企圖，其本質無非是派系立場的勾心鬥角！」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五）〉，頁一〇三。

⑫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一四六。

⑩廣西支團部籌備處成立之初，康澤派任親信方采芹爲組訓組長，後由程思遠藉故堅請調離。關於廣西的三青團，參見：黃立志，〈抗日戰爭初期的廣西三青團〉；李朋章，〈地下黨在三青團廣西支團的活動（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七月）〉；覃澤漢，〈我所知道的廣西三青團的內幕〉。三篇憶述蒐入《廣西文史資料》，第一七輯（南寧：一九八三年七月），頁一一九—一二二；一三三—一四一；一四二—一五四。並參見：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頁一六八。

⑪根據一位陝西支團幹部的說法，康澤在陝西並無堅實的人事基礎，只得援引同學谷正鼎；葛武榮原爲復興社員，後遭開除，書記一職爲胡宗南所提出。唯陝西支團的領導權實由親胡宗南的楊爾瑛掌控，最後，楊成爲陝西團務名義與實際上的領導人。翟文鳳，〈三青團和國民黨在陝西的明爭暗鬥〉，《西安文史資料》，第一輯（西安：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頁一三三—一三四。參見：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二四一；康澤，〈復興社的緣起〉，頁一四八。

⑫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一四六—一四七。復興社各分社書記爲當地社務的最高負責人。

⑬蔡正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河南的初期活動〉，《河南文史資料》，第一九輯（鄭州：一九八六年九月），頁三七。

⑭包括某些地方復興社員名單、組織逕行移交，人民團體控制權的移轉等等，參見：羅才榮，〈才榮文稿〉，續一（台北：川康渝文物館，民國七十九年），頁一六八—一六九；李景春，〈復興社在福

建的組織與活動》，頁一四；〈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二十九年度工作報告〉，頁四一。又如三青团重慶支團部籌備處址就設在屬於復興社勢力範圍的市商會裏，〈徵求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須知等〉，國民政府檔案·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務案，國史館藏（以下縮寫為「國」），〇一四四·一〇／一〇七七。

⑧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三民主義青年團二週年紀念特刊〉（重慶：青年出版社，民國二十九年），頁一七三；〈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二十九年度工作報告〉，頁四一。

第二章 雙軌競進的黨團體制

蔣中正曾經寄望三青團能夠重振若干國民黨人業已遺忘的革命精神。基於此前提，他促成了以同樣具有組織基礎、人力資源的復興社爲三青團重心，期對國民黨形成刺激作用，並圖擴大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全國青年的支持。爲了避免國民黨的掣肘，以及樹立足夠號召人心的吸引力起見，三青團在蔣中正的支持下，享有自主運作的地位，不受國民黨的直接統轄，並且迅即被塑造成一個國民革命新血輪的形象。然而，這項設計的用意加上派系政治滲透的結果馬上變了質，首先是來自黨方（特別是CC系）對三青團性質與地位的質疑，繼而爲團方分離意識的抬頭。兩造爭擾不斷，體制、成員吸收均呈雙軌競進的態勢，雙方活動交疊至政治領域，彼此難能共濟，反成水火，以至於三青團成立不到一年，蔣中正與國民黨、三青團中央都開始爲了調整黨團關係而發出政策性宣示與制定多項法規，不過這些措施很快就被證明難能填補黨團之間的鴻溝。本章以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爲範圍，旨就心理及制度面討論相關史實，並連結第一章的討論所得，用以對黨團關係失衡的現象與肇因提供結構性的分析。

第一節 新血輪意識的形成

一九三七年暮春，南京政界已流傳委員長打算在國民黨內再組織一個黨的說法，①翌年國民黨臨全大會決議設立三青團。蔣中正亟賴這個嶄新組織能夠喚回他認為已被國民黨喪失泰半的革命精神，因此，利用適當場合向全國青年及甫成立的三青團提示其新生地位實有必要；同時，由於一般人心對黨、團分野不甚了解，揭櫫三青團的任務內容亦屬勢在必行。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亦即團章公布當天，蔣中正以三青團團長身分發表〈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全國青年書〉，指出「中正受命於黨國艱危之際，負責於民族存亡之交，視本團之組織為吾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所繫之唯一大事」，宣示三青團產生的三點意義在於：一、為求抗戰建國之成功；二、為求國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三、為求三民主義之具體實現。三青團對於國家所負重大使命則在於聚集全國青年，力行抗戰建國綱領，以適應戰時總動員的迫切需要；聯合優秀革命分子，充實革命活力，以樹立最近將來國家社會建設的幹部基礎等二端。特殊任務計六項：一、積極參加戰時動員；二、實施軍事訓練；三、實施政治訓練；四、促進文化建設；五、推行勞動服務；六、培養生產技藝。②

由於部分黨內外人士對設置三青團的真實意涵感到疑惑，因此，蔣中正在這篇告青年書中提出的「為求國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一節，特別獲得人們的注意——該段落主要係呼

籲各黨各派青年應相率集合、團結在三青團的旗幟之下，「如此則新的革命力量，必將因本團之產生而完全集中，而永久集中」。④作爲三青團向全國公開的首篇重要文獻，蔣中正完全沒有對三青團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提出說明；甚至，蔣在這篇文件中幾乎遺忘了國民黨，全文除了「中正受命於黨國艱危之際」、「中正獻身黨國」二句外，再未見任何有關國民黨的字眼。根據學者易勞逸的分析，蔣正在團最初的宣言中明顯的對黨團關係保持沈默，更重要的是，蔣還打算賦予三青團領導革命的地位，例如蔣說道：「應使此組織（三青團），成爲網羅全國優秀熱烈青年及革命份子之唯一組織。」易勞逸認爲，這一非比尋常的說法——三青團不僅是青年的，而且也是其他「革命分子」的唯一組織——似乎沒有給國民黨的革命角色留下一點空間。④

蔣中正對黨團關係的緘默是暫時的。事實上，爲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全國青年書一文係向全國發表，蔣不必也不願將自己的思慮所得公諸世人，這可能也是全文不見團之所出：國民黨字樣的主要原因。不過，從蔣中正在七月九日三青團正式成立以後的幾次團內公開集會中的講話內容可以發現：至少在三青團成立後兩個月內，蔣中正在團中央內部的公開場合，的確曾指出三青團的任務係爲國民黨「吸收」、「培養」人才（即所謂新生命），然而，蔣中正卻也一度明白表示三青團獨立於國民黨之外的地位。

把這些話語拼湊起來可以得到一個類似工程承包的論點，亦即三青團預爲國民黨招收富

有活力的革命成員，並承攬黨的革命未竟工程，而雙方並無體制上的統屬關係。這樣的推理乃以蔣中正的講詞本於理性為前提，否則無從解釋其間窒礙不通處。儘管這些涉及黨團關係的言論幽微難測，但是均具有共同點，即蔣在這幾次對三青團中央的內部講話中都嚴厲批評了黨，相形之下，三青團被畀以革新任務的期待就愈發明顯了。這類談話最早見於七月十一日三青團第一次總理紀念週，蔣中正在會中指出，三青團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使中國革命根本上從新建立起來，要發揚革命精神，復興革命事業」，他認為國民黨對此難以為繼：

本黨革命，到了現在這個情勢，我們自己毫無諱飾的可以說已經衰老腐敗，不能吸引新進青年。青年是我們革命的新生命，這個新的生命如不能培養出來，舊的生命無論如何維持長久，也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我們現在成立青年團，要組織全國的青年，

訓練全國的青年，就是要培養本黨新的生命。⑤

六月十六日告青年書一文，蔣中正已用「新生命」、「新細胞」等辭彙相期於三青團；在三青團成立甫兩天即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上，蔣再度提出「新生命」一詞，並以迥異於告青年書的強烈語氣，向在場的團中央幹部指陳黨的缺失，對三青團的殷望不言而喻。但此時尙如前引文所示，蔣視團的任務在於「培養本黨新的生命」，只不過欲成就革命事功則必先避免沾染黨的積習，萬不能重蹈覆轍，蔣說：「我們革命黨擔當革命的事業，要有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纔能夠達成任務呢？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大家就要反問我們過去的黨務為什麼辦不好？

「他認為其中最大的病因在於「辦事遲鈍，無精神」，由是「黨部成了衙門，委員和一般辦事人員成爲老爺，弄得一個不生不死半死半活的衰老腐敗的況態」。^⑥

一星期後，亦即七月十八日三青團第二次總理紀念週上，蔣中正再度親臨訓話，要求三青團切實選賢任能。他強調，如果三青團的人員不健全，不能滿足一般人對團的期望，就是自喪了革命信用，「以後本黨革命的事業，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夠復興起來」。^⑦文中並以國民黨人才政策失敗爲例：

現在我們國民黨的情形怎麼樣？我們的革命事業爲什麼成了目前這樣衰墜的形勢？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黨對於已有的許多好的黨員和黨內各種人才，缺乏訓練考銓，不曾切實領導，分別激勸獎進，……以致黨內賢才廢棄，有能力黨員離黨他去；同時對於黨外的人才，又不能盡量設法延攬，使到黨內空虛薄弱，消沈腐化，使賢才之士，望而卻步，黨的工作如此鬆懈，如何還能推進革命事業！外面一般人看我們黨部是衙門，委員是官僚，就是這個緣故。^⑧

蔣中正接著要求三青團相關幹部「爲黨吸收各方面的人才」，且引爲「目前最要注意的一件事」。^⑨一個多月後，蔣在九月五日中央團部總理紀念週上重復了廣徵人才的指示，他說：「天下一切事業的成功，全靠有人才。我們青年團有了真正的人才，就不患組織不發展，發展不快當！」接著蔣又提醒三青團須以國民黨爲戒：

但是我們要覓取人才培養人才，決不好和過去黨部一樣，過去中央黨部訓練出來的幾千幾百個各級幹部，到後來都是自認資望深，地位高，只曉得起草龐大的計劃，開支很多的經費，找些社會上所謂有地位的人物，而一切工作只是鋪張形式，缺乏實際，個人的生活享受，比一般普通社會的生活，要高出好幾倍，自己成爲特殊階級，思想行動，完全不是革命！各人自認資格老，那一個都不能指揮他，以致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我們青年團現在一切的事情，都要以此爲鑑戒，要澈底防止這種不良的趨向。

⑩
身爲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中正對黨流於衙門、官僚化深表痛心，在多次的談話中均毫不避諱的提出批判。五、六月之際，蔣中正曾在武昌召開的一項省市黨部委員聯席會議上提出「改造」的初步念頭，儘管蔣個人尙無具體方案，但他明白指出「如有必要，寧使目前將黨部停閉，從新改造」，可見其視黨務如沉痾，不無挹注猛藥的決心。⑪三青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有別於黨的新生集團。蔣中正正在九月五日對三青團中央幹部發表的談話中，期許新造的三青團應徹底防止沾染有關國民黨的不良趨向，而以革命服務爲天職，他盼望三青團成爲辛亥革命以前像同盟會一樣的革命黨，雖憑藉有限，亦能革命建國。在此，蔣中正也首度就黨團關係提出了較爲重要而公開的說明，他認爲國民黨難以徹底改造，無從吸引優秀青年，這樣的黨有待徹底改革，是以此背景下，三青團不能「附設於國民黨以內」：

本來中國的革命，有中國國民黨來領導，只要中國國民黨能復興，就不必另設青年團；即令有組織青年團的必要，亦可以附設於國民黨以內。但是我們現在爲什麼要從新創立這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呢？就是因爲我們國民黨這幾年來消沈散漫，成爲積重難返的局面，不論精神紀律，都是異常衰頹，可以說黨部都已變成了衙門，而黨員已變成了官僚，無論如何設法改造，都不能澈底改造過來！在本黨沒有澈底改革以前，如果吸收青年進去，那只有害了青年，而無補於革命，所以要另外設立一個青年團，來組織一般有爲的優秀青年，好使他們承擔中國革命的事業！⁽¹²⁾

這樣的說法頗能符合去年蔣中正反對陳立夫所提，將團的名稱再添上國民黨字眼的建議，他認爲如此將不能吸引人們前來參與新的革命集團。也就是說，蔣中正對黨團關係早有定見，至少到現在爲止仍未游移（儘管人們必須費力的從一些幽微的言論中爬梳理解）：他認爲三青團這個嶄新的革命組織必須有其相當的體制、行動自主性，不能受到老舊的國民黨的羈絆。不過，蔣的立場顯然有異於國民黨臨全大會新修正的總章所稱「本黨爲訓練青年設青年團」（該條文明喻了三青團的從屬地位）；此外，由復興社主擬，經蔣審定的三青團團章也充分體現了團的自主性格，團章全文並未清楚提到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甚至國民黨字眼也只出現一次而已。⁽¹³⁾

這樣，國民黨和三青團對於團地位的認知有了差距，人們同感困惑。三青團宣告成立後

，依地緣之便迅即著手組織武漢支團部籌備處，當地一位年方十六、七歲的茶館夥計在和團部負責人進行面談時就問道：「現在入團與過去入黨有什麼不同？」¹⁴一般社會人士認知不明，已是黨團工作極大隱憂，即令三青團各級團部對團的性質與任務也不甚了解，以致內有疑惑者質問團中央：「青年團究爲本黨的新生命抑爲本黨的預備軍？」急進者則公開宣稱團係另一政黨。¹⁵

蔣中正正在三青團成立初期一些公開場合的談話裏，似乎不斷企圖將三青團的新生命地位與他所言國民黨的衰墮形勢作一對比，其目的在於猛促三青團體認革命責任之艱鉅與重大，但是相形之下，國民黨的顏面卻在歷次訓詞裏一再作爲前車之覆的範例而逐步流失了。武漢時期，蔣中正曾多次親臨主持中央訓練團的總理紀念週，有時紀念週擴大舉行，國民黨高級官員均須與會。根據青幹班首期一位學員回憶擴大紀念週的情景，受訓生始終排在會場前列，後頭才是文武官員，蔣常常在談話中警示這些學員：「你們站在前面的，不要學站在後面的那些官僚、鄉愿。」可見蔣中正對於國民黨的失望之情，尙不僅限於中央團部的場合抒發而已；並且，蔣的表達方式常出之以率直、不留情面的言詞。¹⁶

直到一九四三年，蔣中正還以有機體作譬，將三民主義比喻爲國家的靈魂，國民黨爲國家的「動脈」，三青團則是動脈裏面的「新血輪」。¹⁷另一方面，對三青團灌輸革命熱情的亦非只團長蔣中正一人，書記長陳誠也曾在一九三八年底公開表示三青團是「國民革命的一

個正統」，「亦可說是本黨革命的新生命的產生」。¹⁸易勞逸指出，三青團打算，至少它的部分領導人試圖讓團在中國承擔起革命的領導角色，¹⁹這對於一般團員的榮譽感與責任心自有抬高作用，但是一再將國民黨作為反面教材出現的結果，卻間接造成三青團對國民黨的負面評價；並且隨著派系意識作梗，黨團關係渾沌不明等因素，從而加深黨團裂痕。一位對黨仍抱同情的地方團部幹部就曾指出「黨員看團員，好像是新起之敵，團員看黨員，當作落伍份子」，²⁰可謂深刻之論。團方對自己有別於國民黨的形象、身分是瞭然於心的，惟對應於黨的態度緩進不同：溫和分子認為「今後救國必先救黨，救黨必須發展青年團」，寓意團之發展為黨之希望所寄；²¹急進者談及黨團關係時則謂今後「除了蔣團長外，誰說的都不算」，儼然已視黨為旁物。²²

不容否認的，幾位領導人對於三青團殷切的期許，相當程度地塑造出團特有的新血輪意識。不過，除了領導階層歷次的公開談話之外，新血輪意識還經由多種不同的方式逐漸獲得培育及擴展，²³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要算是每年夏天在各地舉行的青年夏令營活動。先是蔣中正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交下飭擬青年營具體計畫手令，原始構想是每一位團員皆應入營受為期三個月的訓練，每省各設一團，輪流召訓，並先以幹部為主。²⁴三青團中央隨即擬具計畫大綱，並於同年由中央團部與四川支團分別在重慶、成都二地先行試辦，此後營數、學員人數漸有擴充（表四）。夏令營大致由中央、地方團部主辦，間有教育部參與合辦者；²⁵學員

主要以中學以上學生為主，有時中小學校長教師與團務幹部也在調訓範圍內。²⁶學員不限於具團籍者，且三青團至少一度在江西、貴州、甘肅三省分別調集該省高中應屆畢業生參加當地營隊，一面施以夏令營常規訓練，一面在營中舉行高中畢業會考及專科以上學校統一入學測驗。²⁷

表四：一九三九—一九四四年間三青團青年夏令營營隊、學員數量

年 份	營 數	學 員 數
一九三九	二	七一九
一九四〇	三	一、四二九
一九四一	五	二、四九六
一九四二	七	五、四〇八
一九四三	一二	七、〇七二
一九四四	一九	六、一五七
合 計	四八	二三、二八一

各年營隊：一九三九／重慶，成都；一九四〇／重慶，成都，城固；一九四一／重慶，陝西，成都，貴州，福建；一九四二／灌縣，南嶽，城固，昆明，福建，江西，第三戰區；一九四三／重慶，南嶽，東南，贛縣，貴陽，蘭州，湖北，皖東，皖南，大理，閩南，耀縣；一九四四／重慶，灌縣，西安，贛縣，鄂中，宜良，楚雄，祿豐，蒙自，溼縣，師崗，夏館，閩南，喬邱，瀧縣，西南聯大等。

資料來源：康澤，〈七年來的本團〉，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這一年共舉辦了十八營，一九三九—一九四四年間合計舉辦四十七營，夏令營學員總數至一九四四年為止則為二三、二八五人，〈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一三三。

根據蔣中正的說法，三青團舉辦夏令營的宗旨在於「造成作青年模範的品格，和領導社會，實行主義的本能」，他期望學員們藉著訓練的機會確立革命的人生觀，養成服務犧牲，團結奮鬥的精神，然後擔當起救國救民的事業。³⁴夏令營營址多在風景明媚之地，一般而言，學員在一個月左右的活動期間內，必須接受文武體育各類課程。³⁵活動至為緊湊，學員們過著素樸、紀律，兼富熱情活潑的生活。³⁶營內的精神教育無所不在，可以說，夏令營確被賦予刷新青年道德觀與政治思想的使命。一名夏令營教官發現營中女生對於政治問題的興趣與理解不如男生，她要求女學員們細思「這對於國家民族與婦女本身的前途有多麼重大的關係與影響」；³⁷贛縣夏令營主任蔣經國在名為「光明之夜」的出營式上也曾激昂的指出「一般青年還不夠革命，不夠發揮力量」，他認為現代青年不能專喊口號或談理論，因而強調：「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別的，而是革命的行動！」³⁸

標榜行動價值的蔣經國，是三青團內一個極富活力的例子。他為蔣中正長子，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就讀，國共決裂後滯蘇，一九三七年始返回中國。³⁹一九三八年四月，經正式批准成為國民黨員，⁴⁰在這之前蔣經國來到了江西接受政治歷練，一九三九年任江西第四區（贛南）行政督察專員，⁴¹七月，受派為三青團江西支團部籌備處幹事兼籌備主任，八月籌備處成立。⁴²蔣經國初在江西支團人事組織問題上，曾和親康澤一方（多為復興社分子）有過角力，其後蔣經國藉主持江西支團部幹部訓練班的機會，逐漸樹立起可觀力量，

並在歷次團部改組與組織擴充中累獲優勢，至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團召開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時已完全控制支團幹事會與其下幹部，以及該省出席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①

在蘇聯長達十二年的思想學習與勞動經驗，構成青年蔣經國異於一般官僚作風的大部分特殊人格。^②除了與蔣中正那令人注目的血緣關係外，他在中國最先的聲名應從贛南算起。蔣經國專員任內的諸多興革被視為「新政」，這些措施全盤反映了專員個人質樸剛毅的價值觀，並從而獲得人們的敬畏與質疑。^③在建設贛南的過程中，蔣經國援引大批青年作為工作重心，他強調「運用青年」的重要性，且要求年輕人到社會上，從工作中汲取經驗；^④這和蔣經國在三青團內的言行態度完全一致。在位於赤珠嶺的江西支團幹訓班上，他呼籲師生應以「政治的黃埔軍校」自任，竭誠發揚「赤珠嶺精神」，亦即絕對效忠團長、團結一致、朝氣蓬勃、開天闢地，與繼往開來的精神。這些年輕學員往後大多成了蔣經國政治生涯中的得力幹部。^⑤在一九四三年的贛縣青年夏令營上，由蔣經國親自號召，幾乎所有入營的非團員學生都申請參加了三青團。^⑥

如果說三青團成立目的在於「求國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培養國民黨的「新生命」，那麼團有別於黨的活躍精神早在成立之前即已命定；不過，正如前面所說，這種活躍精神、新血輪意識，主要還是在三青團成立以後，透過各種領導人談話、團務活動等交叉形成的教育過程逐漸涵養而成，夏令營裏的音樂課程即是一例。在贛縣青年夏令營最後一日舉行的

「青年大示威」遊行中，一千八百名男女學員連同縣內其他青年隊伍繞行城內主要街衢，沿途呼喊口號及高唱由蔣經國作詞，國歌作曲家程懋筠譜成的營歌《虎嘯歌》，歌詞簡潔有力：「太陽出來照虎崗，崗上青年臉發光；齊聲作長嘯，好像老虎叫；一嘯再嘯，魔鬼影全消，新的時代來到了！」⁴³蔣經國會指出革命的成敗繫於「兩個對立方量的生死鬥爭」，⁴⁴營歌裏太陽與魔鬼所寓示的對立意涵可以反映出他對革命的深層思想，他在歌詞中賦予青年虎嘯的譬喻，正是盼以發揮革命行動，而非徒務理論之意。對於行動價值的讚美同樣出現在一些三青團的歌曲裏面。戰時由闕仲瑤所作一首名為《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進行曲》的曲子鼓舞青年們淬礪身心，好負起「黨的新生」與「民族的復興」雙重任務；⁴⁵同由闕仲瑤寫作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團歌》則更引新血輪之義，敦促團員實現國防經濟文化三體合一的新中國。

從一開始，三青團這種革命新生兒的姿態就埋下了和所謂衙門官僚之屬的國民黨相互敵視的因子。沒有直接證據可以武斷的指出蔣中正、陳誠等幾位同具黨籍的三青團領導人蓄意鼓動黨團雙方在心態上的輕視與對立，⁴⁶但是三青團視國民黨為革命的反面教材，以及黨團關係難獲共識致使黨對團的疑忌日重等現象，確與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運用不當有關。⁴⁷另一方面，三青團藉著各種方式灌輸成員革新意識與行動的必要，對團員而言雖有策勉之效，無意間或不免陷於認知膨脹的局面；即使退一步說，三青團被賦予勝於國民黨的活力（至少

原始構想如此）亦是人們共聞共見的事實。主觀上，三青團團員多以國民革命的「新血輪」、「新生命」、「新細胞」等心態自命，客觀上和處於被改革地位的國民黨距離已遠。團內溫和者以新血輪意識有別於黨，急進者所持新血輪意識則不啻形同分離意識，更有甚者，乃意欲取國民黨而代之。^⑭在這些微妙的心理因素下，國民黨與三青團之間難能建立穩固的互信基礎。

第二節 組織關係準一元化

從一開始，國民黨就顯示了意圖直接領導三青團的立場，如果排除其後發展不論，早先國民黨這項立場不無合理之處。三青團係經由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成立，在一九三八年臨全大會修正通過的總章第五條規定「本黨為訓練青年設青年團，其辦法另定之」。四月六日，亦即臨全大會閉幕後舉行的五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們通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案〉，內載「依照本黨總章第五條之規定，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⑮四月二十一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修正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規定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設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一人，由總裁兼任之」，團的地位則與政治委員會、黨務委員會、訓練委員會平行。^⑯綜上以觀，國民黨從全代會以下，經中全會、中常會，均以提案決議權與條文規定等途徑，清楚表明了團的從屬地位。^⑰然而，黨團雙方

共同的領導人蔣中正並不作如是觀。如前節所述，蔣中正到三青團成立後兩個月（一九三八年九月）仍然覺得，三青團應該預為國民黨招收富有活力的革命成員，並承攬黨的革命未竟工程；而為了保持吸引力起見，這個嶄新的革命組織必須有其相當的體制、行動自主性，不能受到老舊的國民黨的羈絆。換言之，當時蔣中正心目中的國民黨與三青團不具有組織體制上的統屬關係。

三青團和國民黨不同，從擬定團章的過程與結果中可以發現，三青團內要求體制自主的勢力的確占了上風，並且獲得諸如蔣中正、陳誠等領導人的支持。三青團這份最高章程的初步討論始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嗣經蔣中正正式指定譚平山、陳立夫、康澤等人起草。⁵³根據筆者見到的幾份團章草案，各案對黨團地位的規定均不相同，其中一案規定三青團服從國民黨領袖命令，接受黨的中央執監委員會指導，團章由中執會核准施行，如有未盡事宜應由團長呈請中執會修改之（本案所附「黨與團的關係」圖表標明中央層級的團部在領袖、黨中央執監委員會之下，地方層級的黨、團部平行）；一案直接明定三青團直屬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團章由中執會核准施行；另一案則全未提及黨團的統屬關係。⁵⁴這些內容不一的草案透露出各個派別對黨團關係的不同見解與願望。最後，由康澤等復興社人員共同研擬的團章草案獲得三青團籌委會主席陳誠支持，一九三八年五、六月時，以此案作基礎經修改報籌委會通過，並呈請團長蔣中正核定後，於六月十六日正式公布。⁵⁵團章附則規定團章的

公布修正權在於團方本身（而非國民黨或其他組織），稱：團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幹事會提請團長核准修改之；團章由團長公布施行。⁵⁶另外，全文通篇未見界定黨團關係的具體條文，國民黨甫於四月通過中執會擁有對三青團的上級領導地位亦未出現在團章中。因此，就團章而言，三青團初步已有自立地位；就黨與團中央層級相關章程而言，雙方對黨團體制統屬問題顯然各據立場。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難理解。一九三八年四月以前，三青團的籌備事宜係以機動方式進行，並無一具體組織統籌擘畫，因此，國民黨各會議成了三青團設立的依據，黨方則藉著各種提案決議權與條文規定等象徵及實際途徑，清楚表明了團的從屬地位。大約在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間，三青團籌備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⁵⁷該會的正式運作意味著三青團此後金字塔型組織結構的開端。籌委會委員全由蔣中正指派；團章經籌委會通過，且直接由蔣公布；三青團正式成立後的重要人事均由蔣核派，凡此可見三青團確已別樹格局，最高負責對象為團長而非國民黨。國民黨對三青團的組織、人事任免調遷始終無實際過問權力，在黨的「省執行委員會組織條例」中也未見任何對同級團部組織的領導、指揮關係的文字規定，⁵⁸再者，以河南省為例，省執委會所設各科股的職掌權責亦未涉及三青團團務；⁵⁹倒是黨中央的總章與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對三青團形同虛文的領導地位文字一直保留著，直到一九四五年。⁶⁰

CC系與復興社對三青團之於國民黨關係的看法可謂南轅北轍。在三青團成立初期，雙方重要人物均曾就此問題間接進行辯難。譬如陳果夫在一九三八年青幹班第一期即以黨團關係為題，對學員強調三青團係根據國民黨總章規定設立，應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團員則相當於國民黨的預備黨員；康澤在另外一場講座中反駁了陳果夫的論點，他引用蔣中正期許三青團成為革命新生力量的言詞，強調三青團的獨立性，康澤問道：「如果青年團員等於國民黨的預備黨員，乾脆就叫預備黨員好了，何必還要成立這樣龐大的機構——中央團部來領導呢？」兩造的談話各自獲得不同學員群的支持，略占少數的CC系學員持親陳立場，康澤的談話則博得多數非CC系學員的同情與支持。^①

立場有別的意思也存在於三青團中央團部早期編印的一套文集當中，各篇作者不限於一派一系，從這裏得以發現各方對三青團此嶄新組織與國民黨之間的定位莫衷一是，而且足證這類歧見在三青團甫成立時即已存在。以文集收錄梁寒操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漢口的播音稿為例：「或許有人要懷疑，既有中國國「民」黨，為什麼還要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梁寒操提出問題後接著說：「大家要知道三民主義青年團是隸屬於中國國民黨的，並不是離開了中國國民黨的。」梁寒操並且認為國民黨以往的改組，是「組織的根本改變」，現在成立三青團卻是「組織的擴大」，也可以說是「組織的補充」。^②黃季陸在同年月的廣播稿中也試圖澄清社會人士對於繼國民黨之後又設一三青團的疑惑，他強調三青團與國民黨的性質任務

並無多大的差異，然而「許多人竟把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看作兩個性質不同的組織」，黃季陸認為這些人的見解有誤。^⑤另一方面的看法則或出之以婉轉，或出之以直接，總之在於強調三青團的自主性，例如復興社分子、時任直屬成都區團部籌備處主任的任覺五在談論黨團關係時，就曾巧妙的以一種倫常的政治觀作比喻，他說：「團與黨的領袖是共同的，團與黨的精神、信仰主張是一致的。……如果要把國民黨與青年團比成手足，國民黨就是哥哥，青年團就是弟弟吧？」這樣實即暗示作者對於黨團處於同一輩份，而非父子（或母子）地位的看法。^⑥另一篇由復興社分子簡貴三撰寫的文章則直接點出三青團除了「政治意識」應受國民黨指揮外，其他不必發生隸屬關係，「換言之，青年團的組織是獨立的，青年團的工作是自發的。這裏面的理由很簡單，一則因為青年團組織特殊，運用可以靈活，二則因為中國國民黨總裁兼任團長，而團章規定「團長總攬團務，決定一切」，那還成什麼問題呢？」^⑦

儘管口頭談話與書面文字裏充斥著不同見解，三青團團務確實正朝著自主的方向前進，以黨團的人事、經費為例，即明顯各成系統。^⑧在幾個省黨部逐月上繳工作報告時連帶提報中央組織部的「組訓工作進度數量檢查表」項下「所屬青年團團員數」一欄，幾乎連年累月呈現空白。該表為制式規格，各省均同，中央組織部特予要求「本表以備檢查考核之用，務須翔實填報」，然而，「所屬青年團團員數」一欄空白的事實似乎顯示出地方黨部對於黨員

兼具團員身分的人數完全不能有效掌握，甚至毫無了解。⁶⁷另外，國民黨與三青團分立，除少許兼具黨、團籍分子外，⁶⁸團員基本上由三青團獨立控制，國民黨難能置喙。在重慶，國民黨在文化界的黨員組織「文化黨團」為便於推展相關工作起見，打算蒐羅該市各學校團部負責人名單，但是這份名單不在市黨部裏，因此，文化黨團真正函請提供名單的洽辦對象是三青團，不是黨。⁶⁹在經費方面，三青團也不仰黨鼻息。一九四〇年以前，三青團經費預算係由軍政部特別費內撥給，在國家總預算上尚無法定地位；一九四〇年以後，則列入國家總預算教育文化經費項下，取得法定地位。總的來說，三青團經費與黨無涉。⁷⁰

基本上，國民黨和三青團如後來蔣中正所說，已是「兩個形式的存在」。⁷¹有資料證明，在三青團成立的初期，黨團雙方在青年領導權問題上險些也要釀成兩個形式的存在。國民黨在一九三九年間，曾試圖在各省組織一種高層級的「綜合性青年抗敵團體」，這個計畫由中央社會部推動，當時的部長是陳立夫，兩位副部長為張道藩、馬超俊，⁷²陳張二人均被視為CC系高層分子。以貴州省黨部社會科擬訂的辦法為例，新團體的名稱叫作「貴州全省青年抗敵救國會」，簡稱「省青抗會」；該會領導機關為省黨部、省動員委員會；任務則在於「發動全省青年擔負抗戰建國工作之設計指導事項」、「全省青年組訓宣傳工作之設計及指導事項」、「所屬各青年團體組織及工作之考核事項」、「會員之獎懲事項」、「辦理主管領導機關交辦事項」等；這份辦法還規定省青抗會組織採民主集權制，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

力機關，閉會期間選出幹事組成幹事會爲最高執行機關……等等，體制設計一如國民黨。一九三九年間，這種綜合性青抗團體在一些省分尙處於籌畫階段，有的省分則已經成立，例如安徽省在二月份即舉行了全省代表大會。⁷⁶國民黨中央似乎沒有顧及成立未久的三青團正在同一一段時間內在各地籌建團部的事實，浙江省黨部就曾向黨中央表達了深切的疑惑：

本會前奉辦組織與調整本省綜合性抗敵青年團體正在遵辦中。三民主義青年團浙江支團業已派員籌備，對於綜合性抗敵青年團體之組織與調整，是否仍須照案進行及如何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支團取得聯絡等問題，當經電請中央核示。⁷⁷

其他省分也面臨同樣情況。三青團貴州支團部籌備處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⁷⁸然而僅僅只在一個月之前，貴州省黨部送呈中央的省青抗會籌組步驟還說：一、由省黨部令飭各縣黨部於最短期內積極整理健全各該縣原有青年團體加入省青抗會作團體會員；二、未有青年團體之縣於最短期內應從速開展組織，指導其加入省青抗會；三、各縣青年得經黨部介紹爲省青抗會個人會員，並編組訓之；四、定期召集全省代表大會，成立省青抗會。⁷⁹顯然的，國民黨也展開了吸收組訓青年的動作，無論用意爲何，這個在各省籌設步調不一的青抗團體，勢必與三青團在任務、成員等方面交相疊錯，而且，由CC系運作的這個團體也違背了蔣中正視三青團爲領導青年唯一組織的立場。⁸⁰也許正因爲如此，或者還加入了其他不爲人知的原因，譬如來自高層的壓力等，中央社會部在十月份電告各省黨部「各省市綜合性抗敵青年團

體未成立者暫不進行組織」，⁷⁸這樣一來，一場可能引發有關青年領導權的大組織對峙的局面暫時消弭了，但是，黨與團在青年領導問題上的小組組織競爭卻始終存在著，這主要指的是各級學校裏的黨、團二元組織。

從中央到地方，國民黨和三青團的雙軌體制個別運轉，不生上下統屬的實質關係，這樣造成的尷尬情況可能還不像在校園裏頭來得特別些。三青團成立未久即逢武漢戰事吃緊，團務進展有限，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團部遷抵重慶之後，始有餘裕開始籌備學校團部事宜。⁷⁹基於適齡性與吸收便利等因素，三青團對學校團務頗表重視；然而三青團在學校推展工作時不免碰上一些瓶頸，其中聲望大者為校方與團部的配合問題、在校部分團員的行事作風及品德引人物議等問題，⁸⁰此外，國民黨在學校裏設立正式組織——即學校黨部——一事也帶來了相當的困擾。據中央組織部的報告指出，國民黨自一九三八年底即已開始「注意辦理」籌設學校黨部，⁸¹這顯示出黨對學校組織工作的經營腳步可能和三青團相去不遠，甚至也許還要略早。國民黨的動作十分積極，以專科以上學校及國立中學為例，到一九四三年春，已在九十六所學校設立了直屬黨部；同年三月，三青團只在同等層級學校建立了七十九個分團，其中多所重複。⁸²然而，根據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說法，由於發展量過大，「指導活動，漸感困難」，所以到一九四五年黨六全大會舉行之前，該層級的學校黨部只剩下二十七個；另一方面，同一個時期，同樣的學校層級，三青團則仍舊保有七十二所學校。⁸³

這是一個饒富對立意涵的景觀。事實上，戰時國民黨和三青團能夠公開在學校建立組織的機會，彼此不會相差太多，換言之，通常一個學校裏頭存在著一個黨部、一個團部，以及其下各種次級建制。假設一般社會人士依不同的成分劃分標準可以讓黨與團有著各自較明顯的吸收範圍的話（其實不然），那麼，一所成員年齡差距不大的學校能夠給黨與團提供什麼成員吸收與職權區隔的靈感呢？⁸⁴國民黨中常會曾經通過規定「各級學校黨部在已成立青年團部之學校內，不徵收學生為黨員」，⁸⁵但這與前後現實狀況均不相符，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在一九四四年呈給蔣中正的一份意見書中就明白指出「各校學生規定入團而學校黨部則仍徵求學生入黨」的現象。⁸⁶三青團與國民黨在學校內各樹組織吸收學生，加上前述派系意識、新舊意識對立的結果，國民黨政權等於在校園裏造成了二元形式的領導，這對於政權形象、實質利益均有所妨礙。進一步說，校園還只是黨團雙軌競進體制的一隅，以更為廣泛的社會而論，國民黨與三青團並未切實區隔成員來源，於是雙方仍然常在相差無幾的範圍內吸收成員，這就為極不穩定的黨團關係添上更多波折因素，其中首應提到的厥為年齡問題。

第二節 成員來源的相疊性

三青團最初在成員年齡的問題上享有較寬鬆的規定，這是蔣中正折衷不同派系意見後的結果。在團章草案草擬與付諸討論的過程中，復興社和CC系會就團員年齡設限問題各執立

場：復興社認為三青團所指的青年，只要他的精神和行動都合乎青年的條件，則雖是中年以上人士，也可算是青年，同樣可以加入三青團，因此，主張年齡不應有所限制；CC系表示年齡相近者較易密切合作，若年歲相距過遠，則在組織訓練與工作上容易發生困難，因此，主張團員年齡應予限制，二十五歲以下可算合理範圍。⁸⁷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反映出復興社對新組織的經營企圖，以及以黨為本位的CC系對新組織的疑慮。最後，經陳誠支持，以康澤等復興社勢力草擬的章程成為團章的藍本，並且送呈蔣中正候奪。蔣在年齡問題上採取折衷的立場，他將入團年齡規範在十八歲至三十八歲之間，但團的各級幹部人員則不受上述年齡限制。⁸⁸這樣，三青團的團員年齡的確設限了，惟以青年的定義看來，差距二十歲的範圍仍顯得寬鬆；而幹部年齡不止於三十八歲的但書則為因應事實需要，自不必拘泥於青年名詞之爭。⁸⁹職是之故，其後關於團員年齡的正式規定中，雖具妥協色彩，然實際為復興社的勝利。學者易勞逸觀察團章裏的年齡條文後即指出，三青團藉此擴展了成員來源，而很可能只把那些不革命的中年人和老朽者留給國民黨，易勞逸並把年齡問題視作幾位領導人試圖讓三青團在中國扮演起革命領導角色的證明。⁹⁰的確，除了團長蔣中正給予三青團較廣泛的年齡規定之外，書記長陳誠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說：

三民主義青年團，這個「青年」的界說，與普通一般對於青年的解釋亦不同。我們團裏的青年，並不一定以普通青年的年齡為準則，凡是有革命熱情與向上的朝氣者，雖

是白髮斑斑的人，在我們看來，還是一個革命的青年。反之，如果在年齡上雖然還是青年，而精神上已經暮氣沈沈，這是年青（輕）的老人。本團所應延納的團員，決不是單以年齡為標準，而是要有富於生命活力名實相符的青年，其範圍更不是專指學生而言。⁹¹

三青團團員年齡上下限拉大，不可避免的和國民黨成員來源重疊許多，這讓國民黨員感到疑惑，一名黨員在三青團成立半年後即為文表示：「一個信仰三民主義的同志年齡在二十至三十八之間，是入黨抑入團呢？」⁹²同時由於國民黨也決議擴大徵收黨員，黨團不免產生摩擦，⁹³因此，在三青團成立一年後的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團中央臨時幹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修正團章，其中有關團員入團年齡部分，從原訂年滿十八歲以上至三十八歲，改為年滿十六歲至二十五歲，但書仍予保留，並增列團員年滿二十五歲仍得保留團籍的規定，全文於翌年元月公布施行。⁹⁴根據團方的資料顯示，這項修正乃基於黨團關係不清，分工不明，所提出的改進措施之一；⁹⁵另一方面，三青團與國民黨也會商制定〈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經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內明載：「嗣後本黨徵收黨員應以徵收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者為原則。」⁹⁶這樣，在黨團各有明文規範，以二十五歲為區隔點的背景下，如果雙方各守本分，即令或有招收成員的問題產生，規模程度亦當有限，但事實不然：直到一九四三年三青團一全大會時仍有提案指出各級黨團組織多未能嚴格遵行上述規定，以致「黨團部均不管年齡大小，盡量吸收新份子，由吸收而爭奪，由爭奪而攻擊，由攻擊而詆毀，因此形成黨與團的對

立」，提案人要求黨團應嚴格遵照規定年齡徵收成員，以杜流弊；⁹⁷然而，也在同時，三青團全代會代表決議通過了遵照蔣中正提示所擬的團員年齡修正條文，將原訂年滿十六歲至二十五歲，放寬為年滿十六歲至三十歲，但書仍未更易，團員年滿三十歲仍得保留團籍。⁹⁸

從一些統計數字可以說明三青團與國民黨在成員來源方面（年齡部分）的重疊程度。由於國民黨實施黨員總報到，因此一九三九年黨員累積數銳減，不過一九三九與一九四〇兩個年度隨即徵得大量黨員，根據國民黨在一九四〇年底的結算數字，這兩年新徵普通黨員數即占全體普通黨員累積數的四分之三強，⁹⁹可見國民黨在一九三九年起確已落實擴大徵收黨員辦法，用力甚殷。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九年起也是三青團中央遷至重慶後開始積極推展團務的時候。一九三八年底三青團實際徵得團員數與該年國民黨普通黨員數尚是一：六八·八〇的懸殊比例，到一九四〇年底為止雙方成員比例已急速拉近為一：四·四〇，¹⁰⁰可證三青團在同一時期內吸收成員的企圖心較諸國民黨亦不遑多讓。在此激烈競爭的背景下，以國民黨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兩年新徵普通黨員的年齡分布狀態為例，二十五歲以下者占這兩年徵得總數的二八·八七%，如果加上一九三九年度所徵二十五歲至三十八歲者合計（這一年，三青團的入團年齡仍以三十八歲為上限），則可能還要高占這兩年新徵總數的五至六成左右。這樣的數字說明了國民黨雖然面對三青團的競爭，仍致力不懈的吸收青、壯年分子，即使連國民黨中央的統計單位也不得不承認，一九三九與一九四〇年新徵黨員確較完成總報

到的舊黨員爲年壯。^⑩

再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六月爲例，國民黨新徵普通黨員二十五歲以下者占該時期徵收總數二五·四九%；^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歲以下者占同時期新徵總數二二·八二%。^⑫連同前段所引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數據，顯見在三青团仍以二十五歲爲入團年齡上限的同一時期，國民黨新吸收的二十五歲以下普通黨員大致維持著占新徵總額四分之一左右的穩定比例。並且，隨著成員潛在來源的擴大，這些比例還要更高，如前段所述當三青团最初以三十八歲爲團員年齡上限時，國民黨新徵同齡以下普通黨員占新徵總額五至六成；在一九四三年三青团改以三十歲爲入團年齡上限後，國民黨於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兩年的新徵同齡以下普通黨員也大約分占各年度新徵總額的五成弱和四成五左右。^⑬

這令人想到蔣中正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發表的告全國青年書，文中提到應使三青团成爲網羅全國優秀熱烈青年及革命分子的「唯一組織」，易勞逸認爲，這一非比尋常的說法似乎沒有給國民黨的革命角色留下一點空間，但易勞逸忽視了一件事實，即國民黨仍未消失，除非國民黨從此放棄發展，否則必不可能停止吸收新進成員。而在擴展成員的過程當中，任一政治組織均難罔顧青壯分子的潛能與質量，否則不啻自速老化。即以二十五歲爲例，國民黨徵收普通黨員二十五歲以下者的比例不失穩定的維持在新徵總額的四分之一左右——依照國

民黨與三青團雙方的文字規定，這些新黨員原來都應交由負責羅致青年分子的三青團所吸收，但是現在，這些青年卻反而來到一個對三青團抱持疑慮，甚至帶有敵意的政治組織。

就年齡論，黨團成員的來源確實有著大幅度的重疊性，然而除了國民黨外，三青團也要為該現象負起若干責任。蔣中正曾飭令「團員入團年齡應照團章規定切實奉行，不得再行收羅已逾年齡者為團員」，^⑭而三青團中央幹事會直到一九四四年還曾通令各支團及直屬區分團部，嚴飭停止吸收超齡人員入團，^⑮可見三青團吸收逾齡成員的行動無日或歇。儘管三青團成立初期曾享有較寬鬆的團員年齡規定，但其後即因釐清黨團關係暨分工區隔的需要而受到緊縮，從團長蔣中正和中央幹事會的命令觀察，一些三青團的地方組織似乎仍不以有限的年齡範圍為己足。國民黨吸收青年之舉在於鞏固活力基礎，避免自速老化；三青團超齡徵收之舉則繫於移植地方力量，速立政治地位的考量。^⑯三青團與國民黨即在此一味私自擴充成員年齡範圍的過當行動中，逐步斲喪了有關成員年齡法規的尊嚴；同時，法規既為調整黨團關係而設，當事者（黨團雙方）共同逾越法令規定的行為，等於也宣告了調整黨團關係動作的控餒。

如果說年齡問題顯示出黨團「成員來源」的重疊性，那麼跨組織分子就直接涉及「成員」重疊的問題。蔣中正曾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公開表示三青團此後以不徵收國民黨黨員為原則，非經蔣個人批准，國民黨黨員不得為三青團團員；^⑰但根據三青團一至五十萬號團員入團

登記表統計（約爲一九四二年中的累積數），曾加入國民黨者計八九、一七九人，仍占團員總數一七·八四%。⑩一個兼具黨員、團員身分的基層成員可能帶來一些困擾，舉凡應該繳納黨費或團捐，黨團兩處開會時間牴觸應以何者爲先，被開除黨籍者是否連帶喪失團籍等比照處分的問題，諸如此類，國民黨與三青團都必須時常謀求合理解決。⑪三青團一全大會中的一份提案就明白指出「一人爲黨員，同時又爲團員時，則對其組訓考核工作所屬黨團均感困難，因此形成兩不管之現象」。⑫除了程序技術事宜管理不便之外，也許跨黨團分子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向心力的考驗，例如安徽省黨部接到蔣中正一九四〇年五月的通令後，就曾電詢中央：「查黨員在未奉 總裁批准以前即已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爲團員，團部立即要其履行團務，以致影響黨務工作，此種現象本省日漸增多，究應如何辦理？」⑬再者，對一些人來說，橫跨黨團二處正是最好的政治投機事業，既可多拉關係，又能多占地盤，總而言之，對一己一時有利，卻無補於黨團長久的發展，這也是黨團成員重疊的流弊之一。⑭

三青團中央團部於一九三八年七月成立後，適逢武漢會戰，經撤退輾轉於西南各省，次年一月始抵達重慶。其間各項團務工作多因播遷而告停頓，⑮加上國民黨經營有年，爲中國第一大黨，故截至一九三八年底，三青團實際徵得團員數與該年國民黨普通黨員數比例仍甚爲懸殊（一：六八·八〇）。然而僅僅兩年後，亦即一九四〇年底，三青團與國民黨成員比例已急速拉近爲一：四·四〇，成就不可謂之不大，此中三青團所採發展策略乃所謂「質量並

重」原則。一名復興社分子，並在中央團部組織處擔任組長的湯如炎曾經解釋「質量並重」的含義在於「每一個組成份子都是優秀的」、「所集結的份子又是絕對多數」；^⑮這兩句話極不可解，如果三青團著重於質的菁英原則，那麼又如何保證吸收到的「絕對多數」（非「相對多數」）皆能符合質的要求呢？^⑯事實上，三青團確實醉心於成員量的擴充，以致三青團成立甫一年，蔣中正即指責三青團存在著「無論什麼人，不問好歹，甚至明知是幫會的分子，也都准他入團」的不良現狀，他失望的對中央幹事們表示：「（如果）仍然採用像從前辦黨辦團體那種方法，找一般不相干的人參加進來，只求數量上的擴充，不在質的方面加以選擇，則團的工作將與團的本旨相差更遠，革命的前途，亦要因之而斷斷！」^⑰

最後，懷於團長的要求，三青團終於自一九四一年起調整方針為「重質不重量」。雖如此，直到一九四三年，蔣中正仍以深刻的自省力提醒三青團一全大會代表：「我們現在不怕團員不多」，「也不怕本團事業不能發展，我們所蘄求的是如何使本團能真正擔當革命的事業，使本團的團員真正不愧為革命的幹部。這不是重量不重質的辦法所能得到的。」^⑱試從統計數字觀察，三青團的成員數目仍然呈現穩定成長，尤其自一九四三年後的年增率更為顯著；另一方面，三青團與國民黨員人數的比例也逐年縮減（表五）。這些數字顯示三青團儘管翻新了形式上的口號，實際並未放棄量的追求。安徽支團部主任萬昌言在一九四三年就曾引古語「一夫不獲時余之辜」來闡揚他對擴充團員隊伍的企圖心：「本團（安徽支團）團

員人數僅一萬五千餘人」，「佔全省青年人數的千分之一，這是何等懸殊的數字，我們需要以最「快」速度與最大的努力，征收全省千萬的青年一齊參加到本團的組織。」⁽¹⁾

表五：黨員團員累積人數與黨員團員比例（一九三八—一九四七）

年 度	黨 員 累 積 數	團 員 累 積 數	黨 團 員 比 例
一九三八	六三三、四〇二	九、二〇七	六八·八〇：一
一九三九	四七一、二二七	八九、六六四	五·二六：一
一九四〇	一、一三九、九二八	二五九、一四七	四·四〇：一
一九四一	一、七四五、六九七	四二一、一六一	四·一四：一
一九四二	——	五三七、七〇六	——
一九四三	二、一四四、一四七	六二〇、四六一	三·四六：一
一九四四	二、七七七、九七二	八八七、八六五	三·一三：一
一九四五	三、一一四、六三八	一、二四五、〇〇一	二·五〇：一
一九四六	三、五六三、〇六三	一、五四五、九四四	二·三〇：一
一九四七	三、八〇〇、七七三	一、三四〇、二五五	二·八四：一

單位：人。

資料來源：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止黨員累積數見：中央組織部統計室（製），〈中國國民黨黨員近十年來之發展趨勢〉；一九四〇年止黨員累積數見〈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七中全會後黨部組織暨黨員統計提要〉；一九四一年止黨員累積數見〈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五九一；一九四五年止黨員累積數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央組織部黨務統計報告〉（其中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數據係按年度新徵數逆算）；一九四六年止黨員累積數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黨務報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七一一（五）／一三三三；一九三八—一九四六年止黨員累積數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頁八九—九〇。

備註：一、黨員累積數不含海外、軍隊黨員；團員數以實際徵求數為準。二、一九四二年止黨員累積數不詳。三、一九四七年黨團員人數根據國民黨中央於該年十一月公布的數字，時黨團已開始辦理合併，〈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六九六。四、一九三九年黨員人數逆成長，係因開始辦理總報到之故；一九四七年團員數字可能受到該年團員總甄核的影響，黨方對團員數的掌握度或許也是變數。

在追求量的擴充當中，降齡、超齡徵收成員係國民黨與三青團分別採取的策略之一，其理由如前所述，國民黨吸收青年之舉在於鞏固活力基礎，避免自速老化，三青團超齡徵收之舉乃亟盼移植地方力量，速立政治地位。同樣的理由可以用來解釋黨團對於選擇新徵成員職業的特殊喜好。截至一九四〇年底為止，國民黨普通黨員裏的學生百分比為七·六一%，黨務公務人員（含政法警等）合占三三·八五%，農工分子二〇·三三%，教員一八·八%；同年底三青團團員裏的學生比例為一三·七%，黨團務公務人員（含行政、地方自治、軍警、政訓、訓練班員生）高達六三·五%，農工分子僅占二·〇%，教育人員一一%。暫將國民

黨農工分子中的貧富比例擱置不論，單就職業別來看，國民黨黨員的成分確較三青團分布均勻，而三青團則明顯流露了一種更爲接近「菁英主義」的傾向。從某些角度而言，這種傾向似能符合蔣中正、陳誠等領導人賦予「新血輪」的期待，並遵循了初期「質量並重」的方針，但是事實與此仍有一段差距，其中癥結點在於三青團將「質」與「職業」等而齊觀，以致團員職業成分難以避免的呈現畸形發展。陳誠在一九四〇年三青團成立兩週年紀念時就援引當時所能取得的最新團員成分統計數據，指出學生僅占八·三%，農工分子只有一·六%的事實，他認爲這證明了「本團之組織尚未普遍深入於學校、農村及產業機關之青年群衆中，亦就是本團的真實基礎尙未形成」。^⑩

其後三青團的發展路線略有調整，其中以增加學生團員爲主要目標（一九四五年止已達四六·六〇%），教育人員的吸收態勢持穩，農工分子比例仍未見顯著成長（一九四五年止，只占四·五二%），黨團務公務人員比例則逐年下降，但至一九四五年底爲止，還占三〇·四二%（表六）。國民黨方面則持續擴收農工分子，公教人員爲另一組成主力。以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年度新徵黨員爲例，農工分子合占四七·三四%，黨務公務人員亦達一九·二六%，學生則爲六·五五%，教育人員九·六六%。^⑪總的來說，此時國民黨和三青團的成員發展策略均已大致穩定：國民黨以農工分子爲成員大宗，三青團則以學生爲主幹，其次，雙方共同留意吸收者首推公教人員。公教部門成爲黨團組成分子之重要來源的原因，與吸收便利有

關，國民黨重慶市執行委員會曾於一九三九年函請該市黨務推進委員會，請求提示「徵求黨員之最有效辦法」，推委會經討論決議建議中央「凡屬政府機關職員及學校教職員均應以一體入黨為原則」，^⑫可見黨務人員視此為徵納捷徑的心態，即在訓政背景下亦可理解；三青團中央幹事會一九四二年也曾循黨部「非黨員不得任公務員」前例，批准地方團部所請，規定「凡十六歲至二十五歲之青年公務員，非本團團員不得任職」，^⑬可證彼此心理出諸雷同，亦可見三青團援例以行的積極手腕。然而，這樣的走向一不能保證都在規定年齡內合法徵收，二不啻將團員結構推向更加失衡的境地；三青團藉此雖利於擴展成員，團務可能也較易獲得官方政治力的支撐，惟終無補於樹立全面的社會動員基礎。

表六：三青團團員職業成分統計（一九三九—一九四五）

年 度	一 九 三 九	一 九 四 〇	一 九 四 一	一 九 四 二	一 九 四 三	一 九 四 四	一 九 四 五
農 業	〇·六	〇·八	一·六〇	二·二六	二·三四	二·四六	二·六八
工 業	一·〇	一·二	一·五七	一·五六	一·五八	一·七四	一·八四
商 業	一·七	二·五	三·五八	三·四三	三·三六	三·四五	三·三九
黨 務	一·五	一·四	〇·七四	〇·六八	〇·六五	〇·五七	〇·五三
行 政	八·六	五·八	四·八二	四·四三	四·二一	四·二五	四·二三

地方自治	軍警	政訓	教育	自由職業	團務	在學學生	受訓員生	其他
一一	一七·二	二·九	九·九	〇·七	二·三	八·一	三七·一	八·四
五·六	一九·六	三·七	一一·〇	三·〇	一·七	一三·七	二五·七	七·〇
五·二二	一四·四一	二·四八	九·八七	〇·五九	一·二五	三一·六一	一五·九八	六·二八
五·六九	一二·二一	二·〇七	九·〇一	〇·五八	一·二〇	三六·九九	一二·六七	七·二二
五·五九	一一·三一	一·八四	八·五八	〇·五六	一·二四	四〇·二八	一一·五一	六·九五
五·五四	九·八二	一·五八	八·三四	〇·五〇	一·一六	四四·八七	九·二九	六·四三
五·七九	九·〇九	一·四一	八·二九	〇·四四	一·一〇	四六·六〇	八·二七	六·三四

單位：百分比。

資料來源：《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八月，頁一五九。

備註：一、資料來源所載一九四〇年數字超出二·七個百分比，權且從之。二、本表係據團員累積總數進行統計。

對於三青團團員的職業結構偏向的現實，幾位領導人至少在口頭或文字上都表達了相當程度的自省，但在團的實際作為上似乎還存在著路線之爭。一篇發表於湖北支團部刊物的未具名文章指出，三青團把長期艱苦所得的成績，僅僅放在少數知識分子，包括公務員及保甲

人員的身上，而根本忘記了團的決定因素在於廣大的農民青年和職業青年，「這也可說是我們工作同志過去極端錯誤的地方」；宜都分團部在一九四〇年度工作總檢討中也認為以往組織路線有誤，然而湖北支團部仍批示說：「組織的發展必須透過知識份子（包括公務員）這一級，而與農民學生、職業青年接近吸收。」¹⁰相對於此，三青團的領導群在一些官方談話裏還能夠保持較為一貫的立場。一九四一年七月，三青團第二任書記長張治中在團成立三年首次召集全國各地重要幹部匯集一堂的工作會議開幕講話中，即承繼了他的前任者陳誠對團員職業成分的批評態度，且還更進一步集矢於徵收公務員的部分，張治中說：

從組織的構成份子來說，目前團員的成份雖因各地情形不同而略有差異，但差異的地方很少。據中央團部的統計，全體團員中公務員竟佔到百分之七十，其他如農、工、教育、和基層行政人員不過佔到百分之三十，這雖不是一個絕對正確的統計，但已經告訴我們組織上的毛病了。試想以百分之七十的公務人員來構成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堅，不是和我們預期的原則相距太遠了嗎？我們更詳細的檢查，這百分之七十的公務人員已經超過二十五歲以上的又是很多。這是一點。其次，公務人員原來就有他們本身的行政組織，同時也有黨的組織，用不著本團去組織我（他）們；而事實上他們反成了我們的中心，這實在不能不指出是一個嚴重的缺憾。¹¹

該段講話內容提及超齡與黨早有組織二節，足徵三青團在公務部門發展成員之舉勢必牽扯到

複雜難解的黨團關係。張治中接著表示：「固然青年在公務人員中的組織是應該有，但是我們希望他們的百分比要盡量減少——減少到最大的限度才能夠說是合理，合乎我們的組織原則。」他也指出若干單位吸收團員完全「因襲從前工會商會的舊方式」，這種集體收攬，考核不精的網羅途徑早為人所詬病，三青團吸納公務人員雖具便利了當的考量，但也難脫綜覈不實的風險，於是張治中鄭重提醒各地負責團務的幹部：「像那種工會商會吸收會員的方式，實在是辱沒了青年團的組織！」¹⁷⁰

整體而言，自一九三八年以降，三青團團員的職業結構以學生與公務人員合占四分之三比例為最高。兩者也是主要的結構變動群。從統計數字來看，三青團的公務人員比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學生比例則逐年累增，然而儘管吸收公務人員的計畫受到政策性的壓抑，最後仍能保持可觀的比例，並且，學生及公務人員合占四分之三團員數的事實一直穩定的持續著。除此之外，三青團其他四分之一的成員結構幾乎沒有顯著的變動，包括領導人一再強調爭取的農工青年年增率亦屬有限，這說明了三青團改善成員結構的成果至微。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這一點，國民黨政權等於已在校園裏造成黨團兩個形式的領導，現在公務部門隱然又成了另一個競吸成員的場所。雙方在相差無幾的範圍內擴充成員（農工業例外），結果不能給黨團的工作分割與關係和諧帶來幫助；而三青團介入公務領域，實際也和爭取政治地位的意圖有關，隨後我們將會逐漸談到這種意圖及其衍發行爲所帶給國民黨的沉重壓力。

第四節 團務政治性格深化

蔣中正立意籌設三青團與政治因素有關，其中涉及派系利益分配也是不爭的事實。三青團成立前後，和國民黨密切相關的報刊已有反對三青團未來走上政治道路的言論出現，意在避免黨團組織間的工作重疊，並尊重黨的政治地位。^⑩惟基於前文討論所示，三青團終究還是不能脫離政治路線，並且因為和國民黨分據體制，久之漸成競爭之局。即使連美國駐華使館方面也發現了這個現象，一九四三年三青團一全大會召開前兩個月，一份分析國民黨政權內各重要勢力的使館報告指出，三青團這個取代了前復興社影響力，且受黃埔系軍人支持的成長中團體，在成員數、自我權力與政治面的重要性而言，都取得了顯著的成長；報告也提到三青團的作為引起國民黨相當的關切，執筆人最後強調：「擴展中的三青團是政治舞台上的一個派系，未來發展受到注視。」^⑪

這就說明了三青團早在一九四三年的全代會之前即已樹立起可觀的政治基礎，其勢力廣泛伸展至黨政教社會等範圍，此國民黨關切之所在。根據三青團一九四五年提出的數據顯示，團員籍貫以湖南為最多，占總數一四·三八%；^⑫該省組織發展普遍，「除城市學校之外，農村的保甲，鄉長鎮長，中心（學）小學校長，合作社主任大多是團員」；^⑬這些情形又和握執湖南黨政軍權力的薛岳支持團方在當地的發展有關，也跟朱家驊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

長時亟欲削弱CC系力量至為相連。薛岳曾把省黨部執委及組訓科長、宣傳科長、總務科長等職位納入團方勢力，團方又與親朱家驊、但欠缺組織基礎的省黨部書記長相結合，並配合省黨部主任委員薛岳的整黨計畫，讓一部分三青團幹部轉為縣黨部書記長。在湘西，三青團曾由第二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出面，將常德縣黨部要員依貪瀆罪名逮捕解往長沙，縣黨部書記長職位反代以團方人馬，桃源縣黨部書記長也由團方掌握。一九四四年陳立夫接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後，湖南黨部人事又經變動，張炯擔任省黨部主委，團方為配合中日戰事需要，並因應省內黨政新局，於是在沅陵成立三青團湘西辦事處，以鞏固原有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則對伸入各縣黨部的人員，採取保護撤退的策略。此後黨團對峙依舊，且延至戰後。

貴州則又是另一番景況。貴州支團部籌備處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籌備主任由復興社分子黃宇人擔任；一九四〇年一月，兼具省黨部執委身分的黃宇人繼任省黨部主任委員，於是黃得以同時攬持貴州黨團實務。除黃宇人外，該屆省黨部執委派身分劃狀況為CC系四席，團方三席，傳啟學派（即親朱家驊勢力）三席；CC系席次尚能與三青團方面相當，然就政治聯合運作論，實際已落於團方、傳派下風。為了維護派系利益，CC系由四名執委組成領導小組，以調統單位為據點，實行保衛黨權，職是之故，CC系在基層的長期經營尚不致盡褪優勢。根據貴州團方幹部的說法，黃宇人在黨團幹部人選等問題上，是有意識的把團的地位提高在黨之上。例如一九四二年由黨團聯合委託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培訓的學員結訓後

，黃宇人就以成績前二名者派任縣分團籌備主任，三、四、五名始派為縣黨部書記長。其後，接任省黨部主委的是朱家驊支持的傅啓學，在傅啓學任內，團方在省黨部仍能保有若干執委席位。一九四四年，貴州省舉行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CC系在執監委員選舉中占得優勢，不過三青團仍然穩住了三個執委位子，席次佔有率僅次於CC，CC系則又奪回了省黨部主委職位。^⑩

團方幹部得以進入黨機器內擔任諸如執委等的角色，這和他們兼具黨籍有關，以利害面而言，純為實力分配，勢不能禁；以公的角度說，是一種促進黨團聯繫的舉動。同樣的，黨方也不乏擔任團部幹事的例子。惟揆諸各地，以利害論，團方在黨機器內多半流於點綴，勢力有限；同時由於本位意識作祟，反有礙於黨團關係。黨方（尤其是CC系）在團內亦然。爲了加強彼此間的聯繫管道，國民黨與三青團於是摸索出一套模式，儘管這些方法是否普遍施行，持久度、有效性如何還大有疑問，但是卻可以說明三青團的確具備不容忽視的政治地位。譬如若干省分會建立「黨團工作會報」的協商機制；在安徽省黨部與安徽支團部之間，一九四〇年六月起曾經展開定期性的黨團「聯席座談會」；^⑪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舉行的湖南全省黨務會議裏，與會者分「出席會員」、「聘請出席會員」，出席會員悉為湖南各級黨部人員，三青團湖南支團部幹部則與當地軍政界人士共列為聘請出席會員。^⑫安徽省「聯席座談」的名義暗喻了黨團平等的地位；復從湖南省黨務會議的出席名單觀察，三青團實已躋身

於黨、政、軍等地方實力團體之列。

由於三青團加入地方實力團體的競爭，地方政治生態勢必隨之重行組合或改變，亦必更趨於複雜。先就黨政部門而言。國民黨自取得政權後，各地黨政關係始終難能穩定，此中涉及地方對中央的離心力問題、派系運作、黨政職權未能明確劃分，與黨政聯繫辦法未能切實規定……等因素。^⑬從事黨務工作的董霖曾憶及黨政關係欠佳的史實；^⑭就連一九三八年國民黨臨全大會裏的一份決議文也不得不承認：「就黨政關係言，本黨執政以後，黨政似成爲兩個重心，除中央有正常之黨政關係外，各級地方，此兩個重心始終處於似並立而非並立之地位，因之地方政府之設施，與黨部之工作，往往有未盡協調之處。」^⑮蔣中正稍後舉行的五屆四中全會裏也要求黨政充分協調，他認爲黨政分立、力量抵消的後果，使得黨與政府的威信一概喪失，一切革命事業都因此減低效能，蔣中正表示這是一般同志不明瞭黨和政府在建國進程中個別性質與關係，以致不明職責，逾越了本分。^⑯臨全大會與四中全會的任務之一即在確定調整黨政關係原則，此後中央採取以黨統政，省市採取黨政聯繫，縣採取黨政融化（融黨於政）的形態，期能一新氣象，^⑰惟這項原則及多項具體辦法未能大舉澄清地方複雜的政情，黨政關係低迷的現例仍然所在多有。^⑱

儘管如此，在一九三八年臨全大會、四中全會通過〈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確定調整原則後，一種省級以下的黨政會議逐漸透過多次補充規定成形，用意在於增進雙方聯繫

功能，基本上可以視作國民黨政權下各政治勢力在體制內的協商管道。這類會議在省級稱「省黨政聯席會議」，縣級原稱「縣黨政祕密會議」，一九四三年改名「縣特別小組會議」，參加人員為各級黨部重要幹部與同級政府的要員。^⑩另一方面，戰前復興社早已樹立地方實力基礎，三青團大體既經復興社勢力而擴充發展，加上派系利益糾葛，組織任務的革新導向，體制設計富自主性……等因素相激盪，走向政治路線勢非偶然。而三青團既成爲國民黨政權下政治生態的一員，就名義論，需求得適當相應地位；就利害言，需進入政權體制內發揮：此爲前述團方進入黨機器從事政治操作的重要背景。就地方政治工作來說，三青團自認「與黨務行政有不可分離之關係」，^⑪即使連蔣中正也示令團部工作應注重聯繫有關各方，俾相互協助工作推展，^⑫因此，三青團逐漸把眼光放到了各級黨政會議的上面。

原來地方政治需要調和者厥爲黨、政二端，自從三青團開展組織後，迅即躍爲政權下絕難忽視的第三股力量。一九四〇年一份由湖南省政府擬訂的黨政聯繫計畫就指出「查各縣縣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與縣政府能精誠合作，共謀業務之推進者固多，而互相發生誤會磨擦者，亦間有之」，結果「遂漸由隔閡而生糾紛，由糾紛而起磨擦，由磨擦而成意見，非特減損行政效率，並予人民以不良印象，關係甚鉅，亟應予以調整」。^⑬而團方認爲解決途徑之一就是參加類似協商、會談性質的黨政會議，以協助推展地方政治。三青團爭取參加地方黨政會議的決心堅強，在某些省份也不乏獲有列席機會，但是在制度面一直無合法出席地位

。⑭迄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黨務委員會審查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函文的決定，准縣級分團主任、書記具黨籍者，可參加縣黨政祕密會議。⑮惟該會議旋於五月改名「縣特別小組會議」，會議參加人也經重行規定，三青團再度被排除於外，經團方要求補列，國民黨中常會始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准參加幹事長（前稱主任）或書記具黨籍者一人。⑯

至於層次更高的省黨政聯席會議，三青團直到一九四五年才正式獲得許可參加。基本上，國民黨中央對團方參與省級的黨政會議持拒絕態度，以一九四四年間為例，福建省政府曾請示行政院稱三青團的支團部應否參加省黨政聯席會議，經行政院函請黨中央核復，並移送黨務委員會審議決定准予參加，但最後提請中常會核議時遭到了否決；⑰隨後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函黨中央稱，三青團「與黨務行政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如省市舉行黨政聯席會議，本團各級負責人員未能參加，其於工作之推行窒礙殊多」，為求「協助黨政並密切配合」起見，三青團認為各級團部幹事長和書記實有參加這種黨政聯席會議的必要，但國民黨中常會經討論後仍維持前次否決原案。⑱延至次年，蔣中正才交下手令准許支團部幹事長或書記出席省黨政聯席會議。⑲這樣一來，三青團在地方的實力地位無形中等於獲得承認，而在實際運作上，政治早已是三青團的主要興趣與伴生利益的所在。

三青團各地方團部的成立，首先使得地方政治生態重新經過一番洗牌，浸而造成嶄新局面。在四川省瀘縣，一名屬於復興社的原鄉子弟羅才榮奉命回到瀘縣籌組三青團，並擔任瀘

縣分團部籌備處主任。他將工作、組織觸角由學校伸入社會，許多年輕人以三青團爲中心，自然結合成了一個新興力量，當地人稱「青年派」，以有別於原以鄉紳爲主的「市政系」。羅才榮積極扶植地方青年，並與縣長袁守成取得合作，當縣政府新增職司聯繫民衆團體與人民福利事宜的社會科時，經羅介紹，瀘縣分團部幹事劉文質得到了這個對三青團組織發展極有助益的位子。⑭另一方面，三青團其實也延續了地方派系盤據之局，例如復興社解散後，原來一些在湖南地方政局上諷屬「乙派」的社員，紛紛轉入甫成立的三青團，這就使得部分原寄身復興社的乙派與以CC系爲領導的甲派，在三青團成立後繼續衍成對抗局面。⑮

有些地方大員與三青團的利益相互結合，這對三青團的組織發展饒有幫助，前述薛岳在湖南任職時期是一例，陝西的胡宗南則又是另一個顯著的例子。在胡宗南掛銜陝西支團部籌備處主任的情形之下，陝西團務大致由親胡的楊爾瑛掌握，兩人均爲復興社成員。楊爾瑛擔任支團部組訓組組長期間，實際上支團部書記葛武榮已無能節制，一九四四年底，楊爾瑛擔任胡宗南支持升任陝西支團部幹事長，楊正式成爲陝西團務最高領導人。三青團在陝西獲有背景奧援，儼然一方勢力，難免和以黨部、教育界爲主要範圍的CC系形成傾軋，在一九四四年底展開的知識青年志願從軍運動中，陝西支團部搶先吸收該省應徵青年加入三青團，事爲黨部所悉，然仍無可奈何；同時爲消解陝北共黨對青年的拉力，陝西的團方與CC系都在教育界積極發展，雙方掣肘日甚，諷屬CC系的西北農學院院長且曾以武力駐校，造成學生受

傷事件。¹⁵⁴同樣的，一九四三年在廣東的一所大學裏，也因為團部主任拘捕黨部書記的事件，進而釀成學潮。¹⁵⁵另一方面，三青團的組織觸角伸展廣泛，形同一綜合性的政團，這就拉寬了三青團與國民黨的競爭面，也掘深了雙方的鴻溝，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底開封新聞記者公會成立的理監事選舉中，三青團系統的《青年日報》聯合軍統、軍方的報社，用以孤立國民黨省黨部機關報河南《民國日報》，開票結果聯合陣營獲得壓倒性勝利，在河南當地頗具規模的《民國日報》只取得一席監事，嗣雙方因選後的筆墨爭執差點又對簿公堂。¹⁵⁶

在一些省份裏，三青團的發展並不順暢，但這是國民黨政權與地方實力派之間存在已久的隔閡與不信任所致，是整個政權的難題，非三青團所能單獨面對。其中可以雲南、山西、廣西、青海為例說明。學者易勞逸把三青團視作中央的政治管制機構之一，作為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之間權力迎拒的一個微妙關係案例，他認為這些機構在中日戰爭時期雖然能夠立足於龍雲統治的雲南，但從未能像在國民黨政權所能絕對控制的地區中那樣發揮作用。¹⁵⁷山西也是這樣，而且情況更為嚴重。三青團在閻錫山統治的山西，既須應付共黨的滲透勢力，日軍占領區內又視三青團為特務組織，加上效忠閻錫山個人的民族革命同志會對中央勢力極不友善，三青團「各工作同志豈僅在敵後及匪區時有犧牲，即在我完整區亦間有遭受暗殺與監禁者」，國民黨在晉待遇亦然，可見山西環境之特殊。¹⁵⁸相對於雲南、山西，廣西與青海當局則是以更積極的手段尋求掌控三青團組織。在廣西三青團裏，新桂系迅速排除了康澤派下

的復興社勢力；在青海，以省主席馬步芳爲首的馬氏家族秉持「以青治青」的排外原則，視國民黨與三青團爲一外來威脅，乃逐步採取措施取得控制權，到一九四七年黨團合併之前，馬家已在兩個組織間占據絕對優勢。^⑩

第五節 調整黨團關係措施

在某些排斥中央勢力的省份，三青團和國民黨共同遭受地方當局打壓，然而在更多國民黨政權能夠或大致可以控制的省份裏，三青團與國民黨卻一直存在著惡性政治競爭，一些觀察力敏銳的人們開始注意到三青團的表現和需要改革的國民黨並無太多不同，蔣中正寄望三青團集攏革命分子成一聯合隊伍的想法馬上就落空了。三青團成立沒多久，即開始和國民黨爲管轄權限而爭鬧，競相吸收新的成員，並且公開訕笑著國民黨。黨團雙方這種意氣之爭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距三青團正式成立只過了八個月）已經變得非常嚴重了，^⑪好些黨的地方骨幹這時在重慶向黨中央發出抱怨三青團的言論，怨懟的聲音發生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上，引爆這些高級黨工不平情緒的人可能是康澤。據原任中央訓練團副教育長，代行陳誠教育長職權的王東原回憶，中央訓練團實以黨政訓練班爲重心，該班分期分批召集全國黨政軍學中上級幹部，各省區縣長以上，乃至中央各部會次長以下，各廳處長以上爲受訓對象，授課內容多以政治課程、思想訓練爲主，其中有「青年團團務」課目，講師包括兩任三青團書記

長陳誠、張治中，以及負組織責任的康澤。很可能就是康澤在一九三九年初開辦的黨政訓練班第一期課堂上，提出過於刺激在場國民黨受訓幹部的言論。康澤表示，正因國民黨「組織不健全」，後復為「紀律不健全」，所以「要青年團以替代黨」。這番談話引起黨方受訓生的不快，從而在三月二十九日黨務人員內部的談話會中爆發。¹⁶

三月二十九日中央黨部召集各省市黨部受訓委員書記長的談話會上，主席丁惟汾要求在場的各地高級黨工提供黨務建言，安徽省委余凌霄首先發言指出黨團關係困難殊多，值得討論，中央祕書長朱家驊（亦兼代三青團書記長）則安撫大家，表示未免過慮。江西省書記長范爭波顯然不能同意朱家驊這樣的處理態度，他發言指斥三青團代黨自居的想法，稱訓練課程裏某教官的代黨言論令「大家覺得發生很大問題」，「誰懷疑黨，當然黨員要向他進攻」；范爭波尚且憂慮三青團成員身分的分離傾向，他認為三青團既是黨裏訓練青年的組織（剛才朱家驊正是以此說為安撫），則其幹部就該悉屬黨員，然事實上「不但有許多幹部不是黨員，且是一向看不起黨的，而那天教官還說是盡了多少選擇而找來，黨員聞之，焉得不氣憤」。范爭波向朱家驊強烈要求三青團幹部非「忠實黨員」絕對不能容納，這項意見獲得廣州市委方少雲的呼應。方少雲並且質疑三青團所稱「吸收好黨員」之舉是否想摧毀國民黨，他說：「果真他們這樣做到了，國民黨不是會無疾而終？」¹⁷

談話會接著還有針對黨團關係的批評意見，以至於要等到主席透露蔣中正翌日將就黨團

關係提出說明的訊息後，才能止息這場抨擊。黨政訓練班第一期關於黨團關係的爭論氣氛熱烈，¹⁵在一些小組會議及其他場合均不乏立場各異的見解，三月二十九日的黨務人員談話會則具體反映了黨方態度。這些爭辯給黨內人心帶來一些難以言說的困擾，於是蔣中正以中央訓練團團長的身分，在正值黨政班首期訓練期末的三月二十六日對學員澄清：「青年團是黨內青年的組織，也就是本黨的生力軍，預備隊，我們應當看作是黨內的新生命，新細胞，新血輪。」¹⁶三天後，亦即二十九日，三青團書記長、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陳誠也對受訓學員發表了黨團關係的談話，他要求三青團的成員特別要認識團是黨的一部分，「有黨的存在而後才有團的產生，任何人也不能認為團與黨是兩個獨立的或是分離的組織」。其次，關於統屬問題，陳誠個人以為國民黨是以主義、領袖、政綱政策來領導三青團，「並不是逐級都發生直接隸屬的關係」，至於黨員與團員之間，「平時應該注意的是觀摩不是領導」，他指出：「黨所以不使黨員個個人對團員都負領導的義務，這也可以說含有使同志毋因自滿而不再求長進的意思。」陳誠也談到黨團雙方工作範圍不能機械的加以劃分，因為在同一系統之下，如此「既不可能，亦屬錯誤」。¹⁷

整體而言，陳誠對於黨團關係的見解不能縫合實際的裂痕。儘管他不認為三青團應與國民黨各自分離，但在組織體制、成員統屬，與工作範圍的議題上，陳誠親團方自主的立場顯然與國民黨方面大有差距。陳誠在演講最後還點出國民黨與三青團和衷共濟的重要性，¹⁸然

而就在同一天，從各省市前來重慶受訓的黨部委員、書記長，在中央黨部舉辦的談話會中，卻一再對三青團的分離主義施加言詞攻擊。兩個組織間的隔閡已深，同一最高領導人蔣中正勢必得做出較富意義的澄清舉措，三月三十日黨政訓練班第一期畢業學員的入黨入團宣誓典禮提供了發表政策性說明的機會。蔣中正正在宣誓典禮上，以「黨與團的關係」為題，告誡這些幹部：「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中國國民黨系統之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言之，他就是黨的團，不是黨以外對立的一個什麼組織。……大家不要以為團與黨有什麼特殊的區別，或者以為團是用來替代黨的，其間有一種什麼輕重消長的關係，這是絕對錯誤的觀念！」再就黨團的系統和性質來說，三青團「乃是本黨系統之內的青年組織與集團」，「至於整個系統之下，黨部指導團部，黨員指導團員」，這裏，蔣中正特別提醒聽講者：「指導」不等於「指揮」一詞，「指揮」有上下統屬的關係，「指導」完全是引導輔助的意思，「故不僅黨員可以指導團員，團員也可以指導黨員，並且黨員與團員都可以盡忠竭智輔助領袖」。¹⁷

蔣中正認為他所闡述的黨團關係，大家可以本著革命的良知心領神會，而不必以文字來作形式的規定。他要求大家了解，國民黨與三青團同一系統，不可分離，「團員應知道，團的基礎在於黨的健全與充實，黨員應知道，黨的前途有賴於團的向前開展」，明白這層道理，彼此就不會再有什麼懷疑或不可解決的事情了。¹⁸這篇講稿可能是蔣中正首度就黨團關係發表的較具集中性、全面性的說明，觀察文中要旨可以發現與陳誠的態度相去不遠，即使和

蔣中正去年的立場相較也沒有太多差別。蔣不認為三青團應該用來取代國民黨，但在黨團實際統屬問題上仍然傾向於團方的自主地位，此從蔣選擇「指導」而非「指揮」的字眼即可得知（陳誠則用「觀摩」取代「領導」，兩人的意思是一樣的）。比較寓有深意的轉變是蔣中正，在談論黨團問題時開始顧及國民黨的顏面，並強調其在國民黨革命進程中的執政地位，但是這種態度不能解除國民黨黨員的憂慮，國民黨在這篇重要的政策性談話中，只是獲得了蔣中正對於以團代黨說的公開駁斥，至於管轄三青團的權力依舊付諸闕如。

蔣中正、朱家驊和陳誠三月間在黨政訓練班的談話，對國民黨與三青團毫無約束作用。體制問題難能廓清，徒以互信和讓的道德語彙相助勉並不能解決實際面的爭端，以至於第二期的黨政訓練班又重演了相同的紛擾。在五月十七日黨政訓練班黨務人員談話會上，主席朱家驊面對著另一批由中央召訓的省委，但是三青團問題照例成了批評的焦點。朱家驊致詞時首先指出，自三青團成立以來，黨團雙方均有認識錯誤之處。他援引蔣中正三月底的談話，重申自總裁以下無人有棄黨他顧之意，並希望國民黨以老大哥地位力避糾紛。幾位省黨部委員接著就三青團團員年齡範圍過寬、黨團統屬、黨員入團等問題提出意見，在貴州極具影響力的陳惕慮甚至表示，中央決定新制度時稍欠鄭重，一有毛病則歸咎同志自私自利，不能合作，他認為這不合事實。陳惕慮指三青團成立以來問題叢生，一方面不乏吸收年紀很大的土豪劣紳來和黨部對立的情事，一方面三青團最高年齡規定到三十八歲，「於是乎有人說黨員

都是昏庸老朽之輩，這種印象到民間，實才（在）是很不好的」。^⑯

以前蔣中正對三青團的講話中，總是著重在國民黨的缺點上，期望三青團這個嶄新團體能夠振衰起敝；現在，蔣中正發現三青團自身的毛病和需要改革的國民黨並無太多不同，因此他開始談論青年人和三青團在肩負訓練與領導全國青年的任務中的品德缺失，至於國民黨人的衰頹則不再強調。^⑰在五月十一日交給代書記長朱家驊的手令中，蔣中正指出中央團部「近甚消極無聲」，各辦事人員「皆星散零亂」，他要求特別注意地方輿情對於各省支團部人員多不稱職，而且腐儒之人為多的看法。^⑱如果說過去蔣中正還有意讓三青團成為國民黨政權的政治（領導）角色的話，現階段則削弱了這方面的作用，他說：「我們青年團的組織固然含有政治的意義，但青年團的工作，仍應以教育的成分占主要地位。」^⑲三青團團章也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央臨時幹事會第四次會議中做了首次修正，團員入團年齡從十八至三十八歲改為十六至二十五歲，整體而言是縮窄了，並且在團章的紀律部分加入不得在團外抨擊國民黨等條文。^⑳同一天，蔣中正對著會議出席者表示「現在外界對於本團一般觀感與輿論，都不很好」，他重申三青團是黨國新生命的地位，「如果我們辦理不善，以致歸於失敗，則將來恐怕再沒有這樣好的機會，讓我們從頭作起」。^㉑

十九日，蔣中正針對三青團成員的良莠問題作出更為露骨的批判。他反駁幹事會議有關工作報告審查意見認為三青團形象良好的說法，並要求注意三青團的純潔性，例如應杜絕幫

會中人等不良分子加入這個革命團體，團員不宜擔任偵調等特種工作，不可像拉伕般強制吸收團員；其次，三青團必須徹底改變已經染上的官僚政客習氣，他說：「我們爲要革除遺留在本「黨」以內這種官僚政客的習氣，纔來另外成立這個青年團，一方面繼續培養革命力量，同時也使黨員有所觀摩，力求進步，要是我們再把這種壞的習氣，傳染到青年團來，這個青年團還要他（它）做什麼？」蔣中正也痛心於國民黨和三青團幹部營私樹衆，埋沒人才，如果再不放開眼光，爲國家民族著想，則不啻爲革命黨員莫大的罪惡。他最後說道：「我們革命事業的成敗，完全要看這一回的努力如何而定，如我們再不奮鬥努力，挽救衰弱，那末，革命失敗，國家滅亡，我們不但要做亡國奴，而且以後真是要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①

——時隔一年，蔣中正對三青團的表現仍持保留觀感。一九四〇年八月，三青團書記長陳誠以軍政事務繁忙，無暇兼集團務，呈請辭職，陳並辭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一職，專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蔣中正令調張治中爲政治部部長，並兼三青團書記長。^②在張治中到職之前，蔣中正特於八月二十三日在三青團中央團部召集三青團與政治部的重要幹部發表談話。僅僅就在幾天前的十九、二十日，日機濫炸重慶市區，大火兩日夜，爲繼去年五月重慶大轟炸後又一顯著劣行，^③蔣中正訓示三青團、政治部的幹部（這裏面有不少黃埔系、復興社的成員）應從這一番現實教訓中徹底覺悟，他學社會一般人懷有「青年團不

如國民黨，政治部則有不如無」的看法，蔣中正自認經費、待遇較外國類似組織還要優厚，論及缺失癥結厥在二端，一為不知事理，不守範圍，以致組織愈大，摩擦愈多，衝突愈厲害；二是不肯負責任怨，所以人成了官僚，機關成了衙門。他期勉即將由張治中負責的兩個組織「不要只看著內部，計較他人的是非」，如果眼光一致放遠，「則我們協助主官同僚，惟恐不及，何暇自相摩擦？」^①

蔣中正曾在三青團面前痛斥國民黨的官僚衙門作風，不到一兩年，三青團也成了這類批評的目標。在地方團部的內部刊物裏不乏深刻自省的文字，例如一份未署名的文章強烈指責許多幹部把團務工作當官兒一樣做，下級工作同志冀圖從此廁身官場，打造成一個官僚紳士的典型，團部則雖人數稀少，衛兵冗室一應俱全，與一個衙門無異，作者警告這樣的國民革命終將流於官僚政治，他日必讓第三者來革命。^②即使連執掌三青團組織重任的康澤也不得不指出一部分團員有減退革命熱忱的傾向，而一般幹部則仍舊因襲以往處理公務的習慣，把團部當作一般機關在辦。^③內部檢討的聲音一直持續著，蔣中正在一九四三年三青團的一全大會期間告誡來自各地的出席代表，今後要打破團部衙署化，團務形式化的積弊；要打破以從事團務工作為營求權位階梯的心理；要打破過去不居名義不能辦事的觀念，切不可預存權利思想去辦事，「如果犯了這種心理，那就是官僚式的辦事方法，非致失敗不可」。^④在一全大會閉幕後舉行的三青團中央幹事、中央監察聯席會議開會式上，蔣中正又向這個昔日他

所寄望成爲黨國新生命的組織重複述說了他的憂慮：「我覺得我們辦理黨務有幾十年的歷史，辦理團務也有了五年的歷史，而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工作沒有效果；（，）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從事黨務與團務工作，往往把黨部與團部當作衙門，把自己當作普通的官吏，……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今後必須徹底改正。」⁽¹¹⁾

學者齊錫生認爲，多數三青團的重要領導人是前復興社的老資格成員，一開始他們就採取了高度侵略性的擴張政策，他們故意散布謠言指稱蔣中正已經自腐化無能的國民黨這邊轉，且最終打算以三青團取代它；在許多地方，三青團採用擴大行列的相對戰術，藉著收攏非青年人、土豪劣紳來壓倒地方的黨組織；甚至在頭兩年，三青團的組織工作已經顯示它的主事者並未打算只是留在青年工作的範圍裏。這個後起的團體複製了國民黨的組織架構，且指揮著一堆通常由黨來幹的活動。來自黨政軍的團員比例非常可觀，當這些職業的人大多都已加入了國民黨時，三青團吸收他們的企圖可以被解釋爲讓這些人棄黨來到一個分離派系之意。⁽¹²⁾主觀上，三青團自認是有別於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新血輪，種種本位意識、分離意識、取國民黨而代之的心理紛紛產生；客觀形勢上，則不知不覺陷入欠缺熱情的衙門官僚之屬的境地。這樣一來，三青團一方面和黨疏遠了，一方面自己反倒也成了第二個亟待整頓的黨。從一九三九年開始的調整黨團關係措施，正是在黨團關係失控，以及蔣中正對三青團感到失望的背景下展開的。

所謂調整黨團關係措施，係指一九三九年，為緩和國民黨與三青團之間的矛盾，由幾位領導人相繼發表政策性談話，以及新頒布、修訂增補相關法規……等多元化、具有澄清目的的措施統稱。前述蔣中正和陳誠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間的談話替這些努力作了開端，^⑩儘管這些談話論及三青團性質時，仍不免語帶模糊，或者較偏向團方自主的立場，但是他們卻也一致反駁了諸如以團代黨等種種不利於國民黨的傳言；在七月十七日蔣中正的講話中，他還期待以注重教育性工作來降低團組織的政治意義，這多少也出於彌合黨團關係，與導正三青團流於官僚政客傾向的考量。蔣中正和陳誠的談話迅即成為黨團要人與各級幹部闡述相關論題的準據，即使是康澤，也在一九四〇年一月黨政訓練班第六期的團務課程上，朗誦了一段去年三月底蔣中正正在該班第一期的訓誨，然後接著要求團尊重黨，黨愛護扶植團，並且說：「如果到今天還有黨和團的摩擦發生，就是誤解了團長的主張；如果到今天還高調黨和團微乎其微的不諒解事實，就是違背了團長的主張。」^⑪

一些公開發行的宣傳刊物也出現澄清三青團性質與黨團關係的文章。丁作韶先後為文指出黨團關係「本是不成問題的，並且是不應成問題的」，三青團在國民黨領導之下，雙方均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是弟兄而不是對敵」。^⑫親康澤的復興社分子方采芹則駁斥三青團是復興社的變相，是法西斯蒂組織的說法；不過，他也認為三青團具有獨立的組織系統和特殊的政治任務，與國民黨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領導關係，實非國民黨的青年部，團員也不是

國民黨的預備黨員，否則爲何像陳立夫等國民黨的老同志還要舉起右手宣誓入團：「難道他們還要重新來作預備黨員麼？」對於盛傳三青團是準備替代國民黨的第二黨，方采芹則指斥「只有日寇漢奸和反動份子才有這種思想」，「我要大聲的說，我們的團不是第二個黨。黨和團像左手之於右手，像唇之於齒，我們能夠拿右手來反對左手麼？我們能夠用牙來反對我們的唇麼。當然不能夠的！只有傻子和瘋子才作這樣的蠢事」。

三青團中央也開始致力於緩和黨團關係與澄清團的性質。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團中央通令各地指出三青團爲國民黨所組織，關係至爲密切，但部分團員每於公文書或言談間「稱本黨爲『國民黨』，有如二體，實屬不當，以後應改稱本黨，以明體系」。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通過對各級團部工作的指導方針計八項，經蔣中正批准後頒發實施，方針第一項即開宗明義指出：「本團應使全體團員與全國青年，均深切認識本團乃團結青年及訓練青年，使其能力行革命主義，捍衛國家，復興民族之唯一的青年革命集團，亦即本黨之新血輪，新細胞，而非一般人所稱政黨。」稍前，三青團團章在七月十七日作了首度修正，涉及黨團關係的有年齡、紀律等相關條文，修正後的團章經蔣中正核定，於翌年一月一日公布施行。朱家驊曾經預先向黨政訓練班第三期的黨方受訓學員透露團員年齡即將修正縮窄的訊息，以往在這個場合中，朱家驊時常聆聽各地高級黨工對三青團的抱怨與激烈批評，現在他樂觀的對國民黨的幹部預言「最近的趨勢更比以前好辦了」。

在這一波試圖化解黨團歧見和衝突的措施裏，最令人矚目的要算是一連串直接套上黨團關係之名，採明文條列式的辦法；其產生原因除了爲落實蔣中正等領導人的口頭訓示，也和團章修正後尚需配合具體法規，才能釐清其間執行窒礙處有關。這類辦法中最早公布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由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的〈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先是在七月十九日三青團中央臨時幹事會第四次會議中，幹事王世杰提出〈請遵照團長訓詞〈黨與團之關係〉具體規定實施辦法以謀團務發展案〉，會議前天才剛通過團章第一次修正案，現在進一步將王世杰的提案照審查意見通過，並移送中央黨部。國民黨將原案加以補充修正後先行報請蔣中正鑒核，嗣於十一月二日中常會決議通過。該辦法分「一般的」、「學校方面」兩大項，對年齡、分工、協商等事宜有原則性的規範。^⑩

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張治中在經過日機轟炸重慶，留下滿目瘡痍的景況下，以及蔣中正對三青團「不要只看著內部，計較他人的是非」的訓誡聲裏，接任三青團書記長一職。前三年，張治中的主要職位先後是湖南省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主管軍事機要）。蔣中正之所以屬意由張治中接任三青團書記長，或與張爲黃埔系教官系統，與黃埔系、復興社在團內幹部有師生之誼有關；同時，張治中與他的前任陳誠頗具私誼，對於團務的推展當不致乖離太甚。^⑪據張治中回憶，此時他對三青團的工作感到很陌生，對這一組織的作用和過去的情況向來沒有研究過。^⑫無論所言是否真確，然作爲一個在團長之下

，團務的最高執行者，張治中難以迴避複雜的黨團關係。九月七日，即張治中到任一週後，在重慶青年夏令講習會對學生發表講話，他以佛學三寶作喻，指出革命青年應該皈依三民主義、國民黨，與最高領袖蔣中正等三寶。關於國民黨，他說：「革命一定要有革命的集團，而中國國民黨就是為實現三民主義而組織的革命集團，我們當然要絕對擁護中國國民黨。」^⑭接著，在張治中主導下，中央團部提出一份〈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經蔣中正核閱，以所擬尚屬可行，電飭提交國民黨中常會審議。復經各方協商，十一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修改後的案子。^⑮

〈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規定三青團應服從國民黨的指導，國民黨應扶助三青團的發展，雙方成員不得相互攻擊詆毀，同一地區的黨部團部應經常舉行工作會報；國民黨的工作注重與政治相配合，三青團注重教育；國民黨的活動範圍注重社會，三青團注重青年學生；對於二十五歲以下黨員入團與二十五歲以上團員入黨的手續也作了規定。不過這些條文仍屬概括式的原則，因此在草擬的同時，也構想以前後幾個辦法及相關決議意見為本，制定一更為詳細的實施細則。經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與中央團部反覆磋商，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呈報國民黨中常會備案，即〈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實施細則〉。該細則共分六章，對黨員團員年齡問題、黨籍團籍的釐定、黨與團工作的配合、黨團與人事上的聯繫均有詳細規定。^⑯為了保證辦法與細則能夠貫徹實行，蔣中正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復以總裁兼團長名

義通令各級黨部團部，重申紀律指出：「不特黨與團之內，不許互相攻訐，不許有小組組織意識之存在，黨與團之間尤絕不容有摩擦鬥爭之情事」，他並提出查察黨團關係及考核辦法計九項，飭令各級黨團組織與成員一體遵行。^⑭

蔣中正的講話與接連頒布的法規是戰時國民黨政權處理黨團關係的最高準則。爲了廣爲傳播這些政策性的宣示及辦法，三青團中央團部在一九四〇年印發了一本題爲《黨與團的關係》的小冊子；兩年後，由於相關的宣示及辦法又添了幾項，所以中央團部將之增訂後再次發行。^⑮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包括蔣中正歷來對黨團關係的訓示、有關法令與決議案，以及出之以闡釋和問答方式的說帖，^⑯在「黨與團之關係問題解答」中，編者否認三青團是用來代替國民黨，或者是國民黨以外的一種政治組織。^⑰另一方面，釐清黨團關係的努力同樣見於中央團部大量印發的《團員須知》內容中，在這本作用等同團員指南的小冊子裏，黨團關係占有專門的篇幅。如果就不同年度的版本進行分析，將可以發現三青團中央在黨團關係日益惡化的過程裏承受極大壓力，以至於必須在這份團員基本手冊中，累次加強相關文字的嚴謹度，以避免過度刺激國民黨。例如，最先編印的冊子表示「青年團在政綱上必須受國民黨之領導，但青年團祇爲國民黨總裁領導之下的團體，既非直接與黨發生統屬關係之組織，亦非獨立平行的組織」；^⑱前述版本內容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出版的冊子裏全盤更新，新版本只是委婉的說道：「團在組織上，思想上，政治上，以至歷史任務上，不是與黨對立平行的

，它與黨不同的地方，在於工作的分工，……換句話說，黨把全國青年組訓的任務，交給團，團在這個任務之下，有它的行政獨立性，而這行政獨立性，與黨的整個組織系統依然具有密切的關係。」

儘管如此，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印行的《團員須知》仍然隱約強調了三青團的革命性與政治性。它說：從領導青年而言，因為三青團有行政上的獨立性，所以自成一個團體，但並不是脫離了黨，相反的，團要受黨的領導；同時三青團也不是普通的社會團體，而是負有特殊任務的「青年革命集團」。編者並引用蔣中正所說「青年為革命之先鋒隊，國家之新生命」，是「社會進化」、「政治改革」的生力軍和主幹云云，指出加強青年組訓的重要性。^②然而，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增訂的《團員須知》裏，所有有關革命性、政治性的暗示字句悉遭修改刪除：原來「青年革命集團」的字眼改成了「青年集團」，原編者援引蔣中正期勉青年成為進化、改革的生力軍、主幹的整句話也被刪掉了。^③也許這樣的作法是基於促進黨團和諧，不願再生刺激的考慮，例如在《團員須知》一九四〇年版中，尚以「團與黨的關係」為題，內文也曾表示「團與黨是相需相存的」；一九四二年版則將章節題目調轉為「黨與團的關係」，並進一步把「相需相存」修改成「相需相輔休戚相關」這類更具緊密性的辭彙。^④

地方團部發行的一些專刊同樣也給予釐清黨團關係的篇幅。例如四川支團部籌備處編印的一本團務綱要裏，就提供了一章的篇幅談論黨團關係，編者簡述黨與團的歷史、性質、任

務，並指出黨團互相指導而非互相指揮，其間也沒有尊卑或新陳代謝的關係。⑩綜合以上所有的政策性宣示、法規通令，與有關刊物的配合性言論等措施觀察，可以看到幾乎全是圍繞在年齡、分工、協商等技術性事宜打轉，這些形諸口頭與文字的措施，在表面上的確一再強調三青團絕非一個取代國民黨的組織，對於黨團和諧的道德面要求也始終不遺餘力，甚至蔣中正還試圖將三青團組織上的政治意義轉移到工作上的教育作用；然而，蔣中正對三青團自主運作的地位仍不願加以改變，再加上先天的派系格局作梗，三青團與國民黨從競爭到鬥爭的態勢並未隨著種種挽救黨團關係的努力而稍有改善，⑪相反的，這種敵意並且還對上述技術性的改善措施有所妨礙，以致各項辦法到最後仍難落實。⑫例如，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三青團全國幹部工作會議開幕典禮上，蔣中正就曾對著各地團務主事者坦率的指出：「現在我們有許多地方團與黨就不能協調，團員與非團員之間，更是時常發生衝突。」⑬

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蔣中正正在交給國民黨中央祕書長吳鐵城、組織部長朱家驊、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與組織處長康澤的手令裏，更用嚴厲的口吻表示：「現在各地黨與團間仍不斷發生磨擦，以致減弱本黨之力量，反授異黨以機會，言之殊堪痛心。若長此以往，團部不僅無益於黨，而徒為黨部之蠹，則團部不如取消，以免貽患于將來。」蔣中正說了重話，不過現階段他並不算真的取消三青團，只是接著說：「以後不論任何地區之團務工作，皆應秉承當地黨部之指導，絕對不許有與黨部發生磨擦或鬥爭之事。」⑭這樣的命令無補於實

際，三年後，即使連國民黨中央也承認黨團關係「無論從工作方面看，從精神方面看，還不能完全滿意。雖然經過不少次的研究，制定種種辦法，收效亦尚有限」。^①由於國民黨內派系對峙局面與黨團體制雙軌競進的混合結果，使得三青團的自主意識、政治興趣及其伴生利益與日俱增，如前所述，即使連美國駐華使館也密切注視著這一個於戰時新崛起的政治派系，並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的報告中做了扼要的介紹。的確，三青團的力量正在持續擴展，以致一九四三年四月，當〈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駐華記者霍爾(Ernest Haussey)參觀三青團一全大會會場，獲知三青團成員已經發展到六十萬人時，不免大感驚異的表示：像具有如此深厚力量的「青年組織」，美國還沒有！^②

註釋

- ①何廉(原作)，〈簡述國民黨的派系〉，頁八三。
- ②漢口〈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有本文多篇草稿，及蔣中正要求加強民族意識內容比重的親筆批覆，「二」七二八(四)／二一。
- ③漢口〈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
- ④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3. 漢口〈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
- ⑤蔣中正，〈青年團的組織精神和根本任務〉，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一日出席三青團第一次總理紀念週訓詞

，〔二〕七二八（四）／一一。

⑥同前註。十一日當天三青團中央臨時幹事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團長蔣中正親自主持，會中討論臨時幹事會組織條例及團務推行計畫綱要草案等。

⑦蔣中正，〈青年團員辦事的精神和方法〉，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出席三青團總理紀念週訓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長訓示〉（重慶：民國三十一年），頁五〇。

⑧蔣中正，〈青年團員辦事的精神和方法〉，頁五一。

⑨蔣中正，〈青年團員辦事的精神和方法〉，頁五二。十八日，中央常務幹事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審議徵求團員暫行辦法草案等。

⑩蔣中正，〈對於青年團工作的檢討和感想〉，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出席中央團部紀念週講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五，頁四七九。

⑪蔣中正，〈救國必須救黨〉，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在武昌出席擴大紀念週講詞，與〈革新黨務鞏固黨基〉，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在武昌出席各省市黨部委員聯席會議講詞，二文均見〈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五，頁二七〇—二八一，二八七—二九二；阮毅成，〈民國二十七年武漢半年日記〉（下），〈傳記文學〉，第四三卷第三期（台北：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頁五六。蔣中正的念頭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改造才付諸實現，「黨部停閉」的概念始帶到台灣。

⑫ 蔣中正，〈對於青年團工作的檢討和感想〉，頁四七四。並參見：頁四七四—四七七。這似乎是從七月十八日以後，蔣中正首次再參加三青團中央團部總理紀念週，頁四七一。

⑬ 第四章第八條：「本團設團長一人，由中國國民黨總裁兼任之。」當時有人據此堅持為三青團隸屬於國民黨的明證，但這項說法禁不起考驗。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兼任的職務頗多，根據兩位美國在華新聞特派員的說法，對日戰爭時期一位蔣的秘書曾說蔣至少身兼八十二職，「美」白修德、賈安娜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合著)，端納 (譯)，〈中國的驚雷〉 (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一三七—一三八。不能說每一個蔣兼職過的機關都隸屬於國民黨之下，充其量只能謹慎的認為團章這項條文替黨團體制關係預留緩衝地帶，但不意味著團受黨的直接管轄。關於蔣中正的兼職作風，參見：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 (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三八六；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三〇七—三〇八。

⑭ 徐覺生，〈為奮鬥犧牲而來〉，陳復生 (等著)，〈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漢〉 (重慶：青年出版社，民國二十八年)，頁四六。

⑮ 直屬第四分團部籌備處建請確定黨與團的關係案，直屬南陽區團部籌備處所辦〈青年魂〉創刊號載〈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歷史使命〉一文稱三青團為另一政黨之產生，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一年來工作報告〉，一九三九年七月。

⑯ 羅才榮，〈要找老師，不要找嘍囉〉，羅才榮，〈才榮文稿〉，續一，頁一五九；陳開國，〈青幹班和

青幹校始末記》，頁四三。又如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國民黨內的總理紀念週上，蔣中正均汲引黨外人士觀感來指責黨流於衙門官僚，甚至稱人們視一般黨員為不能生產、脫離民衆生活、以游惰爲生的「亡清時代之旗下人」，蔣中正，〈救國必須救黨〉、〈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一五，頁二七三—二七四；卷一六，頁三二一。

17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重慶：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二年），頁一九六。陳誠曾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以「本黨的新生命，新血輪，新細胞」比喻三青團，陳誠，〈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應有的認識與修養〉，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對重慶支團第二次入團宣誓團員訓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性質及其展望〉（重慶：民國二十八年），頁一四。但筆者不能肯定「新血輪」一詞是否在一九三九年由陳誠首度提出。三青團團員特別偏好這個名詞，一九四三年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也出現了這個字眼，〈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一九四三年，頁四一，「二」七二八／〇三四。血輪，即血球之意。

18 陳誠，〈培養革命的新生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重慶支團訓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性質及其展望〉，頁四。全文又見：重慶《大公報》，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四日。

19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3.

20 余森文，〈從黨的失敗說到團的新任務——以團的社會運動來鞏固黨的政治運動〉，三民主義青年團遂昌分團部（編印），〈團務通訊〉，第一二期（遂昌：民國二十九年十月），頁三〇。文中，余森文對

國民黨抱持溫情，但仍承認黨的缺點，希望以團的社會運動填實之。

② 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頁五三。

③ 一名在三青团成立後擔任中央團部組織處幹事的復興社分子向黃埔出身，同為復興社成員的組織處指導組組長湯如炎問到黨團關係為何，湯毫不遲疑的表示：「我們幹我們的，他們管不了我們。在我們的工作上，除了蔣團長外，誰說的都不算。」蔡正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河南的初期活動〉，頁三二—三三。湯如炎後來當上了組織處副處長。

④ 包括開辦劇團和音樂會，發行報紙、期刊、書籍、小冊子，組建宣傳出版事業，社會服務……等項。

⑤ 總裁兼團長親筆：〈飭擬青年營具體計畫手令〉，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黨」一三七／八，毛筆原件。

⑥ 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青年夏令營的意義〉，重慶〈掃蕩報〉，社論，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⑦ 〈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一三一—一三三。

⑧ 一九四三年的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青年夏令營手冊〉（重慶：民國三十三年），頁二；〈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工作總檢討報告〉，一九四四年三月，頁九，「二」七二八／〇二四；〈蔣經國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五輯〕（南昌：一九八九年八月），頁二九二—二九三。

28 蔣中正於一九三九年對重慶青年夏令營入營典禮的講話，這是三青團中央團部首度舉辦的夏令營。蔣中正，〈青年夏令營之宗旨與目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青年夏令營手冊〉，頁一—二，六。

29 據三青團中央統編的教本所載，夏令營主要學習課程計一百八十三小時，類別分配如下：一、精神訓話十二小時（六·五六%）；二、研讀團長訓詞八小時（四·三七%）；三、黨團務課程卅六小時（一九·六七%）；四、一般政治課程卅六小時（一九·六七%）；五、軍事學術課程廿九小時（一五·八五%）；六、體育課程五十一小時（二七·八七%）；七、音樂課程十一小時（六·〇一%）；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青年夏令營手冊〉，頁二三—二三四。課程綱要及課目時間配當表見：頁二三六—二五一。上述規定並非一成不變，活動期間有時也不限一個月，重慶〈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六日；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30 在一九四二年的南嶽青年夏令營裏，學員每日三餐合計兩飯一粥，每餐八人一桌共用兩道菜餚，一名記者表示「生活是相當刻苦」，重慶〈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六日。夏令營實施軍事化管理，然而學員們大多不失熱情，一名記者對一九四三年的贛縣夏令營出營典禮的熱鬧場面作了生動的描述，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七—八日。

31 潘錦端，〈赴重慶青年夏令營服務歸來〉，重慶〈中央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

32 「光明之夜」，又稱「不夜天」，是蔣經國在贛南慣用的一種激勵人心的通宵娛樂教化活動。蔣經國

在一九四三年贛縣青年夏令營期間，還曾兩度對學員實施子夜緊急集合訓話，強調「不革命的混（滾？）出去，反革命的消滅他」，其後一名女生在最後一天的結業典禮上致答詞時提到這些事，她說：「那種赤誠的教誨，主任，你的感情激動了我們，你那蘊藏在心裏的熱淚，都成了我們的懺悔。」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七、八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幹事會（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正式成立特刊》（贛州：民國三十二年），頁八四—八六。關於三青團的青年夏令營，除前引資料外，尚可參考《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夏令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十三年八月）》，中央通訊社徵集部製，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藏，剪報一冊；《三民主義青年團三十二年灌縣青年夏令營訓練紀實》，第一、二卷（重慶：青年出版社，民國三十一年）；杜元載（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抗戰時期之青年活動（二）》（革命文獻第六三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二年）；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册，頁三五六—三六三。張治中擔任三青團書記長期間，喜好參與青年夏令營的程度，遠甚於其他團務，他認為青年夏令營是在學青年訓練中，「最活躍」、「最收效」的一種形式。

33 其間行止見：蔣經國，《我在蘇聯的生活》，《我在蘇聯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台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八十年），頁一一九〇；江南，《蔣經國傳》（台北：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三一—九四。

34 入黨介紹人是陳果夫、陳立夫、張厲生三名中央執行委員，第七十五次會議，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

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二〇三。又，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稱他在一九二五年首途莫斯科之前，於啓程的港埠上海正式加入了國民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頁六六；全集年表指一九二五年十月初：經林煥庭介紹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誓入黨，〈蔣經國先生全集〉，記事年表上輯（台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八十一年），頁二八。

③⑤ 江南，〈蔣經國傳〉，頁九六—九七，一〇七，一一一；蔡省三、曹雲霞（合著），〈蔣經國系史話〉（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一九七九），頁二，一三；〈蔣經國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頁四六一—四六二；徐浩然，〈蔣經國在贛南〉（台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三），頁四〇—四五。蔡省三、曹雲霞敘述蔣經國在一九三七年秋天來到江西，江南指應爲一九三八年春天之誤，〈蔣經國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所附年表則謂蔣經國於一九三七年十月抵南昌，徐浩然稱蔣經國於一九三七年重陽節前後來到南昌。〈蔣經國先生全集〉所附年表指蔣經國於一九三七年十月攜家眷抵南昌，記事年表上輯，頁六〇。

③⑥ 〈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正式成立特刊〉，頁六〇；江南，〈蔣經國傳〉，頁一二二；倪豪，〈詹鏡公與江西青年團〉，詹純鑑先生的生平編輯委員會（編），〈詹純鑑先生的生平〉（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八年），頁六九。

③⑦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三二—五七。參見：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六八—七〇。

38 曹聚仁，〈蔣經國論〉（香港：聯合畫報社，一九七一），頁二二—二四。參見：江南，〈蔣經國傳〉。

39 例如，「蔣青天」與「共產黨」是人們對專員兩種截然不同的愛憎評價。

40 據一名記者說，行政專員公署裏的人員都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蔣經國了解青年欠缺經驗的特性，但他對記者說道：「讓青年們去幹，從工作中去求經驗，去求應付現實的學問。」當被問到新贛南的特點何在時，蔣經國特別指出：「余亦不否認贛南有一特點，即有一大批肯吃苦能實幹之青年，現正埋頭於贛南深山窮谷中，從事建設工作，既無名諸思想，亦不計較待遇，此種現象，實不易多得。」曹聚仁，〈蔣經國論〉，頁三四，五二。蔣經國喜歡和青年接近且不吝培育的原因，除了他向來厭惡一般官僚的習性之外，作為一位政治新人，欠缺班底，也是實際利害面的一個重要因素。

41 〈蔣經國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五輯〕，頁二六八—二六九；曹雲霞，〈贛南憶舊錄〉（台北：自由時代，出版年月不詳），頁二二—二四。

42 〈蔣經國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五輯〕，頁二九二。參加這次夏令營的男女學員大約有一千八百名，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夏令營吸收了七百名新團員，〈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正式成立特刊〉，頁八五。

43 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蔣經國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五輯〕，頁二九〇；〈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正式成立特刊〉，頁八二。虎崗，夏令營營址。

44 江南，〈蔣經國傳〉，頁一〇〇。

45 闕仲瑤製譜撰詞，〈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進行曲〉，「黨」五一九／九〇，鋼筆原稿。本曲作於一九三九年春，完稿於第三戰區支團部籌備處，流傳甚廣，現在台灣軍隊仍將之納為軍歌傳唱。這首歌對戰時青年意志的影響，見：康芸薇，〈有首歌，瑪麗和約翰沒有聽過〉；水天，〈不曾遠去的〉，二文均見：邱七七（編），〈回憶常在歌聲裏〉（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二九—一三三；一五五—一五八。本曲又名〈三民主義青年進行曲〉。並參見〈李洪朝等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國民政府檔案：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務案，「國」。

46 闕仲瑤製譜，節錄團長訓詞，〈三民主義青年團團歌〉，「黨」五一九／九〇，鋼筆原稿。本曲作於一九四三年八月東南青年夏令營音樂總教官室，作者摘取蔣中正歷年對三青團的講話與〈中國之命運〉書中相關內容擬就歌詞。並參見〈李洪朝等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國民政府檔案：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務案，「國」。

47 儘管一些人認為蔣中正喜好玩弄兩面手法，並藉著不同組織間的對立互為牽制，以達到控制部下、鞏固領導威權的目的，早期的CC系與復興社、現在的黨團之爭都是這種心理下的產物。參見：卜萬平，〈從黨團關係看國民黨內部各派系的矛盾〉，頁一一八；陳希亮，〈三青團述論〉，頁三四。

48 由於黨團歧見日深，蔣中正與陳誠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距三青團成立不過八個月）相繼發表澄清黨團關係的講話，但蔣仍說「這種關係，大家可以本著革命的良知心領神會，而不必以文字來作形式的規

定」，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黨與團的關係》（重慶：民國三十一年），頁四一五。這樣的談話無補於實際，最後，仍需借助於文字規定，然黨團關係已難挽回。進一步的討論見第五節。

④ 有些團員認為「黨漸漸老大了，不行了，我們一定要有另外一個新的組織，來準備替代它」，三青團第二任書記長張治中批判了這種心理，他說：「甚至有一種最不好的誤會，說我們團成立以後，將來就要在無形中給黨一個打擊，以至於取消了黨，拿團來執政，來發揮青年團的力量，來統治國家。這是一個不可寬恕的誤解！」一九四一年九月張治中對中央團部工作檢討會議的總講評，張治中，《本團性質與工作講評》，頁三一，「黨」五一九／六。參見《二十八年度各省團務視察報告書》，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務通訊》，第二卷第二期（重慶：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頁五五。

⑤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頁六一一—六二二。

⑥ 第七十四次會議，〈修正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系統圖〉、〈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九八—一九九；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頁四五三—四五四；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四三四—四三五。關於中執會設三青團的規定，最早見於臨全大會通過的〈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頁二六五。

⑦ 四月六日五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隨《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案》提出的附件《三民主義青年團組

織訓練要旨」是一個令人費解的例外。文中表明三青团「受本黨之領導」，但「若青年團完全成爲本黨之附屬機關，亦無以實現青年團之特殊使命」，職是之故，「青年團爲造成本黨黨員應具備條件之組織，而非在組織上統屬的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頁六一—六二四。必須注意的是，這份文件似由同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身分的復興社劉健群與CC系周佛海共同擬就，內文矛盾不通處可能反映了不同派系間在文字表述上的折衷結果，而且這份文件僅做爲附件隨〈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案〉提出，〈青年團組織及訓練要旨草案〉，「二」七二八（四）／一；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上冊，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二十九日，五月二，九日，頁八五，九一，九四，九七。周佛海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間在南京還草擬了一份三青团的政治綱領，劉健群、谷正鼎參與意見甚多，唯蔣中正批答政治綱領「不必再要」，「或將力行社綱領檢討修正」即可，〈周佛海日記〉，上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十五，十八日，頁六〇—六一，六三；〈青年團政治綱領草案〉，甲、乙二案，「二」七二八（四）／一二。〈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訓練要旨〉稱「青年團遵奉本黨政綱政策不另定政治綱領」。三青团成立後再未提出政治綱領，然實際的政治傾向愈益濃厚。〈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訓練要旨〉首度以專項陳述了黨團關係原則，並已警覺「三民主義青年團與本黨之關係須縝密規定，以免形成對立或互相推諉，使工作效果爲之低減」——時三青团尙未成立！

54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附組織系統表）〙、〘〇〇〇〇青年團團章草案〙、〘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二〕七二八（四）／二一。

55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二；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五）〙，頁一〇一；〘國史資料〙，頁三。

56 〘國史資料〙，頁一三一—一四。

57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二〇一—二〇二；〘國史資料〙，頁二〇。

58 第二〇一次會議，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修正省執行委員會組織條例〙，〘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七八九—八八〇；第二五九次會議，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執行委員會組織條例〙，〘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二二一—二二二。

59 第九次執行委員談話會，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國民黨河南省執行委員會辦事細則〙，〘河南省黨部會議紀錄及工作報告〙，〔二〕七一七（四）／三二一。

60 除了黨中央的法規章程之外，在國民黨對外公開發行的宣傳小冊子裏，也把三青團納入黨的組織系統內，吳鐵城，〘黨政制度及其關係〙（重慶：獨立出版社，民國三十三年），頁一八；參見：附圖一、七。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取消總章與中執會組織大綱有關三青團的規定，原因是爲了因應憲政，國民黨六大會議決議三青團自黨改屬於政府，進一步的討論見第三章。

61 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四五，四八。

62 梁寒操，〈中國青年的一條光明大道〉，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一集（重慶：民國二十八年），頁三二—三三。

63 黃季陸，〈爲什麼要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一集，頁五六。

64 任覺五，〈對三民主義青年團應有的認識〉，〈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一集，頁八七。確有CC系分子視黨團爲父子關係，藍奇，〈抗日戰爭時期我在貴州三青團的一些回憶〉，〈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七輯（貴陽：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一八四。

65 簡貫三，〈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性質及精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二集（重慶：民國二十八年），頁六〇。

66 梁上賢、田秉德，〈三青團在湖北的組織與活動〉，頁六六；藍奇，〈抗日戰爭時期我在貴州三青團的一些回憶〉，頁一八二。

67 有時是有登載的，如廣西省黨部在一九四三年七、八兩月的檢查表即是，中央組織部人員在七月份檢查表的所屬團員數目上打了一個勾；不過，在筆者看到的檔案中，以上兩個月是僅見的少例。在這類檢查表裏的其他欄目，地方黨部均照中央指示「翔實填報」，因此「所屬青年團團員數」一欄空白的意義值得思考。〈湖北省黨部工作報告〉，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七二—七四／六四〇；〈廣西省黨部的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十月—一九四四年一月，「二」七二—七四／七六〇。關於「所屬青年團團員數」的意思還有待釐清，筆者在此將之解讀爲黨員兼團員者，但該名詞也

有可能逕指三青團員（依照黨方的意識，確有可能將團員視為「所屬」），如果實為後者的話，則該欄連串空白的事實更可以說明黨方無能掌握團務。

68 國民黨與三青團對這些兼具黨、團籍的成員較為頭疼，舉凡應繳黨費或團捐，黨團兩處開會時間抵觸應以何者為先，在任一方遭受處分則另一方是否應比照辦理（如被開除黨籍者是否連帶喪失團籍）……等均成了討論的問題。

69 〈本市文化黨團第二次會議紀錄〉，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日，〈重慶市黨部及所屬黨部會議紀錄〉，「二」七二七（四）／八五四。該文化黨團索取名單之舉，據其表示乃為了便於「進行工作時有所參考」。

70 中央團部所擬預算案的主要把關人是團長蔣中正，一九四〇年蔣刪減了三青團半數的年度經費概算。呈請團長批示修正過後的概算案，須提請黨的中央常會作形式上的核定，再送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民黨在這方面只是取得了面子。又如國民黨中常會曾決議要求：「關於報銷手續，除照團部系統，由各級監察會主持，並呈團長核銷外，應按月將收支實況，送由中央秘書處轉呈中央監察委員會備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監察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頁八，「二」七二八／一六四；〈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頁一三一—一四；第一四三次會議，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五五一；〈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七年八月，頁二〇四，「二」七二八／〇二九。

71 參閱本書的緒論。

72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一四七。

73 中國國民黨貴州省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貴州省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十月三十日，〈貴州省黨部的會議紀錄〉，「二」七一七（四）／八八一；〈安徽省黨部人事糾紛〉，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七一七（四）／四四九。

74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二十八年七月份工作報告，〈浙江省黨部工作報告〉，「二」七一七（四）／五一五。

75 藍奇，〈抗日戰爭時期我在貴州三青團的一些回憶〉，頁一八二。

76 中國國民黨貴州省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紀錄。

77 蔣中正，〈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全國青年書〉；〈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頁七五四—七五五。

78 中國國民黨貴州省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紀錄內文並未交代已成立這類團體的省份下一步的走法。中央社會部部長、副部長於十一月易人，但仍由親CC系勢力掌握，〈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一四七。

79 據三青團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的報告，三青團已派員在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復旦大學、東北大學、河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院校進行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

一年來工作報告》，一九三九年七月。

⑧一九四一年，湖北支團部籌備處在一份針對學校團員所提出的公開聲明中說道：「本省學校同志表現是怎樣的呢？本省是本黨首義成功的地方，也是本團光榮產生的區域，加之本省中等以上學校全為公費，一切工作進行，應該是異常順利蓬勃的，至少也不會比別人落後，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雖說學校裏有著不少的同志，在萬難中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但仍有一部份同志是認識不夠深切，工作還欠實際，更有的生活失於檢點，行動超出範圍，這不僅與本團的要求相距太遠，甚至敗壞團譽，……。」

「為推展學校團務告學校團員同志書」，〈工作通訊〉，第四，五合期（恩施：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五日），頁二；湖南支團部籌備處一九四一年發行的一份訓練刊物指出，學校團員應以學識服人，「至於經常藉口團務忙不上課，考試時用不正當的方法應付了事，這是要用全力反對的，因為這不僅為團的作風所不容，亦且為國家教育的損失」，作者還指陳有些團員藉口團務，「往往不羈本身生活行為，越觸校禁，結果形成做事待人，均不正當」，「在學校方面，務須尊重學校同志，不應以負責團務，即可與學校分庭抗禮，以致與學校分裂對立，影響團務」，翟文鳳，〈怎樣幹學校團務〉，〈團員訓練〉，第二卷第一七，一八合期（耒陽：民國三十年十一月），頁四一五；同期另一名作者則認為：「青年團在學校裏面發展的結果，可以說是設學參半。有些學校當局，因為該校團隊沒有在他們的意旨之下行事，認為破壞了學校行政；有些學生因為該校園，沒有為青年謀福利解決困難，認為不夠革命，不夠前進。」沈永中，〈如何確定學校團務工作目標〉，頁八；一九四三年，浙江支團部

在團一全大會提案條陳學校團務面臨的難題，其中就包括「學校當局和一般教職員，大多思想陳舊，態度保守，既缺乏時代認識，更未能瞭解本團使命，甚有存猜忌之心，深恐學生入團，足以使學生與學校對立，起而破壞學校行政或鼓動風潮。……學生對現狀不滿，為普遍現象，要求改革之心甚切，因之對本團存有不甚正確之觀念，與過份急切之期望，希望本團立刻掃除惡勢力，同時或以團部人事工作上之缺點及濫吸團員等關係，遂影響其對團之信心」，〈積極發展學校團務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一冊，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頁五一六，「二」七二八／一六六；在湖北，一位師範學校校長與團方鬧了糾紛，據說是因為團方認為該校長活動組織、虛構事實、陷害青年，〈關於湖北建始師範學校三青團與校長糾紛問題的來往文書〉，一九四〇年，「二」五／〇一五七七；白修德、賈安娜甚至報導說：「教授們哭泣著學校給毀了，因為青年團團員功課不及格，不可留級。」不過兩人並沒有說明消息來源或是發生在哪些學校，〈中國的驚雷〉，頁一二一；在一部長篇小說中，三青團出身的作家王藍藉著主角的口表露他對學校團務的認識：「固然有不少優秀學生做了團員，但是也有無所謂的、湊熱鬧的、甚至別有企圖的混了進來。我曾冷靜地觀察那些懷著不正當心理入團的同學，他們對三民主義一無所知，他們要做團員，有的認定這是一種出風頭的機會，有的希望藉此可以交上女朋友，有的以為這是畢業以後從事政治工作的階梯……當然，這種人是佔了少數；但是，任何團體都是好的吃壞的「掛落」。因此，學校團務在一般教授與同學的心目中並未取得令人崇敬的地位。相反地，我聽到許多含有惡意的謠言攻擊與誣蔑。」王藍，〈長夜〉

（台北：紅藍出版社，民國五十年），頁二六四、二六五；一名三青團的中央幹事會經提案指出學校團務或與學校行政未能切實配合，即負訓導責任人員竟有設法撓阻團務情事發生，他建議中等以上學校訓導人員須經黨、團、教育部門會同檢定任用，合格者並須擔負團的實際任務，黃字人，〈加強學校團務活動案〉，雲南支團部則提議學校團隊應設專人負責推動，以免兼任工作人員的教職員生無暇顧及團務，流於工作鬆懈、有名無實的毛病，雲南支團部，〈學校團隊應一專任負責推動或對實際負責推動團務之教職員酌予減少授課鐘點以加強工作案〉，均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案彙錄》，第一冊，一九四四年三月，頁三三，六五，「二」七二八／〇二二。儘管三青團在校園裏面存在一些缺失及問題，但仍有人指出了學校團務表現的積極面，樊中原，〈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大專院校活動之研究〉。

⑧ 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一一—一二。

⑨ 同前註：《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七。

⑩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一九四五年五月，頁三〇，三五，「二」七二一（五）／一六五；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一二。有些被減去的直屬學校黨部可能撥給地方黨部管轄了。

⑪ 黨部與團部組織的重疊範圍尚不止於此。例如產業職業機關。三青團早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第一次修正

團章時即已增列：「本團得按產業職業機關，及其他特殊性質之部門或區域，設各直屬組織，其辦法另訂之。」其目的在於擴大、穩固團的基礎，「務求各階層各部門具有技術能力的優秀青年都成為本團的團員，然後本團才能夠在社會上發「揮」偉大的力量」，〈團史資料〉，頁一〇三—一〇四，一〇八；鄭彥棻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中央團部總理紀念週的報告詞，〈對修正團章應有的認識（下）〉，福建支團部籌備處（編印），〈團員通訊〉，第一卷第四，五合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頁七。不過，儘管三青團在成立一年以後就已顯露發展產業職業機關團部的企圖心，並以修正團章的方式化為明文規定，然而真正行動的進度不能讓人滿意——雖然三青團的確成立了一些職業機關團隊，但在形式上，蔣中正曾經批示不必設立，因此，職業團隊的地位等於有欠明朗，〈第七期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黨」四九五／一四一。而國民黨早有鐵路、海員等特別黨部，可能基於三青團的刺激或至少持著跟團一樣擴大組織基礎的企圖，一九四〇年起國民黨開始籌設工礦黨部（就工廠黨部而言，發展對象包含全國所有國營、商營、官商合營等工廠），為建立優勢並避免活動重複起見，黨的中常會曾於一九四〇年五月通過決議，要求「設有黨部之工廠，三民主義青年團暫緩成立組織，其團員應參加黨部活動」，嗣三青團中央組織處簽具意見二點，稱「（一）設有黨部之工廠，本團暫緩成立組織，則未設有黨部之工廠，本團似應繼續推行團務工作，建立團隊組織。（二）工廠中團員參加黨部活動後，為使與地方團部取得密切聯繫起見，似仍應參加分隊工作」。以組織處第一點意見論，似有和國民黨競速之意

，第二點則為確保對團員的領導地位，其實黨對團員仍無實際支配力。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一二；第一四七次會議，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五七三，五七七—五七八；〈團史資料〉，頁二四一—二四二。又如軍隊方面，軍隊本有不設團部的規定，但湖北的保安隊黨部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向中央反映，三青團也在隊裏成立了團部，且黨團雙方迭有衝突，組織部長朱家驊只能安撫保安隊黨部說：「軍隊不設團部，已有規定，唯團部同志，時常熱心過度，隨便去設立，這是不合法的，可以對他們說明白。」

〈第七期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

85 第一七八次會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七三六；〈黨與團的關係〉，頁一四—一五。

86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工作總檢討報告〉，頁二二。

87 鄭彥棻，〈對修正團章應有的認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中央團部總理紀念週報告詞，福建支團部籌備處（編印），〈團員通訊〉，第一卷第三號（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頁一八三；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二二；〈團史資料〉，頁三。

88 〈總裁親筆修正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第三條〉，一九三八年六月，「黨」一三八/一一四，鉛印本。毛筆修改。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正式公布的團章裏，還加上特許入團人員亦不受年齡限制的規定。

89 一九三八年，陳誠四十一歲，康澤三十五歲，其他復興社重要幹部年紀亦多在團員年齡上限三十八歲上下。

90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3.

91 陳誠，〈培養革命的新生命〉，頁四一五。

92 胡夢華，〈臨全大會以來本黨的建設（下）〉，原載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週刊》第一卷第二二期，引自：李雲漢（主編），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下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年），頁一二五二。根據國民黨此時的規定，凡年在二十歲以上，都是可予徵求的年齡範圍，第八十七次會議，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徵求新黨員細則〉，〈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二七二。

93 康澤，〈青年團團務之進展〉，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對黨政訓練班第六期學員講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務通訊〉，第二卷第三期（重慶：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頁二一。

94 〈團史資料〉，頁一〇三；〈團長告全國青年書·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二」七二八（四）／五。

95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陳誠對黨政訓練班第五期學員講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宗旨及今後團務推進方針〉，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訓練處（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宗旨及今後團務推進方針〉（重慶：民國二十九年），頁七一八；〈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頁三；康澤，〈青年團團務之進展〉，頁二〇—二一；鄭彥棻，〈對修正團章應有的認識〉，頁

一八三一—一八四。雖然鄭彥棻認為這種修正有其必須的理由，但他也將各級幹部人員與特許入團人員年齡不受限制，以及團員年滿二十五歲仍得保留團籍的規定視作「爲著適應團的特殊需要」，「不能不有」的變通辦法。就三青團而言，增列團員年滿二十五歲仍得保留團籍的規定，可免成員來日流失之虞。

96 〈國史資料〉，頁一四三—一四四。

97 顧希平，〈黨團部應嚴格遵照規定年齡徵收黨團員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二冊，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頁五，「二」七二八／一六六。

98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實〉（重慶：民國三十三年），頁四六；〈國史資料〉，頁一一八，一二五。這項條文連同其他決議修改的條文經大會通過後，呈奉團長蔣中正核准施行。文獻並未說明蔣中正提示修改團員年齡的理由，但〈國史資料〉說修改之舉可「充實本團之力量，期能達成此非常時期艱鉅之任務」。經過近五年的發展，大致而言，一九四三年召開的三青團一全大會相當能夠體現團方的自主意識，見第三章的討論。

99 至一九四〇年底爲止，總報到普通黨員計二七五、〇七一人，一九三九年度新徵普通黨員計二七四、七九一人，一九四〇年度新徵普通黨員計五九〇、〇六六人，中央組織部統計室（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七中全會後黨部組織暨黨員統計提要〉，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黨」四九五／一三七。

100 見本節所列表五。

⑩《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七中全會後黨部組織暨黨員統計提要》。

⑪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四七〇。

⑫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五〇七。

⑬一九四四年新徵普通黨員總數為六三三、八二五人，三十歲以下者計三〇七、七一人，占四八·五%；一九四五年新徵普通黨員總數為三三六、六六六人，三十歲以下者計一五二、一四六人，占四五·一九%。《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央組織部黨務統計報告》，一九四六年二月，頁三，「二」七一一（五）／二〇七。

⑭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各地青年團幹部每有幫會份子參雜藉勢招搖應由中央團部嚴加整頓手令》，九月三十日（年份不詳），「黨」一三七／一九，毛筆原件。

⑮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中央團訊》，第一卷第一期（重慶：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頁一。

⑯由於三青團入團年齡上下限經多次修正，而三青團歷次的官方報告又慣以團員累積總數為本進行成分分析，因此無法充分反映個別時期的逾齡徵收狀況。根據一至四十萬號團員入團登記表統計（約是一九四一年中的累積數），二十五歲以上者占總人數的一六·九%，逾齡徵收的情況乍看不輕，但這裏面也包括一九三八與一九三九年以三十八歲為上限合法徵得的團員，《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報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頁九。一九四三年三青團改以三十歲為入團年齡上限後，統計數字上的

逾齡者比例自然隨之降低，以一九四四年一月底止的團員累積數為例，三十歲以上者僅占六·一八%，〈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四年三月，頁四五，「二」七二八／〇一九。總的說來，三青團逾齡往上升收團員的情況，要比國民黨越齡往下徵求黨員來得較為節制，但是國民黨違令徵收的年輕人泰半尚無政治地位，三青團逾齡徵收的成員則可能具有若干政治基礎，中央幹事會就會指出各級團隊在省市縣黨政軍幹部訓練班團集體吸收超齡人員入團的事實，〈中央團訊〉，第一卷第一期，頁一。

⑩〈中國國民黨貴州省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紀錄〉，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頁五，〈貴州省黨部的會議紀錄〉。

⑪〈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報告〉，一九四三年九月，頁一四一—一五，「二」七二八／一六一。

⑫在三青團與國民黨中央，以及省黨部的會議紀錄裏，可以發現不少有關這類問題的報告事項、討論事項，如〈團史資料〉；〈五屆中常會紀錄〉；〈安徽省黨部會議紀錄〉，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四二年六月，「二」七二七（四）／四七七；〈江西省黨部的會議紀錄〉，一九四〇年七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七二七（四）／六〇七；〈貴州省黨部的會議紀錄〉；〈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常務幹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紀錄〉，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頁三，「黨」特〇二四／二〇。

⑬顧希平，〈黨團部應嚴格遵照規定年齡徵收黨員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二冊，頁五。

⑫《安徽省黨部關於黨員兼團員影響黨務工作應如何辦理的電文》，一九四〇年八月九月，「二」七七一（四）／二一五一。

⑬趙樹，〈CCC的擴張活動〉，《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三七輯（北京：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頁一五六。

⑭《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一年來工作報告》。

⑮湯如炎，〈本團的組織及其指導工作〉，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務通訊》，第二卷第三期（重慶：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頁七一。

⑯三青團中央提出了反駁，稱：「我們組織發展的第一個原則是『質量並重』。對於這個原則的反應，我們聽見了三個聲音。第一個聲音說：『我們應該重質不重量，因為要這樣才能夠保持組織的純潔與鞏固。』第二個聲音說：『我們應該重量不重質，因為要這樣才能把全國廣大的青年吸收進來。』第三個聲音說：『質與量是不能並重的，因為這是一個矛盾，如果勉強做去，結果必會質亦不精量亦不大。』我們認為第一和第二種人都是一偏之見，第三種人則是政治無知，我們現在仍然堅持『質量並重』的原則，但是我們要指出這個原則的重點是在乎『質』，而它的運用則是『以質求量』。」（二十九年度的組織工作），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務通訊》，第二卷第四期（重慶：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頁一五一—一六。

⑰蔣中正，〈今後發展團務的途徑（下）〉，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出席中央幹事會議訓詞，三民主義

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長訓示〉，頁七四。

⑪ 〈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一一五；〈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工作總檢討報告〉，頁四。

⑫ 蔣中正，〈青年團工作的要領〉，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與大會全體代表會餐時訓詞，〈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頁一九。

⑬ 萬昌言，〈努力與反省〉，三民主義青年團安徽支團部（編印），〈指導通訊〉，第二卷第五期（立煌：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頁九—一〇。三青團中央持續執著於「量」的追求。在〈長夜〉這部長篇小說中，曾出席一九四六年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河北支團代表王藍，透過主角的口指出：當時中央核定河北支團的成績為丙等，因為「河北團員人數比別的省份少」，王藍，〈長夜〉，頁三〇九；參見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⑭ 陳誠，〈本團成立之回顧與前瞻〉，〈三民主義青年團二週年紀念特刊〉，頁五九—六〇。康澤在同一刊物上承認團員成分比重出現畸形現象，康澤，〈團的使命與兩年來的組織工作〉，頁七六。一份地方分團刊物的作者認為，從統計表的形式及數量、從團部裏的來往人群、從會議桌上的出席代表，均可發現三青團欠缺農工分子，他據此指出三青團還沒有做好社會基礎，不著撰人，〈指出團過去之失敗，糾正團此後的作風〉，遂昌分團部籌備處（編印），〈團務通訊〉，第二二期（遂昌：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頁五〇。關於正文所提及的三份統計資料，依引用順序，分見〈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七中全會後黨部組織暨黨員統計提要〉；〈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

六年八月，頁一五九。「二」七二八／〇二〇；〈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黨」五一九／五四·四。第三份資料根據一至四萬三千號登記表（約爲一九三九年中的團員累積數）進行統計。

⑯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央組織部黨務統計報告，頁五。筆者把報告提供的人數換算成了百分比。

⑰〈重慶市黨務推進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會議〉，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頁一〇—二〇，〈重慶市黨部及所屬黨部會議紀錄〉。

⑱〈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部籌備處命令〉，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直屬第二分團籌備處（編印），〈團務通訊〉，第二卷第八，九合期（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頁七。

⑲不著撰人，〈怎樣領導群眾？〉；〈宜都分團部廿九年度工作總檢討〉，均見：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北支團部籌備處組訓組（編印），〈工作通訊〉，第一期（恩施：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頁二；五，七。

⑳張治中所指公務員占七成的數據可能是湊成整數的結果，雖不精確，但可以反映大致的情形。即以上一年底（一九四〇年）爲例，黨務團務公務人員合計就占了團員總數的六三·五%，此前文已述。張治中，〈青年團工作的檢討與改進〉，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在全國幹部工作會議開幕典禮訓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張書記長訓詞論文選〉（重慶：民國三十一年），頁七一—七二。

①張治中，〈青年團工作的檢討與改進〉，頁七二。

②例如兩篇立論相仿的文章：李鴻音，〈設立青年團與鞏固黨基〉；「青年團員除在中央指導之下參加愛國運動或社會服務之外，絕不能作政治之運動，更絕不得使爲政治鬥爭之工具。青年團「員」亦不得有黨籍，必俟訓練期滿，方可介紹入黨。」（《武漢日報》，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引自：葉溯中（等撰），〈三民主義青年團〉（重慶：獨立出版社，民國二十八年），頁五—六；張道行，〈我對於青年團的意見〉；「青年團員在中央指導之下，應參加愛國運動或從事社會服務，惟不應作政客式的活動，尤其不能有何小組織，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若利用之或鼓勵之以專幹爭權奪位的活動，而不爲社會服務，以增其經驗，則殊非愛護青年之道，盼今後中央團部，注意及此。」（《民意周刊》，第三三期，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引自：《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下）》，頁一〇〇九—一〇一〇。

③Spiker,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 241.

④〈團員籍貫統計表〉，〈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

⑤湖南支團部領導人李樹森在一九四三年團一全大會接受訪問時的談話，〈大會日刊〉，第七號（重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日刊社，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四日）。

⑥文傑，〈常德黨團爭權奪利的見聞〉；王進三，〈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始末〉，均見《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五四—五五；六二，六四—六五。薛岳當時擔任第九

戰區司令長官、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務。擔任過三青團長沙區團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幹部的葉國素，對薛岳統治時期省黨部裏面的黨團矛盾，以及三青團內部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刻畫甚詳，葉國素，〈薛岳統治湖南時期的黨團鬥爭內幕〉，《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頁一一—一四。

⑬兩名分別來自CC系與三青團幹部的回憶：陳明仙，〈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貴州黨務〉，《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五輯（貴陽：一九八四年五月），頁一五四—一五五；藍奇，〈抗日戰爭時期我在貴州三青團的一些回憶〉，頁一八二。全省黨員大會後，張強受派為貴州省黨部主任委員，伍家有代理主委。

⑭黨團工作會報，「黨」特〇二五／一；黨與團關係卷，「黨」特〇二五／二·二；〈湖北省第一次黨團工作會報〉，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湖北省第二次黨團工作會報〉，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黨」特〇二五／五；〈中國國民黨安徽省執行委員會第十七次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頁二b，〈安徽省黨部會議紀錄〉；並參見該次會議紀錄所附〈中國國民黨安徽省執行委員會·三民主義青年團安徽支部籌備處聯席座談會議錄〉，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會中三個討論事項和黨團聯繫有關，均決議交付會商再提會討論，另一個團方的提案：黨員與團員應分別報到案，則決議通過。這類黨團聯繫方法有沒有立即在各地推展開來，並成為固定的模式頗值得懷疑，同時它是否促進了黨團了解、滑潤了黨團關係也有待進一步的探討，不過直到一九四四年三月，團的中央幹事全體會議一份提案還指出黨團實際工作「實有加強聯繫之必要」，駱力學、鄭通和、寇永吉，〈加

強黨團聯繫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案彙錄》，第二冊，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黨」五一九／一〇七・二。

⑧《湖南全省黨務會議出席會員一覽表》，《中國國民黨湖南全省黨務會議席次表》，《湖南省黨部及黨政聯席會議紀錄及全省黨務會議出席會員一覽表》，一九四〇年九月—一九四四年七月，「二」七一七（四）／六八四。全省黨務會議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

⑨參見《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頁一六四、四三五、六〇七。

⑩董霖，《六十載從政講學》，頁一一八。

⑪《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紀錄》，頁七八。

⑫蔣中正，《改進黨務與調整黨政關係》，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出席五屆四中全會致詞，《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頁五一九—五二〇，五二三。蔣中正在文中陳述了他對地方黨政對立現象的認識：「就省以下黨政關係最普遍的現象來說，黨部要爭著做政府應做的事業，干涉用人行政；政府不接受黨部的監督，表面敷衍，暗中排拒，黨和政府之間，不僅不能協調一致，分工合作，而且形成彼此分離，互相對立，不是黨部反對政府，破壞政府，就是政府抵制黨部，阻礙黨部，結果不論黨與政府，威信一概喪失，一切革命事業都因此減低效能。」

⑬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四三一—四三四。

⑭例如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開辦初期的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中，就充斥著檢討黨政失調的言論，有

些人認為各級黨部須管理各級政府、黨要監督考核從政同志才是解決之道，〈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在中央組織部一九三九年的地方黨務視察報告中，黨政關係不良的情形所在多有，〈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二八四—二九七；一九三九年六月，肩負皖南行政責任的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在安徽省黨部舉行的皖南各縣書記長會議中表示，政府與黨部貌合神離，「人事方面因為摩擦的緣故，費去腦筋很多」，他呼籲大家精誠團結，摒棄意氣之爭，戴戟於皖南各縣書記長會議的開幕詞、閉幕詞，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十六日，〈中國國民黨安徽省執行委員會皖南各縣書記長會議錄〉，一九三九年六月，頁四二—四三，四五，「二」七—七（四）／四七七。學者李雲漢認為，中日戰前，省市黨部與地方政府貌合神離，並無正常的黨政關係可言；俟戰時實施調整黨政關係原則，揆其成效，中央確能貫徹「以黨統政」，構成黨政軍一元化的領導體系，省級黨部則因地因人而異，有的省區配合良好，有的省區則遭遇困難，縣級機構則由於黨的組織未能普遍建立，多數縣區的「黨政融化」係屬有名無實，李雲漢，〈抗戰期間的黨政關係（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四，一八一—一九。

⑩〈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二五—二六；第二二五次會議，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第二二九次會議，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〇二七，一〇四六。

④討論案引述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函，第二六三次會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二三三。

⑤蔣中正要求據此擬訂具體辦法，〈總裁兼團長親筆：以後青年團之工作應注重與有關各方之聯繫擬訂具體辦法手令〉，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黨」二三七／六六，毛筆原件。

⑥〈湖南省政府二十九年黨政聯繫部份工作計劃草案〉，一九四〇年六月，〈湖南省黨部及黨政聯繫會議紀錄及全省黨務會議出席人員一覽表〉。綜觀全篇計畫內容，無不就民政、財政、教育、建設、保安、兵役等任一部分來看，國民黨與三青團都是省政府進行聯繫、要求協助的兩個主要對象。

⑦〈團史資料〉，頁二五九。從〈湖南省黨政聯繫會議二十九年第七次會議紀錄〉看，省政府出席委員五人、省黨部出席委員四人，列席者團方一人，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湖南省黨部及黨政聯繫會議紀錄及全省黨務會議出席人員一覽表〉。一九四三年四月，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一次聯席會議裏的一份提案指出，就以往情形而論，這些黨政會議確需三青團參加，而法令上則從未將團列為法定與會單位，因此雖然各地團隊亦可基於事實需要與會，「然因無法令根據，究有許多不便之處」，〈為增進黨政團聯繫本團應參加各級黨政聯合機構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一次聯席會議議程〉，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黨」五一九／一〇八。

⑧第二次會議，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九八九；〈中國國民黨河南省執行委員會第三十九次執行委員會議紀錄〉，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河南省黨部會議紀錄〉，一九

四二年八月—一九四四年一月，「二」七（七四）／三三〇。

⑭ 第二二五、二二九、二四三次會議，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五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九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〇二七，一〇四六，一一一九。原縣黨政秘密會議是和縣特別小組會議統一名稱，成爲縣特別小組會議，理由是「名異實同，易滋混淆，且原規定參加人員亦未盡妥善」。必須注意的意思是，三青團獲得參加新的縣特別小組會議後，還一直要求參加所謂黨政會議，合理的猜測可能是國民黨政權在縣特別小組會議之外，又另行建立一個新而具實質地位的，常設的黨政協商管道，所以三青團不得不又要爭取。

⑮ 中常會決議稱「不必參加」，第二五〇次會議，一九四四年三月六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一六八。

⑯ 第二六三次會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一三三。

⑰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八月，頁八七—八八。

⑱ 羅才榮原來介紹劉文質作社會科科員，不意後來發表爲科長。據羅才榮說，當時四川省政府規定，各縣政府的社會科長要由縣黨部書記長兼任，而瀘縣縣黨部書記長董庸仙可能過於老邁，縣長袁守成向他說以這項新工作過於繁重，且黨團不分家云云，董「欣然允諾」讓出。羅才榮認爲從他到瀘縣籌組三青團後，該地的政治結構，特別是由鄉紳支配的一面倒勢力，起了根本的變化。羅才榮，〈靜臥草堂聽松濤〉；〈炸彈炸開我命運的門〉；〈交接革命的火炬〉，均見：羅才榮，〈才榮文稿〉，續二

（台北：川康渝文物館，民國七十九年），頁二；一三；一七一—一八。

153 王進三，〈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始末〉，頁六二。關於湖南甲乙派之爭，見第一章第一節。

154 翟文鳳，〈三青團和國民黨在陝西的明爭暗鬥〉，頁一三三—一三五；辜達岸，〈對熊斌在陝西期間的見聞〉，〈陝西文史資料〉，第二三輯（西安：一九九〇年三月），頁六四—六五。

155 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一冊（香港：編者出版，民國六十四年），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頁四一二。

156 王華農，〈記解放戰爭時期開封的新聞團體〉，〈開封文史資料〉，第二輯（開封：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頁九三—九五。

157 Lloyd E. Eastman, "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Yunnan and Chungking," in Paul K. T. Sih, (eds.),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icksville, N.Y.: Exposition Press, 1977), pp. 340-341. 易勞達在〈毀滅的種子〉裏再次陳述了這個觀點。

158 蔣彥士，〈悼念鏡秋兄〉，郭鏡秋先生紀念集編輯小組（編），〈郭鏡秋先生紀念集〉（台北：編者印行，民國七十年），頁一三〇。郭鏡秋，即郭澄，復興社社員，曾負責山西團務。民族革命同志會成立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勢力延展到閩統區各級行政機關、軍隊、學校等，會員最多時有二十多萬人，中日戰爭期間，同志會活埋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的事情時有發生，此即蔣彥士所言「即在我完整區亦間有遭受暗殺與監禁者」之意，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三一八—三二〇。在一

九四三年三青團一全大會地方團部報告的議程中，山西團務報告人最後甚至籲請在場代表對山西團務發展給予「赤誠之指示」，《大會日刊》，第七號，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

¹⁶⁵ 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五五四—五六二。有關廣西的部分參見第一章第三節。

¹⁶⁶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4.

¹⁶¹ 張治中要到一九四〇年才接任三青團書記長，一九三九年初尚無團部職位，故不可能擔任團務課程講師。至於當時的書記長陳誠，儘管才剛在一九三八年底指出三青團為「國民革命的一個正統」，但也從未大膽的揭橈「代黨說」，相反的，他還明言三青團「決不是本黨之外的另一個政黨，也決不是黨內的一個小組織。青年團顯然是本黨所領導的一個革命的新生命」，只不過「黨對於團的領導，是以黨義，以領袖，以政綱來領導團，以整個黨來領導整個的團，並不是逐級的附麗」罷了，陳誠，〈培養革命的新生命〉，頁四—六；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對重慶支團第二次入團宣誓團員訓詞裏，陳誠甚至批評一些代黨言論「是非常錯誤的」，陳誠，〈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應有的認識與修養〉，頁一四—一五；同時不要忘記，陳誠在甫成立的中央訓練團擔任教育長，理當在受訓的黨政幹部面前維持比較超然的立場。相形之下，康澤最有可能是在黨政訓練班上提出代黨言論的講師，在稍前武昌珞珈山的青幹班第一期訓練中，康澤就已經反駁了陳果夫有關團員是國民黨預備黨員的見解。在黨政訓練班第一期裏，三青團也保送學員共計四十八人受訓，〈本團大事記〉，〈三民主義青年團二週年紀念特刊〉，頁一七三。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陳誠其後晉任中央訓練團副團長，原署理教育長的王東原真除

，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頁五，二五。

⑧〈各省市黨部來渝受訓委員書記長談話會紀錄〉，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 210.

⑨在七月黨政訓練班第三期的談話會上，朱家驊諄諄訓誨受訓學員：「黨團糾紛是絕對錯誤的，在第一期訓練班裏已經發生過這樣不幸的問題，今後千萬不可再有這種情形。」〈黨政訓練班第三期畢業學員黨務組會議中央秘書處主管工作討論會紀錄〉，一九三九年七月四日，〈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

⑩陳誠，〈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性質及其展望〉，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對黨政訓練班學員講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性質及其展望〉，頁三一—三二。陳誠在講詞中引述了蔣中正的話。

⑪陳誠，〈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性質及其展望〉，頁三一—三四。參見：吳錫澤（編著），〈陳辭修先生年譜簡編初稿〉，〈傳記文學〉，第六二卷第五期（台北：民國八十二年五月），頁二一。

⑫陳誠，〈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性質及其展望〉，頁三八—四一。

⑬蔣中正，〈黨與團的關係〉，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對黨政訓練班第一期畢業學員入黨入團宣誓訓詞，〈黨與團的關係〉，頁三一—四。

⑭蔣中正，〈黨與團的關係〉，頁四—五。這一期的訓練班計有二百多人入團，六十餘人入黨，康澤，〈青年團團務之進展〉，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在黨政訓練班第六期講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

部（編印），〈團務通訊〉（重慶：民國二十九年），頁二八。

⑬ 陳惕廬發言過後，朱家驊隨即承認黨團問題的確已相當嚴重，但他強調當初的設計也有很大的苦心，是應付環境的一種手段：「有人以為青年團為什麼不交黨部來辦，就是因為為應付環境的緣故，年齡提得這樣高，也是這個意思。青年團最好不給人家知道和黨有怎樣的關係。」朱家驊也試著安撫黨方人員：「也有以為青年團一來，黨沒有新生命了，這也不足怕，因為他也是信仰主義、信仰領袖的，還不是和我們走一條路麼？」他提醒這些地方高級黨工「種種糾紛以避免為第一要緊」，否則將為共黨所快，〈第二期黨政訓練班黨務人員談話會紀錄〉，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

⑭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94-95. 這和黨團衝突下，蔣中正不便加深雙方歧見有關，也是由於三青团發展一年必須面臨檢討的緣故。不過蔣在國民黨方面的內部場合中，還是持續對黨務、黨人進行批評。

⑮ 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本部消極無聲望詳查實報並以團務為主積極進行手令，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黨」一三七／六，毛筆原件。

⑯ 蔣中正，〈今後發展團務的途徑（上）〉，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出席中央臨時幹事會第四次會議訓詞，〈團長訓示〉，頁六六；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4.

⑰ 〈本團大事記〉，〈三民主義青年團二週年紀念特刊〉，頁一七三；〈團史資料〉，頁一〇三，一〇

六一〇八，一一六。

⑩ 蔣中正，〈今後發展團務的途徑（上）〉，頁六一。

⑪ 蔣中正，〈今後發展團務的途徑（下）〉，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出席中央臨時幹事會第四次會議訓詞，〈團長訓示〉，頁七二—八一。不少人認為三青團帶有特務組織性質，單就這點來說，易勞逸把三青團與中統、軍統等量齊觀。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 605. 三青團在校園從事匯報各種具有顛覆性的思想和行爲，在淪陷區三青團注重諜報工作和打擊行動。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7. 湖北支團部籌備處的一份內部刊物列舉了戰地各級團隊蒐集敵僞（日本及其在華扶植政權）與奸黨（中共）情報的工作指示，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北支團部籌備處（編印），〈工作通訊〉，第一一，一二合期（恩施：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頁二—一二。蔣中正在一九四〇年繼續要求三青團「不許令團員任特務性之工作，使其刺探同學」，〈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不許團員任特務工作積極使左傾分子就範各地團務經費以團員養團爲原則手令〉，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黨」一三七／五，毛筆原件：一九四二年蔣又令三青團不得專立檢調名目另成系統，〈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不得在各地任意設立檢查機關與調查統計局等對立手令〉，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黨」一三七／六四，毛筆原件：不過三青團在國統區校園以及淪陷區的特務行動仍在不同程度上繼續進行著。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7.

⑫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五五二。陳誠的離職，與他剛在川鄂門戶、極具戰略地位

的宜昌打了敗仗有關。爲示負責，陳誠放棄軍委會政治部與三青團等政治兼職，專任軍事。參見：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p. 568, 571; Gillin, "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p. 844;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一五七—一六二；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五七一。

⑩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七〇九。

⑪ 蔣中正，〈對青年團政治部幹部訓詞〉，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三青團中央團部講詞，〈團長訓示〉，頁九八一—一〇。

⑫ 不著撰人，〈指出團過去之失敗，糾正團此後的作風〉，三民主義青年團遂昌分團部籌備處，〈團務通訊〉，第一二期（遂昌：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頁六一—七。

⑬ 康澤，〈團的使命與兩年來的組織工作〉，頁七六。

⑭ 蔣中正，〈青年團之職責與當前急務〉，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理紀念週訓詞，〈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頁一三一—一四。三青團中央的通訊刊物也曾節錄發表蔣中正對於三青團內部爭權的看法與訓誡，〈中央團訊〉，第二卷第二期（重慶：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頁二。

⑮ 蔣中正，〈本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一次聯席會議開會詞〉，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頁二九三，附件。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 210.

⑭ 往回推，比如陳誠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重慶支團部籌備處的講話當然也可以算是澄清黨團關係的一次努力。

⑮ 康澤，〈青年團團務之進展〉，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在黨政訓練班第六期講詞，〈團務通訊〉，第二卷第三期（重慶：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頁二七—三一。參見：朱家驊，〈青年團團務之進展〉，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黨政訓練班第五期講詞；陳誠，〈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宗旨及今後團務推進方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對黨政訓練班第五期講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宗旨及今後團務推進方針〉（重慶：民國二十九年）；〈幾個問題的解答——陳部長對軍三分校政訓第一總隊畢業同學答解〉，三民主義青年團直屬第二區團部籌備處團員通訊編輯委員會（編印），〈團員通訊〉，第五期（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頁六七；陳誠，〈黨與團的關係〉，在江西支團部籌備處講詞，三民主義青年團福建支團部籌備處（編印），〈團員通訊〉，第一卷第一二期（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頁一—四。

⑯ 丁作韶，〈廓清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曲解〉，〈青年嚮導〉，第三八期（重慶：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頁一；丁作韶，〈黨團教三位一體論〉，〈青年嚮導〉，第三九期（重慶：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頁一。

⑰ 方采芹同時也反駁了其他有關三青團性質的說法，如三青團是各黨各派青年的大聯合，是所謂青年統

一戰線的組織；是一個普通的青年團體，或類似基督教青年會般的青年團體；是一個特務機關，或類似特務機關的組織。那麼，方采芹眼中的三青团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他認為三青团是「全國三民主義青年戰士的革命總部」。方采芹，〈三民主義青年團底任務與性質〉，《青年嚮導》，第二卷第四期（重慶：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頁八一—三。

188 〈青渝字第一六四號通令爲團與黨係屬一體通飭所屬一體注意糾正由〉，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福建支團部籌備處（編印），〈團員通訊〉，第一卷第二號（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頁一五六。又見〈黨與團的關係〉，頁一七。

189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頁二二，「黨」五一九／五四·一；〈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頁三一四；〈團史資料〉，頁一六〇。

190 〈黨政訓練班第三期畢業學員黨務組會議中央秘書處主管工作討論會紀錄〉，一九三九年七月四日，〈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

191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幹事會第四次會議第二次會議紀錄〉，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幹事會有關資料〉，「黨」五一九／一二〇；〈總裁批示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案〉，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黨」一三八／一一九，毛筆呈文·紅鉛筆修改批可；第一三三三次會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四九一；〈團史資料〉，頁一四三。蔣中正在黨

方送請審核的辦法中修改了一條，即（乙）學校方面，第四條，原文為「在同一學校，黨部對於團務有所指示時，團部應加重視」，蔣修改為「……團部自應接受」。〈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全文見〈五屆中常會紀錄〉，頁四九四；〈團史資料〉，頁一四三—一四四。

⑧張治中個性圓融，面對複雜的黨團關係正足以展其長才，這可能也是蔣中正考量的依據之一，他足以獲得蔣相當的信任當然也是重點，余湛邦，〈張治中——張治中生前機要秘書的回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二），頁六五—六八。根據戰時服務於委員長侍從室的張令澳說，陳誠辭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及三青团書記長二職時，曾向蔣中正推薦張治中接替，獲蔣同意，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頁一八七。張治中在其回憶錄中自稱與陳誠交情不錯，這主要還是在侍從室時期建立起來的，唯兩人在處理中共問題上態度截然不同，此為張抱憾之處。

⑨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册，頁三三五。

⑩張治中，〈革命青年應有的三個反省〉，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對重慶青年夏令講習會學生訓話，青年出版社（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一，二合集，頁二九—三〇。不過，張治中也承襲了蔣中正與陳誠的態度，表示在組織系統上，「各級並行的黨部與團部並不發生隸屬的關係」，張治中，〈三民主義青年團之任務及工作實施〉，一九四〇年九月對黨政訓練班第十期學員講詞，頁三，「黨」五一九／七一。

⑧一年前制訂通過的〈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效果未如預期，這是提出又一個辦法的重要原因，〈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二十九年年度工作報告〉，頁三一五。有關制訂〈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過程與辦法全文，參見：第一六二、一六三次會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六四一，六四四，六四八；〈黨與團的關係〉，頁一一—一二；〈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四〇—四二；〈團史資料〉，頁一四四—一四五；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三六；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五五二—五五三。

⑨〈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實施細則〉制訂過程與辦法全文，參見：第一六三、一七七、一七八次會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六四四，七二六，七二九，七三五—七三六；〈黨與團的關係〉，頁二—一六；〈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四二—四八；〈團史資料〉，頁一四五—一四九；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三六。並見：黨與團關係卷，「黨」特〇二五／二。

⑩〈查察黨與團之關係及考核辦法〉制訂過程與辦法全文，參見：吳鐵城呈總裁文，〈奉令擬具查察與考核黨與團之關係辦法擬請訓令全黨全國同志遵守〉，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黨」特〇二五／二·二·一五；〈黨與團的關係〉，頁七一八；〈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四八—五一；〈團史資料〉，頁一四九—一五〇；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三六—三三七。

⑪易勞逸將再次發行的原因解釋成黨團糾紛依然存在的緣故。這個說法也沒錯，如果爭端已經停止的話

一些新的宣示及辦法根本也不用再提出」。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99.

⑧〈黨與團的關係〉，各處。

⑨〈黨與團的關係〉，頁三五。不過，在尊重國民黨的革命地位下，編者也相當著眼於三青團的自主色彩（這並沒有違背蔣中正的基本立場），例如編者就說，在制度和系統上，三青團團員與過去的國民黨預備黨員完全不同，甚至「根本用不到預備黨員這個名詞」：「比如小孩子將來長大成人，結婚生子，自然可以當父親母親，何必叫他預備父親母親呢？」編者也認為政治活動的「活動」二字帶有官僚政客不正確企圖的意味，與其說三青團是否應如國民黨一樣參加政治活動，不如說是參加「政治建設工作」，或「青年的政治教育工作」較為妥當，頁三六一—三八。由於蔣中正早在一九三九年即已指示三青團的工作仍應以教育性為主，因此，對於應否參加政治活動的問題，編者顯然採取一種較為迂迴的解答方式。

⑩〈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須知〉，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頁一三一—一四，「二」七二八／〇六三。小冊子印行的年份不詳，不過依內文團員年齡尚規定在十八至三十八歲的範圍判斷，應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之間。

⑪這個版本有關三青團性質、黨團關係，與組織作用的內容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員須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頁四—七，「黨」五一九／八一—一。

⑫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員須知〉，一九四二年七月，頁三，五，「黨」五一九

／八一·二。

①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版的《團員須知》，頁四一六；一九四二年七月版的《團員須知》，頁三一四。關於團員須知，可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幹事會第四次會議第一次會議紀錄》，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三民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幹事會有關資料》；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員須知》，一九四三年，「黨」五一九／三。

②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支團部（編印），《團務建設大綱》（成都：民國三十二年），頁八一—二。

③從曾經擔負組織處重任的康澤、湯如炎兩名復興社分子的言論（康：第二節、本節；湯：第一節）就可以略知黨團關係滲入派系格局之後即已注定先天不良了，另見：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三七。儘管聲明、辦法陸續發出，從許多文獻中可以知道黨團關係仍舊惡劣，一九三九年七月曹德宣視察河南省黨務的報告摘要，《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三〇八；一九三九年三青團中央視察江北區（長江以北各省）團務意見指出，許多幹部與團員認為三青團是一「獨立之青年團體」，甚至是與國民黨「居於對立之地位，將來可取而代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務通訊》，第二卷第二期（重慶：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頁五五；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八日，蔣中正正在黨方審議過後的《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案》批示說，邊疆各省最好不辦三青團，如要辦，也須委託當地黨務人員兼辦，「以免紛歧見輕於地方官吏也」，《總裁批葉楚傖報告審議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案》，「黨」一三八／一九九，毛筆呈文、藍鉛筆批示；張治中，《本

團性質與工作講習》，頁三〇—三五。第三章以後的史實更說明了黨團關係已陷入極度難能振拔的境地。

⑩參閱稍前本章的討論，特別是第二、三節。

⑪蔣中正，〈青年團工作根本要旨〉，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在三青團全國幹部工作會議開幕訓詞，〈團長訓示〉，頁一二七。

⑫總裁兼團長親筆：不論任何地區之團務工作皆應秉承當地黨部之指導絕對不許有與黨部發生磨擦或鬥爭手令，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黨」一三七／二七，毛筆原件。

⑬〈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務檢討報告〉，一九四五年五月，「二」七一—(五)／一六八，頁五六。

⑭鎧，〈美記者霍爾參觀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日刊社（編印），〈大會日刊〉，第一〇號（重慶：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七日）。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一九四

第三章 革新聲中的派系權謀政治

在國民黨與三青團分據體制，以及後者政治性格愈見深化的背景下，中日戰爭後期，三青團與國民黨先後舉行的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具體提供了團方幾個在中央政治舞台上凝聚本位意識和展現政治實力的機會。藉由一九四三年召開的團一全大會，三青團確實在人事與情感認同上和國民黨更加疏遠；然而，國民黨畢竟仍為中國政治體制內的有效、有力代表，因此，三青團爭取並參與了一九四五年黨六大大會的權力分配。這樣，三青團一方面自築城壘以塑造更為完整、有別於國民黨的意識與地位，一方面卻又難能避免且頗為主動的涉入國民黨的政治事務當中。作為國民黨政權下的一個龐大派系，三青團從容的展現了現實取向的政治運作風格，並透過個別的事件與運動來選擇不同的合作對象（本章將以黨六大大會與跨越戰時戰後的革新運動作為主要的分析樣本）。儘管幾次結盟的獲利程度不一，但大體而言，三青團的政治資本的確正在累積孳息，同時也經由歷次縱橫捭闔的政治操作，儼然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方重要支撐力量。

第一節 本位意識與三青團一全大會

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首次修正，並於翌年一月一日公布施行的三青團團章中，原第五章「評議會」改爲「團員大會及代表大會」，期能逐級樹立民主集權制的精神。①以團章所列全國團員代表大會爲例，規定每二年舉行一次，②而三青團成立於一九三八年，是以在一九四〇年團章修正公布後，要求召開三青團全國代表大會的呼聲即不絕如縷。中央幹事會對此會數度進行研討，各地團員也迭有建議，所持一主要理由爲三青團的籌備階段似應早日結束，方利於未來組織基礎。就名目而言，各級團部此時尙掛以「籌備處」牌銜，雖不滯於實際工作，然終有礙於名目觀瞻；就團內權力分配而言，籌備階段各級幹部的產生採由上而下的選派方式，若能藉由各級團員代表大會所行使的選舉程序，以爭取民主集權制精神下合於限度的民主，自當受多數團員歡迎。惟三青團中央對此問題的最終態度傾向保守，初以「各地團隊建立未久，時機未熟」爲由，稱應先著手健全下級團部組織，以昭慎重；嗣兩度決議擇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然「以時間過於迫促，而籌備工作又極繁重」，以及「事實上之困難」，決定展期召集。③

這種逡巡不前的態度很可能和日形惡化的黨團關係有關。幾年來，國民黨與三青團各據體制，形同二元組織，並且加上嚴重的派系對峙意識，以復興社爲主流的三青團試圖緊控其成員，從而引起國民黨相當的關切；④一些屬於CC系的少數三青團幹部對於國民黨的忠誠要遠超過對三青團，因此，這些人被稱作「黨方」或團內的「黨方成員」，與之相對的是以

復興社爲首的「團方」或「團方成員」。也許正就是這些內部紛爭，使三青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得不在時機尚未成熟的藉口之下，一再推遲。^⑤然而，隨著地方團隊數量的擴充（省市級支團數目早已呈穩定態勢，組織成長主要還是見諸縣級分團以下的團隊：表七），三青團籌備階段之名已不能合乎事實要求，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終由蔣中正批准，於翌年三月二十九日舉行團一全大會，旋經確定以組織處長康澤爲大會籌備主任，各級團部召開代表大會（或團員大會）日期亦經三青團中央斟酌各地情況分別排定，同時派員分區督導，代表監選。^⑥截至一九四三年二月，所有分團一級，除在敵後、戰地、邊疆及海外等特殊情形外，均已舉行代表大會，並選出幹事，由中央分別核定明令發表。總計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底以前，完成籌備程序正式成立的團部，計有支團十八，中央直屬區團二，中央直屬學校分團五二，各支團所屬分團二四九。^⑦

表七：三青團團隊數量統計（一九三八—一九四三）

年次	支團	區團	分團	區	隊	分	隊
一九三八	五	八	四〇		—		—
一九三九	二八	一七	二〇六		—		—
一九四〇	二五	二一	三九三	二、六九一		一二、五四一	

一九四一	二五	二三	五三四	四、三六二	二〇、四一九
一九四二	二五	二三	六一九	五、五五四	二九、二七九
一九四三	二四	二八	六八二	六、〇一五	二八、一二三

資料來源：〈抗戰時期之青年活動（二）〉「革命文獻第六三輯」，頁七一八。

備註：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區隊、分隊總數不詳，惟據資料來源頁二所載歷年地方團隊（不含學校、海外、邊疆

）統計顯示，一九三八年地方區隊計三六，分隊計一〇四；一九三九年地方區隊計七三四，分隊計四、四九七。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紀念日），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假馬家寺的青幹班原址舉行，距重慶西五公里許，會期十五天。^⑧此為一九四一年全國幹部工作會議以來，全國三青團菁英再次匯聚一堂的盛會，而規模更勝以往，大部分經由各級團部選出的出席者更合於民主程序要求，代表性較強。開幕當日，團長蔣中正以三青團應有的任務，今後青年運動方式及團務工作重點等勗勉在場人士。^⑨四月四日，大會第一次總理紀念週與中央聯合擴大紀念週合併舉行，在這場幾乎囊括黨政團重要政治人物的集會上，蔣中正特將三青團這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性與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等量齊觀。近五年來，三青團的革命精神與工作績效不能盡如人意，甚至還浸染了當初蔣中正正在三青團面前一再痛批國民黨流於官僚衙門的毛病，現在，蔣取出黨史上著名的一全大會作喻，不啻視這次大會為三青團力戒積弊、重振精神的起點，他提醒在場人士，今後無論辦黨辦團，均應打破諸如

衙署化、形式化，以工作爲權位階梯，與不居名義不能辦事的積習與心理。⑩在十二日的大會閉會詞裏，蔣中正還要求出席者以社會對三青團的批評爲鑑，「拿我們的行動和事實來明證我們革命動機的純潔，以轉移社會的心理」，他並將這次大會視爲中國青年自同盟會、黃埔軍校以降的第三次大結合，期許之殷，溢於言表：「我們全國革命青年第一第二次的大結合，能夠打開這樣艱難的環境，能夠奠定這樣光榮的基礎，難道我們第三次革命青年的大結合，就不能繼往開來完成使命嗎？我可斷言，這是當然而且必然可以成功的。」⑪

三青團完全承認蔣中正多年來的批評，其內部的檢討言論甚至更爲嚴厲坦白，即使連民間不利於三青團的順口溜，例如「黨部官化，團部黨化；黨員官僚化，團員黨員化」等語，在三青團的會議桌上也全無避諱的揭櫫以供針砭。⑫然而，對於團方的幹部與代表來說，團務整頓重點絕非僅限於蔣中正著重的自省（其中大都涉及道德因素）層面。一全大會召開時，許多地方支區團主任、書記和大會代表要求適度放寬曾經遭到緊縮的團員年齡限制，他們也強調須注意這次全代會的政治意義，不少人更進一步主張，爲健全組織計，應加強三青團的政治性，確定三青團在政治上的法定地位。⑬軍校六期生、雲南大學經濟系主任，亦爲雲大分團主任的魯冀參在大會提出學校團務的興革意見，語間曾旁觸三青團的政治地位問題，所言頗能符合一般團員心理：

我們認爲團的政治性之加強，不外意味著團權的相當提高和同志工作的適當統籌，

因爲只有這樣，領袖所付予我們的重大任務，才可以切實實現，同志們爲團奮鬥的革命情緒才能夠歷久彌堅。我們不應忽視，努力的效果均衡的願望，實是人類行爲遂行的重要動因。同志們革命的努力，倘若不能透過革命的集團，獲致相應的效果，則這種努力恐難長久持續下去。這一關聯，每個革命者都不應忽略。¹⁴

這些團本位意識的言論無疑對黨方形成挑釁作用。以三青團一至五十萬號團員登記表（約爲一九四二年中累積數）爲例，曾加入國民黨者占團員總數一七·八四%，¹⁵其中頗多係黨內派系菁英分子，現同時成爲三青團各級骨幹。儘管欠缺實際的數字，但其中CC系只占少數確爲不爭的事實，惟其凝聚意識並不亞於敵對的復興社，在三青團中央，CC系也有一定的入數，由於忠誠度有別，或對復興社深抱敵意的緣故，這些人一向被視爲三青團內的黨方勢力。很多三青團幹部（無論黨方團方）同時都具備黨籍，這些黨內各派系菁英一則透過三青團原中央幹事、監察資格直接取得參加一全大會的權利（稱大會出席人員），或者經由各省市、學校團部代表大會選舉脫穎而出而來到重慶（稱大會出席代表），僅就三百二十名選出的大會代表分析，具黨籍者計二百四十七人，比例即高達七七·一八%，¹⁶其中CC系自成一格，他們在一全大會中的能量似乎要高過自己在整個三青團組織內的薄弱勢力。在多項議題上，CC系均以復興社爲首的團方有過相當激辯，¹⁷全代會就在個別的本位意識影響下，隱然形成黨方和團方對峙之局，《中央日報》社論事件即爲兩造在大會初期的顯著爭端之一，當

事人爲陶百川。

陶百川爲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他表示這是「政治方面富有重任的崗位」，故自認蔣中正對其知遇甚深。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陶繼陳博生擔任《中央日報》社長，基於以往經歷及人脈因素，一般視陶爲CC系人馬，在三青團內自然爲黨方成員。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正值團一全大會召開期間，《中央日報》社論突以《「這一代比上一代更好」》爲題，摘引指導員戴傳賢三月三十一日對大會講詞進而曲意發揮，略謂清光宣之際親貴政治世所詬病，其形於外的特徵爲親貴少年驕縱恣肆，此與當時的親貴老年一再放縱有關，社論以古喻今，意有所指的表示：「如果今日的成年老年，對於後一代的青年，愛之不以其道，言動思想，處處暗示他們不勞而獲，引進他們到特殊與例外的地位，處處無形中培養成功一批親貴子弟，那前一代人對不起後一代的地方，莫此爲甚。」^⑩雖然三青團成員與團務表現確有若干瑕疵，內部向來亦不乏深刻的自省能力，但國民黨機關報這篇時地不宜的文字顯然傷害了團方的群體尊嚴。社論見報當日，全代會團方人員群情洶洶，咸認黨報指桑罵槐，辱及青年幹部，爰決議要求原已簽到，但鑒於會場空氣惡劣逕行折返的陶百川於翌日升旗典禮到場解釋。究其實際，該社論係由中央宣傳部直接頒布，全國黨報一體遵登，因此確可視爲國民黨中央見解。惟刊布權既不操於陶百川之手，而文責復轉嫁於己，進退失據之餘，加上黨中央未施援助，陶又不願求取團方領導人同情諒解，於是其不獨未出席四日升旗典禮，半年後更辭去《

中央日報》社長一職，從此脫離黨工核心的生涯達三十八年之久。¹⁹

《中央日報》社論事件已然撩撥起全代會裏的黨團怨隙，作為三青團幹部主要養成地的青幹班，其去從命運則成為派別交鋒的又一重點。在一全大會的議案討論中，CC系視青幹班為過時產物，主張停辦，並另行創設一所幹部學校以徹底劃清界線；復興社則認為應尊重青幹班的歷史與成效，並援引一九二九年中央黨務學校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的國民黨成例，主張將青幹班擴充為幹部學校，以資銜接。乍看之下，兩個意見差別甚微，實則利害甚大，關鍵在於由康澤掌控的青幹班資源能否完整保留轉移至未來的幹部學校，並與以往所養成的人力資源構成連結。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康澤以外的系統不免對所謂「擴充派」感到猶豫。事實上，一所與過去完全斬斷承接關係的新學校，的確是一個比較足以提供各派系重新進行權力分配的場域，康澤一派絕難扭轉其餘派系的這種本位心理。最後，重新成立一所學校的「創辦派」獲得表決的相對勝利。然而，該決議案經由後續繁瑣的整理程序，一位親康澤的大會祕書自稱得到「有力的支持」，仍將該決議文整理為「將青幹班擴充為中央幹部學校」，且即完成整理法定程序，大會主席團已難置喙。²⁰

三青團一全大會雖具派系之爭，取其最大利害共通點而言，仍以黨方與團方的爭執為烈，身為三青團最高負責人的張治中對此不能置若罔聞。自接任三青團書記長後，張治中雖力持超然立場，惟以個人背景之故，自謂仍「稍偏於黃埔」，儘管如此，張治中以在團多年經

驗，對派系的糾葛局面了解愈深，亦認爲係「黨內無可救藥的不治之症」。^①在四月十日全代會第十五次大會中，張治中以「本團四年來工作總檢討」爲題，對大會進行報告。內文不可避免論及敏感的黨團關係，張治中以不失幽默的口吻向在場人士表示此是「家庭會議」，有話用不著隱諱，繼而話鋒一轉，強調反對所謂分割分化、打小算盤、小主意的行爲，復又說道：「今天說這些話，等於無病呻吟，其實不會有這類事的，我不過怕將來會有這類事罷了。」張治中的談話雖不合於事實，但藉著反面的表達方式，倒也引起在場人士一陣會心的笑聲。他繼續指出近來黨、團，與外界均無人認爲黨團關係還有不好、摩擦的情形，「要是有人歪曲事實，硬說是有的話，那就是對本團不懷好意，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其時大會主席係與CC、陳誠均有淵源的張厲生擔任，中央常務幹事陳立夫、谷正綱等CC系分子也出席聆聽。張治中關於黨團關係良好不容分化的官式言論，兩度博得在場人士的熱烈掌聲，根據全代會會議紀錄顯示，這是張治中通篇報告裏獲得最大回響的段落。^②不過，翌日接踵而至的中央幹事、監察選舉，立刻戳穿了張治中建構的和諧表象。中央幹事、監察向由團長蔣中正指派，現在，全代會的出席者首次得到圈選權利，選舉結果對未來三青團人事生態勢必牽動甚鉅。康澤爲確保全代會議事的順利及選舉的勝果起見，先於四月上旬假中央團部舉行青幹班同學會成立會，他強調青幹班同學是三青團的「法定幹部」，並要求爲數約五十名具備全代會代表身分的同學識大體，顧大局，保存旺盛的精神，作出榜樣。全

代會召開期間，以復興社為首的團方即已針對中央幹事、監察選舉積極展開布置；十一日下午三時前後，康澤約集各地團部實際負責人與青幹班同學會多名理事，在全代會會址附近一間勞動營教室裏確認最後配票事宜；五時許，選舉開始。至於CC系的選前動員情形尚不可知，但基本上能量至為有限。開票結果，中央幹事選舉中張治中、康澤、朱家驊所獲票數最多，原中央常務幹事陳立夫遠落於第二十一名，可見CC系與團方實力之差距及本位意識對人事問題上的強烈影響。最後，經蔣中正重新核定，並在十二日大會閉幕典禮正式宣布的當選名單中，陳立夫被蔣擢升至中央幹事第三名，康澤居第十一位，²³不過，整個CC系在底定的名單內仍是少數。據估計，在中央幹事與候補幹事總共九十七個席位中，親CC勢力約有十名上下，²⁴黃埔系與復興社則至少達到全額的半數（表八）。連同第一章所列人事進行編年式綜合考察可以發現，CC系勢力仍然在中央幹事會裏呈現下滑走勢，黃埔系與復興社的席位比例則繼續揚升。

表八：第一屆中央幹事、候補幹事派系屬性分析（一九四三、四—一九四六、九）

◀中央幹事				
排序	姓名	派系	屬性	籍貫
一	張治中	黃埔教官		安徽巢縣
			派	
			系	資
				歷

二	陳誠	黃埔教官	浙江青田	
三	陳立夫	CC	浙江吳興	青白團副幹事長
四	朱家驊	朱家驊派	浙江吳興	
五	陳布雷	親CC	浙江慈谿	
六	胡宗南	復興社／黃埔一期	浙江孝豐	力社幹事
七	谷正綱	CC	貴州安順	
八	王東原	親陳誠	安徽全椒	
九	湯恩伯	黃埔教官	浙江武義	
一〇	賀衷寒	復興社／黃埔一期	湖南岳陽	力社本部書記、軍會常幹
一一	康澤	復興社／黃埔三期	四川安岳	力社本部書記、力社宣傳處幹事、西南青年社主委、南京中國日報社社長
一二	李惟果	復興社	四川華陽	
一三	段錫朋	原CC，親陳誠	江西永新	
一四	何浩若	復興社	湖南湘潭	軍委會政訓研究班教務主任
一五	張厲生	原CC，親陳誠	河北樂亭	誠社總書記
一六	蔣經國	蔣經國系	浙江奉化	
一七	邵文儀	復興社／黃埔一期	湖南醴陵	力社本部書記、力社宣傳處幹事、歐洲分社指導、中國文化學會理事長

一八	胡木蘭	粵系	廣東番禺	胡漢民女
一九	梁寒操	孫科派	廣東高要	
二〇	張道藩	CC	貴州盤縣	青白團常幹
二一	李樹森	復興社／黃埔一期	湖南湘陰	湖南省分社書記
二二	任覺五	復興社／黃埔四期	四川灌縣	四川省分社書記、青會書記、南京中國日報社副社長、中國文化學會南京分會書記
二三	倪文亞	復興社	浙江樂清	力社組織處助幹、河北省分社書記
二四	顧希平	復興社／黃埔一期	江蘇淮陰	陝西省分社、江蘇省分社幹部、南京中國日報社社長
二五	黃宇人	復興社／黃埔四期	貴州黔西	
二六	湯如炎	復興社／黃埔四期	湖南醴陵	
二七	陳良	復興社	浙江臨海	
二八	劉詠堯	復興社／黃埔一期	湖南醴陵	南京市分社書記、中央軍校分社書記、南昌掃蕩日報主辦人
二九	劉健群	復興社	貴州遵義	力社本部書記、力社宣傳處幹事、軍會常幹
三〇	袁守謙	復興社／黃埔一期	湖南長沙	
三一	滕傑	復興社／黃埔四期	江蘇阜寧	力社本部書記、力社訓練處幹事、湖北省分社書記
三二	范予遂	改組派，親朱家驊	山東諸城	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幹事
三三	涂公遂	復興社	江西修水	

三四	鄭彥棻	粵／蔣經國系	廣東順德	
三五	黃珍吾	復興社／黃埔一期	廣東文昌	南京市、福建省分社書記
三六	吳兆榮	復興社	安徽休寧	力社本部助書
三七	程思遠	新桂系	廣西賓陽	
三八	吳菊芳	粵系	安徽	李漢魂妻
三九	李國俊	復興社／黃埔四期	廣東五華	力社幹事
四〇	黃季陸	原胡漢民派	四川叙永	
四一	陳雪屏		江蘇宜興	
四二	余井塘	CC	江蘇興化	
四三	項定榮	CC	浙江嘉興	
四四	駱力學		甘肅天水	
四五	黃少谷		湖南長沙	
四六	葛武榮	CC／黃埔二期	浙江浦江	原為青會書記，甘肅省分社書記，一九三二年秋遭力社除名
四七	王啓江	朱家驊派	河北東鹿	
四八	王汝泮	復興社／黃埔四期	河南南陽	河南省分社書記
四九	鄭通和		安徽廬江	
五〇	陳逸雲	復興社	廣東東莞	

六一	何義均		湖南澧縣	
六〇	林翼中	粵	廣東合浦	
六二	萬昌言	親張治中	安徽巢縣	
六三	洪瑞鈞		浙江瑞安	
六四	劉世達		廣東潮陽	
六五	趙仲容	親傅作義	山西	
六六	余紀忠		江蘇武進	
六七	張鶴真	夫人派	上海	
五一	吳紹澍	親朱家驊	江蘇松江	
五二	任卓宣		四川南充	
五三	徐君佩	復興社	安徽廬江	
五四	鄧飛黃	原改組派	湖南桂東	
五五	包華國	復興社	四川成都	
五六	張伯謹	親陳誠	河北行台	
五七	張其昀		浙江鄞縣	
五八	秦啓榮	復興社／黃埔六期	山東鄒縣	山東省分社書記
五九	胡軌	復興社／黃埔四期 ／蔣經國系	江西萍鄉	力社本部組織處副處長

排序	姓名	派系屬性	籍貫	派系	資歷
一	李俊龍		湖南湘鄉		
二	陳開國	復興社	四川巴縣		
三	寇永吉	復興社	甘肅		
四	杭立武		安徽滁縣		
五	楊雨瑛	復興社	陝西榆林		
六	袁永復	復興社	四川安岳		
七	顧毓琇	CC	江蘇無錫		
八	王友直	復興社	陝西		
九	李名章	復興社	河南		
一〇	徐瘦秋	復興社	廣東汕頭		
六八	柳克述	親陳誠	湖南長沙		
六九	沈祖懋		浙江桐縣		
七〇	胡定安	親張治中	浙江吳興		
七一	姚從吾	親朱家驊	河南襄城		
七二	鍾天心	孫科派	廣東五華		

◀候補幹事

一一	周自新		江蘇江陰	
一二	鍾鼎文	復興社	安徽舒城	
一三	陳介生	復興社／黃埔五期	四川	一九三四年經選派留德、歐洲分社書記
一四	韋贊唐	新桂系	廣西容縣	
一五	周天賢		湖南臨澧	
一六	陳蒼正	復興社	浙江黃岩	北平市兼河北省分社幹部
一七	何勝奎	親陳誠	浙江松陽	
一八	李天民	復興社／黃埔系	四川華陽	南京中國日報主筆
一九	郎維漢	復興社／黃埔系	湖北漢川	湖北省分社幹部
二〇	程登科	復興社	四川巴縣	
二一	楊玉清		湖北孝感	
二二	詹純鑑	蔣經國系	江西婺源	
二三	張桓	復興社	江西九江	
二四	梁幹喬	復興社／黃埔一期	廣東梅縣	力社、軍會訓練處幹事
二五	王政	復興社／蔣經國系	雲南	

資料來源：名單的部分，見《團一全紀錄》，頁一九三；派系屬性、派系資歷與籍貫的部分依據徵引書目相關資料編成。

新任中央常務幹事則由蔣中正自中央幹事裏指定十五名，此外，中央幹事會各處處長除特殊情形者均規定爲當然常務幹事。嚴格的說，十五名經指定產生的中央常務幹事裏只有二名CC系分子，黃埔系同復興社合計七人，親陳誠勢力三人，朱家驊一人，孫科派一人，夫人派（親蔣宋美齡）一人。和以往的中央常務幹事會陣容比較，本屆親復興社的比例確已獲得顯著成長。④同時，復興社在三青團一全大會後重組的中央幹事會各處會的主管職位上也取得優勢，其中，組織處處長康澤，兩名組織處副處長胡軌、徐君佩，以及訓練處處長李惟果，兩名訓練處副處長吳兆棠、張桓，均屬復興社成員。⑤在地方上，復興社仍是團務重心所寄，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各省市團部幹事長（或籌備主任）、書記爲例，保守估計黃埔系同復興社至少約達半數（表九）。

表九：三青團省市團部領導人派系屬性分析（一九四四、三）

支團別	幹事長／籌備主任	書記
重慶支團	任覺五（復興社／黃埔四期）	羅才榮（復興社／黃埔系）
四川支團	李天民（復興社／黃埔系）	黎光明（——）
西康支團	陳志明（——）	魏進軒（——）
貴州支團	黃宇人（復興社／黃埔四期）	季天行（黃埔六期）

廣西支團	黃旭初（新桂系）	韋贊唐（新桂系）
廣東支團	李漢魂（粵系）	李國俊（復興社／黃埔四期）
湖南支團	李樹森（復興社／黃埔一期）	劉業昭（復興社）
江西支團	蔣經國（蔣經國系）	詹純鑑（蔣經國系）
福建支團	黃珍吾（復興社／黃埔一期）	韓文溥（軍校高教班二期）
浙江支團	倪文亞（復興社）	陳蒼正（復興社）
陝西支團	胡宗南（復興社／黃埔一期）	楊爾瑛（復興社）
甘肅支團	宋格（——）	寇永吉（復興社）
青海支團	王文俊（親朱家驊）	楊生霖（——）
湖北支團	張伯謹（親陳誠）	劉先雲（親陳誠）
河北支團	張蔭梧（親復興社）	張興周（復興社）
河南支團	王汝泮（復興社／黃埔四期）	周南（復興社）
綏遠支團	趙仲容（親傅作義）	王明德（——）
雲南支團	裴存藩（復興社／黃埔三期）	高雲裳（——）
安徽支團	徐君佩（復興社）	朱施民（復興社）
山西支團	薄毓相（——）	谷深甫（——）
山東支團	——	興舜衡（復興社）

上海支團	吳紹澍(親朱家驊)	沈祖懋(——)
第三戰區支團	鄧文儀(復興社/黃埔一期)	倪志操(復興社)
魯蘇豫皖邊區支團	湯恩伯(黃埔教官)	莫國璋(——)
平津支團	——	韓家蘭(——)

備

註：一、‘——’：資料來源空白

二、‘——’：資料不明或派系屬性不明瞭

資料來源：職名的部分，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手冊》，一九四四年三月，頁五五—五九，「一二」七二八/〇〇一；派系屬性的部分依據徵引書目相關資料編成。

一九四三年的三青團首次全代會還通過了一些決議案，團章在會中也作了第三次修正，其中的團員年齡規定從「年滿十六歲至二十五歲」改為「年滿十六歲至三十歲」，原則上可視為團方的一大勝利。^⑦中央幹事、監察會的名額亦較前擴增，此有擴大參與的功能，但CC系難能從中均霑利益，復興社仍為最大贏家；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由蔣中正指派為中央幹事的蔣經國，在本次全代會中獲選為中央幹事，且成為繼陳誠之後，康澤在三青團內的主要競爭對手，此後漸有凌駕之勢。全代會的宣言顯然深受蔣中正甫發表的《中

國之命運》感召，以至於文中隨處可見據以發揮的言論，如摒斥帝國主義的黷武侵略，與呼應蔣中正建立國防、經濟、文化三體合一新中國的聲明等；這樣的文字在全代會由李惟果宣讀時還是遭到了代表的責問，只因宣言矛頭對準了帝國主義而對共黨卻無片語隻字的抨擊。儘管如此，三青團首次全代會的宣言以其幾近於白話的筆調仍然獲得人們較大的注意，書記長張治中日後即指出，這篇文章力避國民黨歷次會議宣言的八股形式，內容較真實，形式較活潑，頗能表現青年的時代使命與主觀要求；學者李雲漢也認為，宣言採用語體文體裁，形成了表現三青團創新精神的一項特色。²⁶

從出席者的集體認同來說，一九四三年三青團一全大會體現出黨方和團方本位意識的對抗，然論及會場中的實力對決，則黨方遠不能敵，特別是在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會中的復興社席位比例均較前大幅成長，因此，依實力原則，原已在三青團內占盡優勢的復興社，在這次的全代會中，可謂進一步鞏固了純粹一體的組織意識。隨著三青團成員和力量的增長，三青團與國民黨的糾紛持續加劇，兩年後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提供了包含三青團等各派系再一個權力競爭的場合，並且仍然涉及本位意識的頡頏。這一次，團方在CC系主導的黨六全大會裏成了少數，其狀儼如兩年前團一全大會翻版，惟派系優勢易位而已。三青團處此環境如何謀求最大組織利益？一言以蔽之，合縱連橫！

第二節 實力政治與國民黨六全大會

就權力分配的角度而言，一九四五年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一方面爲了順應國內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訓政的強烈呼聲，即所謂「還政於民」；一方面則係全代會因戰事延宕久未召開，黨內權力資源亟須重行調整以適應現狀。加上此時中國對日戰爭已見樂觀趨勢，阻礙會議的變數減至最小，蔣中正遂於一月六日約集五院院長商討全代會召開事宜，當經決定於五月五日（革命政府紀念日）起舉行；一月八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蔣中正該交議案，並即行籌備之。^④國民黨這次全代會與三青團利益至爲相關者有二，一爲促進憲政，爰行將決議三青團改隸於政府，此不啻摒除國民黨與三青團在形式統屬上的最後接榫點；二爲會中重行選舉中央執行、監察委員，三青團積極投入競爭，此足以說明黨團關係自始雖混沌不清，然三青團仍爲國民黨政權下的重要派系，脫逸此格局則團務的政治面勢將無從言說。國民黨的派系競爭久已形成一項幽微而又顯著的政治文化，幽微者係指一般升斗小民不易窺知幕內情節，顯著者則指其惡性互動結果往往牽動政局甚大。就中央舞臺觀之，戰時八年的黨內派系爭執尤以六大會期間衍至最烈，會前各主要派系已然形成一聯合陣營，其共同敵人厥爲陳立夫領導的CC系一派，主要攻防點爲中央執監委員的席次問題，聯合陣營意在防杜CC壟斷，並爭取個別派系的利益擴充。

CC系自北伐後成長頗為可觀，到一九三五年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能大致取得會場優勢，隨著蔣中正領導地位的鞏固，多年來CC系儼然已成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重要派別。根據粗略的統計，CC系在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一百八十個名額（含候補）裏，擁有三十至五十席左右的實力，為黨內最大最有力的集團，也是黨內最有影響力的派系。^⑩然而，由於戰時各派系力量大幅擴增，加上國民黨中央侷促西南一隅，政治資源相對減少，從事政治競爭者的活動現在主要只限於中央的層面，和還未被既有的地方實力派爭先攘奪到的少數省份及地方。政治鬥爭在這種資源緊縮的情況下變得更加尖銳了。^⑪的確，自一九三八年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國民黨已有七年未舉行象徵黨內最高權力機構的全代會；而從一九三五年五大大會以降，中央執監委員更超過九年未曾改選，此絕難反映各派系現有的政治生態，而遲至一九四五年方才召開的六大大會勢必成為派系競相覬覦的目標。^⑫例如與CC系同具組織能力但彼此仇隙甚深的復興社，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裏似只占得三個名額，即中央執行委員會擴情、賀衷寒、劉健群，整體而言，復興社在黨務部門的實力遠不如CC；惟復興社成員自一九三八年開始獲得三青团的主導權，組織、動員力更為精進，政治慾亦與日俱增，一九四五年的黨六大大會為三青团成立後國民黨首次召開的全代會，以復興社為首的團方亟欲投入競爭，然苦於代表人數不足，遂思以廣納盟友的途徑向CC系提出挑戰。黨內幾個重要派系基於同樣的考慮，亦樂見結盟實現，這些派系至少包括了黃埔系、朱家驊

派、政學系，以及新桂系等。

復興社最初的幹部來自黃埔系學生系統，以後組織的下層基礎愈見擴大，而黃埔系仍居領導核心；三青團其後成爲復興社重心所寄，加上黃埔系教官系統的陳誠與張治中相繼擔任三青團書記長一職，因此，以領導菁英而論，黃埔系／復興社／三青團三者具有若干明顯的傳承脈絡。三青團與朱家驊的合作紀錄則始於朱代理陳誠書記長職務期間。由於三青團書記長陳誠仍負軍事責任，所以團長蔣中正於團部成立未久即指派朱家驊代理書記長職位，直到一九三九年八月底中央臨時幹事會結束爲止。³⁴蔣中正挑選朱家驊的理由可能有二，一爲朱家驊個人經歷，一爲派系平衡考量。就個人經歷而言，朱家驊富學術教育背景，對青年領導問題饒具經驗；且其曾留學德國，一般被視爲國民黨內的親德派領袖，在意識形態上和復興社、三青團大致接近。³⁵另就派系因素來說，朱家驊原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尙爲親炙，但並非居於二陳之下的上下隸屬地位，一九三八年四月臨全大會之後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旋又兼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局長，朱家驊得職務之便，開始自樹一方勢力，此後與CC系漸行漸遠，因此，由其代理三青團書記長料將不致增強CC系在團內能量。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朱家驊自中央秘書長職位調任中央組織部長後，與CC系的矛盾逐漸白熱化，雙方交鋒重點爲組織、教育，及特務系統。在政治競爭之中，朱家驊且外結復興社等派別以爲奧援，於是三青團成爲其關係網路的有力屏障，三青團組織處長康澤在調整各地團部人事時也和

朱家驊系互通聲息，期以遏抑CC爲先。³⁵

政學系分子在三青團內取得的最高職務爲王世杰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擔任的中央監察會書記長一職，除此之外，政學系在團內力量至爲稀薄，與復興社不可同日而語。³⁶一般而言，政學系缺乏上層的組織結構，亦無下層的群眾基礎，在戰時政治資源有限、派系競爭日熾的情況下，壓力不啻倍增。一九四四年，張群、熊式輝、吳鐵城、何廉，與甘乃光等人爲因應未來實施憲政及選舉，曾有籌組政治集團之意，並獲蔣中正許可；其後該計畫雖未實現，但已可顯示政學系的政治企圖以及政局變動下的派系肆應之道。³⁷至於戰時三青團和新桂系在地方上的合作事例則以安徽最爲顯著。一九三八年二月，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此爲新桂系插足安徽的開始，迄至一九四九年共歷經廖磊、李品仙、夏威、張義純等省主席，均爲新桂系人物，其中尤以李品仙執政八年爲最久。安徽本爲CC系重要據點，當政的新桂系不免與之衝突。新桂系人物擔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期間，安徽人事盡以新桂系爲優先，其次輔以其他傾向新桂系的各派人物，於是CC系在皖處境益爲艱難。戰時新桂系在安徽以三青團抑制CC系的例子並不少見，李品仙逐走教育廳長方治而代以三青團內親張治中的萬昌言、皖南行署主任一職另保三青團內親陳誠的張宗良繼任等，均爲新桂系壓抑CC之作，其中方治去後，CC在皖頓失重心，新桂系則聲勢益張，影響尤大。³⁸

儘管CC系在地方上受到當政者與各敵對派系的圍堵，但在黨務部門中仍爲最大勢力，

各派系除聯合外，委實不易在黨內進行有效抗衡。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召開期間，三青團書記長且具黃埔系教官資歷的張治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新桂系的白崇禧，以及誼屬政學系的張群、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熊式輝、王世杰等人就曾連日集會，「因不滿於立夫、庸之（孔祥熙）諸人，相約在全會選舉常委時，不選立夫」。³⁹這次的中全會並且對中央組織部長人事作了調整，主要原因可能在於蔣中正欲將黨六大大會及來日憲政選舉的選戰重責，委諸以組織力見長的CC系；再者，此舉亦不無抑制朱家驊與陳立夫在組織、教育部門續行膨脹的考量在內。多年來已自闢局面並同二陳齟齬不止的朱家驊曾提議恢復下級黨部選舉制度，不料引起反對，加上CC系從中推波助瀾，朱遂於十二中全會上黯然辭職。蔣原有意調教育部長陳立夫接任該職，惟似基於牽動過鉅及其他若干不明因素，陳果夫接下了這個位子。十一月，陳立夫始接替健康情形欠佳的陳果夫辭職後所留下的中央組織部長職缺，朱家驊則接替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據說蔣中正在這波人事搬風中，曾告誡陳立夫與朱家驊二人不可輕易更動兩部的幹部，惟事實不如預期，雙方到職後人事清洗之例仍多。⁴⁰

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總裁蔣中正交議案，決於同年五月五日召開六大大會，會中並推舉葉楚傖、李文範、陳布雷、陳立夫、吳鐵城、張厲生、張道藩七人研究全大會及國民大會有關事項，⁴¹揆諸名單，CC系色彩頗稱濃厚。一月十二日，三青團組織

處長康澤訪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且爲三青團中央監察會書記長的王世杰，二人就三青團與六全大會事宜進行商談，王世杰支持給予團員選舉出席全代會代表的權利，並表示願具名提出此議。嗣王世杰曾於十七日黨內談話會的場合獲得包括CC系陳果夫、余井塘等人同意三青團應有若干代表參加大會。但另一方面由陳立夫掌控的中央組織部所草擬的六全大會組織法、選舉法中，並無有關三青團的出席規定，意即稍前CC系只作了空頭承諾，實際上團仍被排除於本次大會之外。這份草案隨後經葉楚傖等七人小組審議修正，囿於小組不利於三青團的派系成分，三青團參與全代會的願望仍無從實現。然而，草案瞬於二十二日黨的中常會上受到若干非CC系勢力的質疑，癥結點即在三青團被拒於全代會外一事；同時，葉楚傖等七人小組也因孫科、馮玉祥等人認爲「太狹隘」，經蔣中正指示，遂於常會中加推十四人，合計二十一人組成「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有關事宜審議委員會」，葉楚傖、吳鐵城爲召集人，三青團中央幹事會、監察會的兩位書記長張治中與王世杰分別以黨的中央執行、監察委員身分列名該審委會內。此時黨內空氣顯然轉而有利於三青團，究其實際，仍爲各方不滿CC系意欲操攬所致，原組織法與選舉法草案於是在二十二日的中常會中，決議交由甫經通過設置的審委會重行審議，實則三青團出席全代會事已可期待。⁴²

一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修正通過經重行審議後的六全大會組織法與選舉法，應選六百名大會代表名額中，三青團獲六十名配額，形式上占一成。二月五日，國民黨中常

會修正通過三青團所擬該團出席大會代表選舉法，會中附加決議三青團代表以具有國民黨黨籍者爲限；具有黨籍之團員，除在黨部服務者依規定得參加黨部選舉外，應一律參加團部六十名配額內的選舉。④四月二十日起，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及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三次聯席會議相繼召開，兩項會議除研議憲政時期團的組織與活動方式問題之外，尚須選出團出席黨六大大會代表之中央配額十五名。團長蔣中正於團一屆三中全會四月二十日開幕當天的訓詞略稱，爲避免將來實施憲政之後，其他黨派援例侵入學校爭取青年，三青團不能再以「本黨系統下單位的名義，在各學校吸收團員」，雖然他自稱還沒有時間考慮其具體辦法，但也指出了一個方向，即「將來青年團的工作，實際上儘管由我們國民黨來主持，但名義和方式上則必須隸屬於國家」。⑤會上遵循蔣中正的政策性指示，對三青團未來的組織與活動方式作了討論，經提付表決，贊成屬於國家者以三十五票之多壓倒了五票主張隸屬於國民黨的意見。該表決結果隨即送至二十三日召開的一屆三次幹監聯席會議上獲得同意確認，聯席會議並決議將討論過程簽報團長核示。⑥

這次聯席會議的主要任務係選出三青團出席黨六大大會代表的十五名中央配額部分，⑦康澤操縱了選舉結果，在一百零三位投票人中，康即囊括九十票遙居首位。三青團中央幹事、監察兩會書記長張治中、王世杰各具有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身分，本即擁有出席黨六大會資格，二人無論在黨在團都無爭取出席權的負擔，遂以較爲客觀的立場在聯席會議上呼

籲三青團劃出若干名額給予在校青年學生，惟到會者權力慾既重，復以團務經驗為後盾，張、王二人意見卒未獲通過。二十三日選後當晚，蔣中正聞悉無一學生當選，即痛斥三青團幹部人員，並迫令調整名單。⁴⁷三青團出席黨六大大會的六十名配額中，中央團部占十五名，地方、學校、海外團部及女團員等占四十五名，合計占全代會六百名經由選舉產生的大會代表的十分之一，不過這尚不能涵括三青團在黨六大大會的全部實力，主因係若干團方幹部在地方黨部負有職務，故在團中央的密令下，已逕循黨部途徑參選代表，不占團方配額；再者，各地黨部方面選出的代表裏亦有若干復興社分子，彼等與三青團實互通聲息；又，軍隊黨部出席黨六大大會的一百一十個代表配額中，黃埔系／復興社／三青團相關勢力持有絕對優勢。職是之故，「黃復青」在黨六大大會裏的代表席次據估當在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之間，粗占六百名大會代表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此均為三青團在全代會裏的直接助力，實力不容輕視。⁴⁸

儘管三青團現已擁有可觀力量，但按人數而言，仍為相對弱勢，尋求外援實有必要；黨內其他非CC系勢力亦作如是盤算；另外CC系逐步進逼，當也激起各派系同仇敵愾的決心。⁴⁹一年前各派在黨的五屆十二中全會上曾短暫結合以抗衡陳立夫，現各派系在黨六大大會召開前夕，更進一步形成龐大的聯合陣營，主要攻防點即是這次全代會中即將選出新一屆中央執監委員的席次問題。參與該聯合陣營的派系領導人至少包括：三青團前後兩任中央幹事

會書記長且兼具黃埔系教官資歷的陳誠、張治中；三青團組織處長且是前復興社末任書記長的康澤；誼屬政學系的三青團中央監察會書記長王世杰（亦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同為政學系重要分子的熊式輝、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新桂系的白崇禧；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陳慶雲；以及自成局面但一直同三青團保持密切關係的朱家驊等人。聯合陣營集會頻仍，至遲在四月底已完全確定成形。據資料顯示，熊式輝、吳鐵城，與康澤的家中都曾是密談地點，其中似以康宅次數為多。「黃復青」勢力在聯合陣營中頗稱活躍，賀衷寒、康澤等均曾擔任重要幕僚及執行的角色；袁守謙、程思遠、王啓江則為聯絡員，分別代表「黃復青」、新桂系、朱家驊方面。這樣陣容龐大、動員廣泛、目標簡化的派系聯合陣營，在戰時國民黨的中央政局中並不多見，換言之，當時擔負國民黨組織重任的陳立夫與其領導的CC系所面臨的挑戰，亦至為沈重；全代會出席者包括中央執監委員與大會代表兩部分，聯合陣營能夠掌握多少票源尚不易精確判定，不過根據會前參與派系密談過程及在全代會中擔任會場幹事的三青團重慶支團書記羅才榮回憶，聯合陣營頗為強大，「估計在位代表人數的比例，已成多數」。⁵⁰

五月五日，國民黨六大會在重慶復興關的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揭幕，會中充斥著各類檢討意味濃厚的言論與提案，氣氛熾熱。⁵¹即使連蔣中正屬意將三青團納入國家系統的想法，大會也出現了另一種微弱但不同的聲音，即主張國民黨與三青團應合併組織，層層節制，

以便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提案者爲苗培成等十二人，具CC色彩。不過出席大會者仍以蔣中正的態度爲準，三青團「改屬於政府，擔任訓練青年之任務」的重要條文納於蔣中正向大會交議的「促進憲政實現之各種必要措施案」中，該案並於十八日經大會修正若干文字後，獲全體一致通過，其間並無過多波折，以至於現場擔任大會主席的王世杰對於該案順利過關也略表訝異，⁵²此應和與會者一以蔣中正的意志爲貫徹有關，CC系亦然。先前程天放等五十九人曾提案修改國民黨的總章，指三青團在憲政時期以改隸政府爲宜，故擬刪除總章原第五條「本黨爲訓練青年設青年團，其辦法另定之」的相關條文，本案CC色彩更濃，加上陳立夫等領導分子也列名其中，連署人數較多，大致可視爲CC系服從蔣中正的基本態度，而前述苗培成等十二人提案則應屬個人意見或策略運用而已。⁵³全代會的總章審議委員會整理各方意見後，即於十六日提交大會決議修正通過國民黨的總章修正案，原第五條內容正式刪除，三青團自一九三八年起存在於國民黨最高章程裏的一段文字到此終結，在此議題上，兩日後通過的「促」案實則已屬餘韻。⁵⁴蔣中正對三青團的安置立場除了爲因應未來憲政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考量，今仍不能得知，惟團改隸於政府，不啻摒除了國民黨與三青團在統屬關係上的最後接榫點，因此，從六大大會修正總章以後，國民黨與三青團之間事實上已無任何法制形式的層級之別了——儘管這種法制形式從來就沒有獲得團方應有的重視。⁵⁵

對三青團來說，六大大會另一項攸關利益的重點厥爲競爭激烈的中央執監委員選舉。⁵⁶

全代會開幕翌日（六日），曾先後擔任或兼代三青團書記長的陳誠、朱家驊、張治中三人，假團部邀集「黃復青」等大會代表茶敘。與會者多表激昂，復興社分子唐縱視彼等洵洵群情乃「對CC宣戰之祭旗」。另一方面，大會既經召開，聯合陣營與陳立夫連日談判，內容不外名額分配、投票方式等。⑤蔣中正也曾召集陳果夫、陳誠、吳鐵城、陳慶雲、張治中五人會商選舉辦法，初步決定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名額共為二百五十人，嗣編列候選人名單，惟CC系旋即向蔣要求追加名單，政學系等見狀跟進，CC爰又追加一批，漲勢未已，與日俱增，直到五月九日蔣中正向大會提出選舉辦法，規定中央執監委員總名額（含候補）為三百六十名，當經通過，此為六大大會中關於委員應選名額的首次調升內情。CC系面對聯合陣營的挑戰委實倍感壓力，且依實力原則未見得穩占上風，為紓解形勢計，於是聯合第五屆中央執監委員及大會代表約三百人上書蔣中正，表示願將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選舉權奉獻予蔣；三青團方面聞訊，接踵聯名上書表示異議，指稱選舉權不能私相授受，前議暫寢。⑥聯合陣營與CC系的較勁，隨著選舉日愈近而更加短兵相接，投票前夜，即十八日晚間，雙方在兩路口政治部會議室進行最後談判，到會者有CC系的陳立夫、方治，「黃復青」方面的賀衷寒、康澤……等人。兩造在這場機密的談判過程中都堅持己見，互不相讓，而電話不斷鈴響，陳立夫屢次應接後均稱係自總裁官邸打來要增列某人云云，電話次數既多，加上時間已深，談判對手實感不耐，並且也懷疑起電話的真實性，結果賀衷寒拍桌怒責CC方面毫無談判

誠意後起身離席，談判破裂。⁵⁹

翌日（十九日）進入選舉議程，蔣中正親臨主持，據會場幹事羅才榮回憶，蔣當場交下手諭希望了解康澤、賀衷寒是否有組織性的控制會場等情事，羅才榮由坐在蔣左邊的張治中處接下紙條並轉達給台下的康澤與賀衷寒，二人在一間無人的教室仔細商量後呈覆報告予以否認，並稱如有此種事實，則願接受校長最嚴厲的制裁。這份由康澤繕寫，賀衷寒一同簽字的報告經原徑傳回蔣中正的手中，蔣閱後即向大會宣布新的選舉辦法，不料引起會場譁然。⁶⁰依照這份全新的辦法規定，中央執監委員的應選名額又增至四百六十名（含候補），據蔣所言此是為使黨內優秀人才多所貢獻的緣故；另外，選舉票計分兩種，甲種票係從約八百名候選人中圈選出四百六十人，乙種票由蔣中正推薦的四百八十名候選人中自由又去二十人，兩種選票由選舉人自擇一種。當六全大會籌備期間，CC系方面已有人醞釀鼓吹擴增中央執監委員名額，其後發展漸成事實，九日全代會通過的委員名額已較第五屆多出一百名，十九日宣布的新辦法再添一百名，合計比起第五屆擴增了整整二百個席位。選前兩天已盛傳總裁將親自統籌分配，十九日蔣作說明時特以三百名選舉人願將選舉權交給他支配為由，強調該新辦法不容反對。據說這項突如其來的改變是CC系從中運作所致，聯合陣營至表不悻。⁶¹

會場代表們情緒激動的原因不難理解，歷屆中央執監委員名額隨著黨員數累增以及為了滿足派系需要而愈見擴大，名器已有過濫之虞；⁶²況本屆一舉添增兩百個名額，聯合陣營反

應未及，原先佈局亦遭打亂；新辦法中的甲種票圈選耗時，稍一不慎溢額即成廢票，乙種票則無異承認蔣中正的選舉中的絕對主導權。在蔣宣布選舉新制且強調不容反對的立場後，即將辦法逕付表決，並強行通過，嗣展開投票。大多數的選舉人仍採用乙種票付投，惟會場秩序不佳，部分情緒不快的選舉人以嘲諷的手法在選票上宣洩異議。投票日當晚八時，蔣中正假大會廣場宴請全體出席六大大會人員，然實際赴宴者不到半數，三青團的代表多數缺席！⁶³

二十日上午起開票，CC系操縱了會場，即使是大會推選的監票人也難以獲悉底蘊。⁶⁴

翌日晨開票作業始告完竣，真正的選舉結果可能永遠是個謎，其實亦無探究必要，因為由蔣中正親自調整核定後的正式當選名單旋在二十一日上午向大會公布，實則蔣個人意志的表現，未久，六大大會宣告閉幕。原有中央執監委員除張學良、楊虎城、盛世才……等少許人外，幾乎全獲連任；據程思遠的看法，新增委員實際上是CC系和陳誠均分，白崇禧也認為聯合陣營提高了陳誠向CC系的談判地位。⁶⁵新桂系上述所見並非無的放矢，但仍欠精準，正確的說，應是黃埔系、復興社的席位顯著提昇。本屆軍職人員當選比例甚高，學者李雲漢指出「當為抗戰之時代背景使然」；⁶⁶根據田弘茂引用的一份資料顯示，軍職人員在這屆的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裏共占九十二席，其中黃埔系即取得四十三個位子（學生系統：中執會二十三席，中監會十席，合計三十三席；教官系統：中執會九席，中監會一席，合計十席）田弘茂視此為黃埔系的政治影響力呈現穩健成長的例證。⁶⁷另一方面，復興社的席次也比

第五屆時多了一些，現在他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至少獲得二十個位子——儘管在三百一十二名中執委、候補中執委裏，這只能算是微弱的少數，但如果和第五屆中執會僅有的三席相較，成長率亦屬可觀。⁶⁶

聯合陣營方面也有個別收穫，例如政學系的吳鐵城除參與各派系對CC系的競爭外，並對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勢力多所掣肘，其後李雖當選，但粵省其餘新增名額幾全為吳鐵城囊括。⁶⁷整體而言，聯合陣營在中央執監委員席次問題上未必毫無所得，但或與各自的主觀願望存有相當程度的差距，且應選名額既經大幅擴增，價值所剩幾何亦足堪置疑；再者，CC系恃蔣而驕，在最後關頭冒出的選舉辦法上，蔣中正尤其展現強力的議事作風遂行通過，此特別招致了一般代表的不滿，對蔣仍抱敬意者指控CC系「為便利私圖，陷總裁於不利（義？）」，憤激人士則私下散播諷刺言論，「總裁獨裁，中正不正」的順口溜因而在會場上哄傳一時。⁶⁸這些因素加劇了國民黨內本已治絲益棼的派系歧見與政爭，對於蔣中正的政治道德形象也有負面的衝擊，至於七年以來江河日下的黨團關係更因這次CC系與復興社的當面交鋒而愈形低落。⁶⁹儘管以復興社為首的團方與黨內其他派系在六全大會上進行合作，顯見有參與黨內政治之意，但CC系與黨機器仍然密不可分，敵對的三青团既有組織之便，實難以在政治競爭中脫卸組織抗衡的色彩，是以黨團嫌隙終究難以泯除。就派系政治的角度來說，六全大會的過程與結局在在都對未來的黨團關係產生了嚴重不良的影響；同時應該注意

的是，現在即使連形式上，國民黨都已經喪失領導三青團的法源依據，面對即將到來的憲政時期，三青團該走向何方呢？

第二節 革新運動中的派系運作

長久以來，學界對於國民黨政權在中日戰爭後半時期的表現賦予相當程度的注意；在美國，自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以降，對此浸然已形成一股趨於負面的評價取向。這種評價根源多少與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後漸行漸遠的國共關係有關；一者由於戰事擴大後中美兩國利益愈見交錯，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中國境內政治的參與者，失望之情既深，責咎之詞愈烈；二者因爲戰時國共漸趨殊途，民主化問題躍爲口舌交鋒重點，執政的國民黨形象大失，此爲日後國共政權交替的重要政治背景，學者自難漠視。余英時即認爲，一九四九年的中國變局有其長遠的歷史背景，也有近期的原因，如果一定要追究責任，則最直接的責任當由國民黨承擔。國民黨雖師法蘇聯式的一黨專政，卻根本不具備專政的社會條件，執政以後完全沒有觸動既存的社會結構，因此，其控制從來只能及於政治表層，而不可能深入社會之中。^⑫此言可供學界反覆論辯之處仍多，然國民黨政權的「社會條件」並不充足，大抵亦爲事實。抗戰初期國民黨曾因民族危機而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支持，但是這種熱情很快就已消褪泰半——儘管還未全面消失。易勞逸發現，戰爭後期，國民黨政權無

論在精神或是在物質方面，都已處於衰退之局；災難性的通貨膨脹不已；軍隊狀況持續惡化；戰時的政府也面臨著如何合理分配稀少經濟資源的特殊問題，由於慣常的效率低落、官僚主義盛行、執行者的腐化墮落，以致到戰爭後期，政府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變成了政治上的負債，「官僚資本主義」之譏評不脛而走；易勞逸還從各方面分析了戰爭後期的政治衰微之象，並總結道：「重慶的國民政府發現自己陷入了似已難能挽回的惡化過程之中。」⁷⁵

的確，國民黨政權對於形象及權力基礎的流失同樣深感焦慮，早先被賦予國民革命新血輪身分的三青團尤其認為國家的危難既深且重，一些阻礙或是破壞抗戰的腐敗分子必須對此危局承擔完全的責任。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三青團中央發布〈為克服當前之困難與爭取最後之勝利對全體團員之指示〉，列舉六項團員當前任務，飭令一致遵行。在這份揭櫫「國家民族高於一切」信念的訓令中，具體臚列了三青團團員應該積極肅清的幾類對象，大體均與政治、經濟有關，如所謂民主人士、官僚主義、土豪劣紳、破壞經濟者等。⁷⁶地方團部對此訓令表示歡迎，如湖北支團部籌備處即認為自三青團成立三年來，對於「一些抗戰時期的滓渣，團都沒有明確和積極的行動，在鬥爭上，我們僅僅只做到了協助和附庸的地位，因此，我們工作的精神是相當地消沉了」，三青團中央頒發的六點指示則可謂適時之舉，「他（它）英勇的指出了我們鬥爭的路線，確定了我們鬥爭的對象，指示了我們許多直接的行動，這是我們全團同志三年來一個共同屬望的問題」，「也就「是」我們一點安慰，一件痛快的

事情」。^⑮

隨著不利於政權穩定的徵象逐漸加深，以及三青團本身的責任感與權力慾的累增，三青團也開始發表一些時局觀感之類接近政治主張的意見。在重慶，團方的高級幹部經常私下會商時局，討論的範圍相當廣泛，並且頗為坦率露骨，間有針對蔣中正的領導風格提出犬儒式的譏嘲、批判者。^⑯行政院長孔祥熙也是三青團議論臧否的主要對象，他在國民參政會中飽受抨擊為豪門之屬，嗣在三青團的青幹班上講話時力圖澄清，自謂從無中飽私囊情事，然而話音甫落，學員席中即傳出一陣陣尖刻的冷笑聲，這至少顯示出三青團的一些中下級幹部人才對孔祥熙不表認同。^⑰事實上，孔祥熙在整個三青團內所能獲得的支持率不會比在青幹班裏的一場講話來得更多。當時蔣中正聞悉三青團在昆明發起的倒孔運動中扮演重要領導角色，於是對書記長張治中親下手諭斥責三青團幹的是反革命工作，張治中閱後認蔣庇護縱容，當即請求辭卸三青團職務，未准。^⑱在一九四三年三青團的一全大會上，一部分地方代表延續年來的倒孔熱潮，嚴厲攻擊孔祥熙貪污無能等諸多謬行，強調其顯已不孚衆望云云。^⑲全代會閉幕後，張治中邀集各地幹部到重慶北溫泉數帆樓密議三天，這些三青團的地方核心分子一致認為國內財政經濟、社會人心、政治軍事等局面都已陷入極度可慮的境地，蔣中正的領導作風招致了與會者廣泛的抱怨；在某些人眼裏，揣摩上意成習的政學系也被視為政風敗壞的來源；關於孔祥熙的問題，衆人則咸認應予罷免，以肅政風，於是在會後聯名向蔣建議

「請速改組政府，將違背領袖意旨，不執行領袖所決定之政策，且已失衆望之大員，立即罷免」，矛頭實指向行政院及孔祥熙個人。⁸⁰

除了人事上的不同意見，三青團也提出了若干改革的構想，譬如在北溫泉會議後向蔣中正提出的建議書中，還要求儘速訂定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穩定物價等改善民生的切實可行辦法，並加緊實施；嚴厲處置貪官污吏；先期改革黨團軍隊，以作為改造政治、改革社會的根本要圖。⁸¹到目前為止，三青團紓解政權類局的計畫雖難稱深刻周詳，但其識見仍不無可取之處，並且，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一份送請蔣中正參閱的工作檢討報告中，三青團也替自己加入打擊腐敗勢力而請命，就他們看來，這種打擊行動必須要配合加強三青團的政治成份方能奏效，唯蔣中正不置可否。⁸²持續的呼聲出現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青團一屆三中全會的一份決議文裏，三青團呼籲政府應根據民生主義，考慮財經政策，徹底掃除官僚資本傾向，特別應從位高權重者著手嚴懲貪污，並賦予團員舉發的責任，以提高團的革命性。決議文最後更疾呼：「本團優劣勝負之所繫，即國家存敗興亡之所關，設或矇蔽事實，自欺欺人，諱疾忌醫，終成貽誤，何以對領袖？何以報國家？……振衰起敝，端在於此。」⁸³

三青團對政權的頹象深表忱憂，黨內同具強烈政治意識的CC系亦然。大約在一九四四年初或稍前，亦即國民黨政權疲態盡現之際，一些屬於CC系的國民黨幹部已開始尋求振興政治的途徑。當時視察五省地政後返回重慶未久，也是一位黨內著名地政農經專家的蕭錚，

日後回憶這個即將以「革新運動」之名聞世的誕生背景時說道，中國的實際國力的確是衰退了，農村也陷入崩潰的危機，以致他的視察之旅竟有「憑弔江南」的非常感受。這樣的客觀事實加上戰時盟友的美國對國民黨政權多所批評，令有心者頗為難堪；蕭錚特別對掌握財經大權的孔祥熙與翁文灝二人極表不滿，認為孔思想落伍，尤其怕聞土地改革，翁則能力薄弱，又乏決心，他強調如果「孔翁不去，政府不全盤革新，國家前途必甚可危」。⁶⁴

除了蕭錚之外，這些屬於CC系而經常集會的不滿分子還有余井塘、程天放、蕭吉珊、潘公展、谷正鼎、姚大海、賴璉、齊世英、胡健中、張強等人，蕭錚可能是其中態度最為激昂的幾個人之一。一九四四年四月，國民黨正在籌備五屆十二中全會，這群人也加快步伐以保證形成一場所謂的運動。為了擴大政治基礎，他們首先爭取到和孫科或胡漢民方面極富淵源的梁寒操、馬超俊、黃季陸的支持，然後，在全會開幕前夕，他們又形成了一個如易勞逸所稱「似未可信的聯盟」(an improbable alliance)，以尋求「黃復青」勢力的同情與支持。五月十九日，由徐恩曾、潘公展、葉秀峰出面，邀集了幾名「黃復青」重要分子同CC系方面餐叙，出席者包括賀衷寒、鄭介民、蕭贊育、康澤、唐縱、張鎮和CC系的蕭錚、程天放、張道藩、余井塘等人。會談的氣氛頗佳，康澤對時局的看法及贊成黨政全盤革新的立場，尤其令蕭錚興起「士隔三日，刮目相看」的觀感。在這場夜談裏，年來不復得蔣中正充分信任的康澤至為激越，指出蔣之領導方式應有所變革；潘公展在與會者口徑一致的改革聲中

，提議在場的兩個陣營必須合作，張道藩接著以更強烈的發言增強了潘的訴求。⁶⁵

這樣的一種組合確實讓人驚訝於政海的詭譎多變。自從黃埔系建立了復興社組織，並接著透過下層基礎更為龐大的三青團而樹立起「黃復青」一方不容輕視的政治地位後，原則上與CC系的衝突只有增劇而無可能緩和；同時，正如第二節所述，五屆十二中全會其實也存在著另一條的反對路線，即諸派系要人相約不選陳立夫為常委一事，具備三青團書記長身分的張治中與焉。現在，在同一個會場幕後，三青團的負責人和高級幹部分別對CC系的領導人及重要分子同時進行了杯葛與合作！可以說，隨著政治經驗與實力的累積，作為國民黨政權重要派系的三青團已逐漸懂得展現靈活的政治手腕，並在縱橫捭闔的過程裏求取最大的利益。事實上，三青團與CC系對國民黨政權的頹象同樣深感焦慮，也一致認為必須力謀更張國內政治，但是他們似乎對自己在政權躑躅的戰時統治過程中所應負起的政治責任給予了過多的寬容或忽視，相反的，一些憑藉姻親關係而起的政治豪門與所謂彘緣倖進的官僚卻成了他們有限範圍內的最大共識：彼輩必須對黨的形象、權力基礎的流失承擔代價。

儘管如此，CC系尋求合作一事早先仍然分別在三青團與CC系內部引起普遍的疑慮。畢竟在三青團看來，作為黨務主流派別的CC系理當也要為黨的衰弱負起責任，並且雙方積怨已深，對這項由CC系發起的政治運動實不無戒心。最後，依據現有的資料表明，至少兩個（最保守的估計）和CC系成員略具交情淵源的前復興社分子對猶豫的三青團同僚起了重要

的勸導或觸媒作用，即中央幹事黃宇人、中央監察蕭贊育。⁸⁶另一方面，像蕭吉珊等CC系分子是堅決反對三青團參與政治的，因此也就避免把它視爲一支合法的政治力量，至於賴璉、蕭錚、余井塘這些人則採行現實取向——並且得以成爲CC系在這場政治運動中的政策路線——認爲三青團已經涉入政治，因此也可以試著一起合作。⁸⁷

在CC系分子的積極串連下，二十日起舉行的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成了黨內革新分子宣洩塊壘的場合，二十一日上午檢討黨務，批評聲浪盈滿會場，蔣中正也在下午邀請了包括方覺慧、賴璉、蕭錚在內的幾位主張改革者交換有關意見。然而，以CC系爲主軸的這場政治運動，在首度出擊的十二中全會裏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對CC系而言，陳果夫取代朱家驊出任中央組織部長一事可能是這次僅有的人事勝利。⁸⁸緊接著，在一九四四年剩餘的日子和一九四五年初，革新分子加強喚起改革的世論，這時的社會氣氛也愈發適合改革思潮的伸展，經濟狀況的惡化與日軍一號作戰所造成的災難性失敗，使得各派都堅信改革的需要迫在眉睫了。⁸⁹一九四五年五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全大會就體現了這麼一種特殊的景觀：一方面它是黨內派系惡性爭奪中央執行、監察委員等權力資源的競賽場域，一方面又是各派系痛陳黨腐化無能、人謀不臧，與宗派觀念過重的清議論壇。⁹⁰會場上的檢討聲浪不斷，三青團以書記長張治中爲首，合計七十一人共同向大會提出了〈對本黨政策之建議案〉，全文分爲外交、軍事、內政、經濟、教育五項，凡三十六條，民主的觀念貫穿全案，三青團再度呼籲嚴

懲貪污，實施廉能政治；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方案具有不輕的社會經濟色彩，以致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向張治中笑指該案要能實行的話，那麼國民黨在政治上就將變成左派了。^①

很明顯，國民黨內普遍認為黨與政權正處於關鍵的時刻。然而在一片黨同伐異的指責聲中，令人不禁懷疑，發言者若不是缺少自省的勇氣與認識，就是帶有某種權力鬥爭的動機。中日戰爭結束後的動盪政局足以支撐上述懷疑的合理性。除了各方一致抨擊的官僚資本主義之外，革新分子另一攻擊目標為政學系成員。一九三〇年代前半葉，政學系曾在楊永泰等人的經營下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復興社在一些省分也曾倚勢借力與CC系相抗；戰時政學系仍穩健發展，並自一九四三年蔣中正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後，開始積極串連，一九四四年政學系且有建立組織之意，政治企圖不言而喻。在一九四五年的國民黨六大大會中，包括三青團與政學系在內幾個重要派系所組成的聯合陣營曾經對CC系構成莫大壓力，他們平日論及時事語多批判，認為國民黨的危機在於內部，衆矢之的則為控制黨部及教育等部門的CC系、掌握財經的孔祥熙，與主管軍事的何應欽等。^②然而三青團和政學系之間亦非全無矛盾存在，一般而言，政學系成員易被黨內政治意識強烈的人貶斥為夤緣倖進毫無原則的政客官僚，CC系向來正是以「忠實黨員」此慣用封號將自己的純度與政學系區隔開來，一些三青團團員同樣看輕政學系分子的政治風骨；另外，戰後政學系急速膨脹的局面當也有損黨內派系的平衡生態，三青團的實質利益自然同受波及。凡此種種，均為橫梗在三青團及政學系之間的

負面因素。⁹³

這種心理及實質利益的距離，也成了三青團寄身革新集團的原因之一。在很大的程度上，三青團對政學系的異議是通過各類抵制中共的政治行動而間接表達。溯自中日戰爭後期開始，主張對中共問題採取政治途徑解決的政學系就已成為蔣中正處理國共談判事宜的重要倚石，因此，戰時即致力打擊所謂「奸黨」的三青團，在戰後抵制中共的行動上，不僅延續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同時也可以被視為對政學系的間接打擊。⁹⁴易勞逸認為，使革新集團的運動真正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事件，還是要屬一九四六年一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研究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連性的學者林能士指出，經由蔣中正的授權，政學系代表在這項中外矚目的跨黨派會議中主導了國民黨方面的立場。為達成協議，國民黨勢需多所讓步，但這為黨內強硬分子所不許，其中五五憲法草案修正案尤其引發黨內的反對聲浪，CC系抨擊尤烈。⁹⁵很快的，國民黨內的歧見和許多中國人視協議如和平曙光的願望產生嚴重的落差，並且迅即在許多黨外的公開場合暴露開來，二月十日的較場口事件正是該背景下的產物。親中共人士在當日（星期天）假重慶著名的集會廣場聚眾慶祝政協會議成功，詎料會中發生群毆事件，責任歸屬當時國共殊詞，現在依據國民黨與三青團當事人的回憶及內部會議紀錄證明，陳立夫下達「民衆對民衆」的指示方針，由誼屬CC系的重慶市黨部主委方治操縱了事件的發展，經過方治事前的照會，重慶支團部也動員本身厚實的組織基礎加入這場騷動，黨

團同為重要涉事分子。⁹⁶

較場口事件震動中外視聽，二月二十二日重慶學生繼之舉行反蘇聯示威遊行，黨部團部的操縱色彩濃厚，行進間並發生《新華日報》社被搗案，凡此均為中共及其親近勢力的受挫事例。極力促成國共和平的美國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指責CC系與黃埔系為「國民黨方面對於政協決議案實施之障礙」，月來諸多事件皆「使人深信國民黨中有若干不合作份子，反對政協之意圖，殊為可慮」。政情發展對政學系自是一大打擊，對中共傾向妥協、對蘇聯不惜遷就的政學系亦非不知黨團的作為，較場口事發翌日，政協會議國民黨代表之一的王世杰在日記裏悲觀的寫道：「黨派問題於此又趨破裂。」二十二日重慶遊行事前，王世杰曾力請蔣中正電陳立夫等勸止，結果仍未能遏阻，王至表焦慮。凡此俱可顯示政學系對時局的鬱結之情。⁹⁷

革新集團一方面對政協決議作出各種干預行動，相對的，此舉也更加刺激了集團本身借改革之名行之的政治運動。政協會議結束後不久，梁寒操、蕭錚和革新集團其他要角在中央黨部舉行一次公開的革新座談會，先前的座談會只吸引大約十個人參加，這次卻超過了一百人。隨後在二月與三月初舉行的四場座談會上，出席人數有時候更超過一百五十人。很明顯的，這是因為許多國民黨人對政協決議感到憤慨的緣故。大多數的與會者來自國民黨政權各領導機構的成員，如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立法院、監察院、三青團的中央幹事會，與國民

參政會等。⁹⁸這些座談會顯示革新分子真正開展了組織性的活動，座談會本身也成了革新集團的組織名稱：「陪都黨改革新運動座談會」（簡稱陪都座談會）。在二月二十七日的座談會上，革新集團通過一份題為〈我們的呼聲〉的政策性聲明，用以宣告該運動的主要目標。這份文件嚴厲譴責了隨處可見的官僚主義、派系主義，並將之視為國民黨的兩大致命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革新集團對「派系主義之為崇」表達了更為痛心的態度，他們指出，在此情況下，有為有守之士唯有短氣灰心而已，革新集團接著斷言問道：「黨的生機，安得不為之窒息？」⁹⁹

革新集團對國民黨的諍言具有濃厚的「反省」而非「自省」的色彩，事實上，該運動的組合原本就是橫跨若干派系運作的結果，現在，作為一份最重要的政策性聲明，〈我們的呼聲〉規避了這些派系分子以往在「派系主義之為崇」裏所扮演的角色問題。也許革新分子的評說範圍不及於己，從某種角度說，革新集團的跨派系組合可能也正好讓他們自認已經彰顯了運動本質的純潔性，使得革新分子能夠勇於指摘黨內的派系流毒而不己。然而，這種清議式的言論終究有其批判對象，加上疏於罪己的結果，遂仍難脫黨同伐異的嫌疑。三月一日，即距〈我們的呼聲〉發表後僅兩天，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開幕，依照易勞逸略帶誇張但輪廓不失真實的評語，革新集團使會議陷入了騷動的局面（*threw the meetings into an uproar*）。一方面，他們要求改革，並猛烈批評幾近全面的黨政作為，譬如從官僚資本主義的

流弊到土地改革的失敗，從政權的官僚主義積習到外交政策等。另一方面，他們也攻擊政協決議，梁寒操及余井塘提出一份加上三十二名其他革新成員連署的聲明，要求完全拒絕這些決議；隨後，另外一百一十名代表提出類似的要求。^⑩在整個會議進行期間，至少有下列黨政官員遭到直指人身的強烈抨擊甚或罷免的動議：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經濟部長翁文灝、財政部長俞鴻鈞，重慶市街且廣佈「打倒張群」標語，東北人士團體向大會請願要求懲辦熊式輝，出席大會者私下接獲攻擊陳儀治台之黑函。^⑪總之，政學系要員盡成怨望所集，宋子文則被視為官僚資本主義的又一化身。

長久以來，蔣中正慣於用國民黨已深陷官僚衙門境地的話語來勗勉黨人洗刷陋習，並重振革命精神；三青團曾經被蔣昇以厚望，但是不久後蔣也用同樣的批評要求三青團覺醒。然而，在革新集團看來，其實政學系才應該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傾向負起最大責任，並且，蔣中正知人用人的作風也令他們私下不敢苟同。隨著戰後政局演變，蔣對政學系的倚賴不減反增，在政學系應付中共與蘇聯的相關問題上，革新集團眼見黨與國家的主權尊嚴正逐步流失，咸認應設法挽救，於是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聲明當中，陪都座談會就曾呼籲「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發揚民族正氣，保衛國家主權」，而「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一項亦在喚起之列。爲了確保這些政見能夠遂行，陪都座談會認爲首需注意「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⑫職是之故，接踵而來的二中全會成爲革新集團推動「黨內民主」的首

要場合。在三月十一日的總理紀念週上，蔣中正承認「上一週各位對於黨務和國事的檢討，態度的激昂和發言的熱烈，實為歷屆全會之所未有」，然而，他對黨人之間猜忌攻訐、喪失互信的行爲至表痛心：

但是我們對於如何恢復本黨革命的精神，完成本黨革命的任務，如果沒有根本的認識和切實的計劃，而徒然憤慨不平，又何補於實際？我們革命黨要能歷久彌新，最重要的就是要發揚黨德。而黨德之所由發現，即在同志之間必須建立共信和互信。我今天沉痛的告訴各位：這幾年來我們同志之間的互信實在一天低落一天，到了這次二中全会，由於這幾天會場的表現，可以說我們黨內的互信完全喪失了！⁽¹⁰⁾

蔣中正在這篇題爲〈革新黨務之要道〉的講詞裏接著警告：「同志間沒有互信，就一定不能親愛精誠，而發生種種猜忌和攻訐，如此，縱令我們個人的良心血性發現（表現）得如何激昂慷慨，但我們的意志不能集中，共同的力量是無由表現，其結果就沒有不失敗的。」他要求每一個黨員徹底滌除本身根本的病根，「由我們個人的革新，而促成全黨的革新」，其意在提醒革新集團「反求諸己」。⁽¹¹⁾然而道德訴求終無能羈縻，十三日晚間，蔣中正約集二中全会主席團和政協會議國民黨代表會商，可能爲了尋求某種妥協，蔣中正答應革新集團所堅持的中央常務委員由票選方式產生。⁽¹²⁾

僅僅不到一年前的國民黨六大全會上，CC系爲了消解聯合陣營的龐大壓力，曾糾合了

三百人聲稱願將中央執監委員的選舉權奉獻給總裁，三青團聞訊表示異議。現在，CC系主導的革新運動在黨內民主的議題上倒是走向了三青團這一邊，原因仍在於有組織為票選後盾，而聯合陣營形同明日黃花之故；同時，藉由黨內民主的推行，當能對蔣中正的領導威權給予適度限制，使政學系的權力來源無可憑恃，即黃宇人所謂「阻止官僚政客『走私』」之意。¹⁰⁶票選中常委結果，革新集團大有斬獲，親炙CC系的運動中堅分子梁寒操、賴璉、蕭錚……等人均新預其中，CC系在常會的地位更加鞏固；以「黃復青」勢力為骨幹的三青團團方亦有六人上榜，除陳誠、張治中為原任中常委之外，賀衷寒、劉健群、鄧文儀、柳克述四人亦列名在內，六人合占中常會六分之一陣容，已是三青團在國民黨內前所未有的勝利。¹⁰⁷飽受抨擊的政學系仍只有吳鐵城一人在榜，同僚不免自酸，王世杰日記且云：「有衆多資望能力薄弱之委員，趨附黨中所謂CC派者，均當選。黨內黨外均不免失望。」其話鋒所指，厥為上述獲選中常委的革新集團新進分子。¹⁰⁸

關於黨內民主問題，蔣中正曾對革新集團的代表余井塘、梁寒操、黃宇人等重申國民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權制，主張民主固無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權。同時，革新集團在二中全会內對政學系與宋子文的攻擊，實則間接形成了對蔣中正威權的挑戰，因為無論是各類政治事務或者是最近的政協決議，蔣仍是那些被抨擊者最終的權力來源，而且由於政協決議中外矚目，革新集團在黨內的干預舉動事實上已成蔣的莫大困擾。十一日，蔣已公開暗

示革新分子宜自我約束，到了二中全會十七日閉幕當天，黃宇人於會上指摘大會宣言欠缺革命性，主事起草的陳布雷悲忿至於痛哭。翌日，蔣中正任總理紀念週上，以極其嚴厲、冗長的話語怒斥黃宇人與革新集團，指黃雖主張革新，實亦官僚，革新集團的目的只在攫取中常委云云，言下甚為憤慨，對革新運動的權謀動機與作爲之不滿顯已表露無遺。¹⁰⁰

爲了著意強調革新運動的純質與實踐性格，陪都座談會在四月十二日通過的一份暫行綱領中，將「革新先從我起」列爲每一個國民黨與三青團成員應該熱烈參與的七大急待展開的運動之一。這份文件具有臨時組織章程的意味，陸續在首都及各地成立的黨政革新運動座談會將是推廣工作的實質機構，各座談會擁有幹部、事務組織與研究單位，並對認同革新運動的黨員團員表達了歡迎加入的願望。接著，革新集團也出版各類定期刊物與宣傳小冊，裏面充斥著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批判言論。¹⁰¹

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爲止，革新運動仍然是國民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這年的三月一日，行政院長宋子文在他的財政政策導致了一月和二月初的黃金風潮後黯然下台。三月十五日起在南京舉行的六屆三中全會上，以孔宋爲代表的所謂豪門與政學系爲代表的所謂官僚主義繼續受到抨擊。即就政學系而言，西康自去年底起掀起大規模民變，親政學系的西康省主席劉文輝成爲衆矢之的；政學系要員陳儀主政下的台灣甫於三中全會開幕前爆發全島性動亂，史稱「二二八事件」；對蘇外交失敗及東北問題亦廣受注目，總

之，主事的政學系所受沉重壓力實不亞於去年在重慶舉行的二中全会。⑩

然而，儘管革新運動仍舊擁有可觀的清議火力，但在三中全會以後，這項運動消褪了。在南京發行的代表性期刊《革新週刊》於八月停止出版，研究革新運動的易勞逸分析說，這可能顯示一項具有政治影響力的運動已經結束，或至少是各派聯盟的告終。他推測其原因可能是成員眼見運動欠缺具體成果而感到失望，包括蔣中正並未給予該運動深刻的同情，例如在四月，蔣提名了政學系裏的最著名成員張群繼宋子文後擔任行政院長一職。唯根據易勞逸多年後在台北進行的口述訪問及蕭錚回憶錄指出（這表示可以反映出一些當事人的見解），運動消失的一個最明顯原因是三青团與CC系之間日益升高的敵意。先是基於現實的考慮，三青团與CC系嘗試進行合作，不過兩派既往的長期競爭使得革新運動一開始就注定難能穩固，同一時期內，在兩派有限的利益交集範圍之外，衝突仍然不斷，前述一九四四年的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一九四五年六大會，以及即將討論到的一九四六年間各地參議會選舉同三青团的組黨風潮均足以說明這種合作局面始終就不是兩派互相對待的全貌，一九四七年以後的選舉人事糾紛更讓兩派在中央與地方的衝突益熾，蕭錚憶指革新運動終不敵「私心」，在易勞逸的訪談中，一些當事人也悲嘆該運動就這樣成為宗派主義下的犧牲品而消殞了。⑪

不過，就派系政治而言，三青团的確已經藉著自我實力累積與廣泛不拘於一格的派系結盟行為，愈加強化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及籌碼，並且逐漸形成對這種地位要求給予實質承認的巨大

呼聲，一九四六年九月召開的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即足以體現這股來自團方的政潮。

註釋

①《團史資料》，頁一〇四。根據三青團中央團部編印的《團員須知》所載，三青團的組織精神有三，即民主化、集權化、軍事化。所謂民主化，係指「個人服從團體，少數服從多數」，採用選舉制度產生各級幹部，同時，在團之內，職務縱有高下，紀律一律平等；所謂集權化，即「下級服從上級，全團服從團長」，編者強調，「集權並不與民主相反，卻與民主相成。各級組織都由選舉而來，既集權而又民主，所以叫做民主集權」，見《團員須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版，頁一五一—一六；一九四二年七月版，頁四。並見：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支部（編），《團務建設大綱》，頁二一。至於國民黨的民主集權制要到一九四五年黨六大會修正總章時才增訂納入，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集》「革命文獻第七〇輯」，頁一三六，一五〇，參見：頁一八〇。

②《團史資料》，頁一〇九。

③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實》（重慶：民國三十三年），頁二—四，以下簡稱《團一全紀實》。

④參見：Spiker,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 241.

⑤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00-101.

- ⑥ 〈團一全紀實〉，頁四；〈團史資料〉，頁三五七；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傳記文學〉，第六八卷第二期（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二月），頁一〇九。各地團員代表大會內部的選舉過程有涉及權位爭執的情事，重慶支團的例子見：羅才榮，〈懷念包華國陳介生兩先生〉，〈才榮文稿〉（台北：川康渝文物館，民國七十二年），頁七〇—七一，與〈交接革命的火炬〉，〈才榮文稿〉，續二，頁一九—二〇；廣東支團：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一冊，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五日—二月二十七日，頁四一〇—四一二；江西支團：蔡省三、曹雲霞（合著），〈蔣經國系史話〉，頁五四—五七；湖北支團：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二二七。

⑦ 〈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一一三—一一四。

- ⑧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一九四三年，頁六一，以下簡稱〈團一全紀錄〉；〈團一全紀實〉，頁二九—三二；〈團史資料〉，頁三五七—三五八。

⑨ 蔣中正，〈本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團一全紀錄〉，頁一一八。

- ⑩ 蔣中正，〈青年團之職責與當前急務〉，〈團一全紀錄〉，頁一〇—一一，一三一—一四。這一次大規模的總理紀念週計到八百餘人，含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各院部會首長，中央執、監委，黨政訓練班、國防研究院學員，及團一全大會全體參加人員等，〈團一全紀錄〉，頁六三；據〈團史資料〉記載，

「一時冠蓋雲集，英才薈萃，情緒莊嚴熱烈，為一般集會所罕見」，頁三五八—三五九。

① 蔣中正，〈本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團一全紀錄》，頁二八一—二九。

② 關於「團的前途」的〈自由討論紀錄〉，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紀錄〉，收入〈團一全紀錄〉，頁三三九—三四四。

③ 〈大會前奏曲——兩次代表座談會散記〉，《大會日刊》，第一號（重慶：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浙江支團部提，〈健全組織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一冊，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頁一。

④ 〈我對學校團務的意見〉，魯冀參的意見全文，《大會日刊》，第一四號（重慶：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魯冀參於團一全大會中獲選為中央候補監察。

⑤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報告〉，一九四三年九月，頁一四—一五。

⑥ 〈出席代表黨籍統計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製，〈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人員名冊〉，「二」七二八／〇〇六，頁七一。〈團史資料〉則稱選出的大會出席代表有三百二十一人，具黨籍者二百四十八人，頁四四一。

⑦ 陳敦正，〈動亂的回憶〉，頁八二；參見易勞逸的看法：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1.

⑧ 陶百川，〈困勉強捐八十年〉（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三年），頁一六九，二四五—二四七；〈「這一代比上一代更好」〉，重慶《中央日報》，社論，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關於戴傳賢

在團一全大會上的講話：重慶《中央日報》，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團一全紀錄》，頁六二。

⑮ 陶百川，〈困勉強捐八十年〉，頁二四六—二四九；第二四〇次會議，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〇九五。該社論係由中央宣傳部所設黨報社論委員會撰寫，該會每周頒發社論二至四篇，經中央宣傳部長核定後，分電全國黨報一體遵登，陶百川只有照登的義務，〈修正中央宣傳部黨報社論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二三次會議，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〇一七。事發時的中央宣傳部長為張道藩，CC系分子，亦為三青團中央幹事。陶百川憶稱該事件為「一陣怪風」，「頗能反映當時黨團暗鬥之激烈」，事後他即「隨風而逝」，意指促成其脫離黨工核心的生涯。一九八一年，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向國民黨十二全大會提名陶百川為中央評議委員，獲大會通過，陶自稱「枯木生花」。

⑯ 復興社分子陳敦正時任大會決議案整理委員會秘書，所謂「有力的支持」者，至少可能是當時擔任大會秘書長的康澤。陳敦正認為表決時「創辦說」的勝利顯示「黨方佔了上風」，易勞逸則圓融的據此解釋說陳敦正對CC系力量的評估只適用於團一全大會內，在三青團的一般成員中，團方，或者是親復興社的陣營繼續維持著優勢：陳敦正，〈動亂的回憶〉，頁八二；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1. 事實上，CC系在團一全大會中沒有占據多數席位，關於表決的結果不宜將之解釋為CC系勢力占了優勢，而毋寧應該放在更為複雜、更多派系間的角度政治來觀察。無論如何，關於此案最後在大會的命運，仍然由康澤一支的派別取得支配權；弔詭的是，在江西會與康澤勢力有過政治競爭的蔣

經國，隨後取得由青幹班（康澤勢力範圍）所擴充而成的中央幹部學校的控制權，見第四章第一節。

①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三七。

② 張治中，〈本團四年來工作總檢討〉，〈團一全紀錄〉，頁四八—四九；參見：頁六六。關於〈本文〉，又見〈團史資料〉，頁四〇—四一。

③ 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四—六六；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十二日，頁六七二；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〇九—一一〇；〈團一全紀錄〉，頁六六，一九二—一九四。資料顯示投票過程受到控制，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四冊，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頁五四—五五。謝然之晚年回憶蔣經國在這次全代會中獲得中央幹事第一高票，不確，當時擔任監選人員的竺可楨有日記為證，謝然之，〈從馬家寺到復興關——回憶經國先生創辦中央幹校的往事用以紀念他逝世一周年〉，〈傳記文學〉，第五四卷第一期（台北：民國七十八年一月），頁一七。事實上，謝然之該文有關全代會出席人數幾乎誇大了近三倍，蔣經國發表開幕詞一事也錯了。

④ 嚴格來說，可能只有八名左右，因為這時的段錫朋與張厲生對CC系的認同感已大不如前，相反的，他們對陳誠的忠誠度可能要高一些。

⑤ 經蔣中正指定的十五名中央常務幹事為：張治中、陳立夫、朱家驊、張厲生、段錫朋、梁寒操、谷正綱、王東原、賀衷寒、何浩若、張道藩、劉健群、倪文亞、袁守謙、黃宇人。其後倪文亞、王東原、

黃宇人三席出缺，改以蔣經國、柳克述、任卓宣接替。〈團史資料〉，頁七七。

26 〈團一全紀錄〉，頁三五—；〈團史資料〉，頁八六。中央常務幹事監察與各單位主管名單由蔣中正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一次聯席會議閉幕典禮上宣布。各處會主管至一九四六年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調動頻繁，其中，倪文亞接替為組織處處長，上官業佑、湯如炎、胡長怡先後接任組織處副處長，王文俊接替為訓練處處長，余拯接任訓練處副處長，復興社績占優勢。

27 〈團一全紀實〉，頁四六；〈團史資料〉，頁一八，二二五。

28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二冊，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頁六七二；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六五；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五六一。宣言全文，見〈團一全紀錄〉，頁三七—四二；〈團史資料〉，頁三九五—四〇二；〈抗戰時期之青年活動（一）〉〔革命文獻第六二輯〕，頁一五七—一六五。

29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頁三一四；第二七四次會議，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二九九。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即國民黨黨史所謂革命政府紀念日。

30 根據一九四三年美國駐華使館的報告，CC系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擁有二十三個席位，Spiker,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 235. 筆者認為還要稍多一

些，從名單上看來，三十名是保守的估計。田弘茂徵引日本方面的資料指出，與CC系有密切關係者約有五十名。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 50.

③齊錫生試圖對戰時國民黨內盛行的派系主義提供一個結構性的解釋方向，見：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 205-207.

④諾斯、普爾(North and Pool)視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權力所在，齊錫生對此有不同意見，他認為若從形式和結構著眼，這樣的說法理由充分，但在實際運作上往往未必如此。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 214-217. 筆者傾向齊錫生的意見，然而，不能忽視中執會仍然具有政策辯論的功能；就黨內派系競爭的角度而言，也是形成黨內輿情聲浪用以施加政治壓力的絕佳場合；如果依照齊錫生所說，戰時派系政爭因為資源緊縮而變得更加尖銳，則中執會恰好更是寸土必爭之地，何況在國民黨的總章中仍有其崇隆地位。也正是這樣，六全大會才有中央執行、監察委員席次的爭奪問題。

⑤《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二一三；《中央團部各時期各單位歷任主管人員一覽表》，《團史資料》，附錄二；《朱家驊簽辭黨政訓練班暨青年團職務呈》，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黨」特〇二七／四〇。

⑥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二五二；大小，《關於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諸派系的若干考察》，頁二八。Spiker,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 237; "China: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Chungking, Feb. 14, 1944, in *The Amerasia*

Papers, Vol. 1, p. 359.

³⁵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五）〉，頁一〇三—一〇四；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五六；Spiker,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 233; "China: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p. 359; "Chu Chia-hua Removed from Post," June 5, 1944, in *The Amerasia Papers*, Vol. 1, p. 527. 朱家驊的職務調動，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頁四一五；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一三七—一四〇。朱家驊與CC系的親善、交惡過程：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頁二五四；劉恭，〈我所知道的中統〉，〈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長沙：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二二—二一五；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五九八—六〇四；范小方，〈二陳和CC〉，頁二四—二四四；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二五—二六一；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台北：新銳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頁三四—三五，七六—七七，八五—八六，一四四—一四六。基本上，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期間，中央組織部幾乎多為CC系掌握，其中曾任部長的張厲生、朱家驊，一投陳誠，一自立門戶，算是CC系內部的重大波折。

³⁶根據一九三九年七月首度修正的團章規定，中央監察會的職權為：一、監察團務進行；二、檢舉並審議幹部及團員違反紀律事件；三、稽核全團決算及經費收支；四、指揮下級監察工作。王世杰對三青

團事「不甚感興趣」，可能是因為中央監察會所能發揮功能的空間不大，王世杰自認「少所貢獻」的緣故，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四冊，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十五日，頁四八—四九，五七。

37 何廉（原作），〈簡述國民黨的派系〉，頁八九—九〇。這些政學系成員甚至為計畫中的組織捐獻基金。關於政學系建立組織的計畫未能實現的原因仍不清楚。

38 更詳細的情節，參見：蘇民，〈新桂系與CC在安徽的矛盾和鬥爭〉，〈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長沙：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一五六—一七八；曾佩涵，〈新桂系在皖南及其與蔣介石嫡系的矛盾〉，〈安徽文史資料〉，第一七輯（合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頁一三七—一六四；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三五六—三六三。新桂系即使連縣長長的派任問題也對CC系甚為敷衍，立場較接近CC的省府、省黨部委員蘇民曾質問過李品仙：「為什麼軍統和三青團的人都可以用，而對黨部的人，這樣苛刻？」李答稱：「他們不想爭奪政權！」

39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四冊，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頁三一八—三二九。

40 參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頁五；第二七二次會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附件，〈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二九三；陳果夫，〈陳果夫先生民國二十五年至四十年日記摘錄〉，收入：徐詠平，〈陳果夫傳〉（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七年），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日，頁九二三，九二六；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四冊，一九四

四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頁三一九—三二〇；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二；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二五七，二八七；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六〇三；馬五先生，〈我的生活史〉（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五十四年），頁一二四；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一四〇；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六二四，六三〇。爲掌握各院校教職員黨籍團籍，教育部長陳立夫曾製發調查表格，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以該部名義訓令各院校限期填報，十一月六日再度飭速呈報。不過不久後，朱家驊即轉掌教育部，若干晚到的「情報」回到了朱的手上。各級學校教職員黨團籍調查，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黨」特〇〇三／三。

① 第二七四次會議，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二二九九。

②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十七，二十二日，頁八，一二，一五；第二七五次會議，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三〇三。六全大會有關事宜審議委員會除了八日中常會原推舉的葉楚傖等七人之外，還添上二十二日加推的張繼、張治中、潘公展、段錫朋、陳慶雲、朱家驊、熊式輝、王子壯、甘乃光、王世杰、谷正綱、梁寒操、余井塘、洪蘭友等十四人。王世杰原爲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遞補爲中央監察委員（當時他才剛在同年九月起擔任三青團中央監察會書記長一職，事僅兩月餘之隔）。據康澤回憶，他在蔣中正邀集三青團中央幹部共餐的一個場合中，向蔣爭取三青團成員出席六全大會的權利，蔣原則同意

，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二。

⑬ 第二七六、二七七次會議，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二月五日，〈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三〇六，一三一四；〈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常務幹事監察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朱家驊先生檔案，以下縮寫爲「近朱」。關於〈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組織法〉、〈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法〉、〈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表〉，以及〈三民主義青年團出席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法〉、〈三民主義青年團出席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表〉，見〈五屆中常會紀錄〉，頁一三〇七—一三一一，一三一七—一三一八；〈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紀錄〉，一九四五年五月，大憲法規頁九—二八，「二」七—一（五）／一五五，以下簡稱〈黨六全紀錄〉。三青團六十名配額中，中央占四分之一，即十五名；地方、學校、海外、女團員等占四分之三，即四十五名。

⑭ 〈團長開幕訓詞〉，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五年四月，頁六一七，「黨」五一九／四一。又見〈本團一屆三中全會團長開幕訓詞〉，〈團史資料〉，頁二〇五—二〇六。蔣中正正在講話中並且要求三青團改正兩個根本的缺點，一爲無法運用外圍力量，不講求工作技術；二爲無法吸收全國優秀的青年，厲行選拔與考核。他並引西南聯大的學生自治會由「一般反動派」操縱爲例，指責三青團雖有組織、有政府爲後盾、可以公開活動，反而不能當選、不能掌握，他說：「這是我們所應該引爲最大的恥辱！」蔣中正批評的言論在這篇訓

詞中占了絕大篇幅，由此可見蔣於一九三九年起對三青團的指正與批評仍舊持續著，現在他對團務表現仍不能滿意，他沉痛的表示：「今天我們大多數的黨員和團員的責任感和廉恥觀念是薄弱到了極點了！……我們黨員團員的心理，因循麻木到了這種程度，真是本黨本團最大的危機，也是本團長平生最痛心的一件事！」（《團史資料》，頁二〇〇—二〇五）。

45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三次聯席會議紀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附錄，頁一一九。

46 其餘四十五名地方、學校團部與海外、女青年代表業已先行選出，同前註，頁二二一。

47 同前註，頁一一九—一二一；（《團史資料》，頁三三四；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頁一九六；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頁七三。聯席會議原選出十五名代表及十名候補代表的名單與票數，及經蔣中正核定更動後的名單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附錄，頁一二〇—一二一；這份名單在黨六大大會上又稍有變動，見〈黨六大全紀錄〉，出席大會名單頁五〇。

48 參見：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三。四川省的李天民，江西省的蔣經國，甘肅省的胡維藩，重慶市的陳介生、包華國、陳逸雲，山東省的臧元駿……等人都是團方躋入省市黨部出席代表名單的例子。黨六大大會代表名單（含三青團部分）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冊〉，一九四五年，孫逸仙博士圖書館藏，〇〇六·三一六／八〇四；〈出席大會

名單》，《黨六全紀錄》。

④例如三青团差點受阻於國民黨的六全大會之外，軍人亦然。軍隊黨部向來不受CC系控制，據說六全大會前，CC系會傳言值此時局緊張之際，軍人不應離開職務云云，結果遭致反彈，康澤曾指稱軍人絕對可以來渝參加，且席位當會比任何方面多云云，最後軍隊黨部獲得一百一十個代表席位，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編印），《黨派情報》，第一六六五號（重慶：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四日），頁一。「二」七二六／二一〇。另外，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王世杰曾向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抗議「組織部處長秘書無一不被選出或指定為代表；中央宣傳部之秘書處長無一被選或被指定之人」，王世杰稱「予實不勝憤愧」；對於六全大會上的中央執監委員選舉方式，王世杰等人和陳立夫也有「無記名投票」與「記名投票」的歧見，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頁一二，七六，八二—八三。

⑤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八日，五月一日，頁七〇，七九；唐縱的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十八日，四月二十一日，頁四八六—四八七，五〇四；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改造」之歷史意義與時代使命》，均收入《才榮文稿》，續二，頁二八—二九，一〇三；程思遠，《政海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一七七；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四；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二五七：East.

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1. 關於參與聯合陣營的派系領導人，羅才榮記得似乎還有孫科，但羅不能確定，筆者在引其他資料中也沒有再看到孫科的名字。對這一點，康澤回憶文獻的措辭並不明確，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三—一一五。事實上孫科派在國民黨六大會代表的產生過程中也甚受排擠，在大會上所能掌握的人數至為有限，就算孫科會加入該聯合陣營，似仍以助添聲勢的功能居多，參見〈黨派情報〉，第一六六五號，頁二。康澤對反CC的幾個主要派系做出個別的人數推估，按照他的說法予以合計，反CC的勢力確實已經超過代表總額的半數，不過他也指出，「直接」參加聯合陣營的派系是：「黃復青」、朱家驊派、新桂系，至於政學系，康澤認為，基本上政學系是反對CC的，只不過在手段上是縱橫捭闔，不能使人相信而已，〈康澤自述（六）〉，頁一一三—一一四。

① 參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經過〉，〈黨六大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一一八；易勞逸對此情況作了較為負面的陳述，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 607. 關於國民黨的六大大會，見：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五九六—六一一；遼耀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華學報〉，第四卷第一期（台北：民國六十六年一月），頁九三—一〇二；另可參閱：陳存恭，〈中國國民黨六大大會中委會及中常會初探〉，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四冊——台灣光復與建設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一六一—一五四。

52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頁八八。苗培成等人關於黨團合併的意見係載於他們所提的〈改進黨務案〉裏的第二項，〈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一冊，一九四五年五月，頁九一—九三，「二」七一一（五）／一五二。六次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的齊世英，在其口述歷史中誤指這次大會「原就計劃要黨、團合併」，關於全代會的召開年份日期也有錯誤，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五四。齊世英關於黨團合併的說法可能是當時一些CC系成員的主觀願望，但絕非全代會的計畫。有關〈促進憲政實現之各種必要措施案〉的原始草稿，見〈蔣介石在國民黨X次代表大會上有關還政於民提案草稿〉，一九四五年，「二」七一一（六）／一九。六次大會於五月十八日修正通過的〈促〉案全文，見〈黨六全紀錄〉，頁二〇〇—二〇一；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六〇四。

53 程天放等五十九人提，〈修改總章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三冊，頁三四七—三六二，「二」七一一（五）／一五三。有趣的是，苗培成也連署了本案，這樣他就有了兩種立場，一是黨團合併，一是團改隸政府。

54 〈黨六全紀錄〉，頁一三五—一三六。參見〈中國國民黨總章第四次修正（六次大會）前後條文對照表〉，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集〉「革命文獻第七〇輯」，頁一五〇。

55 〈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內有關「中央執行委員會設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一人，由總裁兼任之

「的條文，也跟著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第六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刪去，〈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七。

- 56 以治國民黨黨史聞名的學者李雲漢曾指出：「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之名額及選舉，自為黨內外人士所一致關注。」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六〇六。選局中的派系競爭激烈，若以各部門領域來看，緊張程度也不遑多讓，下引資料提供了軍統、海外、婦女代表的例子：沈重宇，〈蔣介石的親信謀士與情報主管——唐縱〉，〈江蘇文史資料〉，第二四輯（南京：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一七一；文強，〈戴笠其人〉，沈醉、文強（著），〈戴笠其人〉（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二二一；李樸生，〈我不識字的母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頁二二—二二三；錢用和，〈半世紀的追隨〉（台北：著者自印，民國六十五年），頁一〇—一一〇。並參見：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二一；西門柳，〈中國國民黨六大大會競選側面〉，〈新聞天地〉，第四期（重慶：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頁八九。

57 唐縱的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一九四五年五月六—七，十二日，頁五〇七—五〇九；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頁二九；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頁八二—八三。各派系協商名額問題的用意，是藉此大致保證形成一份依實力原則分配的中委名單，並經由受到控制的投票過程給予合法化，並送至蔣中正的手中等待最

後的圈選。關於六全大會對中委選舉的投票控制情形，見出席全代會的河南省代表馮友蘭的回憶，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台北：谷風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二七一—二一九。

58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上冊（香港：一九八二），頁三四九—三五五；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七；參見〈黨六全紀錄〉，頁一〇三。

59 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頁二九；羅才榮，〈「改造」之歷史意義與時代使命〉，頁一〇三。

60 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頁二九—三〇；羅才榮，〈「改造」之歷史意義與時代使命〉，頁一〇三—一〇四。蔣中正對全代會幕後的派系爭鬥現象具有一定的瞭解，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01-102.

61 〈黨六全紀錄〉，頁二〇三，二一一，會議經過頁八；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頁八九；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頁三〇；張九如，〈文采風流想像中〉，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民國五十八年），附錄，頁二二六—二二七；陳明仙，〈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貴州黨務〉，頁一五七—一五八；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七—一七八；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四—一三五。參見：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四。

67 推動擴增名額的張九如預期到這種結果，張九如，〈文采風流想像中〉，頁二六—二二七。

68 新的選舉辦法及決議通過的官方記載，見〈黨六全紀錄〉，頁二〇三—二二一，會議經過頁八。私人記載以及選舉前後會場秩序不佳的報導，見：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頁八九—九〇；唐縱的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頁五一〇—五一—；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頁三〇；羅才榮，〈「改造」之歷史意義與時代使命〉，頁一〇四；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八—一七九；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四—一三五；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四；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上冊，頁三五—三五—三四。有人在選票上題詩作畫，有的又去乙種票的前二十名，有的又去末二十名，有的乾脆在整張選票上打一大叉。劉先雲說晚宴實際到者不到半數，程思遠更稱到場者不到三分之一。羅才榮指出三青團的代表多數缺席。

69 劉先雲二十日到場參觀所見，〈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五。參見：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頁三〇。

70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頁九〇；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八。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總額計四百六十名，其分配情形：中央執行委員二百二十二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九十名，中央監察委員一百零四名，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四十四名，名單見〈黨六全紀錄〉

，頁二五四—二六一；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一七九—一八三。

66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六〇八。

67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 53.

68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復興社成員與黃埔系學生系統有相當的重疊度，因此，他們在中執會的席位不可以合計。

69 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三日，頁一九六—二〇四。

70 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五；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九；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二八七。六大大會上嘲弄蔣中正的這副順口溜似非首度出現，參見：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頁四三—四四。

71 一些三青團的幹部特別強調六大大會對黨團關係以及黨內派系政治的負面影響，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頁二八；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三，一三五；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七三。

⑦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一年），頁一四五、一五四—一五五。

⑧詳細的討論，見易勞逸在《劍橋中國史》裏負責的專章·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p. 566—608. 並參見·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9. 費正清斷定國民黨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喪失民心，余英時認為這恰好也是昆明教育界人士的共同結論。郭廷以也強調一九四三年起國民黨內的高級人員暗中論及時事亦多感慨·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p. 241-264...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頁一四七—一四八；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七二〇—七三一·並見·John Israe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ervation as an Ultimate Value," in Paul K. T. Sih, (eds.),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 146. 顧貝克(Anthony Kubek)也注意到「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局勢逆轉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幾位派駐中國的青年外交官所製造的不利於國民黨與蔣中正的歪曲言論，導致美國改變了對遠東的政策方向，Anthony Kubek,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asia Papers," in *The Amerasia Papers*, Vol. 1, pp. 30, 37. 所謂「官僚資本主義」，根據Joseph F. Fawcsmith的看法，指的是政治職位與社會資源的相互滲透，具有慣常以公共職位獲取私人利益（即假公濟私或劃公為私）的意涵，但卻比傳統上的貪污更嚴重，因為傳統的貪污僅獨厚私人，但官僚資本主義卻把個人的貪污和官僚體制內的派系連在一起，並形成制度化，是一種

結構性貪污，參見陳明通的介紹，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頁二四。

⑥ 包括破壞經濟法令，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者；操縱物價營私牟利，藉機發國難財者；藉「民主」名詞違反軍事第一原則，破壞抗戰者；因循敷衍，欺騙虛偽，生活腐敗的官僚惡習者；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流痞奸商。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北支團部籌備處（編印），〈工作通訊〉，第八一—一〇期合刊（恩施，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頁二—三；〈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九三—一〇三；〈團史資料〉，頁一六三—一六四；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三七—三四六。三青團後來又根據這六點指示的原則，訂頒〈團員行動指導綱要〉，用以作為行動上的指針。

⑦ 〈中央對全體團員之「指示六點」討論結論——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北支團第一次座談會紀錄〉，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北支團部籌備處（編印），〈工作通訊〉，第八一—一〇期合刊，頁五。

⑧ 由於參與集會的人士常常還有未具團籍的前復興社成員，所以有時這種集會究竟是屬於團方或復興社的聚會並不容易分得清楚，但這無關宏旨，鄭彥棻，〈永懷唐乃建兄〉，私立台南家政專科學校（編），〈唐乃建先生紀念集〉（台南：編者自印，民國七十一年），頁二〇九；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一〇一；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六三—一六四；唐縱的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頁四七四。

⑨ 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五五。

76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四六，三五六。參見：康澤，〈蔣介石爲什麼叫我到襄陽去當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湖北文史資料〉，第二〇輯（武昌：一九八四年九月），頁七。

79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六三。

80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六九—三七一；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六三—一六四；余湛邦，〈張治中先生小傳〉，〈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頁一七七。一九四三年九月，蔣中正任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上獲選爲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推選宋子文爲行政院長。

81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七〇—三七一。

82 這指的是一九四三年一大大會後，團中央召集在重慶的中央幹事和中央團部各處室負責人分別舉行檢討會議，歷時三月，會凡八次，最後具結意見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呈蔣。〈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工作總檢討報告〉，一九四四年三月，頁一，三，二一—二五；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七四—三八三。

83 〔「青年領導問題」決議案全文〕，〈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頁九—一二。

84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台北：中國地政研究所，民國六十九年），頁二五二。

85 唐縱日記與蕭錚的回憶：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

頁四三二；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二五二—二五三·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09-110.

86 黃宇人素以敢言著稱，在國民參政會內常以參政員身分抨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有「大砲」聲名。他勸導黃埔同學應共同響應CC系所發起的運動。不過他勸說三青團幹部的時間可能還有爭議，有資料暗示，他發揮影響力的時間似乎要更晚一點，如果此說無誤，那麼可以說明三青團內部對於和CC系的合作始終都不是那麼立場堅定與一致的。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香港：一九八二），頁一六；陳立夫，〈余井塘先生事略〉、華壽崧，〈追隨井塘先生五十年〉、張淵揚，〈老成凋謝余井塘〉，均見：大華晚報社（編），〈余井塘先生紀念文集〉（台北：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民國七十四年），頁二〇、一二三；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三。關於蕭贊育在革新運動裏的角色，見：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頁六四—六五，七〇，七三。

87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25.

88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二五三—二五四。

89 參見易勞逸的討論·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10-111.

90 例如一份提案間接的指責了政學系，韓振聲等十二人提，〈改進黨務案〉，頁九三；一份提案撻伐嘲弄了官僚資本主義，裴鳴宇等十一人提，〈擬請轉函國民政府遵照五屆七中全會「嚴防官僚資本主義之發展以免影響民生主義之推行案」中一、八兩項辦法嚴厲執行並提供補充辦法以挽救經濟危機案〉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一冊，頁一〇八一—一〇。以上兩案連署者多與CC系有關。親朱家驊勢力的提案中抨擊了黨員日益濃厚的宗派觀念，甘家聲等十一人提，〈黨的改造綱領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四冊，頁二八〇，「二」七一一（五）／一六三。

①團方主張社會安全福利制度，耕者有其田，都市土地與獨占性企業等均應收歸國有。張治中等七十人提，〈對本黨政策之建議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二冊，頁二四六一—二五〇，「二」七一一（五）／一五一；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册，頁三七一。參見：陶希聖，〈記陳布雷先生〉，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附錄，頁一八九—一九〇；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二五九。

②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七二四；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民國八十五年），頁九二四；與本章第二節。

③一九四一年，陳誠在鄂北行政會議會後聚餐中，公開批評政學系盡為縱橫家之流，馮世欣，〈陳辭公軼事記聞——紀念陳誠副總統逝世三十週年〉，〈傳記文學〉，第六六卷第三期（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三月），頁三八。據程思遠回憶，張治中對他說中日戰後蔣中正原已內定張為東北行轅主任，後竟

易爲政學系的熊式輝，張治中判斷此係王世杰與張群幕後運作所致，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一—一九二；而三青團在戰後中國另一勝利果實的台灣島內，更扮演了被視爲政學系分子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對立面。另參見：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11-113.

94 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對中共問題同樣力主政治解決，但這一點他在三青團的影響力至爲有限。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張治中爲慶祝一九四六年初政協會議成功，曾於二月八日以三青團與軍委會政治部名義主辦一場聯歡會，包括江青在內的一些中共黨員與其他各黨各派、社會賢達代表出席了這場聚會，張治中在致詞中難掩興奮之情，見：重慶《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然而就在此時或稍後，重慶市黨部與重慶支團部已私下對破壞十日親中共人士的慶祝會達成了共識。學者林能士對中日戰爭後期至一九四六年間的國共商談與國民黨內派系政治作了聯繫性的研究，並著重分析政學系與CC系的角色問題與衝突情形，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和談——以「重慶會談」爲例〉，〈歷史月刊〉，第八九期（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頁七一—七五；及〈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爲中心的探討〉。

95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13；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爲中心的探討〉，頁九三四—九三五。

96 〈國民黨重慶市黨部第二十次臨時執委會會議紀錄〉，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引自：范小方，〈二陳和CC〉，頁三〇〇—三〇一。關於重慶市黨部主委方治主導事件的原委，見：方治，〈我生之旅〉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五年），頁六七—七三。重慶支團部與事件的關係、以往打擊中共的經驗、與該團有力的社會組織基礎，見重慶支團部書記羅才榮的回憶，〈較場口的憤怒〉、〈在群眾戰場的勝利〉，〈才榮文稿〉，續二，頁三一—三五；〈懷念包華國陳介生兩先生〉，〈才榮文稿〉，頁七二—七三。關於較場口事件與稍前發生的滄白堂事件，參見：丁永隆、孫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頁四三—四七。

97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十九，二十二日，頁二六七，二七一，二七三—二七四；梁敬錚（譯註），〈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頁一五三。參見：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四八—一四九。

98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15.

99 〈我們的呼聲——黨改革新運動〉，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改革新運動〉（重慶：青年軍出版社，民國三十五年），頁四一—五；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六五二；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15, 121-122.

100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15-116.

101 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六年三月一—十七日，頁二九〇—二九四；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六年三月一—十七日，頁二七九—二八七；竺可楨，

《竺可楨日記》，第二冊，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頁九二〇；唐縱的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一九四六年三月五—八、十六日，頁五九六—五九九。

①⑦《我們的呼聲》，頁六。

①⑧蔣中正，〈革新黨務之要道〉，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在六屆二中全會紀念週講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一，頁二六八—二六九。

①⑨蔣中正，〈革新黨務之要道〉，頁二六九，二七一；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頁二九二；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頁二八四—二八五。

①⑩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頁二八五—二八六。參見：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二—一九三。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16-117.

①⑪參見：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頁二八五—二八六；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一五，二一；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三。當然，革新運動成員對黨內欠缺民主而導致的不良後果看得非常透徹。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20-121.

①⑫《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六年三月，頁一二三，〔二〕七一一（四）／一七一；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二六二；天津《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並參見：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六七〇—六七一。

⑧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册，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頁二八七。

⑨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册，頁一六一—二〇；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册，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頁二八八；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册，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頁二九五；唐縱的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十八日，頁六〇〇；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三—一九四。

⑩《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暫行綱領》，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頁一一—一二，一四—一九；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六五七；易勞逸對一些定期刊物與宣傳小冊的言論作了介紹和分析，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19-124.

⑪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24；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七七五，七八〇—七八一；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六册，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頁三八—三九；王君，《閒話「政學系」》，南京《大剛報》，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南京《新中華日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宋中堂，《三中全會中的幾門大炮》，《新聞天地》，第二三期（上海：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頁一三一—一五。

⑫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25；蕭铮，《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二六一。

第四章 三青團二全大會的組黨風潮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上海《大公報》刊載一篇來自牯嶺的政治新聞：

【本報牯嶺四日發專電】青年團第二屆全體代表大會舉行以來，會場情緒至為熱烈，各方面代表現正交換意見，並分組研討青年團之前途問題。茲綜合各方意見如下：(1)解散青年團，成立國民黨青年部。中央組織部確有此意見，但無法提出。(2)青年團應維持現狀，仍隸屬於國民黨。陳立夫先生等如此主張。(3)增強青年團之獨立性，黨團幹部絕對分開，即團員不得兼為黨員，但不另組政黨。過去中央團部之幹部如此主張。(4)另行組織獨立政黨。地方代表及學生代表主張最力。以上四種主張，以第三項實現之可能性最大。

六日，二全大會就三青團前途問題展開著名的論辯，儘管組黨論受到多數與會者的歡迎，但是大會最後並未動用表決，團長蔣中正以個人權威止息了這場爭論。三青團內的組黨派未能爭取到形式上的政黨名義，只是從某些方面來說——一如《大公報》記者所預測——更加坐實了獨立的性格。本章即以一九四六年的三青團二全大會為中心，利用檔案、私人日記、憶述文獻、報章報導等資料，回溯組黨風潮的背景，以及二全大會召開前與召開期間的相關情

節，並分析全代會後三青團新的權力格局，期能對此一湮沒不彰的政治要聞提供更多更具價值的觀察線索。

第一節 別立新黨的背景

抗戰後期，大後方若干知識分子特別對國民黨治績發為指摘，黨員同聲內抨；加上國共多次談判，美國介入，國民黨動輒遷就；所謂憲政問題，實則開放政權，國民黨人對此新局不能不表關切。時重慶方面對「兩黨說」多所論及，三青團引為自身絕佳出路，曾於幹部會談中集議改建兩黨事宜，且在幹監聯席會議裏公開討論，中央常務幹事何浩若等人主張尤力，指稱國民黨允宜分為兩黨，以免中共成為第二大黨云云，有關結論並均呈送蔣中正核閱。^①

戰後中國的民主、和平呼聲更為高漲，國民黨開放政權不日將屆，黨內有心者頗感切急，三青團部分成員組建新黨之議尤其仍未稍歇。自贛南時期即追隨蔣經國的王昇同此主張。據王昇日後回憶當時個人看法，認為執政的國民黨在政治現實中背負無限責任，動輒得咎；且國民黨自北伐後滲入地方集團勢力，已見異化，黨的革命精神也因追求官宦而漸漸消褪了。王昇指出，凡此包袱，三青團均無，且在現實中三青團組黨正是時機，蓋不僅可為政黨政治下忠於三民主義的反對黨，復在還政於民聲中得以濟國民黨革命屬性轉化不易之窮，且兩黨政治符合美國方面的期待，國人也增一政治選擇機會。^②

王昇的見解不一定符合政治現實，例如美方就不一定對三青團抱持友善觀感，^③但在三青團內，這類主觀想法確非王昇一人或某個派系所獨有。^④另一方面，來自團內渴盼組黨的主觀願望也因著戰後三青團發展成績斐然，以及團方本位意識幾達高峰的有力客觀背景而更形強化了。

三青團自一九三八年成立後即熱衷擴充成員，馴至中日戰爭結束當年（一九四五），團員數已逾百萬，戰後一年間尤為三青團積極廣納新員的時期，此和戰後環境便於吸收（同艱困的戰時相較）、搶於憲政粗肇之前擴大組織影響力有關，到一九四六年底為止，團員數已逾一百五十萬人，國民黨與三青團成員比例也在這一年縮減至八年以來最為接近的數字（二：三〇：一）。^⑤由於三青團自行控制其成員與組織，因此，團的發展成就幾乎不能給國民黨黨務機器帶來任何提振效果，相反的，可能還有極大的環伺威脅成份，學者汪榮祖、李敖即指出，以三青團龐大的成員數，「儼然已成黨內之黨」，其後要求分家亦屬必然。^⑥如果暫時將實際的黨團體制分治問題存而不論，汪、李二人所謂「黨內之黨說」的確可以讓人們較易於理解複雜的黨團關係，但這仍有礙於全盤與正確的認知。事實上，因著不同的關照角度，我們還可利用費正清的理解來增加對三青團獨立自主性格的認識，即三青團係「與國民黨平行並立的金字塔型組織」（a pyramidal structure parallel to the party）。^⑦應該注意的是，儘管「平行並立說」與「黨內之黨說」看似矛盾，但對三青團自擁勢力的性格描繪則仍

然一致，兩個說法也分別符合片斷真實的面貌。

三青團在擴充組織能量的過程當中，採取了自力發展與對外結盟的廣泛模式；作爲一個國民黨政權下的龐大派系，有時亦涉足黨內的政爭以求均霑利益。如前節所述，三青團這種權謀政治在戰後運用得更爲淋漓盡致，由於和黨內最有力派系CC系在革新運動中的合作，團方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取得六分之一的國民黨中常委席次，是爲三青團前所未有的勝利。戰後中國政局複雜，三青團置身當中絕對有其不容忽視的影響力，而統觀三青團領導階層在黨機器內（主要仍在中常會）的突出表現，以及足堪作爲下層基礎實力指標的團員數字、黨團員比例等項，均可發現三青團這股影響力在戰爭結束翌年（一九四六）已具懾人氣勢。從該角度看來，一九四六年的三青團的確正處於顛峰的狀態。

另一方面，三青團在同一時期內的本位意識依然濃厚，大部分地方基層幹部與不具黨籍的團員仍舊對國民黨深感疏離。爲因應憲政起見，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六大會決議三青團改屬於政府，^⑧然而此舉卻讓隔膜已深的黨團關係推入再難挽回的境地。一來由於黨團之間最後僅存的形式上的統屬接榫點自此廢除，三青團儼如脫韁之馬，而所謂三青團改隸政府的決議其後又遲遲未見履行，國民黨在此期間仍動輒對三青團施行指導行爲，就法規而言已屬師出無名，團方褻急者之不耐可以想見。^⑨即使連新桂系的白崇禧也認爲，默察當前政治形勢，三青團發展方向與革命建國前途關係至爲密切，團既不屬於政府，黨團關係不能一仍舊貫

，必須立加調整。⑩其次，由於三青團自成立後，「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團之地位與立場，始終在模糊動蕩之間」，⑪久之不免頓起反動，要求承認其政治現實地位的呼聲甚囂塵上，就此角度而言，改隸政府用以訓練青年的決議對三青團並非延續利益的最佳途徑；況三青團積累的利益所在尚不限於政治圈內，即以團營事業為例亦屬可觀，一旦實施改隸作業則未見得都能繼續充份有效掌握，凡此均為三青團內具備政治認識者思考未來走向時，不能不審慎慮及的。⑫

根據三青團方面的文件顯示，改隸之議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間確實給三青團帶來不輕的困擾。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即黨六全大會閉幕未久，三青團中央幹事會舉行臨時全體會議，會中決議三青團組織方式及各級機構與工作暫時不變，至於一切改隸辦法則授權予中央常務幹事會研討規劃。⑬唯三青團中央對規劃事宜似未積極，及至八月，蔣中正仍囑書記長張治中限期呈報三青團改隸政府後如何加強業務的具體方案。⑭一九四六年三青團中央幹事、監察會一份工作報告則表明，改隸之議使得三青團的性質與地位以及一切有關團務的方針計畫，均不得不準備重行通盤檢討與修訂，而這其實並無助於解決三青團自認的幾項團務推展障礙；再者，團內各級幹部則多因三青團地位變更及改隸一案不能早獲適當解決，「情緒日趨低落，工作效率不無重大之減削」。同年，另一份由中央幹事會提出的工作報告則乾脆指出「此為推行團務期中之一大頓挫」。

有鑑於此，三青團中央曾擬訂了一份〈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置綱要草案〉與三點處理意見，經團長蔣中正批准後轉令各級團部「以安定幹部情緒」，然而這些辦法既不具備法律效力，又完全沒有提及實施改隸時間，看樣子仍以安撫成分功能居多。嗣因國內政治情勢急轉直下，國民大會一再展期，三青團改隸日期也隨之延緩，最後，即將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召開的團二全大會顯然就成了衆所矚目，且期待徹底釐清或者建立三青團此後性質地位的絕佳場合。¹⁵

多年以來，黨團關係始終渾沌不明，三青團的性質與地位在名實之間頗有差距，亦從未獲得有力解決。一個饒富興味的例子是，八年來，三青團團員一直拿的是〈團員入團臨時登記證〉，而非正式的團證，中央直屬國立中正大學分團就向二全大會提案強調說，三青團既是「永久性之革命組織」，上述現象「實足影響社會人士對本團之觀感，即團員本身亦難免疑竇而動搖信心」。¹⁶試觀一九四六這一年，三青團的政治表現達到空前的頂峰，本位意識和由於改隸一案所激化對自身前途的不確定感也更加強烈。除了前幾段所述事例之外，三青團成員參與地方各級參議會選舉所獲成績，同樣是三青團在戰後力求政治表現與本位意識高漲的另一明顯註腳，「湊巧」的是，國民黨政權爲回應憲政呼聲所辦理的這場全國性地方民意代表普選活動，基本上也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間。

戰時三青團已提示團員積極參加地方自治、充實民意機構，以求未來憲政圓滿實施。¹⁷

依照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六全大會通過的〈促進憲政實現之各種措施案〉第三條的精神，戰時在後方各省縣市為促進省政興革而非經選舉方式成立的原臨時參議會，應依法循序普選，俾成為正式民意機關；^⑩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三青團中央幹事會通令發動各級幹部及優秀團員踴躍參加競選，且將專案考核各級團部參選成績，嚴行獎懲之。^⑪

各地參議員經由地區或職業團體兩種途徑選舉產生。以地區論，三青團以往積極投入地方基層的打樁工作這時得以發揮效果，據稱到一九四六年三月為止，整整有六二%的團員在從事地方工作，有些人當了區長、保甲長的職務，這些都是能夠提供基層票源的重要樁腳所在；^⑫另就職業團體來說，三青團同表重視，亦為平日組織動員的主要來源之一。三青團的參選成績令人矚目，根據一九四六年六月止若干省市團部呈報團中央的一份不完全統計結果顯示，在省級的參議會方面，台灣、福建、湖北、陝西等地的三青團均取得三成以上的正選席次，台灣更達到三七%；在湖南各縣市的參議會裏，三青團平均占有四三%的正選席次，其在省內各隅政治影響力之強，實不言可喻（表一〇）。

表一〇：各地三青團團員競選各級參議員當選人數統計

省(市)參議員總數	單位	湘	渝	川	青	陝	閩	康	鄂	寧	滇	台
一五三	一	一	一	一	五二	九四	六八	一	六九	一	一	一九

團員當選數(正選)	二六	一一	三三三	一三	一二	二八	二三	一一	一一	二二	一一	五	七
團員當選數(候補)	一七	一一	一一	二二	一一	一一	一七	一一	一一	一〇	一一	一一	一一
縣(市)參議員總數	一三四〇	六〇二	一一	一一	三二五	一一	七〇四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三三一
團員當選數(正選)	九四	二五六	一一	一一	八〇	一一	二四四	六八	一一	一一	一五	六	六六
團員當選數(候補)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八	一一	一一	四	一一	一一
團員當選正議長數	二	三	一一	二	一一	一一	一五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團員當選副議長數	一一	四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〇	一一	一一	一一	二	一一	一一
省市參議會團員比	一七%	一一	一一	一一	二三%	三〇%	三四%	一一	一一	三〇%	一一	一一	三七%
縣市參議會團員比	七%	四三%	一一	一一	二五%	一一	三五%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二〇%

資料來源空白未載

資料來源：《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八月。

註：一、本表據一九四六年六月止中央幹事會所收各單位呈報結果彙編而成，為一不完全統計，僅供參考。二、團員占各級參議員總數比例係按正選人數統計，不含候補。

三青团藉由各地參議員競選結果，能夠充分檢驗多年來的組織發展績效；透過數字化的當選成績，也大致可以展現其具備的政治實力。然而，三青團民意基礎愈趨擴張，當政的國民黨愈感威脅。對於國民黨而言，其他黨派尚無從給國民黨帶來選戰壓力，除了在地土紳程

度不一的影響力之外，以優異組織能力見長的對手只有本位意識強烈、政治企圖心旺盛的三青團而已，職是之故，黨團競以選局為戰場，交鬥之烈遍及各地。這種政治競爭情勢並且延續到參議會正式組成後，各勢力間的合縱連橫行為接續不斷，對地方政局牽動至鉅。

在首都南京，CC系與中統人士慶深庵、王潞、傅丘平等的「地方建設協進會」，以及三青團與軍統方面黃通、孫玉琳等人所組「地方自治協進會」雙方在選時各樹旗幟，競相爭奪選舉資源，及至選舉結果揭曉，三青團在六十三名參議員中當選了二十三人。南京市參議會既經成立，頓萌副議長選舉暗潮，CC系與三青團仍以本位利益為先，派系成見因之益深。

② 在重慶，三青團接收了復興社的社會基礎，並曾運用一些職業團體從事政治活動；對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重慶支團部幹事長陳介生個人逕自增設六個分團部以契合該市行政區劃，延攬幹部亦破除法條限制，只問反共堅決與否，能夠領導群眾就用。這種掌握機先、大開大闢的作風替三青團在戰後的重慶一地特別取得了不容忽視的實力，該市參議會選舉後生態即以掌控過半議席的三青團為重心。以CC系為代表的黨部與政學系為後盾的市長方面分別向籌碼在握的重慶支團部接觸，盼能支持各自所提議長人選，陳立夫稱黨團宜注重對政府的制衡機能，張群則指應促成府會融合，市長方面且稱願以社會、民政兩局長及市訓練團副教育長等足能擴展群眾、官員影響力及主導未來選舉事宜的重要職位相許，陳介生著眼於來日

組織利益，終倒向市府，親市長一派獲選參議會議長、秘書長，三青團方面則分任副議長、副秘書長。^②

三青團在省內各縣市參議會斬獲最豐者應屬湖南。在華容縣，團方於選前採取近似「拉伕」的方式，漠視年齡限制，積極吸收一些鄉鎮長、鄉隊附和學校校長等具政治能量的人物入團，致有「老年團」之譏；同時亦無顧於組織設立要件，大舉擴充基層團隊至縣府、警局、學校、各鄉鎮，期能爭取有力資源。凡此行徑，均由湖南支團部要求下級不惜採取一切手段獲得選舉勝利的指令精神而來。^③三青團極力擴張聲勢，國民黨自必多所掣肘，以衡陽為例，由於區、保長多由三青團掌握，控制市府及人民團體的市黨部於是在選前即著手撤換這些親炙團方的基層樁腳；在常德，縣黨部更於選前迫使縣府撤換誼屬團方勢力的長庚鎮長、鎮隊附等人，並進而操縱選舉，該鎮候選人、亦為常德分團部幹事長的賀燧初終至落選。^④

儘管三青團在湖南平均取得四三%的縣市參議會席次，但在各縣市參議員間接選出組成的湖南省參議會中，三青團成員數仍然遜於CC系方面，不過，這種情勢迅即在議長選舉過程當中獲得扭轉。一九四六年四月，湖南省參議會舉行成立大會，並選舉正副議長，掌握三分之一基本票源的CC系推出省黨部主任委員張炯與老軍人李國柱競選正副議長，三青團則支持前臨時參議會議長趙恆惕及出身湘西，富財力背景的實業家唐伯球參選正副議長以資抗衡，並聯絡省內原不滿CC系的乙派分子、軍統、復興社成員分途爭取票源，時省府正值

改組，新的人事生態極有利於三青團，因而對付CC系的競選聯盟更形勢張。選舉結果，趙恆惕以恰好過半數的三十八票對三十二票擊敗張炯，唐伯球也獲選為副議長。經此正、副議長選舉，趙、唐二人及部分省參議員均加入聲勢益壯的三青團，團方在湖南政壇正式奠定撼之不易的地位，到一九四七年七月省參議會第三次大會閉幕前，三青團甚至已連續兩屆悉數壟斷了駐會參議員的名額，CC系始終無一人當選。^②

可以這樣說，三青團中央與各地組織在中日戰後至二全大會之間所蘊積有關政治表現、本位意識的能量之大，著實沛然難禦。期間諸多「事件」，可能都是基於歷史的偶然而兜攏在一起，並且在一九四六年的全代會上，對出席人士們的政治憧憬起了有機的催化作用。但是就「局勢」來說，前述已提及的事件（含第三章）均與中日戰爭後期開始，來自政權內外要求開放政治的潮流有關，三青團從中發展茁壯，二全大會中的組黨呼聲已非單純的偶發事件或意氣之爭所能解釋。另以黨團關係欠缺穩定的「結構」及其伴隨的困擾觀之（參見第一、二章），當能想見政權中人遲早得面對這道難題，並求智慧性的解決。調整黨團關係措施和三青團改隸於政府之舉曾經先後試圖對三青團的地位給予定位，然均無疾而終，現在，機會來到三青團自己的手中。從各種角度看來，三青團二全大會都會是那些亟欲將黨團關係與三青團性質地位作一徹底解決，以迴護公私利益或組織尊嚴的人們的希望所寄。

相對於三青團在國內政治地位的提昇，團內聲望漸高的另一名領導者蔣經國也特別獲得

人們的注目。根據一種流行甚廣，但大多出於臆測或個人判斷的傳言，一九四六年的三青團組黨風潮係由蔣中正的「傳子政策」所助長或推動。²⁶無論如何，經由蔣中正刻意栽培，蔣經國的政治聲勢藉由三青團鵲起乃不爭的事實。由於實際的黨齡、資歷尚淺，此時蔣經國仍未具國民黨中央執行或監察委員身分，然而，在三青團內，蔣經國已躍居等同於國民黨中常委地位的中央常務幹事。早在一九四四年，蔣經國還控制了甫成立的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照以後的歷史看來，他逐步瓜代了康澤在三青團裏的制式權力與地位。

先前負責青幹班實權的組織處長康澤對繼起的中央幹部學校頗思掌握，但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自兼校長的蔣中正任命蔣經國為該校教育長，連同親蔣經國的復興社分子胡軌稍前於四月被派任組織處副處長一事，康澤已感權散之憂。²⁷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正式開課，校內不設黨部，只建立團部，學生一律入團，教職員生均須參加團的集體活動，校務實際由蔣經國主持。此後所謂的蔣經國系，除了原贛南派的基本隊伍外，再添一規模更形龐大的幹校派，活動範圍也自江西一省擴展至國內各地。²⁸同年十月起，國民黨與三青團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並徵集編練為青年遠征軍。蔣經國先後受派為青年遠征軍政工人員訓練班主任、青年遠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幹校派師生從而和青年軍政訓工作合流，蔣經國勢力自此跨入軍界。²⁹

蔣經國在江西主持團務初期曾得復興社成員胡軌輔弼，然最大的人事阻力也源自復興社

內的康澤系統。一九四五年時，蔣經國「主要職務全在於渝」，^⑩同康澤的競爭益趨白熱化。蔣經國原已汲引不少復興社分子於甫經草創的中央幹校裏襄贊校務，首任訓導處長胡軌、副處長俞季虞、第二任訓導處長張一清、首任教務處長王政等人均為其中顯例。^⑪俟蔣經國實際控制了中央幹校和青年軍，三青團中央人事更經一番動盪，根據一名先親康澤後投蔣經國的復興社成員陳開國的說法，幾個復興社分子透過蔣經國的運作取得了更有力的位子。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這場人事搬風最受人關注者，首推倪文亞取代康澤出任組織處長，倪康二人雖同屬復興社，但意義截然有別：攬持三青團組織重任長達七年之久，並曾在三個月前的國民黨六大大會中展現可觀政治實力卻反遭蔣中正質疑是否有計畫控制會場的康澤，此時形同失勢；倪文亞的出線一般則視為蔣經國掌權前的過渡階段。透過書記長張治中，蔣中正暗示康澤辭卸組織處長職務，並安排於十月十五日自重慶搭機出國考察，至此，蔣經國在三青團內的最大政敵已去。^⑫

就派系政治的角度而論，自三青團成立以來，復興社始終為組織重心，政治表現且日臻耀眼；以蔣經國為首，發跡於江西的蔣經國系雖起步較晚，但藉著蔣經國進入重慶中央政壇而愈見聲勢，且更加擴張。兩個三青團的重要派別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在國民黨內的資歷聲望實力均顯不足，^⑬蔣經國系尤其是；況三青團內高達八成五左右的成員並非國民黨員，^⑭於派系私利、於團體可大可久之發展，兩派中的有心之士遂力謀在政治地位上別開生面。如果說

一九四三年的全代會有利於三青團本位意識的凝聚，本節前述事件、局勢、結構的綜合土壤則使得人們另闢新局的願望在一九四六年三青團二全大會上更加易於催化伸張了。

第二節 組黨的呼聲與頓挫

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五月還都南京，未久，隨著蔣中正於七月十四日抵達廬山牯嶺，該年夏天的中國政治重心乃暫時轉移到這個自古聞名的消暑山城之中。時國共停戰協定已遭破壞，內戰全面爆發，美國特使馬歇爾遂於七月十八日起，兩個月內八上廬山面蔣，續圖力挽現狀；另一方面，在國民黨政權內，經年爭執不下的黨團關係也即將在這個天氣饒富變化的名勝所舉行的三青團二全大會上面臨攤牌的命運。³⁵

在自主呼聲日高的三青團這邊，由於書記長張治中被發表為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陳誠銜命於四月再度出任書記長職務。陳誠在七月披露一份他所草擬的〈青年團工作綱要〉，指係提供二全大會代表們作為提案參考，這份綱要似乎排除了近來團內部分成員的過度激情，強調：「團與黨為一個整體，團要接受黨的領導，黨要輔助團的發展，彼此密切配合，共同為三民主義而奮鬥。」面對可預見的組黨政潮，陳誠毋寧採取比較折衷溫和的立場，他主張三青團應鼓勵團員以工作競賽方式參加各種政治活動，而三青團的中央幹事、監察會陣容應逐漸減少那些兼具黨中央委員或高級幹部資格者，以選拔部分下級優秀幹部加

入三青團中央機構，俾能培養新機，充實力量。³⁶

在三青團各地仍富組織資源的康澤此時尚滯留美國，六月間康澤接獲書記長陳誠通知盼能返國參加三青團中央幹事監察聯席會議及二全大會，康澤爲示慎重，先行拍發電報向蔣中正請示，覆電稱「安心在美研究，明春回國建設可也」，康澤遂未成行。³⁷同時，蔣經國則動作頻繁。先是蔣經國藉著原青幹班一至五期一千五百餘名畢業學員改劃爲中央幹校政治科第一期身分，及改組青幹班同學會爲中央幹校校友會的機會，取得了部分已在各地團部主導團務的原青幹班勢力的表態支持。青幹班同學會原是康澤爲控制三青團一全大會而成立，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於重慶舉行的中央幹校校友會成立會上，前青幹班同學會常務理事陳開國代表致詞指出今後「班、校是一個整體」，並接受蔣經國的「統一領導」；蔣經國則強調今後班校一家，是兄弟關係，各地校友應努力爭取充任二全大會代表，爲團的「改造」出力。透過青幹班勢力，除江西支團部外，蔣經國還獲致若干省市團部幹部的奧援，例如上海支團部書記曹俊、重慶支團部書記羅才榮等，對蔣經國均表擁戴。³⁸

蔣經國另一重要政治基礎爲青年軍。一九四六年初，蔣中正即指示籌畫青年軍復員事宜。一月間，蔣經國在中央幹校召集親信胡軌、俞季虞、張一清、蔡希曾等人會商，他透露蔣中正對青年軍復員的看法，指出復員不是青年軍的結束，而是青年軍新發展的開端，今後青年軍不僅當爲國軍後備菁英，亦應加強政治組訓，使成爲社會的新興革命力量。³⁹七月，青

年軍復員檢討會議在廬山召開，會中討論青年軍的復員安置、徵集第二批青年軍等問題，蔣經國並經蔣中正指派擔任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處（原為青年軍復員管理處）代處長，掌握實權。

④大約在此前後，蔣經國以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兼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身分，向中央團部建議給予青年軍中的團員選舉代表出席二全大會的權利，獲中央常務幹事會通過，一百六十一名青年軍代表遂成爲蔣經國系在三青團二全大會裏的一支基本力量，占出席代表（不含中央幹事、監察等所謂大會出席人員）總數的五分之一強。⑤

青年軍代表自爲三青團一全大會所無，二全大會出席者另一特色係學生代表名額遽增。一全大會時，具備在學學生身分的團員代表只有二十一人，占出席代表（不含中央幹事、監察）總數的六·五六%，當時會場內對代表年齡偏高的事實曾有非議；⑥二全大會裏的在學學生則大幅擴增至一百七十名上下，約占出席代表（不含中央幹事、監察）總數的四分之一。

⑦這些學生代表與爲數更多的地方代表對於另組政黨一事至感熱衷，⑧前者在國民黨內並無過多利益糾葛，反倒是基於青年熱血，亟欲尋求自主地位及打破國民黨一黨獨大現狀，而後者正是在地方政壇上直接與國民黨黨務部門對壘的團務操縱者，對黨的名器同樣不表留戀。

在二全大會召開之前，學生代表與地方代表的組黨態度已然形成一股熱潮，受輿論界及政壇中人矚目。書記長陳誠於七月披露的〈青年團工作綱要〉草案裏籲請黨團一體的文字沒有發揮太多的指標作用，相反的，三青團的分離意識充斥在各方對二全大會的提案當中，包

括確定三青團爲一獨立政黨、政治團體、獨立組織、重行確定三青團性質等等。⁴⁵雲南支團部就認爲，三青團應將現有組織另行改爲政黨，俾於憲政實施之後以新姿態出現。⁴⁶甘肅支團部更聲言代表該省「十二萬革命青年」，呼籲讓三青團的組織改組爲獨立政黨：

就團的歷史言，原爲中「國」國民黨所提攜之一體的核心，然就團的性質言，則屬以青年爲主幹之三民主義的新生組織，而以團的發展言，尤以蔚爲富於革命精神之三民主義的新生力量。如以青年爲革命運動的新血輪，則此新的血輪業有充沛的循環系統；如以團爲三民主義的新生命，則此新的生命早已茁壯健全而長成，當茲民主政治高潮澎湃，「抗戰既勝建國期成的新時代，「爲」發□（揮？）新生力量爭取革命效率，實有開揚團的精神，改組獨立政黨之必要。⁴⁷

甘肅支團部指出，三青團實已具備革命政黨所必需的基本條件，而在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過程中，也已經取得「追隨中國國民黨駢肩奮鬥共同努力之政治地位」，「世界政黨既各依其政綱政策以爲分合消長之因素，則中國國民黨與青年團亦可各本自身之歷史與精神改進既有之政綱政策，切磋競勉，攜手邁進」，「外分而內合，相輔相成，並存於三民主義的體系之中」。甘肅支團部接著提醒，國民黨現已面臨「歷史上最複雜而至岌危之政治難關環境」，三青團爲「革命之友，奸黨之敵」，「爲增樹中國國民黨的聲援，爲參加當前的政治鬥爭，亟有揭舉團的旗幟，改組獨立政黨之必要」，他們強調此舉刻不容緩，建議這個新的政黨

應稱爲「三民主義共和黨」，以揉合憲法精神，示其生命與中華民國同一生命。④

一份由駐港九澳直屬區團部主任韓文溥、福建支團部書記吳春晴、福建支團部監察林一鵬、福建支團部監察會書記張公甫、福建支團部海澄分團籌備處主任林永年、貴州支團部幹事長季天行等十七人連署的提案，條文分明的縷述了三青團不能再維持舊狀或改隸政府的理由。他們對八年以來團員在撲朔迷離、牽制過多的黨團關係下「忍耐掙扎」，甚至「由苦悶而趨消極」的現象表示憂心；尤足憾者，一月間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涵括了國內重要黨派成員，唯獨三青團「以黨團一體之故，竟抱向隅」。韓文溥等人警告，國內黨派如雨後春筍到處公開活動，「一齊衆楚，勢使本黨陷圍，如再堅持黨團一體，侷限自己的發展，亦即削弱自己的力量，於黨於團，均屬失策」。

提案人表示，維持舊狀，顯違創團初旨，權衡利害，今日三青團確有決定另一生存形態的必要。這份連署提案接著指出，憲政實施後，各黨派既經並存，自可公開活動，原先三青團改隸政府以避免「政治野心家」援例爭取青年的用意也已不符形勢需要；況三青團如實行改隸，「有一般工作意識，無神祕之革命特質」，而對各級組織及幹部地位問題也不易解決。總之，三青團不能維持舊狀，不便改隸政府，「如改隸政府，其優秀傳統將被腰斬，如維持舊狀，則其苦鬥之歷史，亦覺難於持續」。韓文溥等人似乎認爲，三青團改組爲政黨將可提振組織的效率、權力，以及成員的革命情緒，提案辦法項下建議三青團應師法孫中山組織

中華革命黨的精神，改爲獨立政黨，「以繼承革命傳統」，不過，同甘肅支團部一樣，他們特別強調此一新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友黨關係，這個想法是否出於至忱尙待存問，不過意在泯除國民黨政權中人對三青團的疑忌則可確定。^⑩

有些提案內文未觸及組黨字眼，而以獨立政治團體爲願望，實際亦與組黨無異。例如由幾位中央幹事、中央候補幹事、中央候補監察與部分地方、學校團部高級領導人（含幹事長、主任、書記、幹事、監察）以個人名義連署提出的一份案子中就呼籲三青團應即脫離國民黨的隸屬關係，俾能成爲獨立政治團體。這些三青團菁英認爲，黨團關係從未明確劃分，導致全國青年由不滿政治現狀進而不滿國民黨，更由不滿國民黨而對三青團感到失望，致使三青團失卻號召力量；同時，三青團的革命性與吸引力也因爲欠缺政治主張與地位而大幅降低。提案指出，三青團一旦獨立，「以本團今日組織之發展與團員之衆多，必能取得第二大黨地位，減低共產黨在國內國外之政治作用」，並且，三青團與國民黨「雖各成獨立政治團體，但主義與目的仍屬一致，將來在對外鬥爭上可以互相策應，在對內工作上可以互相競賽，如此不僅不致分散革命力量，而且可收相輔「相」成「，」殊途同歸之效」。^⑪

地方與學校代表爲三青團二全大會上鼓弄組黨風潮的主力，部分中央幹事、監察間助之。事實上，多數中央幹事、監察對此抱持穩健立場，他們主張增強三青團的獨立性，黨團幹部絕對分割清楚，不再混兼，黨籍團籍亦須涇渭分明，但不另組政黨。^⑫無疑的，這種態度

較趨於審慎，⁵²唯若與黨方形同頑抗的意見相比，自主意味顯然又濃烈得多。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就曾有解散三青團，代以成立國民黨青年部的想法，但格於環境時勢，無從提出；在三青團內，以中央常務幹事陳立夫為首的少數CC系分子主張維持現狀，唯此議不符實際，甚至未能迎合團內最起碼的自主要求，故可謂團內黨方的咄咄空論。⁵³

有關三青團前途問題的討論，早在九月一日二全大會開幕之前即已瀰漫廬山。青年軍復員檢討會議閉幕後，三青團於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三日間調集各大專院校幹部在廬山接受青年夏令營洗禮，受訓期間正值二全大會召開之前，活動地點也和全代會多所重疊。在夏令營結業之後，部分學員以全代會出席代表的身分續留廬山，連同稍早已到的各地出席全代會人員代表——僅以八月二十一日為止的抵達人數累計（時尚未開始辦理報到），即已合占全體與會者的七成。⁵⁴自蔣中正七月到臨廬山，當地頓時湧至二十餘名來自京滬漢等地的重要媒體記者，蔣氏行止動見觀瞻，《新聞天地》記者更譬喻政治的動力機已由南京搬到牯嶺。隨著廬山夏令營以及二全大會與會者的陸續到來，二全大會行將決定三青團性質及黨團關係一事也成了廬山上的公開談論焦點，要求組黨或成爲獨立政治團體的提案一件件的遞送給全代會秘書處，《大公報》記者報導了學生及地方代表強烈主張組黨的局面，但指出兩點難處：一、黨魁問題；二、黨籍問題，一人勢難兼爲國民黨員與新黨黨員。儘管如此，記者目睹山雨欲來的態勢，還是肯定的說道：「青年熱血，會場中必有一番辯論。」⁵⁵

同時兼具國民黨總裁與三青團團長身分的蔣中正，以及在三青團內逐漸興起的蔣經國系勢力對於這次三青團的政潮究竟抱持何種立場和扮演何種角色？綜合幾名親蔣經國人士的回憶，至少可以發現，蔣經國並未公開表露出他的組黨興趣（如果有的話），不過，蔣經國希望藉著二全大會取得三青團的領導地位卻是不爭的事實，並且，蔣中正助之實現。⁵⁶早在數月前的中央幹校校友會成立會上，蔣經國就勉勵各地包括前青幹班學生在內的幹校校友們，應努力爭取充任二全大會代表，為團的「改造」出力。嗣又活動取得青年軍參加二全大會的高額席次。廬山青年夏令營活動期間，蔣經國又以中央幹校區團部的名義，散發一本題為〈我們對團的建議〉的小冊子，內容要旨在於爭取確立三青團在廣大青年中的領導地位。根據自贛南時期即追隨蔣經國，並於廬山青年夏令營中擔任營報總編輯的蔡希曾的說法，這本小冊子的實質企圖就是要讓三青團擺脫國民黨的牽制，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但是全冊內容對此閃爍其詞，沒有明確的表示。⁵⁷

然而，蔣經國在江西支團部的舊屬蔣廉儒、羅光華、徐日太等人卻以同樣的宣傳品途徑，提出了較爲明白清楚的立場。他們聯名印發另一本題爲〈團的改造〉的小冊子，痛陳三青團既往的錯誤與失敗，指出三青團今後不僅是應如何革新的問題，而且是應如何改造的問題，職是之故，他們公開主張把三青團改造爲獨立的政團。這本小冊子也在廬山廣爲散發，幾名作者另行謄寫了一份大字本呈送給蔣中正，蔣中正閱後隨即召見蔣廉儒等人，嘉許他們的

建議「很有意思」。團長親自召見江西支團部幹部的消息馬上就哄傳了整個廬山，此舉的時地人因素均耐人尋味，大家認為蔣中正已對組黨運動作出表態並給予支持，於是朝向這個目標的言論行動更加在會址內外渲染開來。⁵⁸

根據蔡希曾的回憶，事後蔣中正把他看過並圈紅的〈團的改造〉交給蔣經國，囑咐研究具體辦法。蔣經國當即召來包括蔡希曾、陳元、王昇、賴鐘聲在內的幾名親信開會討論，嗣即分工起草綱領，這時正值二全大會開幕前夕。⁵⁹大約在同一期間，蔣中正首度就二全大會與會者最為關切的三青團前途問題公開陳述他的看法，此即全代會開幕前一天（八月三十一日）在廬山舉行的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四次聯席會議上的講詞。

蔣中正這篇講詞所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助於把三青團的組黨意願推向高峰，但是嚴格說來，講詞的語意仍顯得模稜兩可，以致任何學術工作者若想「單就此文」解讀出他的真正立場，可能都將是一項危險而武斷的嘗試。但必須指出的是，當時在場聆聽演講的人士不可能（或不需要）如後世學術工作者一樣作出（或試圖作出）嚴謹周密的論證判斷，相反的，他們還比較可能順著自己的立場對蔣中正的談話作下合乎己方利益的判讀，或者乾脆選擇那些有利的段落入耳。如果基於這種角度，蔣中正這篇講話的確容易被有心人當作令人感奮的獨立宣言看待。

蔣中正正在演講中表示，這次的二全大會將要決定三青團發展的前途，和中國青年的使命

，凡此均「與整個革命的成敗，至有關係，意義至為重大」。他認為全代會應該深切研究的問題有二，首先為三青團的性質問題，再者為黨團關係問題。蔣中正提請與會者注意：決定三青團性質時，「首先要注意的，青年團應為青年的前途著想，使他們能得到進步，得到發展，和得到成功的機會」。蔣中正聲稱三青團如果能作到這一點，則國家建設便可順利進行，三民主義也可望早日實現，其理由至明，「因為本團對於本黨和國家的前途，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團的成功就是黨的成功，也就是國家的成功」。

關於黨團關係問題，蔣中正坦言：「過去黨和團的關係不確定，聯繫不密切，有時候甚至不免發生誤會和磨擦，這已是很明顯的事實，無容諱言。倘若過去的情形，不加改善，那我們黨和團的前途實在不堪設想。」至於改善之道，蔣中正似乎暗示著——雖然以「團」的立場而言，不能平添黨的困擾，但是三青團的著眼點應以「時代的使命」為前提，不能一味顧念到黨：⑩

今後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認識到今天的時代，我們要根據時代的需要來確定團的工作方向，決不能以「民國」三十五年以前革命的情形，來決定今後團的性質和任務；同時我們也不能僅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來決定團的前途。就本團來說，當然不可脫離了黨而另外成立一個獨立的政黨，以至額外增加本黨的困難。不過我們的著眼點，必須以時代的使命為前提，不能單純為增加本黨的力量來打算，否則於黨不但沒有好處，

也許還是有害處的。我們要知道：團的成功就是黨的成功，倘有一方失敗，即為整個的失敗，其理至為明顯。^①

如同蔣中正認為三青團決定性質時首先應替「青年的前途」著想，蔣中正在這裏也對今後的黨團關係提出個人的意見，即「必須以時代的使命為前提」，國民黨的利益不能成為決定三青團前途的唯一考量，他特別重複指出三青團的成功就是國民黨的成功，語間頗為耐人尋味。不過，蔣中正也補充說道：「假使這次大會決定本團仍屬於黨，那黨便應該考慮如何領導團，纔能發揮青年的力量，達成建國的任務，決不可仍如過去的情形，因循貽誤。」他對於過去三青團的表現並不滿意，由是要求每位幹部反躬自省：「試問我們如果還用過去的方法，是否還能領導青年？據我個人想，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②

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四次聯席會議翌日，即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三青團二全大會在廬山牯嶺傳習學舍舉行開幕典禮，團長蔣中正親自主持，並發表歷時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談話，略謂：這次全代會的性質和任務是要徹底檢討一九四三年以來整個團務的利弊得失，並交換工作經驗，厲行自我與相互批評，期能集思廣益，策進爾後團務的開展。蔣中正強調，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有二，一為解決中共問題完成統一，一為充實組織加緊建國。他要求與會者改革政治上的缺點，扶助多數民衆的利益。末謂三青團是團結全國青年共負革命建國大業的團體，今後如何提高青年信心，解除青年的煩悶與痛苦，確立青年報國自效的途徑，增

進青年在學問知識技能與事業上的修養，以真正促使中國青年努力於革命建國，厥爲二全大會所要精心討論的一個主題。^{⑤1}

若以議事內容區分，爲期十二天的二全大會可劃爲四個階段：一至二日上午爲第一階段，包括開幕典禮、宣讀議事規則並修正之、推選大會主席團、追認倪文亞及余文傑爲大會正副秘書長、通過大會議事日程；二日下午至八日爲第二階段，依序進行地方、學校、邊疆、海外、青年軍、中央幹事會、中央監察會團務的工作報告及檢討；九日至十一日上午第十二次大會之間爲第三階段，討論各項提案；十一日上午第十三次大會至十二日上午爲第四階段，選舉第二屆中央幹事與監察、討論大會宣言、舉行閉幕典禮（表一一）。^{⑤2}

會場內的言論砲火猛烈，開幕當天即橫生主席團選舉糾紛，故全代會第一次大會須遷延至二日下午始能舉行；^{⑤3}中央以外的各部團務報告與檢討則原定四日結束，但卻因居先的地方團務報告受大會代表抨擊甚力，致大會不能不抽調部分時間供作地方團務負責人進行答辯，其後學校、邊疆、海外、青年軍等團務報告議程遂一路延宕至六日方告完結。^{⑤4}而會場數日來的熾熱發言氣氛也在六日直達鼎沸，原因在於二全大會選擇這一天正式討論「團的性質與地位」問題。

表一一：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一九四六、九、一一—一二）

日期	時間／議程（上午）		時間／議程（下午）
九／一	九：〇〇—一：〇〇 開幕典禮與總理紀念週	一—：三〇—二：一五 預備會議	—
九／二	八：〇〇—九：三〇 臨時會議		一五：〇〇—一七：五八 第一次大會
九／三	八：〇〇—一：五〇 第二次大會		—
九／四	八：〇〇—一：五〇 第三次大會		—*
九／五	八：〇〇—二：〇八 第四次大會		—
九／六	八：〇〇—一：五〇 第五次大會		一五：〇〇—一八：三〇 第五次大會 II
九／七	八：〇〇—一：五〇 第六次大會		Φ—*
九／八	八：〇〇—九：五〇 第七次大會	一〇：一〇 總理紀念週	—
九／九	八：〇〇—第八次大會		一五：〇〇—一八：二五 第九次大會
九／一〇	八：〇〇—二：一〇 第十次大會		一五：〇〇—二〇：三〇 第十一次大會
九／一一	八：〇〇—九：三〇 第十二次大會	一〇：三〇—一：三〇 第十三次大會	—
九／一二	八：〇〇—一〇：〇〇 第十四次大會	一〇：三〇—一二：二〇 閉幕典禮	

* * * 二〇：〇〇一 同樂晚會

〇〇：〇〇一 團長會餐

〇〇：〇〇一 三至八日間（六日除外）由提案審查、宣言起草、工作報告審查等委員會分組開會

資料來源：根據《團二全紀錄》編成。

三青團前途問題衆所矚目，二全大會開幕前已是各方爭談焦點，蔣中正召見江西支團部幹部之舉以及八月三十一日聯席會議上的講話，尤足令人揣度再三。九月一日全代會開幕，與會者對主席團名單與選票問題多表不滿，然而，三青團何去何從可能還是最受關切的問題，會場內外對此甚多議論，一種普遍的看法是：蔣中正示意（或支持）三青團組黨。⁶⁷開幕日當天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蔣中正約集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浙江、福建、安徽、重慶等地團部負責人共進午餐，席間徵詢團務及對團二全大會的意見，與會者一致表示三青團應該獨立。⁶⁸

事實上，如同稍前精微奧妙的政治語言，蔣中正在行動上所傳達的訊息同樣十足的模糊不清。根據中央監察白瑜的回憶，在全代會期中，蔣中正曾兩次交代中央幹事、監察另開聯席會議。第一次蔣中正到後，含笑徘徊會場稱：「你們先討論罷。」隨即緩步退出。至於討論何事，衆人聞係組黨問題。第二次蔣中正到場並已入席，他從口袋裏取出紙條，看看後便又塞入，接著說了一些話，而後帶著嚴肅的神情離去，在座的白瑜想要發言提出兩黨問題，但盱衡大勢，未敢貿然。⁶⁹

依據長久以來浮沉於宦海的判斷能力，中國的政治人物有理由相信近來蔣中正的言談舉動正朝向有利於組黨的一方接近中。不過，明朗的一點是：直到九月六日之前，沒有人親耳聽到蔣中正對三青團組黨一事，明白表示同意或支持。¹⁰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或者還加上其他原因，例如會場內一股不小的反蔣經國氣氛等等，作為蔣中正之子的蔣經國遂對組黨事宜顯得保守謹慎得多。二全大會裏反蔣經國的空氣最初主要集矢在青年軍代表上頭，一些人認為蔣經國意欲憑藉青年軍而奪取三青團控制權，¹¹這些不同派系人馬之間的耳語營造出一股不盡友善的氣氛，並襯托出一個事實，即蔣經國在三青團裏的權力地位雖逐步上升，但尚未取得可以大致統攝全團的聲望與控制力。

九月五日當晚，原屬青幹班同學會勢力的陳開國、羅才榮、曹俊、倪志操至蔣經國下榻處探詢他對國共問題及三青團前途的立場。在黨團關係上，陳開國等人盼能了解蔣經國對於「三青團獨立組黨與維持現狀的個人意見，以備次日行動採擇。蔣經國僅表示「黨要革新，團要改造」，意即另行組黨的條件尚未成熟，唯他也指出大家可以見仁見智，就這些重大問題各抒己見，曹俊則答稱青幹校校友仍應以教育長的見解為準。¹²蔣經國的這種審慎態度，似非基於面對非嫡系人馬所可能產生的保留語氣所致，事實上，根據主張組黨甚力的王昇（橫跨蔣經國系贛南、幹校、青年軍派）的說法，在二全大會召開期間，他也曾向蔣經國提出組黨之議，然蔣經國表示國家情勢緊迫，組黨之舉並不妥當。¹³

九月六日上午八時，三青團二全大會舉行第五次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爲書記長陳誠、中央大學分團部代表步天凱、中央幹事何義均。初檢討海外團務，繼由蔣經國進行青年軍團務報告，對青年軍復員情形有詳細說明。嗣迫於時間，青年軍工作檢討經決議另定時間舉行。九時五十分，稍事休息後，大會進入討論事項議程，主題：「團的性質與地位」，實即三青團前途問題。團長蔣中正於十時許大雨滂沱之際抵達會場，連同本日下午，此係二全大會會期中，蔣中正唯一一次出席正式大會。中央常務幹事任卓宣當場提議就討論主題採取正反兩方辯論方式，蔣中正指示可先聽取一般意見，此時氣氛立時緊繃，一如大會紀錄記載：「全場空氣，頓成嚴肅緊張狀態。」由於請求發言者極爲踴躍，大會在正午時分決議下午續行討論。馴至下午三時，續開第五次大會第二次會議，主席爲陳誠，蔣中正偕夫人蔣宋美齡到場聆聽。⁷⁴

根據中央幹事程思遠回憶，第五次大會要求發言者即高達九十多人，絕大多數的發言人主張把三青團改爲政黨，凡言論及於組黨，則場中必報以一片熱烈的掌聲；中央幹事王東原也覺得一般人充溢著不滿情緒；中央監察李漢魂指出發言甚爲熱烈的現象。⁷⁵組黨派方面強調三青團必須組成新黨，方能復興中國的革命事業，所持理由爲國民黨不堪救藥，不足以肩負實現三民主義的重任；國民黨暮氣沉沉，無大振作，際茲國際詭譎萬端、國內共黨稱兵作亂之秋，必須以新的血輪、新的力量應付，在此同時，如黨團仍不分立，團的活動勢須受到

黨的支配，力量恐將無從發揮。也有一些人從兩黨制的角度出發，籲請蔣中正同意黨團分別組黨，實行政治競賽，副書記長李蒸即作如是言論，並獲致不少代表支持。⁷⁶

儘管組黨派勢浩大，但會場內仍有其他異見。根據大會紀錄顯示，這些看法至少包括：三青團應致力文化經濟建設，以軍事教育方式鞏固國防，並培養生產技術，推廣藝術生活；應重新改進國民黨，整理三青團，向積極建設方面著手，三青團不應獨立成為政治性團體；黨團不能分立成為兩個政黨，但三青團應加強獨立性，提出政治綱領，所有從政團員應遵行綱領，方能產生力量。⁷⁷

在一些反對組黨的發言內容當中，可能要以素有大砲聲名的黃宇人在下午發表的反諷式言論最為直接有力。五個多月前，蔣中正曾在一場總理紀念週上，藉著痛斥黃宇人實亦官僚的話語來宣洩他對革新運動成員的不悅之情，現在，黃宇人提醒蔣中正注意：國民黨曾有光榮的歷史，今日的腐敗無能，總裁應負主要責任，因為中央黨政大員均經由蔣任命，他們直接對蔣負責，不受輿論和民意機關監督，可見蔣所負責任最大。如果三青團要組成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就必須另簡領袖，否則，當新黨攻擊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時，以一身兼任兩黨領袖的蔣要如何自處？黃宇人預見新黨的角色可能像羽翼長成的中共一般，在備受抨擊的國民黨面前起著覬覦政權的敵對作用，這樣，兩造的同一個黨魁毋寧是相當尷尬的。黃宇人的言論具有相當的諷刺色彩，為明心志，最後他甚至激動地表示自己的棺木已經準備妥當

，以暗示無懼於蔣中正的惱怒。⁷⁶

據說會前黃宇人曾受陳立夫間接託請反對組黨，無論此說是否屬實，CC系力阻新黨成形殆無疑義。⁷⁷另一項說法則指出，陳立夫等CC系要員在廬山一再向蔣中正力諫組黨之非，並請得戴傳賢向蔣進言，這樣，CC系就起碼取得了一些黨內元老的支持。⁷⁸另外，三青团組黨之議在團中央也從來不是那麼步履一致，不少高級領導人同時在國民黨內享有政治地位，三青团一旦組黨，這些人勢必面臨政治抉擇，因此，當然也就對組黨一事不抱熱忱；而根據王世杰的說法，在這場政治運動當中，陳誠甚至還扮演反對組黨的重要角色。⁷⁹

顯然的，現階段從國民黨政權的母體內分立兩個政黨的作法，仍有技術與利益層面的窒礙處，各方觀感亦當顧及，對當下政局能否發揮正面促進作用也難獲定論。無論蔣中正原先立場為何，現在並無必要變革過鉅。六日上下午的討論過程裏，蔣中正始終只在一旁保持沈默，專注聆聽與會人士的熱烈發言，下午四時半左右，他自台下起身登上主席台發表談話，⁸⁰開宗明義說明他從未主張三青团另組一個新的政黨，大家一定是誤會他了：

今天上午聽了各位討論黨團關係的意見，有的主張黨團仍舊應該保持現有的關係，有的主張本團應應（脫）離本黨而獨立，另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大家討論到這個問題，一定是誤會了我上次在幹監聯席會上所說的話。我當時是說：團的工作性質和方向，在這次代表大會中必須予以慎重的研究。並沒有說團必須離開黨，尤其不主張團另外成立

一個新的政黨。⁸³

蔣中正接著就八月三十一日幹監聯席會議的談話用意提出說明：

我上次爲什麼要提出這個意思哩？……我一方面看到目前革命環境的險惡，一方面又看到我們黨團內部的情形如此泄沓，我在悲憤憂懼之餘，就常常自問我們黨團的工作，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方式，我們革命的事業，究竟要怎樣纔能開展哩？……恰好這個時候，本團二全大會即將開幕，所以我提出前次的意見，其目的是希望大家重整革命的陣容，發揮革命的力量，來消滅我們當前的敵人！決沒有改團爲黨的意思！⁸⁴

蔣中正反覆申明絕無再行組黨的打算，他並且對那些輕視國民黨，盼能出走自立門戶的同志表示失望：

現在的情形，我可以告訴大家，我今天如果是一個青年的黨員或團員，眼看到黨和團受到今天這樣的恥辱和誣蔑，我如果不自殺，就一定要苦心焦思，埋頭準備，來消滅我們的敵人，……但是今天一般青年的同志有沒有這種精神，有沒有這種勇氣哩？我認爲沒有！我之所以悲憤者就是在此，我覺得今天我們一般黨員團員實在太沒有志氣，太沒有勇氣了！太受不得磨練，太經不起挫折（挫折）！……試問我們今天因爲反動派污蔑本黨，就想脫離本黨，萬一明天反動派污蔑本團，我們是不是也要脫離本團哩？這種怯懦的心理。（一）消沉的志氣，實在不配作革命黨員。⁸⁵

在這篇即席講話中，蔣中正視組黨一方為「逃避現實，不敢面對困難」，維持現狀者則是「苟安偷惰，不求進步」，他指出：「這兩種心理，都是失敗主義者的心理，卑怯情緒的象徵，決不是革命家所應有。」最後，蔣中正回應一些發言者對於黨魁問題的說法：「如果黨團分立，且不說其他的條件不夠，即以兩黨共同擁戴同一領袖，這就一個笑話，而且共產黨一定作為宣傳的資料。」

不過，蔣中正也說道：「黨與團的工作決不能不劃分清楚，如果仍如現在的模糊不分，不但對黨無益，而且對團的發展也有阻礙。」蔣中正要求三青團注意勿以從政為唯一目的，團員至少在五年以內不做官，而應戮力於社會服務、建設工作，然而，三青團也需要一個明確的工作綱領，加強團的革命性與社會性，以反官僚、反貪污、反共黨。⁸⁶語畢，蔣中正即偕蔣宋美齡步出會場。大會隨後通過主席團所提臨時動議：一、關於「團的性質及地位」問題，遵照團長訓話要旨，並彙集各發言人意見，交提案審查委員會整理後提送大會討論；二、青年軍團務工作檢討改採書面方式，以免稽延大會日程。下午六時三十分散會，三青團以一九四六年二全大會為中心的組黨風潮形遭頓挫。⁸⁷

第二節 進向新的權力版圖

儘管蔣中正正在九月六日否決了三青團組黨的願望，不過，退一步來說，他仍對一般團方

幹部要求加強獨立性的心聲表示認同，此即當時所言「黨與團的工作決不能不劃分清楚」一句的真實意涵。八日二全大會舉行第二次總理紀念週，蔣中正再度明確宣示「黨和團的工作範圍及辦事幹部，應明確劃分」。⁸⁸在此同時，爲了給二全大會原訂性質地位議題提供最後的定奪依據，大會的特種審查委員會乃以蔣中正日來的言論內容爲基本精神，參酌有關提案，於八日擬就〈團務改進方案〉草案。該草案原擬提交大會討論，唯蔣中正旋以團長身分向大會交議一份〈三民主義青年團改組方案〉，特審會所擬草案遂不便再行提出。⁸⁹

細察兩案最主要的雷同點，在於要求革除既往黨團成員與幹部均見重複的現象，⁹⁰而論其差異，特審會草案側重加強三青團的政治性、革命性、獨立性，團長交議案則儼如一份組織重整的實施計畫。這份由蔣中正交下的改組方案聲稱，爲適應時代需要，加強革命力量，以掃除革命建國障礙，達成革命建國任務，三青團應即徹底改組。改組完成所需時間定爲一年，其間計分三步驟：首先辦理團員總甄核；繼而重新編組團隊及整理團務（在此階段由分隊起，按級召開團員大會或代表大會，選舉幹部，重新建立組織）；最後於一年期滿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幹事、監察，重新建立中央團部。⁹¹

從權力運作的角度看，改組方案具有清洗組織的濃厚企圖，由於蔣經國從未掩飾他對三青團改造的希望，本案又係團長蔣中正交議，以致會場有人將之視爲蔣經國旨在爭奪三青團領導權而運作提出的案子。在九日下午舉行的第九次大會上，改組方案特別遭到康澤舊部的

反彈，書記長陳誠對該案亦持保留態度。⁹²儘管如此，全代會仍貫徹了團長的意志，大會決議彙整中央監察胡庶華等三人代表主席團請示團長結果的報告，以及會場各員發言要點，簽報團長核定，交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執行。最後，整件案子凡逢「改組」字眼，均易為較溫和的「改進」二字，案名也變更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改進方案」，即此修正通過。⁹³

關於黨團人事分立問題，除蔣中正的政策性宣示，與上開二案涉及原則性的陳述外，即將產生的三青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人選更成了檢驗政策落實與否的標的。九日上午第八次大會討論「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選舉辦法」，事前本案先由蔣中正指定賀衷寒、蔣經國、陳布雷、鄭彥棻、李樹森、倪文亞等人研討，除陳布雷外，餘皆富強烈的團方色彩。這項辦法排除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含候補）繼續跨任三青團中央幹事監察（含候補）的可能性，並獲大會通過。翌日，國民黨喉舌南京《中央日報》以「黨中委不能參加競選」充作二欄標題，團方媒體南京《和平日報》指出此案尚須「靜候團長批示」，「預料有成立可能」。⁹⁴

連日大局演變至此，國民黨似非徹底退出本位意識日高的三青團不可。三青團中央幹事吳紹澍、陳雪屏、何浩若、趙仲容等人當即於九日聲明放棄他們在國民黨內的中央委員（含候補）身分，轉而投入三青團本屆幹事會競選——在團內，這些人向來被認為屬於團方勢力。依據九日大會通過的決議看來，任何一名兼具黨團中央要職的人員都必須選擇一邊作為自

己的政治歸屬，不過，同為國民黨中常委與三青團書記長的陳誠是僅見的例外。二全大會特別通過臨時動議，以書記長陳誠「多年以來，卓具勞績，仍請其參加競選，繼續為團服務」，而其餘不願放棄國民黨中委身分的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致無法繼續取得參選本屆中央幹事監察選舉資格的人們，則將由二全大會呈請團長核聘為不具實權的三青團指導員或顧問一職。⁹⁵

儘管吳紹澍等人率先聲明願意放棄黨職，然而，具備國民黨中央委員身分的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來自各派系，包括所謂團方）大多自動放棄了他們在三青團選舉中的候選人資格，這意味著如果必欲抉擇，執政的國民黨終究還是這些政治人物最為屬意的活動場域。⁹⁶不過，其中一些人經由蔣中正的指定，很快又回到了三青團的候選人行列當中，例如倪文亞、程思遠、黃宇人、劉健群等。到最後，人們發現國民黨並沒有完全從三青團最新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的候選陣容裏消失，反而是在歷屆中央幹事會裏人數持續銳減的CC系要員（三青團內，嚴格意義下，相對於團方的黨方），先前既經自動放棄候選資格，復又未得蔣中正事後指定，到十一日投票之前，以陳立夫為首的該系勢力幾乎注定退出三青團。⁹⁷

十二日，二全大會舉行閉幕典禮，大會秘書長倪文亞宣讀蔣中正核定的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名單，計有中央幹事七十二人，候補幹事二十五人，中央監察四十九人，候補監察十五人。以中央幹事會為例，陳誠、蔣經國排名居起首二位；在美國的康澤以國民黨中央執行

一七	陳介生	復興社／黃埔五期	四川	三三	楊玉清	復興社	湖北孝感
一八	任覺五	復興社／黃埔四期	四川灌縣	三四	寇永吉	復興社	甘肅
一九	湯如炎	復興社／黃埔四期	湖南醴陵	三五	季天行	黃埔六期	貴州貴定
二〇	吳紹澍	親朱家驊	江蘇松江	三六	李天民	復興社／黃埔六期	四川華陽
二一	李國俊	復興社／黃埔四期	廣東五華	三七	張宗良	復興社／親陳誠	安徽廬江
二二	涂公遂	復興社	江西修水	三八	余拯	復興社／黃埔六期	湖北沔陽
二三	駱力學		甘肅天水	三九	周天賢		湖南臨澧
二四	黃珍吾	復興社／黃埔一期	廣東文昌	四〇	戴仲玉	復興社／黃埔五期	福建長汀
二五	鄭彥棻	粵／親蔣經國	廣東順德	四一	張作謀		甘肅洮沙
二六	詹純鑑	蔣經國系	江西婺源	四二	李友邦	黃埔二期	台灣台北
二七	李蒸		河北潞河	四三	楊爾瑛	復興社	陝西榆林
二八	程思遠	新桂系	廣西賓陽	四四	胡維藩	復興社／黃埔六期	浙江遂安
二九	李俊龍		湖南湘鄉	四五	吳春曙	復興社	福建南安
三〇	吳兆棠	復興社	安徽休寧	四六	周南	復興社	河南鄭縣
三一	萬昌言	親張治中	安徽巢縣	四七	郭澄	復興社	山西陽曲
三二	胡軌	復興社／黃埔四期	江西萍鄉	四八	王煥彬		松江呼蘭
		／蔣經國系		四九	臧元駿	復興社／黃埔四期	山東濟寧

五〇	袁永馥	復興社	四川安岳	六七	覃異之	親蔣經國／黃埔二期	廣西宜山
五一	沈祖懋		浙江桐縣	六八	睦光祿		四川廣漢
五二	章贊唐	新桂系	廣西容縣	六九	胡木蘭	粵系	廣東番禺
五三	王甯華			七〇	吳菊芳	粵系	安徽
五四	馬敦靜		甘肅	七一	許素玉	蔣經國系	安徽歙縣
五五	徐會之	黃埔一期	湖北黃岡	七二	徐復秋	復興社／親蔣經國	廣東汕頭
五六	艾沙	泛土耳其主義派	新疆	◀候補幹事			
五七	陳雪屏		江蘇宜興	排序	姓名	派系屬性	籍貫
五八	任國榮		廣東惠陽	一	蔡勁軍	復興社／黃埔二期	廣東萬寧
五九	田培林		河南襄城	二	許伯超	復興社	四川華陽
六〇	竺可楨		浙江會稽	三	羅才榮	復興社／黃埔系	四川瀘縣
六一	上官業佑	復興社	湖南石門			／親蔣經國	
六二	常德普		河南鎮平	四	曹俊	親蔣經國	江蘇寶山
六三	韋潤珊		浙江東陽	五	周世光		松江
六四	陳烈甫	復興社	福建廈門	六	穆提義		新疆吐魯番
六五	李壽雍	CC?	江蘇鹽城	七	王志遠		廣東
六六	黃宇人	復興社／黃埔四期	貴州黔西	八	杜元載		湖南淑浦

九	鎮天錫		湖北當陽	一八	劉廣瑛	復興社／黃埔四期	遼寧瀋陽
一〇	劉真	親陳誠	安徽鳳台	一九	韓文溥	軍校高教班二期	廣東瓊山
一一	劉樹勛	黃埔四期	湖南益陽	二〇	劉先雲	親陳誠	湖北大冶
一二	祁宗漢	復興社／親蔣經國	湖北沔陽	二一	蕭忠國	復興社／親蔣經國	湖南瀏陽
一三	陶維琪		甘肅臨夏	二二	魯冀參	黃埔六期	湖北監利
一四	鄧發清	親復興社	四川重慶	二三	張興周	復興社	河北靜海
一五	汪秀瑞		安徽休寧	二四	經天祿		綏遠
一六	王學緒		四川達縣	二五	林一民		江西上饒
一七	林民銘		福建福清				

資料來源：名單的部分，見《團二全紀錄》，頁一五三；派系屬性與籍貫的部分依據徵引書目相關資料編成。

一九三八年三青團成立伊始，復興社在中央臨時幹事會（三十一人）裏所占幹事人數（五人）少於CC及其親近勢力（十人）。唯自一九三九年起，復興社在中央幹事會所占幹事名額即已超越CC，此後復興社與CC的比例差迭次見增：一九三九年中央幹事會幹事定額五十人，復興社計十四人（或略多），親CC者十一人；一九四一年中央幹事會幹事定額六十八人，復興社計二十四人（或略多），親CC者九人；一九四三年產生的第一屆中央幹事

會幹事定額九十七人（含候補），復興社連同黃埔系經本書辨識得出者已達幹事會定額的半數，親CC勢力僅有十人上下；一九四六年，CC系幾乎悉數退出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復興社連同黃埔系目前經辨識得出者大致仍占九十七名幹事定額（含候補）中的半數。必須注意的是，第一、二屆中央幹事會仍有尙待辨識證明爲復興社方面的幹事，是以復興社與黃埔系的實力當在現能確知的五成比例之上。

二全大會閉幕典禮除宣布新任中央幹監成員、團長致詞之外，會議先是宣讀稍早討論修正，並經團長核定的大會宣言。一九四三年的一全大會宣言曾以熱情的筆觸，幾近白話的平易體裁將三青團從國民黨久已沉滯無奇的宣言文化中超脫出來；這一次，自詡三青團「今日已成爲吾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青年團體」的二全大會宣言進一步對國際與國內時局提出意見，政治意味顯然重於一九四三年的宣言。⁹⁸人們熟知三青團飽富政治興趣，這種興趣在一九四六年二全大會上的極致表現即爲澎湃的組黨風潮，儘管組黨之議橫遭中挫，二全大會在九月十一日藉著取消團章內有關入團年齡以三十歲爲上限的決議，還是爲自己爭取到更接近政黨形式的有利條件，唯蔣中正對此不表同意，翌年三月十二日公布的新修正團章在團員年齡項下遂仍維持舊貫。⁹⁹

二全大會閉幕後旋即舉行新任中央幹事監察聯席會議，九月十四日選出蔣中正提名的中央常務幹事、監察、幹事會正副書記長等。陳誠連任中央幹事會書記長，袁守謙、鄭彥棻爲

副書記長，袁乃黃埔系、復興社勢力，鄭親蔣經國一方。十五名中央常務幹事依序爲陳誠、李蒸、張其昀、賀衷寒、趙仲容、何浩若、鄭彥棻、袁守謙、黃少谷、黃宇人、倪文亞、蔣經國、程思遠、何聯奎、湯如炎，黃埔系與復興社合占七人，親蔣經國勢力亦當在三成至半數之間（內疊有部分復興社員），CC系則已無人在列。⑩十月，中央幹事會機構人事依二全大會決議和蔣中正指示重行規畫調整，計分五處一室多會，組織與訓練職權劃歸第二處，處長蔣經國，主任秘書則由蔣經國的留俄同學俞季虞擔任；另第五處主管視察督導研究，處長胡軌，亦屬親蔣經國勢力。⑪

三青團的權力版圖自二全大會後產生絕大變化，CC系落，蔣經國系起，黃埔系與復興社仍爲中央到地方的團務主力。而蔣中正不次擢拔蔣經國，並賦予團的組訓重責，此後三青團能否擺脫復興社色彩過濃的現象實堪令人注目。⑫在蔣經國轄下的第二處，副處長之一的劉真爲親陳誠人馬，然劉真自承知所分際，人事與經費一概不問，以示尊重。⑬儘管蔣經國狀似掌握實權，不過其親信蔡希曾卻說「實際上是頭重腳輕，浮而不實」，此中癥結仍在於康澤舊部在地方上盤根錯節，面對復興社的組織基礎，蔣經國如蔡希曾所言，爲一「空頭處長」，指揮難能暢意，全團組訓頓形渙散；另一方面，蔣經國治下的中央幹校甫與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合併，幹部培育來源一時阻絕，此爲蔣經國在組訓工作的又一挫折。⑭

二全大會通過的三青團改進方案未能有效執行，這恐怕也反映了蔣經國難能充分施展權

力的一个面向。如前所述，該方案有如一組織的清洗藍圖，一般認為蔣經國與該案關係密切，其目的在於爭取並鞏固對三青團的領導權。然而，改進方案只進行了第一階段，即團員總甄核。藉著重新登記甄別審查，三青團將可以汰除那些剋虧職責、罔顧紀律，與信仰不堅的消極份子。⑩這項自一九四七年一月展開的總甄核運動可能達成部分開辦的初衷，即淘汰了一些不良或消極的份子，不過，它也替某些對三青團深感失望的成員製造自然揮別的機會。截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參加團員總甄核的團隊所呈報中央並經覆審的結果為例，一百五十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名所屬團員中有七千零六十六人覆審不合格，占總數的〇·四七%，九十萬六千九百四十七名團員則根本未參加（或尚未參加）總甄核，比例高達總數的五九·八四%。⑪

沒有人知道總甄核最終的完整相關數據，因為並非每一個單位都在辦理甄核作業，而且作業時間延宕過長，⑫在它它可以宣告結束之前，理當沒有一個省市團部依改進方案第二階段的指示「重新建立」，遑論第三階段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構想。更重要的是，在甄核作業仍在辦理的期間，三青團早已被迫接受與國民黨合併的命運——蔣中正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正式發表了該政策性聲明。

註釋

- ①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頁六二；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第七冊，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頁三〇二；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一〇一；鄭彥棻，〈永懷唐乃建兄〉，頁二〇九。
- ②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九九—一〇一。
- ③ 美國朝野有將三青团視為法西斯組織、特務機關者，蔣中正知悉這些人的看法，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常務幹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紀錄〉，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近朱」。另見：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七—一三八。
- ④ 例如在三青團內主張兩黨說不遺餘力的何浩若，其見解亦大致如是，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
- ⑤ 詳見第二章第三節所提供的數字、表格，與討論。
- ⑥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下冊（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頁五五四。
- ⑦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 802.

⑧ 詳見第三章第二節。

⑨ 因此，從國民黨六大大會以後，三青團的地位要較以往更顯得尷尬不明。有關國民黨續行指導的例子，參見《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三七，五二—五三，七〇—七一，一一三，二三〇，二三二，二四八—二四九，三六三。

⑩ 白崇禧在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後，將他的想法及三種案子呈送蔣中正參考，蔣隨即批交給黨團雙方核議。就目前可以取得的國民黨官方文獻來看，五月十五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常會推派了一個跨派系的小組負責研究這個問題，含白崇禧、陳立夫、梁寒操、陳誠、朱家驊、吳鐵城、劉健群等七人，由吳鐵城、陳誠召集之。第三十次會議，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二二四。

⑪ 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呈遞給蔣中正的意見書裏所言，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三五五—三五六。

⑫ 以日報與經濟事業為例——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為止，亦即三青團二全大會召開前三個月：經三青團中央補助，由各支團興辦的日報凡十六種，出版地均為通都大邑；各級團部總計開設紡織、造紙、印刷、電氣、煉油等工業場廠共十九個單位，生產合作社二十所，消費合作社四十七所，農場十三所，林場三十一所。《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八月，頁一九四—一九五，二三三—二三四。

- 13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臨時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附錄，頁二二六—二二七。
- 14 〈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研擬青年團改隸政府後如何加強業務方案限期呈核手令〉，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黨」一三七／五四，毛筆原件。
- 15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頁一—六，「二」七二八／〇二六；〈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八月，頁三，四七。
- 16 〈馮敬儒、吳梅筠、陸冠勳等三人之三青團員登記表、團證、宣誓書等〉，「二」七二八（四）／二三；中央直屬國立中正大學分團提，〈請切實整理團籍並換發正式團證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五冊，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頁四，「二」七二八／〇三八。
- 17 〈團史資料〉，頁一八四—一八五。
- 18 〈黨大全紀錄〉，頁二〇一。
- 19 〈中央幹事會命令〉，青幹組字第七二二〇號，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中央團訊〉，第三卷第二期（重慶：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一日），頁三。
- 20 參見：李清悚，〈南京市參議會的派系鬥爭〉，〈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南京：一九八一年七月），頁一四九；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四一；羅才榮，〈懷念包華國陳介生兩先生〉，頁七三—七四；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3.

⑲ 詳見：李清悚，〈南京市參議會的派系鬥爭〉，頁一四九—一五三；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四一；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頁七七。

⑳ 詳見重慶支團部書記羅才榮的回憶，羅才榮，〈才榮自述〉（台北：親屬自印，民國七十四年）；懷念包華國陳介生兩先生，頁七三—七五；〈在群眾戰場的勝利〉，頁三三—三五；〈重慶市議會的民主鬥爭〉，〈才榮文稿〉，續二，頁三六—四三。陳介生看重的是未來的市長大選，不料格於形勢未逮舉行，而國民黨政權已失。羅才榮就堅信，如果時間允許，重慶民選市長將是屬於三青團的。

㉑ 華容分團幹事長潘志中的回憶，〈華容參議會選舉中的黨團之爭〉，〈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三七—三八。

㉒ 楊曉麗，〈衡陽市參議會選舉紀實〉，〈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頁一二〇—一二一；文傑，〈常德黨團爭權奪利的見聞〉，〈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頁五六。

㉓ 龔勵初，〈湖南省參議會CC派和三青團爭奪見聞〉，〈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頁二二—二五，二七；葉國素，〈薛岳統治湖南時期的黨團鬥爭內幕〉，頁二一；王進三，〈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始末〉，頁六七—六八。

㉔ 參見：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四，一九五；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六一—六一。

㉕ 根據康澤的說法，以往三青團重要人事案，康均參與意見，而團一全大會後的中央人事改組，不僅沒

有讓他參加意見，連組織處的兩個副處長人選，也沒有徵詢他的意見，康澤認為這是因為張治中開始捧蔣經國來打擊他的緣故。詳見：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〇；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五九—六〇；謝然之，〈從馬家寺到復興關〉，頁一七；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七八—八〇；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六一—六二；江南，〈蔣經國傳〉，頁一二四—一二五。唐縱日記有「張書記長對兆民頗不滿意」一語，張書記長即張治中，兆民即康澤，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四日，頁三五—。蔣中正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手令教育長一職由蔣經國擔任，在未到職前，由三青團訓練處長李惟果暫行兼代。八月十一日設立籌備會，並派蔣經國為主任委員。十月二十六日起接收青幹班設備。十二月一日教育長蔣經國到職，中央幹校正式成立。有關中央幹校的官方記載，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四年三月，頁五五—五六；〈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二二—二二九；〈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八月，頁一七七—一七九；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七十八年），頁一四三—二〇二。

28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八〇，九八—九九；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二—六三。

29 詳見：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〇—六四；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

頁一二五—一三六；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〇—一一二；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六一六—六一七；江南，〈蔣經國傳〉，頁一二七—一二九。

③ 蔣中正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致蔣經國電，引自：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四。

④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八三—八五、八八—八九。

⑤ 據康澤回憶，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某日，張治中告訴康澤稱，蔣中正近來數度責斥康澤把持三青團造反。康澤自付從六全大會閉幕後，蔣中正即不再約見康澤，「大會開得不好，對我可能有些誤會，加上張治中和陳立夫們的浸潤中傷，可能誤解更深。」是以康澤認為，張治中轉述蔣的責語即或有夸飾之處，但應非完全捏造。康澤遊歷歐美，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逕行返國為止，共計一年五個月。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五—一一七；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七）〉，〈傳記文學〉，第六八卷第三期（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頁一一二—一二二；康澤（遺稿），〈康澤自述（八）〉，〈傳記文學〉，第六八卷第四期（台北：民國八十五年四月），頁一一五—一一九；康澤，〈蔣介石爲什麼叫我到襄陽去當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頁一；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四；羅才榮，〈我爲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頁三〇；李以劭，〈兩度相隨蔣經國的經過及見聞紀實（下）〉，〈傳記文學〉，第六七卷第五期（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頁九三；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

四；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二；〈團史資料〉，頁九〇；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

③ 筆者於本節前段曾經強調了團方領導階層在一九四六年國民黨中常委選舉的突出表現，不過讀者當可理解筆者旨在說明三青團日臻耀眼的政治表現，這種表現有助於呈現三青團要求被承認為一政治實體，甚至組黨的行動背景。筆者絕非認為三青團（或者說復興社）在國民黨內取得了結構性優勢，事實上，在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的時期，他們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達到或接近過這種優勢。一個很容易理解的線索是，團方獲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的名額仍然有限，這種實力不足以支應他們在一九四六年取得六分之一の中常委席次，除非像筆者在第三章第三節所陳述的情節那樣，是同他們的宿敵CC系合作得來。

④ 根據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中，七十萬名團員的入團統計表顯示，八四·二二%的團員未曾加入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任何黨派，一五·七%曾加入國民黨，〇·〇八%曾加入其他政治團體，〈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頁一一七。

⑤ 參見：謝寶珠，〈牯嶺記者群怎樣獵取新聞〉、章，〈蔣主席在夏都牯嶺〉，〈新聞天地〉，第一五期（上海：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頁一五一—一八；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七六七。

⑥ 陳誠，〈今後團務發展的途徑〉，一九四六年七月，「二」七二八/二二二；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陳誠正式視事之前，副書記長劉健群曾暫時兼代書記長一職。

37 康澤，〈蔣介石爲什麼叫我到襄陽去當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頁一；苗紫，〈青年團組黨之謎〉，〈南京人報〉，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

38 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七—六九；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三—一七五；陳敦正，〈動亂的回憶〉，頁八三；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頁一五六。根據陳開國的說法，蔣經國仿照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把原中央黨務學校的畢業學員列爲第一期畢業學員的先例，建議將原青幹班畢業學員納入中央幹校體制，此議經蔣中正批准後，蔣經國即授意胡軌和在中央幹校任事的原青幹班同學江海東、詹壽山等，與青幹班同學會常務理事羅才榮、鄭森榮、陳開國商量，其後經過更多位的常務理事互相交換意見，覺得雙方都能藉此受益，於是同意改組青幹班同學會爲中央幹校校友會，由蔣經國統一領導，並於六月下旬舉行中央幹校校友會成立會，蔣經國、胡軌亦到。不過，根據當時親蔣經國的蔡希曾回憶，之前不少青幹班學生早已見風轉舵，自稱爲蔣經國的學生。俟這一年的春天，在重慶各部門任職的青幹班學生爲了取得中央幹校學籍，正式集會聚餐，聯名向蔣經國上致敬書，蔣經國偕同胡軌、王政、蔡希曾等親赴會場。

39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三七—一三八。

40 羅長安，〈國民黨青年軍及其廬山會議〉，〈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二輯（南昌：一九八三年九月），頁八〇—八二。

41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五。其中有緊急取得國籍始當選代表者。青年軍代表人

數係依三青團二全大會印發的代表手冊內載名單逐一清算得來，〈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手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二」七二八／〇〇七。

⑬〈各學校團隊出席學生代表名單〉，〈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關於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學校學生代表補課補考問題的來函〉，一九四三年，「二」五／〇一五七四；〈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人員名冊〉；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四冊，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頁四九一五〇；張治中，〈樹立團的作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升旗禮講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青年通訊〉，第三卷第四期（重慶：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頁三三。

⑭精確的數字仍待尋求。全代會召開前，上海〈大公報〉指出學生代表占代表總數四分之一強，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筆者在代表手冊裏依據各人年齡、學歷、現職等欄的記載，推測出一百七十人上下的參考數字，這個參考數字大致可以證實〈大公報〉的報導。谷正綱於全代會閉幕後對記者表示學生代表占有四百多名，這個數字顯然被誇大了，也許谷的原意是學生代表占有出席代表總數的四分之一，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

⑮參見上海〈大公報〉在二全大會召開前與召開期間的報導，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九月五日。另見：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六。

⑯特種審查委員會提合併審查各案一覽表，〈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一九四六年九月，議案全文頁一七〇—一七三，「二」七二八／〇三九，以下簡稱〈團二全紀錄〉。在出席

大會代表的四十二件關於三青團性質地位的提案當中，只有三個團體在案由裏明白呼籲黨團精誠團結、黨團一元化、加強黨團聯繫，他們是中央直屬西北農專分團部（提案第八號）、東北大學分團部（提案第一〇八號）、上海法學院萬縣分院分團部（提案第六〇六號）。

45 雲南支團部提，〈請重新確定本團性質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五冊，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頁三一，「二」七二八／〇三八，以下簡稱〈團二全提案〉。

47 甘肅支團部提，〈遵照三民主義改進政綱政策繼承團的組織改組獨立政黨以期順應時代潮流適合國家需要發揮新生力量完成國民革命案〉，〈團二全提案〉，第七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頁六〇，「二」七二八／〇三八。

48 同前註，頁六〇一六二。

49 韓文溥等十七人提，〈確定本團為獨立政黨案〉，〈團二全提案〉，第五冊，頁八一—一二。這項提案建議三青團的名稱及組織維持不變，並尊奉創立者蔣中正為領袖。

50 提案人為中山大學分團部幹事長任國榮、湖北支團部書記劉先雲、四川支團部書記許伯超、雲南大學分團部股長李紹武、中央候補幹事周天賢、中央大學分團部代表步天凱、河北支團部代主任張興周、貴州支團部幹事鄭代恩、西南聯大分團部股長曹振庸、中央候補幹事寇永吉、中央候補監察胡維藩、顧鈞如（所屬團部與職銜不詳）、中央候補幹事兼漢口區團部主任郎維漢、中央候補監察張超、中央幹校訓導陳茂銓、河南支團部書記周南、社會教育學院分團部監察陳定閻、中央幹事劉世達等十八人

。從提案內文將獨立後的三青團與國民黨等同視爲「獨立政治團體」，以及提案人以中國第二大黨相期於獨立後的三青團看來，這項提案的目的實際上與要求組黨並無差別。任國榮等十八人提，〈爲適應當前政治環境及革命需要，應重新確定本團性質及地位案〉，〈團二全提案〉，第五册，頁一一二。提案人主張：爲保持三青團的革命歷史，獨立後的新政治團體名稱仍應照舊，至於領袖人選則由蔣中正考慮決定之。

51 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2.

52 筆者尙未見到當事人對其原因做出解釋，易勞逸同樣引用了上海《大公報》的報導，但他也沒有提出任何分析。幾個可能的線索是：這些三青團的中央級幹部涉入國民黨政治過深；仍未能偵知蔣中正對三青團走向的最後、最真實的態度；擔心三青團一旦組黨將會是個別派系或個人的得利；或者，只是純粹因爲在上位者習見的審慎保守作風所致。

53 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2. 只有極少數人另外提出特殊的意見，例如中央幹事張其昀建議仿效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的制度，改三青團爲全國青年管理處，做爲學校以外訓練青年的常設機構，並與教育部、國防部、工商部合作，授與青年各種有用技術，從事生產事業，朱高影，〈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頁一五七—一五八。

54 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梁上賢、田秉德，〈三青團在湖北的組織與活動〉，頁六五；劉先雲（口述），遲景德、

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〇—一三一；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六。

55 謝寶珠，〈牯嶺記者群怎樣獵取新聞〉，頁一五；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

56 筆者主要參酌了三人的憶述文獻，蔡希曾（省三）、王昇、陳開國。前兩人自贛南時期即追隨蔣經國，陳開國則為復興社分子，在中央幹校校友會成立之後形同「收編」。稍後筆者將會陸續引用他們的回憶。

57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七。這本小冊子在二全大會召開期間的會場上，仍然廣被發送。

58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七；蔣廉儒，〈向三中全会迫切建議：再論團底改造，請宣佈「還團於青年」〉，南京《救國日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蔣廉儒在一九四七年發表的這一篇文章裏提到，去年蔣中正召見時，對他們在小冊子中的各點檢討與建議「深表同情贊許」。

59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七—一七八。

60 程思遠談到大家對此部分的理解如是，但程說的是二全大會開幕詞，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四。官方公布的開幕詞全文裏不見程引用的話語，倒是八月三十一日這篇講詞有。

61 蔣中正，〈中國青年的使命〉，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廬山對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四次聯席會議講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一，頁四〇〇—四〇一。

62 蔣中正，〈中國青年的使命〉，頁四〇—四二。

63 蔣中正，〈青年團代表大會開會日訓詞要點〉，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經過〉（以下簡稱〈會議經過〉），均見〈團二全紀錄〉，團長訓詞頁一—六，會議經過頁二—二二；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

64 〈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二六。

65 九月一日的主席團選舉糾紛起因是選票未蓋印編號，候選名單只由幹監會議的主席團提出，開票時又「憑空」多溢數十票。當天午後，大會因此選舉糾紛，臨時宣告停會。翌日上午改開臨時會議，首先報告關於推選主席團人選案，請大會公決，當場發言者九人，其中有對選舉不當處指摘甚烈者，嗣大會准照中央幹事兼組織處副處長湯如炎提議，將主席團名單呈請團長重新核定，事乃暫息。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頁三六一；〈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一。

66 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二四；〈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表及代表名單等〉，一九四六年，「二」七二八（四）／一五，這一份日程表係二全大會開幕前規畫的草案。

67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四；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八；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頁三六一。

66 劉先雲，〈劉先雲日記〉，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引自：陳進金，〈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湖北（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頁一六二。

69 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二〇二。

70 或許這時蔣中正的心中對組黨問題仍未具有堅定的、最終的立場也說不定。總之，繼續期待，甚至主動挖掘更深入的文獻資料絕對有其必要。讀者當可發現筆者將分析的焦點放在全代會與會者的認知上，畢竟同蔣中正的態度相較，這些人的認知與行為都要來得更為真實，並且能夠鋪陳出可信度較高的情節。

71 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三六。參見：羅長安，〈國民黨青年軍及其廬山會議〉，頁八二；康澤（遺稿），〈康澤自述（八）〉，頁一一六—一一七；苗紫，〈青年團組黨之謎〉。

72 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九。

73 尼洛，〈王昇〉，頁一〇一。

74 〈會議經過〉、〈第五次大會（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第五次大會（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四，會議紀錄頁六七—八〇。以下場合蔣中正均到並親自主持：九月一日開幕典禮與總理紀念週、預備會議，七日午間會餐，八日總理紀念週，十二日閉幕典禮。不過，蔣中正只在六日上午出席了二全大會的正式會議，這顯示他對當日議程的重視。稍早，大會主席

團曾決議敦請蔣中正於六日蒞臨會場聽取代表對三青團前途的意見，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

75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頁一七二；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頁三六二。參見：劉先雲，《劉先雲日記》，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引自：陳進金，《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湖北（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頁一六一。

76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張香譜，《金山憶舊（五）》，《中外雜誌》，第一二卷第五期（台北：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頁四九；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七〇。

77 《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四。

78 參見：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二七；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一九六；張香譜，《金山憶舊（五）》，頁四九；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3.

79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參見：康澤（遺稿），《康澤自述（八）》，頁一一七；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二八。

80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八。國民黨政權內的兩黨說流傳有時，戴傳賢例不表贊同，王世杰回憶某次在重慶南岸討論及此，戴稱周朝統治有八百年，國民黨不能少於八百年，亦即反對分裂，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七冊，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頁三〇二。

81 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七冊，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頁三〇二。日記內文「三十六年」應為「三十五年」之誤。

82 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七〇。

83 蔣中正，〈青年團的性質和工作的方針〉，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出席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訓詞，〈團二全紀錄〉，團長訓詞頁七一八。

84 蔣中正，〈青年團的性質和工作的方針〉，團長訓詞頁八。

85 蔣中正，〈青年團的性質和工作的方針〉，團長訓詞頁八一九。

86 蔣中正，〈青年團的性質和工作的方針〉，團長訓詞頁九一一二。

87 〈會議經過〉、第五次大會（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四，會議紀錄頁八〇。在九月八日的總理紀念週上，蔣中正對三青團重申不可採取組黨的下策，團員須打破以從政做官為出路的傳統觀念，他認為，假使每個團員都能埋頭從事基層工作，團的政治性和鬥爭性自然就會提高，「如果不此之圖，徒然斤斤於組織一個政治團體，則以我們主觀條件的缺乏，又加上客觀環境的惡劣，即令組織成功一個政黨，」也絕對趕不上具有五十餘年歷史的本黨，這是可以斷言的。蔣中正，〈青年團與社會基層建設〉，〈團二全紀錄〉，團長訓詞頁一三一—一九。

88 蔣中正，〈青年團與社會基層建設〉，團長訓詞頁一八。

89 〈團務改進方案（草案）〉，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二」七二八（四）／一五；〈團二全紀錄〉，議

案全文頁一七三。

90 關於成員問題，特審會草案規定「黨籍團籍應劃分清楚」，團長交議案則稱「團員兼為黨員者，應就其志願自行認定祇參加團或黨的組織及活動，以免重複」。關於幹部問題，特審會草案只說「黨的中央執監委員除團長特許者外，以不兼任團的中央幹事監察為原則」、「各地黨的執監委員以不兼任團的各級幹事監察為原則」，團長交議案則明白表示「團的幹部不得兼為黨的幹部，各級幹部均須實際負責」。在不同的問題上，兩案要求的嚴格度不一，然而，要求黨團成員與幹部不再重複的出發點基本上是一致的。

91 〈三民主義青年團改組方案〉，一九四六年，「二」七二八（四）／一五。

92 苗紫，〈青年團組黨之謎〉。

93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錄〉，一九四七年一月，頁九—一〇，「二」七二八／〇四〇；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

94 〈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五；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

95 〈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五—二六；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參見：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陳誠作為僅見的特例，當然是將國民黨總裁、三青团團長蔣中正存而不論的結果。

96 這些人來自CC系、黃埔系、復興社、朱家驊系、政學系……各方面。經記者揭露的名單見：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

97 參見：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三青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的候選人與當選人名單，〈第十三次大會會議紀錄〉，〈團二全紀錄〉，會議紀錄頁一四七—一五四。

98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大會宣言頁一—九，會議經過頁二—六。在國際局勢方面，宣言對強權政治、菲律賓獨立、印度成立臨時政府等問題作了簡單評論。三青團的關注焦點還是放在國內，宣言痛心疾首於國家的內亂與民生飽受剝削，有所期於中共及其他黨派，同時也籲請政府徹底實行民權、民生主義，確立民主憲政基礎，認真執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政策。

99 依照二全大會決議，未來凡國民年滿十六歲者都將是三青團吸收的對象，但由於蔣中正「另有指示」，入團年齡規定乃維持不變，亦即仍為「年滿十六歲至三十歲」之間，「各級幹部及其他經中央團部特許入團人員，得不受上述年齡之限制」。〈團二全紀錄〉，議案全文頁一八三，一八五；〈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錄〉，頁四一—四二。

100 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至於中央常務監察則有五名：譚平山、劉健群、朱經農、李曼瑰、朱光潛，本屆中央監察會未設書記長一職。《中央日報》與《和平日報》所公布的人事排名一致，但並不符合這些常務幹事監察原本在中央幹事

監察裏的排名順位。

⑩復興社（連同黃埔系）與CC系在歷屆中央常務幹事會的人數消長，見下列附表（本表據以統計分析的名單係以各屆經團長指定或提名所產生的原始人事為準；CC系內兩個差額係指張厲生、段錫朋，一般而言，二人也被同時視為親陳誠的勢力）：

屆	別	復興社／黃埔系	親CC	其他	合計
	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一九三八）	二	三一五	四一二	九
	中央常務幹事會（一九三九）	三	一一三	五一一	九
	中央常務幹事會（一九四一）	四	三一五	四一二	一一
	第一屆中央常務幹事會（一九四三）	七	二一四	六一四	一五
	第二屆中央常務幹事會（一九四六）	七	〇	八一五	

⑪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七二；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八一；胡國台（訪問），郭瑋瑋（紀錄），〈劉真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頁四三—四四。

⑫蔣經國對三青團被辦成「康家團」的局面私下極表不滿，李以助，〈兩度相隨蔣經國的經過及見聞紀實〉，頁九三。

⑬胡國台（訪問），郭瑋瑋（紀錄），〈劉真先生訪問紀錄〉，頁四三—四四。

④康澤舊部在二全大會中對蔣經國會一再掣肘，參見：苗紫，〈青年團組黨之謎〉。蔣經國在第二處處長任內頗表消極，他調集親信俞季虞、徐炳南、蔡希曾到處內辦公，人稱「蔣處長室三人小組」，蔣經國個人則少露面，這與康澤積極投入團務的熱情不能同日而語，參見：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一—一七二，一八一—一八二。關於中央幹校與中央政校合併一事，詳見第五章第一節。

⑤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爲舉辦團員總甄核告全體團員書〉，一九四七年一月，「二」七八／〇四三；蔣中正，〈青年團工作的新方針〉，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對團員總甄核督導人員講詞，「二」七二八／二二四。

⑥〈三民主義青年團全國團員總甄核統計表〉，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七年八月。

⑦新疆、東北省市及海外團隊奉令免辦，台灣支團延期辦理。團員總甄核實施辦法於一九四七年一月頒布，蔣中正曾指示須於三月內完成甄核作業，不過，自二月初全國分十四區，派中央幹事監察督導辦理以來，遲遲未能完成，而六月底蔣中正已宣布黨團合併。〈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七年八月，頁八七。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三三六

第五章 黨團統一與黨權鬆落

作爲一個政治實體，三青團自認有別於國民黨，分離意識強烈。這種分離意識在一九四六年的二全大會上達到八年以來的最高點，蔣中正隨即用個人威權暫時打消了三青團的急進企圖，組黨呼聲爲之頓挫。不到一年，蔣中正進一步決定統一國民黨與三青團的組織，以資根本解決黨團問題，並藉此「政治革命性」行動改造國民黨。然一九四七年的黨團統一作業未能全盤順利執行，三青團雖在黨團統一決策之下被迫放棄自己的自主性組織身分，然派系實質仍在，分離意識未減；黨團復以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的選舉爲戰場，雙方競逐政治席位，黨團關係只能日趨谷底。自這種氛圍脫穎而出的當選人進入一九四八年的國民大會與立法院裏，派系實質與分離意識也就跟著進入這些爲了因應憲政時期而設計的中央機制當中，黨權不僅爲之鬆落，政府機能亦失。本章探討黨團統一的決策背景、實施面貌、實際成敗，與其後連帶政局。就探析黨團統一的成敗而論，第三、四、五節可以視作第二節的延長，而就相關主題來說，各節仍有其獨立性，並且，藉由各節內容與承接方式所產生交互辯證的效果，將能適當的描繪黨團關係在國民黨政權潰敗的過程裏所起的作用，與一九五〇年蔣中正正在台灣實施國民黨改造運動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合併的線索與前奏

自國民政府宣布各黨各派可公開活動後，組黨風氣因之日盛，尤其行憲將屆，結社之例接踵不絕。三青團自二全大會後，與國民黨愈形分立，然其構成政權下層基礎的重要單元則始終未變，一九四七年二月報載中國在野黨社頃據統計共六十八單位，三青團同與國民黨分占在朝黨派地位，合計朝野共七十單位。①儘管三青團組黨意願暫挫，政治野心則未曾稍歇，一九四六年各地參議員普選讓三青團初嘗組織戰的甜美果實，一九四七年底配合行憲所舉行的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選舉更令三青團興致昂揚。人稱一九四七年為選舉年，三青團書記長陳誠在元旦團部團拜典禮上即明確表示本年各個選舉戰場雖不一定以三青團為中心，但三青團均可參加。在中央團部公開發行的刊物上也不乏言及競選的文字，一名作者聲稱三青團不但「可參加」這些選舉，「而且必須參加」，他率直的指出三青團比其他在野黨派占得政治優勢的事實，而在朝的國民黨既以「老氣橫秋」的姿態現身選舉戰場，蓬勃的青年人當然也不能捺住性子袖手旁觀。執筆人還強調，為了解除人民倒懸，三青團理應參政，理應參加競選；再「就本身而論，我們的團有十個年頭的歷史，有一百六十餘萬的團員，這正是我們大顯身手的時候，怎可不參加呢？」②

作為一個政治利益瓜分者，三青團不甘落於國民黨之後的心理能夠讓人理解。在三青團

看來，這種不落人後的合理程度也因著三青團對國民黨的輕蔑之情而更加強化。自一九三八年以降，如上所引的「老氣橫秋」就成了三青團施加給國民黨的標籤典型。直到一九四七年，「以團代黨」還是一些地方團務領導人念茲在茲的主觀願望。^④毫無疑問，一九四七年的行憲選舉提供三青團一個絕佳的機會，以便把它的成員安插到像中央級國會這樣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位置上，^⑤但是競選過程勢必再次催化國民黨與三青團在地方的惡質競爭，就像一九四六年參議員選舉的不快經驗一般，並且這次隨著更高的權力位階色彩，可能還要逼使競爭更爲嚴重。盱衡國內時局，能否支應如斯社會成本？政權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在此正經受著考驗。一份關於改進團務的方案充分反映了三青團自二全大會後燃起的嶄新政治熱情，三青團參選的決心在這份上呈蔣中正過目的案子中被自動賦予了正面的使命色彩：

今年係選舉年，我們當然要發揮民主基礎，才算沒有虛度此一年。譬如作戰，……在各個戰場中，雖不一「定」以我們爲中心，但我們都可以參加。我們的作戰原則是：「寧肯就選失敗，不讓民主的精神與風氣失敗！」——具體的說，就是寧肯我們不當選，不讓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無賴棍子這些政治社會的敗類當選，不作不正當而有損我們純潔性的競選活動！可是（此二字行）爲競選勝利而失去大多數青年的同情，這就是我們的真失敗，相反的，競選雖失敗，而能爭取全國青年的同情，這就可以實現我們的政治理想，完成我們的革命任務，就是我們的真成功。^⑥

案文也對黨團關係提出難得一見的巧弄式陳述，這可能是因為案子還只在內部流通的緣故：

團與黨的關係，原甚微妙。這微妙關係又原祇要大家深切了解，彼此即可各盡其用，相得益彰。惜黨團同志莫名其「妙」，致此微妙關係不能發生妙用，而且大家天天在

鬧麻煩，這真是冤哉枉也！^⑥

蔣中正對於三青團的說法完全不能同意，他批稱不主張三青團把選舉作為本年工作重心之一，並強調：「如果要團增加革命性，這種選舉只有使團員墮落、官僚化、政客化。」至於黨團關係，蔣中正也駁斥了三青團所謂的微妙說，他提醒道：「團與黨的關係決不是微妙，而是很明朗的。就是團應該是黨的團，而不是與黨不接不離，不分不合的。這種想念（法）是錯的。」^⑦三青團未料到有關參加競選與黨團關係微妙論的對談竟成了蔣中正最深的憂慮，日後甚至被蔣中正引為「兩個足以導致革命根本失敗的錯誤」。蔣中正正在七月份告訴三青團，正是這樣，他才決定合併國民黨與三青團，以避免革命之脈就要為之斷送。^⑧事實上，在蔣中正作出合併決策之前的一九四七年上半年，黨團關係儼然早已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地方亂源——儘管這種動亂以往也不少見。尤以行憲期邇，選舉的前哨戰已在各地發動，黨團各據立場，衝突迭起，是以蔣中正無意把黨團對立的內訌行為繼續延伸到年底的大選，否則國民黨政權或不無內潰之虞。^⑨

關於上半年因三青團積極介入或黨團關係導致的地方亂局，要以湖南、台灣二地特別攪

取了南京中央的注意與關切，在台灣，三青團甚至成爲政權眼中的背叛者。湖南黨團之爭由來已久，一九四六年省參議員選舉時各縣尤其迭釀糾紛，擾攘不止，這種對壘形勢在議長選舉時更趨白熱化，三青團擁立的趙恆惕擊退省黨部主委張炯，地方政壇將之視爲國民黨的失敗。國民黨與三青團爭鬥的領域廣泛，除各級政府、民意機關外，各級學校與民衆團體等均成爲對立根源。在長沙，以湖南《中央日報》爲代表的黨方喉舌及以《中興日報》爲代表的團方報紙時有針鋒相對的報導與言論；武鬥情事亦非少見，明至黨團地方領導人妻子在婦女會選舉中公然互毆，暗至黨團地方要人支使在青年節戲劇演出時大興槍戰等，凡省內各縣重大糾紛，黨團摩擦通常必列入主要起因變數。兩湖監察使高一涵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的長沙之行就曾說道：「長沙給我最壞的印象，是黨團鬥爭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了！」一九四六年到任的湖南省主席王東原也在一次擴大紀念週上籲請黨團團結，他在一段湘西的共軍問題報告後即沉痛的要求國民黨與三青團停止一切糾紛，一切摩擦，王東原甚至警告省內的政治人物：「凡一切足以消除政治安定力量的，都是爲共黨造機會，都是準備做俘虜！」¹⁰

誠然，國民黨自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間實際控制湘西之後，這個失序的政治新生地就讓歷任省主席頭疼不已。在中國，湘西還極可能是國民黨與三青團鬥爭最激烈的一個地區。對湘西有過深入研究學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指出，直到二十世紀，政治上統治湘西的體系始終是地方武裝勢力，現代化的清末新軍從來沒有進駐過湘西。因此，當民國初

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時，湘西早已自成一個軍事體系。湘西實質上的自治局面隨著一九三五年國民黨軍隊抵達才宣告終結，此後十五年，湘西內部陷入遠較以往更為全面而嚴重的混亂狀態。在優秀作家沈從文等出身湘西的人們看來，最先，以湖南省主席何鍵為代表的新政權對此難以卸責；至於湘西以外的湖南人則習慣的把動盪不安歸咎於湘西的地方特性：不安份，排外，時機一到就上山落草。①是非暫且無論，湘西為一「特殊地帶」則人所共認。②國民黨與三青團先後加入湘西政局，不免與原有地方派系、土豪劣紳等勢力產生連結，彼此為用，再加上民性勁直，槍支氾濫，湘西的黨團之爭於是多見武鬥情事。

湖南省主席王東原籲請黨團團結後未久，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起展開為期近一個月的湘西十五縣巡旅，而地屬湘西的大庸縣適於此時突起嚴重的黨團武裝衝突。大庸為湘西重城，民槍特多，地方人士咸擁槍自保自重，糾紛迭見。國民黨與三青團加入後，地方糾紛儼有組織化態勢，久之即成人所共見的黨團二元對立局面，而為數氾濫的槍械更成實力表徵，是以公共武力部門亦為黨團錙銖必較之地。原縣長黃老燾即因採取騎牆政策導致黨團兩面夾擊，終遭去職。本縣大族田廷鈺繼任縣長，所委縣府人事盡親黨方，原在縣參議會等地方政治部門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三青團已難忍受，而縣府更有進一步替換某些警察武力領導人的舉動，三青團的政治地位與利益遭受嚴厲挑戰，於是在城內廣佈反對標語，且暗中集結各鄉鎮民兵以待。五月七日，城內分屬黨方與團方的兩支警察武力開火互擊，衍成流血悲劇，三青

團團址與縣府同受波及，縣城白晝閉市，交通阻絕，黨部團部則積極集中民槍互為對峙，是為震動湖南的「五七事件」。¹⁵

五七事件既起，縣長田廷鈺約集國民黨與三青團雙方幹部進行和平談判，抵達大庸的省主席王東原認為以該縣民槍甚多的局面，「如處理稍不慎，前途非常危險」，最後，縣長遭撤職處分，王東原且訓令非法使用槍械者以盜匪論罪，甲乙種國民兵均暫停集訓，兩隊肇事的警察武力調出城外，除此之外，再無重要而具體的懲治措施。¹⁶事實上，黨團鬥爭在湖南已成政治痼疾，自中央到地方幾無有效部勒之方，反時以遷就現實作為逃避現實的口惠。湖南支團部稍早曾有黨團合作之議，黨部聲稱願予配合，然各縣市黨團為年底大選的布置並未稍歇，支團部同時催請省府同意若干縣長人事任命，並積極吸收現任縣長脫黨入團，省黨部堅持三青團應著重青年運動，雙方歧見決難化除。¹⁷南京中央有鑑於湖南黨團既難協調，復有一再令人驚愕的兵戎之災，乃先後派遣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委員劉文島、三青團中央幹事蕭贊育分別代表黨、團中央前往湖南進行調處。同台灣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一樣，蔣中正顯然覺得這些動盪事件中存在著人謀不臧的成分。在湖南黨團糾紛裏，蔣中正認為省黨部前組訓處長陳大榕與現任支團部書記周天賢應負主要責任，擬予撤職，而劉文島、蕭贊育二人聯名上書以現實為勸，指出「苟於此時處置過嚴，勢必重增下級同志之誤會與刺激」，湖南黨團問題治絲益棼的情況可以想見。¹⁸

台灣新近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蔣中正對黨團統一決策的態度，尚不能確切言之。但是，如果說該事件對三青團沒有造成任何形象及實質上的傷害，那才是不尋常的，因為當時的台灣民怨揚沸，對國民政府的輕蔑之情隨處可見，而台灣的三青團在很大程度上選擇了政府（以政學系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為代表人物）的對立面。

在陳儀主政之下，台灣省黨部和直屬台灣區團部同樣居於不受倚重的「在野」地位，而黨團之間與中國內陸各地習見的情形一般，也處於競爭衝突的狀態，這當中除了因為黨團吸收對象特性頗具差異之外，早先原已存在政治舊怨，再加上接收日產的糾紛，雙方鴻溝乃愈發深掘。^①另一方面，戰後台灣重行納入中國版圖，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漸次浮現，民間潛伏不滿情緒，加上各政治勢力伺機而動，相互傾軋，不安情勢有增無減。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緝私血案爆發，陳儀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不僅要面對民間紛至沓來的抗議聲浪，更棘手的問題在於政治派系暗中運作，助長火勢。^②

以三青團為例，事實上台灣各地三青團組織早已和政府機關及軍隊警察時有摩擦，事件爆發蔓延後，各地分團中不少所謂進步分子，甚至帶有左翼色彩的成員紛紛投入這股洪流。有的說法指出三青團在事件中相對於陳儀為代表的政府，是「站在武力反抗一方的主角」，但研究二二八事件派系政治的陳翠蓮認為，實際上從事武力對抗的僅有少數地區（如嘉義等），反而是多數三青團菁英在派系成分複雜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各縣市分會中扮演重要角

色，試圖取代已經癱瘓了的地方政府軍警機關，以維護地方秩序。^①

無論如何，三青團此時確已成爲地方上取代官方威權，甚至對抗軍隊的主力。三月八日，國府增援部隊抵達之後，台灣局勢急轉直下，三青團淪爲誅殺最爲慘重的派系，包括多名分團主任（如王添灯等）均在事後被殺、被捕、被刑求，究其實際，應與三青團深染所謂進步、左翼色彩，事件中挑戰官方舉止甚烈，加上派系交相攀誣構陷有關。三月十七日，三青團第二處處長蔣經國隨國防部長白崇禧抵台，翌日，蔣經國召集留台中央幹部學校同學會，並對團務幹部訓話稱台灣青年應多與祖國接觸、增進情感，十九日即離台返京。蔣經國返回中央後所作報告爲何，尙未可知，但早先赴台調查的監察委員何漢文於二十六日呈函蔣中正建議善後處理辦法中即指出，「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份子複雜，各地負責人此次參加暴動者甚多，應予徹底改組，並加嚴格訓練」。二十九日，憲兵司令部司令張鎮呈蔣中正情報稱台灣區團部主任李友邦窩藏共黨首要，並指李友邦原係「奸匪自新份子」，爲本次事變「幕後操縱人物之一」，「此次叛亂行動，青年團居領導地位」。蔣中正批示查明李友邦來歷，「如未逮，應即逮捕，解京法辦」，而李友邦其實早在三月十日被捕，嗣押解至南京。其後陳誠於六月十四日報告經查李友邦無罪，李方得釋放，但已被拘逾三個月之久。^②

經此事變，台灣「全省之青年團組織已形解體」。^③在中國的首都南京，三青團的獨立地位也在三月間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面臨嚴厲挑戰。去年九月的三青團二全大會組

黨風潮可以視為團方打算徹底釐清黨團關係的極致表現，現在，國民黨的三中全會延續了這項努力，但是方向卻與團方去年所作的幾乎完全倒置，即朝向國民黨屬意的歸併路線運作。如同三青團的組黨聲浪並不單單始於去年九月一樣，國民黨內要求三青團歸併的呼聲也不是源於三中全會的偶發之作，只不過由於年初國民黨中常會確定三中全會將以黨務政治經濟的革新作為討論的議題範圍後，陷於深淖的黨團關係自然不能避免的成為革新必欲面對的議題之一。況去年九月之後，黨團愈形分立，為解決實際衍生問題，黨團關係必須重新檢視，歸併一途則為國民黨隨時可自口袋掏出的對策之一。²²國民黨中常會向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份黨務改革案裏，就相當直接明白的在最末一段單獨提出對於黨團關係最為深沉的憂慮與警告：

關於黨與團的關係問題，從前的辦法因情勢變遷有另行考慮的必要，而就今日之情勢以言，且須謀徹底之解決，因此問題至關緊要，演變迄今天甚為嚴重，萬不可採取敷衍態度，徒事拖延。現狀的繼續，是革命力量的分裂，並且由於互相衝突，而互相抵消，其結果則為親所痛，為仇所快，且必造成革命之大失敗，三中全會對此應有切實的討論與解決。²³

三中全會上的一些提案表達了同樣，但更為具體的立場。從提案人與連署人的名單看來，這些人大多出自CC系陣營。一份籲請黨團「統一領導」的提案指稱「近來各地黨團多未協調，頗有平頭併進，互爭雄長之勢，值此反動勢力日益猖獗，國勢岌岌漸趨嚴重之際，若不統

一領導，和衷共濟，將使親者痛心，仇者快意，演變前途，實不堪設想」，提案建議各級團部應隸屬於各級黨部，專負青年組訓責任，成為確實的預備黨員機構。²⁴另一份提案則坦率說出三青團「群以黨部為對象，從事種種鬥爭」的同室操戈現狀，並進一步表示：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有另行組黨之議，此不啻家庭子弟成人後，要求自立門戶，不予之，則終日詬誶「，」致家庭發生種種問題，聞各省市黨部現感此苦悶者不少，如不改變辦法，將不獨抵消黨的力量，亦且予他人發展，而破壞本黨之機會。²⁵

這份提案向三中全會提出兩條安置三青團的辦法，一為取消三青團，團員悉改為黨員，否則三青團隸屬國民黨，中央設青年部，各省市設青年組；二則乾脆讓黨團各自獨立，界線分明，「俾是非不致混淆，而摩擦亦可消失」。²⁶來自黨團衝突最烈的湖南省黨部主委張炯也在三中全會上主張黨團合併，或團隸於黨，否則就應嚴格執行那些在中日戰時三令五申的規定；國民黨與政治配合，以社會為活動範圍；三青團與教育配合，以學校為活動範圍。²⁷

除了長達八年多，近來糾葛愈煩的黨團關係令人不耐之外，國民黨黨務的頹唐生態也遭眾夫所指，有識之士咸表憂心。在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於三月二十日的黨務報告中坦承「黨的病狀確已陷入積重難返之勢」之後，三中全會即行檢討黨務；二十三日，大會合併討論幾個籲請改革黨務與調整黨團關係的案子，決議國民黨「應謀根本改造」，黨團關係「亦

應謀根本解決之道」，相關提案交中常會核議辦理。²⁵

三中全會閉幕後，國民黨中常會經過月餘反覆討論，初步決定推定一些人負責研究國民黨的改造方案，此係中常會討論改造國民黨之始。構想中的這份案子未來將提交召開日期未定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討論，以尋求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背書；另外一方面，各地黨團糾紛不斷，湖南寇讎相視的現狀絕非僅見的特例，然亦匪夷所思，年底大選在即，南京中央對臥榻內的風暴不能視若無睹，職是之故，國民黨中常會也決議要求黨團幾個負責人「迅即商定切實有效解決辦法」。鑑於茲事體大，爲了探悉蔣中正對於根本改造國民黨及黨團關係的態度，甚至也可能爲了向蔣表述黨內看法，五月十四日的中常會且推定大致由黨內元老與CC系組成的十一人晉謁陣容。²⁶

這份名單對三青團不利。嚴格的說，其中只有陳誠可替三青團採取真正的辯護立場——但是基於陳誠在黨內同具可觀地位，以及並非掌控團務實權的復興社或蔣經國的派系中人，這種辯護能否出之以堅定立場則未可知。長久以來，黨內元老（他們大多也是三青團的「指導員」，該職不負責實際責任）對黨團傾軋的局面均表不滿，他們以國民黨的光輝爲戀，對三青團組黨的企圖始終不以爲然，CC系在此背景下得以在去年廬山取得元老派的支持而阻新黨狂瀾。現在，伴隨國民黨的改革壓力，黨團關係與三青團的地位問題連帶成了改革命題下的重要一環，元老派與CC系爲主體的謁蔣之舉實可視爲國民黨向蔣中正施諫的政治動作

之一。⁽³⁰⁾

這些政治動作的正當、必要，與緊迫性，在湖南等地紛傳黨團慘劇之後更加得以彰顯，同時，三青團多年來的政治試驗也在成串赤裸甚至見血的權力鬥爭當中留給人們負面的評價。尷尬的是，現在即使連三青團最基本的青年組織功能也面臨操作乏力的地步。作為領導青年運動以及抑制那些不為政權所喜的學潮的一個單位，三青團的表現讓蔣中正時有嘖言。⁽³¹⁾中日戰後，反體制的學潮層出不窮，以訴求目的而言，有所謂排外學潮、反內戰學潮等等。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起，標舉「反飢餓，反內戰」口號的學生運動蔚起於南北各主要城市，南京中央疲於因應，國府主席蔣中正發表談話稱「此次學潮之離奇怪誕，為以往任何時期所未有」，學者郭廷以則指出本次學潮「震撼中央政府」，為學生運動的又一高潮。⁽³²⁾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大規模的學潮適巧起於國民黨決議向蔣中正請示有關黨團關係命運的同時，如果說月初湖南的黨團流血事件能夠讓南京當局省思三青團失敗的政治實驗應否告停，那麼中旬以降，讓當局苦惱不已的學潮不啻預示三青團最基本的存留價值也已所剩無幾了。⁽³³⁾

事實上，騷動事件同樣也起於國民黨自己的校園。先是為適應憲政時期形勢，蔣中正在一九四六年手令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與三青團的中央幹部學校應即合併。經有關方面會商並由蔣中正核定：新學校將採大學學制，隸屬教育部，名為國立政治大學，蔣中正仍是這所學校的校長。九月，政大教育長段錫朋奉令先行到校視事，同時中央幹部校合併事宜仍陸續進

行中。從中央幹校教育長蔣經國與段錫朋往來交涉文書可以發現，此案雖名為合併，實為幹校被併入以政校為主體的政大。馴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改制就緒並完成正式交接，政大於焉誕生。同月，教育長段錫朋臥病休養，蔣中正授意蔣經國接充，⁴³未料遭致政大學生強烈反彈，矛頭直指蔣氏父子，二人至為不歡。人稱本次教育長任命風波係由陳立夫發動，無論是否如此，以原政校主流派排斥蔣經國個人及幹校勢力的心理醞釀所致殆無疑義，是為一九三八年政校發生「芷江風潮」以來又一嚴重校內騷動事件。⁴⁵

就結構面來說，黨團關係自三青團二全大會以後絲毫未見改善，一九四七上半年諸多事件則驗證了三青團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所可能帶給國民黨的風險，以及三青團作為一個青年組織的缺乏效能。近來國內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局勢警訊不斷，國民黨政權不能無憂，特別在東北，政府軍處於嚴重不利地位。林彪率領的共軍自去年底以來五跨松花江，本年五、六月間以四平街為中心展開激戰，在共軍攻入市區之後，蔣中正於六月十九日召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表明中共在蘇聯羽翼之下日趨強大，東北形勢極嚴重，無長期堅守可能。司徒雷登則延續向來對蔣中正的建言——蔣幾乎都保持樂意聆聽的態度，司徒最近且特別對蔣傾向具體的同意而感到欣喜——他向蔣中正諫稱可能已到了採取緊急措施的時刻，政府需要以沛然的勇氣與大公的態度力行改革。⁴⁶在國民黨內，三中全會有關決議案甫強調「革新」當從「團結」做起，⁴⁷中常會復推派以黨內素孚資望的元老與掌控黨組織

機器的CC系要人爲主的陣容向蔣中正請示改造與黨團關係問題。在此情形下，三青團主觀上雖以改革者自許，客觀上有礙團結則爲黨內所共認，蔣中正面對黨內壓力與國內局勢變化，勢須採取某種有力動作以資回應。最後，蔣中正決定將三青團與國民黨合併，以作爲這一波改造國民黨的工作重點，再者，他也考慮正式宣布中共的非法地位，且明令討伐之。^{③8}

六月二十七日，蔣中正召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與三青團書記長陳誠二人，指示合併國民黨與三青團二組織，陳誠表示服從。二十八日，陳誠邀集在京的三青團中央幹事、監察等高級幹部傳達黨團合併指令。^{③9}三十日下午三時，蔣中正親自主持國民黨第六屆第七十四次中常會暨第六次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對三青團與中共問題作出重要的政策性宣示。^{④0}剛開始，蔣中正對五十餘名與會者暗示這將是他對黨內同志在最近幾周以來憂慮當前時局的一個觀察與回應，接著他以超乎堅強的口吻強調黨內同志對國內動盪時局的擔憂實在是過於悲觀了，他甚至援引俗諺「亡羊補牢，猶未爲晚」，聲稱還沒到亡羊的時候。不過，蔣中正卻對國民黨本身肆應時局的能力表示最深的關切，他指責道：「現在我們的黨真像一個大家庭，權利是個個人都要享受，責任是沒有一個人肯來分擔。對於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就是爭權奪利，互相防範，甚至對同志的鬥總（爭）比對共產黨的鬥爭還要激烈。」^{④1}蔣中正接著強調：

現在我們黨的精神是太頹唐，太消沉，根本提不起氣來。所以我們中央同志人人都

要立下決心，要趁此時機來自反自覺，貢獻自己的才力。（，）對於本黨做一番澈底的改造，澈底的刷新。如果這（還）是不從改造黨的本身著手，那麼革命建國的前途，絕對沒有希望！⁽¹²⁾

蔣中正認為當下要談政治、軍事、經濟的改革，必得先從國民黨的本身改革起，「而要改革本黨，第一件就要集中我們革命的力量，恢復我們革命的精神，整肅我們革命的紀律」。⁽¹³⁾ 依蔣中正的意見，合併國民黨與三青團正是「改革黨務，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的一個具體辦法，於是有關黨團合併的政策性指示就在這裏由蔣透過正式途徑披露開來：

我認為青年團與本黨再不許容有兩個形式的存在，必須青年團與本黨合併統一。決不能像現在那樣於黨部之外，另立組織，另成統系。我們如不把青年團與本黨合併，則不僅同志之間意志分散，減損實力，而且有的地方甚至互相摩擦，互相攻擊，以致增加工作的困難，抵消革命實力。所以現在必須把青年團與黨統一組織，成爲一體，將青年團的力量和黨的力量匯合起來，對共同目標而努力。⁽¹⁴⁾

兼具國民黨總裁與三青團團長身分的蔣中正正在六月三十日的黨內會議宣示合併黨團的決心，並且沉痛的指摘自己所領導的黨；七月九日，在三青團成立九周年紀念的講話中，蔣中正聲稱中共不足畏，內容空虛而又爭逐權利地位的國民黨與三青團才是他「唯一的憂慮」。在九日的這篇講話裏，蔣中正也強烈要求三青團自省所犯的兩個足以導致革命根本失敗的錯誤。

第一是決定參加競選。他直言團的幹部爲了升官發財，把青年當成競選的工具，「不僅把青年做工具，而且把我團長當作傀儡，這在革命紀律上是絕對不容許的！」⁴⁵蔣中正並質問三青團的幹部：

爲什麼要參加競選，競選是爲真正的革命工作嗎？爲什麼要使我們純潔的青年變成官僚政客？這樣的青年組織還有什麼革命性嗎？要知道：你們既然參加競選，則凡是競選的人就是你的敵人，那裏還有功夫對付我們真正的敵人！所以你們這種行動的後果，只有促成黨團對立鬥爭，而斷喪本黨革命的命脈。這是我所以決心要把團與黨統一組織的動機。⁴⁶

蔣中正指出第二個錯誤是三青團主張與國民黨「保持不即不離的關係」，並且據此認爲能夠「發生相互的作用」。他力闢此說謬誤，自謂能夠斷言：

黨與團如保持不即不離的關係，其結果只有相互對立，相互牽制，乃至一切力量相互對消。今天黨和團的關係，已經弄到這種地步，現在組織如再不明白的統一，則革命必然失敗。這也是我決心要把黨與團統一的主要原因，我以爲這是本黨起死回生的唯一途徑。否則，黨與團惟有同歸於盡。中國革命的命脈就此斷送罷了。⁴⁷

第二節 統一的形式與實際

絕大多數的三青团成員不情願與國民黨合併。數年來他們和國民黨爲了政治利益而爭鬥，認爲黨的腐化無能已屬無可救藥，兩個組織怨對相集的結果，使得蔣中正必須謹慎的安排合併事宜。就在六月三十日宣布統一決策的同時，蔣中正親下命令成立一個以中央黨、團部雙方高級幹部組成的「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並以黨的秘書長吳鐵城、團的書記長陳誠、黨的組織部長陳立夫負責召集。自七月中旬起，委員會與其下小組（以及黨團各自的小組單位）經過將近一個月的密集討論——其間蔣中正會指示全體委員應將黨團合併統一的工作視爲「政治革命性的，而非技術或事務工作」；委員會也擴大了成員陣容，並加冠「中央」二字，劉健群同爲召集人之一——及至八月上旬，一套處理黨團合併的計畫正式獲得通過，即〈各級黨團統一組織實施辦法〉。

這項辦法與稍前通過的〈黨團統一組織原則〉規定地方團部幹事監察將改任同級黨部的執監委員，各省（市）縣（市）組織合併期間將由擴增後的黨部執行委員當中，派定委員組成黨團統一委員會執掌有關合併業務，並代行原黨部常務委員職權。④不過，到目前爲止，無論是〈原則〉還是〈實施辦法〉，都沒有對各級黨部最高領導人選以及各級黨團統一委員會委員人選的分配原則作出明確宣示，以至於還沒有人知道三青团進入國民黨之後可以立即取得多少政治資源。正是源自這種不確定感，各地黨部紛向南京表達殷慮之心。對於幹部問題，咸認省縣黨部原領導人「不得」、「不能」有所變更，部分黨部且主張限定團方在未來地方

黨團統一委員會裡的委員人數比例——根據甘肅省和福建省黨部的意見，「至多不得超過三分之一」。^④

各地黨部聲稱他們的建言係出於維護黨基、法統的考量，究其深意，實即表露了地方黨機器視團為庶出、不同意給予團方平等待遇的立場。至於三青團是否樂意和自己向所排斥的國民黨合併，同樣是考驗當政者的一大難題；在合併的過程及結果中，三青團是否能與國民黨平起平坐，亦攸關三青團成員對此決策的同情與支持。事實上，從九月五日起二周內，接連舉行的三青團二屆二中全會、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及中央黨團聯席會議的幕前幕後，就存在自七月以來一直傳布著的疑慮和反對的情緒。一些三青團的省級領導人於會外集議，他們反對統一合併，並打算另組新黨與國民黨抗衡，蔣中正聞訊到場叱斥遏阻。^⑤即使是立場較為溫和的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會，在團二中全會裏的一份提案內也要求國民黨應重定名稱，以一新耳目，加強號召。這項提議獲得與會代表熱烈的回響，「中華革命黨」、「中國革命黨」的名稱一時紛紛提出。^⑥相較於急進派的表現，更改黨名的聲浪似乎又詮釋了三青團另一些人的想法，即藉由改名之舉，將能去除原黨方的象徵符碼與優勢地位，俾使黨團臻於對等的統一，這無疑可以確保三青團的政治尊嚴與實質上的利益。^⑦至於國民黨方面，多數地方幹部與三青團的急進派一樣對黨團合併抱持抗拒的態度，他們在黨四中全會上抨謂黨團合併形同「開門揖盜」，三青團團員個別加入國民黨可以，但不要三青團組織加入，否則就不知

將是誰合併誰了。⁵³

儘管如此，這些會議最後仍然公開保證服從黨團統一的決策。由三青團中央與地方幹部共同參與的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及黨團聯席會議於九月十三日閉幕，大會發表一份簡短的宣言，文中把黨團統一組織比附為國民黨自興中會／同盟會以降的歷次改組，強調「為政不在多言」，聲稱「此後我們願意拿事實來答覆期望，拿行動來證明決心」。⁵⁴大會並且通過若干重要提案。其中，〈中國國民黨當前組織綱領〉規定黨員團員應重新登記，以確定黨籍，綱領並明訂甄核黨員的積極消極條件，用以剔除腐惡分子，這表示原團員將不能被動的等待自然轉成國民黨黨員，原黨員也同樣須經由登記合格的程序才能繼續保有黨員資格。〈統一中央黨部團部組織案〉規定三青團中央幹事監察一律成為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三青團候補中央幹事監察一律成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監委員，並提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追認；中央執行委員會增設青年部，為國民黨領導及組訓青年的機構。至於七全大會的召開日期則決議為翌年（一九四八）五月五日。⁵⁵在九月十四日團二中全會及幹監聯席會議的閉幕典禮上，蔣中正對在場即將進入黨務部門的三青團菁英表示，起初他對剛成立的三青團曾寄予重大期望，但現在覺得黨所有的缺陷，團也沒有避免；蔣中正以種子作喻指出，團如不埋在黨裏，就產生了新的黨，今後發展全靠這粒種子；他特別要求黨團合併之後，團員要注意敬老愛少，和衷共濟，如果還有不協調的情事發生，團仍要負部分責任。⁵⁶

透過黨團統一，國民黨全盤接收了三青團從中央到地方的幹事與監察，⁵⁷從積極面看，當可視為注輸新血之舉；從消極面看，則可知出於權力分配，不得不然；從運作面看，中央及地方的黨務領導層愈趨龐大，當值國內政治環境不變之際，勢有運轉欠靈之虞。青年部長由團方的北京大學訓導長陳雪屏出任，受胡適等人支持，CC系亦可接受；⁵⁸然青年部與三青團相較，不過為一業務性單位，且稍前三青團力爭組織部長未得，團方未免抱憾。⁵⁹整個局勢看來的確正朝著「團併於黨」的方向前進，三青團不易挽回。如果僅能否達成蔣中正期許「和衷共濟」的角度觀之，三青團落居劣勢的事實預示了黨團統一將告失敗，並且迅即得到證明。九月二十九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省市黨部正副主任委員、正副書記長，與省市黨團統一委員會委員人選，基本上以「黨正團副」為原則，統一委員名額的分配則大體以「黨五團四」為度。⁶⁰這份名單與三青團的主觀願望大相逕庭，即在若干省市也不符當地政治生態，團方地方幹部頗表灰心。

以該名單違反三青團的主觀願望為例。具政治理想者要求黨團一體完全改造，而非簡單合併了事，但此與三個月來事實發展相乖，所謂黨正團副、黨五團四的人事分配原則與政治分贓似無二致。⁶¹一些實務論者對該人事分配原則的惡感尤有過之，他們在九月的黨團聯席會議之前，即已針對統一後的地方黨部重要領導人選問題，積極爭取以全國為範圍的「黨團各半」模式；⁶²中央團部研究小組於七月擬就的一份統一辦法草案則明白揭槩黨團統一組織

的基本意義之一係「變更黨團二元領導，樹立一元的正確的革命領導」，足徵三青團自恃不下於國民黨地位的心態。^⑤以對等地位同國民黨進行合併是三青團實務論者所持的立場，不過他們對實現的可能性有所疑慮，以黨為正的分配方式果然證明三青團仍然是被併入的一方，這就勢必有損地方團務幹部對於黨團統一決策的同情與支持。

即使在若干省市，以黨為正的分配方式也不符合當地既有的政治生態（或是地方團務幹部主觀認定的政治生態）。例如湖南支團部在七月即以全體幹事監察名義致電黨內有力人士，略稱密聞改組後的省黨部將設常務委員五人，並指派一人為主任，而三青團在湖南「地方之基礎及聲譽實遠逾黨部」，因此，湖南支團部開列一份「以團為正」、「團三黨二」的人事清單，懇請促成。末謂「似此主持得人，陣容一新，湖南團務（黨務？）則有新興之一日，不然恐有不良之影響也」。重慶支團部幹事長陳介生在八月也致函向所親炙的朱家驊，信中表達了他對中央進行統一作業內容的關切，陳介生表示「重慶黨團情形特殊」，三青團實占多數地位，他強調中央應重視現實，指出支團所轄各分團幹部一致堅決反對合併後由黨方負領導責任，主張合併後的領導人選及所謂統一改組委員會名額分配問題應該予以特別考慮，意即由團出任領導，委員會內團應過半數。和湖南支團部一樣，陳介生也暗示他對三青團如果未能取得優勢地位所導致負面後果的憂慮：「黨團合併措施如盡合宜，自可集中力量，加強戡亂工作，否則貌合神離，前途未許樂觀。」然而，九月二十九日以黨方為本位的正式人

事名單公布，自認地方實力遠勝於國民黨的湖南、重慶支團部——或許還有更多的省市團部——原先寄望藉由黨團統一組織以取得地方黨部控制權的願望都落了空。⁶⁴

上述人事分配原則立刻導致地方團部反彈，黨團統一後的地方黨務也沒有因三青團組織的消失而獲致生機。在湖北，團方僅迫使黨方在少數幾個縣份作出讓步，俾改由團方出任縣黨部最高領導，即書記長一職。至於多數縣份與在省一級仍由黨方占先。為保持力量起見，行將解散的湖北支團部決議成立「湖北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作為往後一變相的聯絡組織。支團部且在一九四七年底召集百餘名幹部會餐，席間有人以「最後的晚餐」自況，話鋒多見憤激，支團部書記（改組後的省黨部副書記長）劉先雲發言時難以按捺情緒，竟至悲泣，嗣因有人突冒國民黨萬歲之語，會場秩序瞬即失控。黨團統一後的湖北省黨部士氣低落，劉先雲到部後經常無公可辦，幹部屢起爭執，正副書記長論及黨務廢弛的局面，咸感「前途未可樂觀」。⁶⁵

在安徽，各縣團務負責人自認形象學養能力高於黨方同級人員，多不願屈就副職，支團部幹事長（改組後的省黨部副主委）張宗良勸稱「黨正團副，乃中央所決定，雖有不盡符合實際之處，亦應執行。況副自我始，全國皆然」，力促勉予接受。爾後黨團雖經合併，門戶之見仍深。⁶⁶

在河南，支團部要求正副職位由黨方團方平均分配，而堅持黨正團副的省黨部不許，乃

致合併後團方無人到省黨部辦公，各縣情形大抵亦同，原支團部幹事長胡長怡只得到京請求斡旋，盼望打開政治僵局。河南政壇聞人張鈺目睹豫省政局如斯，頗表痛心，曾在省參議會上疾呼，略謂：「為拯救河南同胞，必須集中意志，泯除私見，放棄一切個人恩怨，為河南爭取生存。」黨團爭執牽動地方政情的程度可以想見。⁶⁷

中央的人事派令使得原爭取在統一後的省黨部成爲領導主流的湖南支團部未能如願，但在湖南黨團合併的談判過程裏，湖南支團部續要求全省半數的縣黨部書記長由團方擔任。幾經爭論，黨方應允騰讓兩個縣份給原黨部書記長的團方親戚，另一個縣份一年前已由團員出任縣黨部書記長，其餘縣份仍維持黨正團副的原則。各縣黨團對立情況至爲嚴重，以致黨團雖具統一形式，實則各擁立場，爭端時起。多數縣份的分團部幹事長不願改任縣黨部副書記長，乃轉向尋求其他政治職位，亦有因而失業者。⁶⁸

在湖南省祁陽縣，分團部執監委員接獲黨團統一後的黨部人事派令後，相率拒不到差，並以縣黨部書記長羅鑫爲抨擊對象，羅鑫晉省反映，省黨部指示「耐心等待」，此後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羅鑫辭職，團方始辦理移交事宜。⁶⁹同樣在四月，福建省晉江縣則因爲縣黨部強制接收三青團產業，導致槍擊事件，黨團雙方同聲訴請法辦。⁷⁰

晉江槍擊事件不是黨團統一過程裏最令人驚心的悲劇。在湖南，衡陽黨團糾紛迭起，間有涉及人命者，黨團與所辦報紙各據立場，針鋒相對，湖南《中央日報》甚至披露縣黨部書

記長唐清和的指控，聲稱全縣黨員在團員高壓之下，「含垢受辱，忍氣吞聲」，絕非一日之積。①至於該省黨團衝突最烈的大庸縣也未因黨團統一而稍弭水火，兵戎之災反而愈形嚴重。先是三青團對於一九四七年「五七事件」後上任的新縣長李善後頗表不滿，認爲其人事安排處處偏袒黨方，「倒李運動」於焉而起。十一月，黨團雙方人馬爲國代選舉事於縣內數鄉再起武力衝突，而黨方參選人當選。其後團方旨在壓迫縣長李善後去任的倒李運動更顯積極，這除了積怨已深的緣故外，也不無藉以爭取爲接踵而至的立委選舉預作部署之意。一九四八年一月，向被視爲團方勢力的省參議員黃穎川受派爲新任縣長，黨方頗表憂慮，認爲人事基礎勢將遭到剷除，一如田廷鈺去年五月到任後摒退團方勢力的前例倒轉之。新任縣長黃穎川是否會在任內悉如所料的作出黨同伐異的舉動完全無法得知，因爲他在一月二十八日刻意選在立委選後到任的途中，即於大庸城郊橫遭阻殺斃命，團方的縣黨部副書記長符繼麟自城內潛出脫險，安抵長沙。「一二八事件」發生後，大庸城外一連數日槍戰不歇，武鬥不止，直陷入無政府狀態，城內閉市，戰壕掘竣，城門僅午間半開，儼然如臨大敵，是繼去年五月十一月後，因黨團摩擦而起的第三次大庸慘案。事變既起，各界咸表震驚，部分長沙政界人士與黨外士紳主張黨團暫時撤離湖南，俾使各級地方政府不受黨團種種關係之牽扯，以應付戡亂需要暨維持省內治安。然此理想爲現實所不許，新任大庸縣長劉瀛洲到任後處處力求人事平衡，十二鄉鎮長黨團各半，劉自兼控有武力的自衛隊大隊長，以下各隊長仍爲黨團對半

，總之，係以遷就現實、權益均霑為原則。¹⁷

三青團在極少數省黨部取得罕有的事實上的優勢，陝西省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之一。不過，該省的黨團摩擦並沒有因而稍戢，這大致可以說明在既有成見及權力慾操弄下，黨團統一決策下的任何權力分配方式都不容易讓三青團在政治的位子上知所節制。由於胡宗南的關係，陝西支團部併入省黨部後擔任副主委的楊爾瑛被視為具有特殊政治背景，主委王宗山有所敬憚；省黨部書記長潘廉方其後當選立委，長期在京，日常黨務多由副書記長翟文鳳主持；黨團統一委員會委員則為「團五黨四」，團方占先。陝西支團部在統一過程中頗能伸張主見，王宗山只得妥協：省黨部內人員黨團各半，各縣黨團統一委員會主持人共同負責，輪流主席。在黨團合併後的陝西省，有些縣份的三青團遲遲拒不交接，延宕至一九四八年夏季仍未完全解決。就在這稍前，團方趁CC系分子多往南京參加國民大會之便，逕把渭河一帶的縣黨部書記長統予免職，被黜者狀告中央，而苦於再三膠著。俟主委王宗山回陝後，為緩和人事矛盾，決定全省境內的縣黨部按數對分，黨團各自專責領導，這樣，團方就擁有和黨方同樣數目的縣黨部了。¹⁸

黨團牢不可破的隔膜使黨團統一不能充分達到和衷共濟的理想；另一方面，特別是愈往地方基層愈趨廢弛的國民黨黨務，也讓已經欠缺人和基礎的黨團統一更加難以接近徹底改造的預期目標。即以伴隨組織合併而來的黨員團員重新登記以確定黨籍的作業為例，曾經勸告

安徽團方勉予接受副職任命的張宗良就給予杯葛。直到一九四九年，安徽省的團員名冊始終沒有移交給國民黨，省黨部多次催促，仍無結果。⁷⁴類似安徽團方截留團員名單的行徑實有礙國民黨的登記作業，黨務與政治上的諸多問題也讓一些黨員團員對國民黨失卻信仰與熱情，致對重新登記一事興趣缺缺。可能正因如此，加上黨團人馬投入紛至沓來的國代立委選舉，不易兼顧登記作業，以及地方黨機器在組織條件不健全的情況下，運轉必然遲緩等因素，原規定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起一個半月之內完成的全國黨員團員重新登記期限一再展延，截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尚有未能將登記表冊呈報齊全者。黨團統一之初，國民黨中央公布黨員團員總數為六百六十九萬一千九百一十三人（含軍隊黨員），一年來黨員團員在各單位履行登記手續而名冊送至組織部者只有一百三十一萬九千九百一十四人，也就是說，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為止的帳面數字來看，國民黨與歸併的三青团總計可能已經流失了高達八成比例的正式成員。⁷⁵

黨員團員重新登記作業遲未完成，意味著黨團統一工作還沒有真正結束，且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即將舉行國民大會，蔣中正認為與五月五日的七全大會會期相距過近，深恐籌備不及，乃交議討論是否延期召開七全大會，國民黨中常會遂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決議通過改期召開。⁷⁶這項延期案實際上避免了黨內各派系再度在全代會幕後展開權力爭奪的可能性——三年前的六全大會令人記憶猶新，但是現在國內的政治環境顯然不足以擔付這項政治風險。⁷⁷不

過如此一來，由於七全大會原定負有追認黨團統一後所增加的中央執監委員資格的任务，因此，揆諸爾後史實，展延七全大會會期之舉等於表示黨團統一作業在法理上從來沒有真正完成。^{①6}

就成員心理與其衍伸的行為而言，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最後兩年的歲月裏，國民黨與三青團是否曾經達成全面而徹底的統一？答案是否定的。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國民黨中執會還通令各級黨務機關，強調黨團統一組織為時已久，不應再有黨團之分云云。^{①7}就在同一個月份，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在位於蘭州的甘肅省黨部大禮堂裏，對著市內各機關團體首長及黨員代表計七百餘人剴切指陳省內黨團合併後種種不團結的現象。^{①8}三青團雖經合併，黨團各自的本位意識仍強，本文即將討論到的國代立委選舉更將這種本位意識推向極度惡性競爭的境地。黨團參選人的爭執是全國性的，其衍發的後遺症並且從黨務部門擴散至社會的一般層面，影響不可謂之不大。從該角度來說，七全大會延期召開的決議可能愈發顯得必要。蔣中正對於黨團統一後雖同據體制，實則貌合神離的局面完全了解，這可能才是他提議推延全代會召開日期的真正原因。他曾於統一之初以種子作喻，期許三青團深埋黨內，始能造就一個嶄新的國民黨，但是現在三青團顯然逾越了團結與改革的細微界限——起碼在蔣中正一九四八年四月的一項談話看來，三青團的「團結」用錯了方向，蔣不能同意：

你們有兩個人以上，就不能合作。像韓國人一樣，各立門戶，互不團結。青年團結

束已經半年，團方負責人卻只是形式上取消，暗地裏仍然團結，好像要造成一種勢力，要打倒黨，取代領導地位。我可以告訴你們，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⑧

第二節 國代立委選舉摩擦

三青團原以參與行憲各項選舉爲一九四七年重點工作，蔣中正雖不以爲然，而三青團在黨團統一之後的參選主觀意願絲毫不減，團方幹部且在合併作業當中有「以競選爲第一要著」者，^⑨且客觀環境上，勢有以黨員身分參選的當然權利。事實上，黨團合併的執行進程一開始就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選舉活動期間重疊，這使得黨團統一與行憲選舉兩項活動的過程與結果，必然在黨團關係的命題下相互影響。先是國民黨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會擬就辦法三種，用以指導黨員參加國代、立委、監委競選，國民黨中常會則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推定陳立夫、張道藩、蕭錚、劉健群、康澤五人審查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所提辦法，由陳立夫負責召集。五人當中，陳立夫以統一指導選舉方式困難殊多，力主自由競選，團方的劉健群與康澤二人同表反對，蕭錚與張道藩盱衡黨內外情勢，也不以自由競選爲尙，最後決議採行統一指導，該辦法並於八月十八日提出中常會通過。所謂統一指導，係由各級選舉指導會報匯集登記人名冊，審查後加註意見，擬定建議人選，逐級上報，由黨中央正式提名。同日通過的另一項辦法則規定選舉指導會報在各省(市)縣(市)分別設置，從會報組成

分子結構來看，包括黨、團、政、參議會、選舉事務所等有關人員，就三青團方面而言，爲支團部（分團部）幹事長、書記。³³

基本上，各省選舉指導會報的建議名單對中央提名作業具有重要的左右能力，以湖北省國代、立監委的國民黨籍候選人名單與排名爲例，可以說都是由省選舉指導會報決定。會報本身既富關鍵地位，內部爭執之烈不難想見。通常的情況是代表各政治勢力的會報委員將己方的名單帶到會報上進行協商或談判，經反覆攻守後，得出妥協結果。在湖北，這串人名派系生態大致是CC系的候選人略多於其他派系，其次爲地方耆宿、三青團等方面。³⁴各省選舉指導會報雖具關鍵的指標作用，卻不表示國民黨中央無事可做，事實上，中常會與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除了必須調處或應付各地所提建議名單之外的不服者的狀告或活動關節之外，尚須對各地建議名單進行討論。討論的過程並不全然順利，比如一開始，浙江省的名單就讓黨中央的討論陷入僵局，其後會議爭執亦多。³⁵

國民黨中央最後提出的名單沒有得到榜外一些黨員團員的尊重，逕自參選，甚而當選的例子並不乏見，由是引發提名落選者與未提名當選者的席位之爭；而國民黨爲禮讓友黨所發的退讓通令亦起風波。³⁶此外，在選舉活動期間，儘管國民黨與三青團正在辦理統一組織事宜，但是國民黨與三青團在競選活動中的步伐卻多未齊一，一如上節所述黨團也從來沒有真正統一他們的組織與心理般。尤有甚者，各地黨團參選人在競選活動中大多以政敵相視，傾

軌之烈，宛若仇讎。與CC系、三青團均有淵源，並參選國代的雷嘯岑即回憶道：「在同一主義與領袖下之黨團員，其相互仇視鬥爭情狀，且遠較對他黨尤激烈，實創古今萬國政黨政治之惡例。」⁸⁷

一般而言，三青團成員多藉團的組織基礎參選，團方勢力也自行操盤輔選，不假外求。在南京，參選立法委員的南京市黨部副書記長（前南京支團部書記）黃通即與兩名團方參選人聯合競選，並在市內劃分責任區，區內為某人票倉，區外則替另二人助選。⁸⁸在江西，參選立委的江西省黨部副主委（前江西支團部幹事長）詹純鑑得到三青團舊部全力協助，一名在黨團合併後改任黨職的縣級團部領導人稍前曾因支持某國代參選人遭黨方掣肘而對詹純鑑競選一事「格外提高警覺」，黨團之猜忌與角力可知。⁸⁹

貴州省銅仁縣的國代選舉可以說明地方派系和黨團鬥爭在行憲選舉中的緊密關係。該縣主要派系分老、新二派，老派以三青團銅仁分團部為政治背景，在該縣政治表現上占壓倒性優勢；新派憑恃國民黨銅仁縣黨部，政治力量遠不能及。一九四七年的國代選舉為繼去年參議會後又一重要選舉，老新二派為攘奪政治資源又起競爭，實即銅仁地方的三青團與國民黨組織間的再次政治角力。新派既缺政治優勢，乃利用老派人事間隙，推舉某三青團幹事參選，老派與團方頓形分化，鄉鎮基層基礎亦告鬆動。老派被迫改動策略，圖以控告、檢舉等途徑翻轉新派可能當選的事實。開票結果，新派果然大勝老派三倍票數許，縣黨部開席慶功，

唯不久後，老派參選人自南京回電稱已領到當選證書，這一次，鞭炮反而從分團部所在地一路燃放。⁹⁰

三青團具組織基礎，爲人所共認的一大政治力量。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周雍能返回江西競選立委之前，有人以其既非CC、三青團，也不是政學系，而久離鄉土復非地方豪紳，可謂「四大皆空」等語力勸。⁹¹在湖南，與CC系、三青團均有淵源的雷嘯岑獲嘉禾縣國代提名，而競選期中，縣內仍有多人爭取此席，團方某員與縣黨部書記長尤爲急進，兩人俱不退讓，且團方視雷嘯岑爲CC系一員，黨方則認定雷嘯岑爲團派人物，結果地方團派勝選，雷嘯岑僅獲候補第一名。⁹²同在湖南省，衡陽縣一名參選人則技巧的利用黨團之間的矛盾，爭取了團方對己不破壞，終於脫穎而出當選國代，黨團形同兩敗俱傷。⁹³在益陽縣，黨方提不出一個能與團方競爭的有力人選，乃利用團方的內部矛盾，運作提名一個與黨方素有交誼的團方人士參選國代。⁹⁴

黨團的選舉爭執與暗鬥幾乎是全國性的，以黨團摩擦知名的湖南省更特別以「文攻武嚇」的動盪局面博得人們的視線焦點。在長沙街市上，有以三青團名義貼出打倒國民黨標語者；三青團在湖南的最大機關報紙《中興日報》一向與同在長沙的《中央日報》互爲犄角，選舉期間摩擦尤其不可避免，報導多未顧及平衡原則。⁹⁵在沅江縣選舉國代時，黨團壁壘分明，縣長以選舉事務所主任名義出面與黨團雙方商議，派遣縣府各科長會同黨團人員，充當監

選員、監票員，與保票員，隨帶武警若干，分赴各選區協助各鄉鎮投票。儘管如此，其中一個選區票櫃仍然被砸；一個選區因黨團摩擦激烈，引起動武，負責監選的縣府科長突出重圍，始將票櫃攜回縣城；另一個選區裏，兩股地方勢力分別倚恃黨團，為各自支持者選拉票，雙方互不相讓，始則咒罵，繼則動武，且掏出手槍恫嚇威脅，幾釀至械鬥局面。⁹⁶在大庸縣，「五七事件」後上任的新縣長李善後親炙黨方，人事更動頻繁，團方至為不滿，嗣團方的彭正宇被中央圈定為國代提名人，選戰遂形成團方與黨政聯盟武力對峙的局面。黨方參選人李佑琦揭櫫「聯族、聯戚、聯友」的三聯主義，團方則指斥黨政聯盟為「借我黨之外衣，行割據之實質」，雙方且部署武力以待，投票期間多有衝突。⁹⁷

作為國民黨政權下的一個龐大派系，政治為三青團的實際興趣與伴生利益的所在，上起中央，下至地方基層，凡黨政部門及社會團體等均是三青團樂意擴展影響力的活動場域。中日戰後，國民黨政權為實行憲政所開放的一連串普選更是三青團汲汲經營的目標，安徽省黨部副主委（前安徽支團部幹事長）張宗良在國代、立委選後的一次會議上，就躊躇滿志向昔日他的三青團幹部說道：「這次選舉，是團的力量的一次勝利檢閱，也是所有從事團的工作的同志一年多來艱苦奮鬥所取得的最高報酬。」⁹⁸團方欣慰之情據可徵見。

儘管國代與立委選舉自提名以降風波不斷，頗有瑕疵，執行上亦未盡符合民主程序，總要為中國步入憲政的一大里程碑；不過，若單就黨團關係的角度視之，毫無疑問的，選舉扮

演了國民黨與三青團再次正面對抗的觸媒。從黨團衝突的面向而論，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八年初的國代與立委選舉和一九四六年各地的參議員選舉並無二致，具備組織能力的國民黨與三青團在其他政治團體的實力並不足畏的情況下互視為最大政敵，爭端累出。與一九四六年不同的則是，國代立委選舉正值黨團統一的執行期，統一措施未能全盤順利執行與黨團交相鬥的惡質選風相激相盪，二者互為負面因果，黨團關係只能日趨谷底；且在中國已啓內戰的局面下，具有地域普遍性質的黨團之爭，在一九四七年之後帶給國民黨政權的不良形象與實質社會成本絕對要比一九四六年來得更為不利與沉重。⁹⁹最後，當黨方與團方的國代立委當選人進入中央後，這些不良形象與等待償還的社會成本也就跟著跨進了為實施憲政而組成的嶄新政府裏頭，新政府的效能與國民黨的革新也就更加渺不可及了。

第四節 行憲聲中人事机陞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正副總統選舉在即。四月四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開議，討論正副總統提名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宣稱不願參選總統，「今後雖不任元首之職，但仍將鞠躬盡瘁，為國效勞」。¹⁰⁰黨內對此頗有異見，蔣中正警告若不服從他的主張，則不到二年，國民黨有崩潰可能。¹⁰¹五日國民黨中常會上論戰更為激烈，多數三青團方面的中常委主張接受總裁意見，何浩若且提議總裁放

棄總統名位而擔任行政院長，團方多右其說；CC系擁蔣競選的態度至爲堅決，與團方再三爭辯，黨內部分元老則與CC同一立場。最後，爭議歇止，因爲人們相信依據憲法的規定，總統有名位而無實權，這可能是蔣中正不願參選的主要原因，職是之故，制定一套足以賦予總統在特定時期得爲緊急處分權力之類補救辦法的建議在會上提了出來。六日，臨中全會決議擁戴總裁蔣中正競選總統，但正副總統選舉不採黨內提名方式，黨員在國民大會中得依法聯署提名參選。⑩十八日，國民大會三讀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十九日，蔣中正獲選爲第一任總統；二十日，國民大會依法公告孫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爲國代聯署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⑪

國民黨內雖無副總統提名人選，蔣中正實則屬意立法院長孫科，陳立夫輔選責任尤重。⑫四月二十三日首輪投票結果，無人得票逾國代總額半數，依規定，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出局，得票居前三位的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孫科、武漢行轅主任程潛進入次輪選舉。蔣中正當即召集湖南籍的團方中常委賀衷寒、袁守謙，要求爲程潛助選，此舉似暗有牽制李宗仁，圖使孫科順利出線的意味。兩湖本即程潛主力票源所在，因此賀、袁二人實係受命對三青團各地國代進行運作，在三青團舊部方面仍具影響力的康澤亦助程潛。二十四日續行第二輪選舉，李宗仁、孫科、程潛仍無人過半，依規定須再舉行第三次投票。該日，蔣中正召見程潛勸其退選，並命賀衷寒與袁守謙將爲程潛爭得的選票改投孫科。是夜，蔣經國、鄭彥棻

等人在一場三青團幹部座談會上傳達蔣中正意願，希望促使孫科當選，並說明程潛業已自動棄選，囑在場各員向各省代表宣示擁孫立場；在座人士聞後多表不滿，託詞稱三青團組織在黨團合併後已經瓦解，該任務應責成黨部負責云云。大約同一時間，程潛向他的支持者宣布退選的決定，李宗仁接著在子夜時刻也以種種「極盡誣衊之能事」的謠言打擊其個人競選活動為由宣布退選，二十五日中午，孫科在對手息兵的情況下跟著退選。¹⁵⁵

三名候選人棄選原因不一，總之各有其壓力或考慮。在各方折衝之下，三人應允重開選戰。二十八日舉行第三輪選舉，李宗仁獲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孫科一千零四十票，程潛五百一十五票，仍無人過半，依規定淘汰程潛，李宗仁與孫科將以相對多數原則進行決選。李孫二人票數差距原即有限，至是更有「兩廣決戰，取決兩湖」宣傳語，期以爭取程潛票源為第一要務。李宗仁在這場白熱化的爭奪戰中顯然比孫科多搶得一些程潛的選票，在二十九日的第四輪選舉中，李宗仁獲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孫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雙方僅有一百四十三票差距，李宗仁即以相對但微弱的多數當選第一任副總統。¹⁵⁶

李宗仁在不為層峰所喜的情況下力摒孫科而告當選的原因非只一端，從黨內動員的角度來說，三青團的反動與黨團關係有欠和諧厥為重大關鍵，其心理具體反映在三青團對中央統制性格與表現的不滿，以及對CC系的反制。黨內對政治的不滿由來已久，以新血輪自居的三青團感受同深，其時有人將李宗仁參選副總統之舉視為政府力謀建設，爭取民心的一線象

徵，團方有認同者。⑩且新桂系與三青團在中央及地方均不乏合作紀錄，早在國大開幕之前，南京已有親團方的報紙預言三青團同情李的傾向；在新桂系直接掌控的廣西與安徽省，三青團擁李參選尤為明顯。⑪而副總統選舉雖無黨內提名，為自由競選形式，實則蔣中正執意支持孫科，三青團出身的國代先經囑咐投予程潛，後又奉命轉投孫科，反彈聲浪於焉不絕，多不甘自為工具，對中央統制尤表反感，乃於程潛敗選後轉而支持李宗仁。⑫另一方面，陳立夫對孫科的輔選行動也遭致若干非議。二十四日團方乍聞應改向支持孫科時，已有擁孫任務應責付黨部的憤慨語，選後人稱國代之不守黨紀，即為不滿陳立夫辦黨的一種表示。⑬由於國民黨與三青團的統一，使得現在的黨團之爭在名義與實質上都已正式成為黨內的事務。一九四八年四月的副總統選舉說明了團方自主意識仍強，黨方的一名CC系分子日後回憶這段史實時，就指出此後國民黨在形勢上顯然分裂了，由是成為「大陸淪陷的一個主要原因」。

⑩ 這種分裂的態勢繼續延續到五月八日開幕的行憲第一屆立法院裏，國民黨提名陳立夫參選副院長的人事案成為立院首次黨團之爭的導火線。五月三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總裁蔣中正所提，推舉孫科、陳立夫為正副立法院長國民黨候選人。⑭孫科擔任立法院長職務逾十五年，富理論基礎、議事經驗與執事權威，去年歲杪以來已被視為行憲後首任立法院長熱門人選之一，日前在副總統選舉一役敗後，出路問題尤為眾所矚目；CC系則因在新立院中占據

可觀實力，無論陳立夫有否問鼎立法院院長原意，其為國會重要領袖已可確定，唯陳不孚國際聲望（特別是美國），他的派系色彩也成為副院長選舉的一項險阻變數。①陳立夫的提名迅即在四日舉行的國民參政會歷屆參政員聯誼會中遭到三青團的黃宇人以及朱家驊派的甘家馨等立委掣肘。三天後，一個反陳的聯合陣營大致形成。在七日再度集會的參政員聯誼會上，包括三青團、朱家驊派、新桂系，和一些北方立委提出當時仍在美國的立委傅斯年——中國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參政員任內曾以猛批孔祥熙、宋子文而被報界謔稱為意欲革命——用以反制陳立夫。反陳陣營敦勸立法院其餘勢力支持他們所提出這位無黨無派的副院長人選，藉以集中力量，一致對陳；在立法院議場之內，反陳陣營並預作各種部署，俾影響陳立夫當選機會。儘管CC系全力護盤，反陳陣營起初仍然獲得豐碩成就，例如立法院決議正副院長由立委互選產生（而非經由提名的方式），全體立委均為當然候選人：這表示至少在形式上，反陳的國民黨立委將可給自己擁護第二位副院長人選的舉動賦予正當色彩；此外，立法院還將改選正副院長應經全體委員「五分之一以上」二人數提議方能成案的規定修正為只需「十分之一以上」：這意味著即使陳立夫當選，未來他仍可能要時時擔憂來自異議者的罷免威脅。②

在此期間，蔣中正為立法院選舉一事曾於十二日召集國民黨中常委，三青團方面的黃宇人及湯如炎二人明白表示反對陳立夫，在座的張道藩等CC系中常委甚為憤怒，遂致不歡而散。③百餘名立委也曾在前中央團部集會，一致不滿陳立夫被提名事，其中應多三青團分子。

隨著正副院長選舉辦法愈趨有利的修正，反陳陣營聲勢也愈見浩大，這樣，當整個選舉辦法在十五月底定的同時，反陳陣營的實力似已凌駕CC系一方。①當晚，三百餘名來自三青團、朱家驊派、新桂系，與部分不滿現狀的立委雲集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時的大本營「重慶安樂廳」，並發表聲明，主張推選孫科、傅斯年為正副院長，語間且以傅斯年「無黨無派，無小組織」、「主張改革，絕非定型之守舊人物可比」等佳評，暗諷國民黨提名一個「講統制、弄手段、阻礙進步的人」的不當；在十多位發言的立委口中，陳立夫甚至成了反動勢力的具體象徵，連日來反陳甚力的黃宇人呼籲「必須集中改革的力量，才能摧毀反動勢力的阻礙」；一名陝西省立委質疑「黨為什麼總把政權握在右手，而不讓左手換一換？」一名四川省立委則以「現在當了立委，我不怕失蹤了」的幽默口吻給這些黨籍立委違逆黨令的行為作出部分解釋，他宣稱投票給陳立夫將對不住國父、領袖，與自己的良心，接著他激昂的表示：「我只有一个腦袋，我不投票「選陳」是對辦黨廿年的一個抗議，……也可以請領袖不受蒙蔽。」②

事實上，蔣中正正在立法院副院長選舉的爭端中，並未如副總統選舉那樣強力介入——儘管陳立夫的候選資格係由蔣所提，並且蔣也召集了國民黨中常委進行了解。除了中央黨部秘書處在十五日函請黨籍立委一致支持國民黨提名的孫科與陳立夫外，在正式選舉的前一天，即十六日（周日），沒有來自高層的壓力迫使反陳勢力改變立場，蔣中正夫婦甚至前往無錫進

行簡短的度假，這使政治嗅覺敏銳的反陳陣營感到事有可為。該陣營領袖之一，且擔任安樂廳集會主席的黃統將此解讀為蔣中正正在採取鬆手態度，一些反陳人士則評論蔣未重蹈副總統選舉覆轍實乃明智之舉。⑩反陳陣營在十六日還接續發表一份公開聲明，陳述他們動機純正，此事非反對陳立夫，「祇是不贊成陳先生當副院長」。在這份於選舉日見諸報端的聲明當中，反陳陣營強調不同意讓一位以派系利益高於黨國的人擔任副院長，他們對陳立夫的保守立場與統制性格也再度提出疑慮，在聲明結尾，特別又以傅斯年不具黨派色彩來驗證聯合陣營的動機是「天下為公，毫無任何派系觀念」。⑪

十五日的安樂廳集會過於激昂的言論讓一些中立分子心生猜疑，這是反陳陣營立即在十六日澄清動機的原因之一。至於反陳陣營屬意的傅斯年則態度未見積極，十六日南京兩家晚報掲載一封據說是胡適於六日寫就的私函全文，內稱傅斯年本即無意擔任立委，故胡適勸導擁立計畫可予取消。同日（十六日），以CC系潘公展為首的十八名上海文教界人士向全體立委發出公開信，內對傅斯年執持我見的學者性格與其立委資格的認定問題提出質疑，未以「守法遵憲」相期於立委。⑫儘管反陳陣營的聲勢於十五日達到頂峰，但是十六日的勢頭卻明顯轉向CC系這邊。為了與安樂廳集會互別苗頭，陳立夫於十六日下午假國民大會堂舉行茶會招待立委，到會者約在三百餘人上下。陳立夫致詞指出部分立委所施抨擊非以事實為根據，並仍然否認黨內有所謂CC系存在，稱過去黨內不免有缺點與矛盾，但渠問心無愧云云。

張道藩發言尤爲直接，他逕將這次集會命名爲護黨大會，且批評安樂廳集會違抗黨的決議，無異就是想摧毀黨的力量。總計十餘人在茶會裏代表發言，其中以誼屬政學系要角的四川省立委李伯申即席表達支持陳立夫之舉最受矚目，據傳CC系已與政學系達成協議，條件爲不久後需支持張群爲行憲首任行政院長，無論此說是否屬實，政學系最終未成爲反陳的主力則可確定。另外，由於傅斯年曾提出外蒙非中國領土，內蒙是歷史的名詞等論調，蒙古及邊疆立委票源至是倒向陳立夫。^⑩

最初，CC系在立法院的基本實力約在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人上下，經廣結奧援，在爭取陳立夫過關的議題上已獲增一倍票源有餘。^⑪立法院於十七日上午選舉院長，孫科實際上未遇反對，獲得六百一十六張發出選票中的五百五十八張，得票率九〇·五八%。下午續行集會選舉副院長，反陳陣營未能聯合足夠的力量，甚至己方亦見跑票現象，此消彼長的結果，陳立夫在六百一十九張發出選票中，終以過半數的三百四十三票擊敗獲得二百三十六票的對手傅斯年，陳得票率五五·四一%，傅得票率三八·一三%，《中央日報》記者以雙方一百零七票的差距宣稱傅斯年「慘遭失敗」。^⑫

五月十七日的選舉結果對反陳陣營自是一大打擊，十五日安樂廳集會已有永久團結之說，驗諸開出票數顯未盡然。十八日，黃宇人向合衆社(United Press, UP)宣稱中國的立法院雖爲一黨性質，但還是會像其他民主國家的立法部門一樣有個政府派與反對派。在選舉過

後的這次專訪中，黃宇人表示他的團體將會繼續為一較好的政府而奮鬥，主要目標將對準反動與保守主義。他透露反陳勢力馬上要組成一個具體團體來接下立院反對黨的角色，這個團體將以大約二百五十名來自已經取消的三青團、國民參政會，以及行憲前即已擔任立委的現任立法委員為核心。根據黃宇人散發的訊息，合眾社記者描述副院長選舉一事已經使一個標榜改革、民主，與誠信政權的反對黨具體成形。¹⁰事實上，黃宇人口中的反對派真的在六月一日於國民黨中央青年部正式成立，與他的計畫稍有不同的是，這個名為「新政俱樂部」的組織基本上是出身三青團（含黃埔系、復興社）立委的封閉組合。¹¹俱樂部的名稱與李宗仁在副總統選舉中為人所熟知的競選口號「行新政，用新人」一致，¹²成員共有一百餘人，成立會上並推選若干幹事。人們很容易聯想到三青團的確希望在立法院中伸張他們的影響力，從非正式的角度說，黨團之爭也已正式在中國最新成立的國會裏浮現——雖然三青團早已不復存在。參與新政俱樂部成立大會的前湖北支團部書記劉先靈當天在日記裏記下：「此百餘立委，為團之菁英，能否徹底團結，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全靠自己今後之努力以為斷。」在他的個人回憶錄中並且把新政俱樂部的成立視為黨團合併無功的佐證之一。¹³

為了與三青團的新政俱樂部相頡頏，CC系立委也在張道藩領導的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裏舉行「革新俱樂部」成立大會，時間當在新政俱樂部成立後二星期之內。CC系顯然另行拉攏了一些立委，以致革新俱樂部的成員起碼有二百餘人或更多。根據來自內部的說

法，革新俱樂部的宗旨在於「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團結進步份子，共同促進政治之革新」。¹⁰該俱樂部的名稱明顯承繼自中日戰爭後期由CC系所發起，然而近期已大為消褪的革新運動。除革新、新政兩大政團之外，立法院內還充斥著不少派系的結合體，學者蕭公權即指出：「在目前，派系的聯絡，遠比黨的組織更有力量，這是一個現實問題，絕非唱高調空談所能掩飾的事實。」¹¹幾個較重要的政團還包括親新桂系的「一四座談會」、親政學系的「民主自由社」、朱家驊派等，基本上，這些團體與派別對CC系不具好感，對內戰問題大致主和，與三青團的新政俱樂部時通聲息。其餘先後出現大小不一的政團仍多，例如「諍友社」、「建國俱樂部」、「參政俱樂部」、「北方立委聯誼會」、「中社」……等。各團體的組成多繫諸派系、政治出身、人際網絡、地域等因素，彼此間或有成員重疊現象，如民主自由社內即有三青團分子，「聯合座談會」且為新政俱樂部與友好勢力的聯絡組織。¹²

國民黨在立法院內一黨獨大，黨內派系文化從而導入，議事殿堂仿如國民黨政權又一派系利益爭逐場域。由黨正式提名的陳立夫雖於五月十七日獲選為立法院副院長，然過程足稱驚險，黨機器已有難能駕馭黨籍立委之虞，接踵而至的行憲首任行政院長人事問題尤令蔣中正傷神。出掌行政院甫滿一年的張群初為蔣中正屬意的行憲首任閣揆人選，唯張意願不高，主要障礙仍在CC系與反政學系立委可能作梗。月來蔣中正對張多所疏通，京中政界耳語不斷，其間甚至傳出CC系與政學系就立法院副座和閣揆二職利益交換情事。二十日，蔣中正

就任第一任總統，閣揆人事迫在眉睫。二十一日上午，四百六十名黨籍立委在中央黨部試行閣揆人選假投票，二百五十九票投給另一熱門人選但同持逡巡態度的何應欽，張群居次，僅得九十四票。^⑭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將近日政局視爲國民黨內的反叛，他認爲這比蔣中正和李宗仁參選副總統時遭遇的難關更加嚴重，因爲這是針對蔣中正多年賴以立足的基礎內部的反叛。二十三日當晚八時，包括三青團在內曾經參加安樂廳集會的二百多名立委再行聚晤，會中決定成立聯合座談會以便經常聯繫，他們並澄清外界將新聞難產問題歸咎於立法院一事，指出提名純係總統責任，即使立法院有所阻礙，亦當由「多數派」負責云云，矛頭指向最終仍杯葛張群的CC系。另一方面，就在同一時間，兩日來輿論及政壇焦點所及的何應欽向蔣中正當面推辭了行政院長提名，最後，蔣中正找來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命令他接行政院長的職務。^⑮

蔣中正提名翁文灝的過程至爲倉促，二十四日上午國民黨臨時中常會通過蔣的提名案；下午二時，蔣召集黨籍立委進行說明；嗣立法院即行投票同意翁文灝爲行政院長，此距翁文灝獲告將受提名尚不滿一日。^⑯由黨內各派系共同組成的翁文灝內閣未得各方支持，行政院官員施政遭受立法委員黨同伐異的差別待遇頗爲明顯。^⑰自九月起，前線軍事日趨不利，十一月瀋陽棄守，東北至是陷共，繼則徐蚌會戰（淮海戰役）開始，首都威脅日增；後方則金圓券失敗，物價暴漲，經濟崩潰，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京滬頻起搶米風潮，翁內閣束手無策，

屢請辭職，十一月下旬乃確定由孫科接任行政院長，二十六日立院投票同意該項提名。^⑭孫科有感於翁內閣前車之鑑，默察艱厄時局，乃力主「舉黨一致」，要求黨內各派有力人士相率入閣，其中，代表CC系的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以及具有黃埔系教官身分與三青團色彩的張治中二人也在網羅之列。同受孫科點名的吳鐵城打算角逐孫科所留下的立法院長職位，入閣意願最爲冷淡，唯孫科一體堅持，並不惜據定個人去留，蔣中正同促吳鐵城參加政府。十二月二十二日，蔣中正正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推舉吳鐵城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獲常會通過，浮沉三周有餘的孫科內閣人事至是底定。^⑮

孫科與陳立夫進入行政院後，原立法院正副院長自必隨之改選。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國民黨中常會除通過吳鐵城人事之外，還通過蔣中正提名李培基與劉健群兩名黨籍立委爲立法院新任正副院長候選人。李培基曾於五月公開聲明「信仰中央」，支持陳立夫出任立法院副院長，屬革新俱樂部成員；劉健群則出身復興社、三青團，爲五月反陳主幹之一，新政俱樂部分子。^⑯李劉二人提名案可視爲蔣中正依實力原則對革新俱樂部（或CC系）與新政俱樂部（或三青團）的政治分配，唯兩造不引爲己足。先是親政學系的民主自由社擁舉吳鐵城競選立法院長職缺，新政俱樂部與一四座談會等同表支持，及至吳鐵城入閣，乃改推主和派的童冠賢角逐立法院長，意在反制國民黨中央提名人選李培基；革新俱樂部則簇擁同爲CC系一員的程天放加入立法院副院長戰局，旨在杯葛黨中央提名人選劉健群。^⑰從某種角度而言，這波

人事風潮比起五月的立法院副院長選舉紛爭還要來得嚴重，實際上，不耽於各自利益配額的三青團與CC系等於同時但個別的向國民黨中央威權提出挑戰，並且擴大延燒範圍至正副二職。在這場權力鬥爭中，三青團與CC系既是進攻者，也是防守者，黨內各派系也同聲加入，破壞力與重要性不下於任何一方。

立法院第一任正副院長選舉自國民黨通過提名到立院互選當天，計二周整，選前一日反陳陣營欠缺重要活動以凝聚票源，聲勢迅轉至積極運作的CC系一方，此為反陳陣營失策之處。^⑩十二月二十三日，新舊內閣交接，行憲第二任行政院長孫科正式視事，同日立法院接獲立法院院長孫科辭函。日來各政團活動甚烈，關於立院正副院長改選的政治暗鬥持續加溫，諍友社則呼籲最好留待下一會期（第三會期）再行改選。二十四日上午，立法院會在宣讀孫科、陳立夫辭職書後，原擬進行正規議事討論，未料反CC系方面的前參政員羅衡立委突請改變議事程序，要求即行選舉院長，在場的革新俱樂部立委人數這時顯然居於劣勢，因此羅衡的提議馬上遭到反對，持異議者疾呼：以若干留滬及京畿之委員未獲通知遽行選舉，實不異剝奪彼等之選舉權。雙方爭執不下，會場秩序大亂，經短暫休息重開大會之後，隸屬新政俱樂部之臨時主席陳願遠歸納各方意見提出三案訴諸表決，結果大會通過當日下午進行選舉。革新俱樂部在三（正）至五小時（副）內所發揮的動員能力並不理想，由三青團、政學系、新桂系等反CC勢力推出的院長人選董冠賢獲得三百五十一張發出選票中的一百九十六張，得票

率五五·八四%，敗選的國民黨提名人李培基得一百二十三票，得票率三五·〇四%。副院長方面，國民黨提名人劉健群獲得三百四十二張發出選票的二百零二張，得票率五九·〇六%；革新俱樂部的程天放則獲一百二十六票，得票率三六·八四%，敗選。^⑩

行憲政府自本年組成以來，國民黨黨權即危如累卵，日見鬆落險態。副總統選舉無提名而孫科實為蔣中正屬意人選，然李宗仁仍當選；第一任立法院正副院長有提名而副院長提名入只能險中求勝；第二任立法院正副院長續有提名而院長提名人終至落敗。此中三青團勢力均扮演關鍵角色，不啻黨團合併又一顯著無功的例子。^⑪若以派系政治論之，CC系在第二任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當中全盤皆墨，實為最大輸家；但就國民黨政權而言，院長提名人竟告落選，且純由黨籍立委肇之，黨員不服羈勒之態可謂昭然若揭，蔣中正深為震怒。^⑫時政府軍於徐州前線接連潰退，平津亦起激戰，全國大部分地區進入戒嚴狀態，而和平呼聲四漫。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立法院正副院長改選當天）籲請蔣中正與中共謀和；副總統李宗仁與華中綏靖主任程潛同此主張，翌日並要求蔣中正下野，河南等地隨後應之；中共亦在二十五日宣布以蔣為首的國府戰犯名單。從整個局勢看來，蔣中正的領導權威正遭受源自黨內外不同勢力的侵犯，立法院裏的政爭則具體說明了即使是蔣中正翼下的幾個派系，現在也正自覺或不自覺的促成這種侵犯的可能性，甚而加劇。國民黨的黨權已現鬆落疲態，這使得國民黨的政府官員面臨政權空前的嚴厲挑戰時，將很難從他們的政治權力來源

（領袖／黨）那裏求取有力的挹注，俾進而作出適當且立即有效的回應。

儘管如此，在紛擾的政治內爭中，國民黨各派系咸以道德性動機自許。以立法院為例，黃宇人等反CC人士標榜改革先於安定，第一大派的CC系雖同主革新，但也揭槩安定團結之義，陳立夫當選前後及革新俱樂部成立伊始均曾作此主張。^⑭及至董冠賢與劉健群選出，自是反CC陣營的一大勝利，前三青團機關報《和平日報》發表社論《由立法院長改選看國民黨前途》指出，就好的方面說，國民黨的立法院長提名人落選的事實意味著「國民黨內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就壞的方面說，這證明國民黨已經失去掌握控制全體黨員的能力」。社論實際上重申了改革先行的理念，文中強調國民黨的團結和新生必須透過多數決的民主精神才能化為可能：

立法院這次選舉，證明黨的團結和新生是十分可能的，而應循的途徑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發揮民主精神。……少數支配多數的傳統作風必須改變，多數決定少數的時代潮流必須迎合，國民黨若能重視絕大多數黨員，以絕大多數黨員的利益為利益，一定會在大多數黨員的維護之下獲得新生。^⑮

在這裏，社論執筆人似乎忘記了反CC系勢力在五月的表決結果當中曾經也是所謂的「少數」，然而「多數」並未由此得到尊重。可以發現，國民黨內的改革聲浪自始即夥隨相當濃厚的派系政治、權謀機巧，就此角度而言，一九四八年立法院的反CC行動與稍前反孔宋、政

學系的革新運動之間，基本上並無太大差別，亦即二者均將國民黨活力日蹙的責任歸咎於黨內的政敵，對自己卻疏於檢視或反給予過多的寬容。有趣的是，在一連串的政治運動當中，還未在黨政方面被畀以實際領導重任的三青團幾乎都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以至於幾個多少均帶銼痕的主要派系都曾經是它的合夥人，也是三青團抨擊的矢的。

第五節 國民黨改造的先聲

長久以來，面對外來的嚴峻形勢始終缺乏深刻自省與回應能力的國民黨，一直是蔣中正眼中亟待改革的對象。一九三五年黨的五全大會之後，逐漸步向權力顛峰的蔣中正對黨務與黨人的批評即有持續增加與更為嚴厲的傾向。一九三八年五、六月之際，甫成爲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曾提出「改造」的初步念頭，儘管蔣個人尚無任何具體方案，但他明白指出「如有必要，寧使目前將黨部停閉，從新改造」，可見其視黨務如沉痾，已有挹注猛藥的決心。①一個多月後，三青團正式成立。蔣中正曾經寄望這個嶄新的組織能夠重振業已遭致國民黨遺忘的革命精神，然而三青團的表現讓他頗爲失望，更不堪的是，黨團難能共濟，反成水火，不啻又爲政權添一沉重政治負擔。國民黨政權有岌岌可能，來自各方內涵不一的改造呼聲則自中日戰爭後期愈發喧騰，黨團同請遂行改革。基於淺顯易得的正面理由，三青團曾參與其最大政敵CC系所發起的革新運動，唯如學者易勞逸所稱，儘管革新運動也公開譴責了黨內

氾濫的派系主義，但實際上，運動本身也成了政權的另一個派別。¹⁰作為國民黨因應戰後內在形勢需要所實行的重大調適和改革，¹¹開展於一九四七下半年的黨團統一曾經被蔣中正視為一次真正的改造，但沒有多久，此舉也被證明未能達到振衰起敝的預期效果，而關鍵的一九四八年迅即來到。

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宣布動員戡亂，各地共軍同時也轉取攻勢，一年之間，政府軍處處不利，士氣愈為低落，中共決意進行決戰，奪取大城。而內政外交煎迫，社會經濟加速崩潰，毛澤東先以為一九五一年可能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一九四八年九月，他認為再有一年左右即可做到。¹²國民黨黨機器則不唯形象與黨權盡失，實際運轉活力也因黨團有欠融洽的合併，以及更多經年的病因交叉感染之下愈趨不靈。隨著黨內外局勢日危，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改革聲浪更為震耳與廣泛，不少人察覺國民黨與三青團統一之後根本未能達到蔣中正所要求的「政治革命性」改造功能（甚至早就預測到這結果），於是他們提出比較急進的口號與行動。私下對國民黨常表失望的蔣經國就是一個例子。為了一體貫徹三民主義革命，以及對抗有礙於革命的中共與國民黨內所謂黑暗勢力，蔣經國曾揭櫫「一次革命，兩面作戰」論調；¹³在此前後，更積極著手籌組某種政治色彩的集團或個人組織。¹⁴一九四八年四月間，部分前三青團幹部曾打算成立「中國國民黨黨務改革促進會」，且擬在各省市設立分支會，盼能藉此破除團方在黨團合併後所面臨的困境。¹⁵在安徽，前支團部幹事長張宗良則預備組織

「中國青年團」以資號召。¹⁵甚至前復興社部分成員也正朝著恢復一九三二年的秘密組織而努力。¹⁶

不僅是復興社打算重現昔日的團體光榮，不齒舉目官僚作風的蔣中正也開始緬懷這個當年「足以振奮人心，社會爲之恐懼」的組織。¹⁷看來，現在蔣中正正處於意志掙扎的時刻。¹⁸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間，蔣中正還冷峻的撻伐了名亡實存的三青團仍有取代國民黨領導地位的企圖，但是隨著三青團的政治表現，特別可能是來自立法院內龐大且跨派系的反CC系洪流，以及若干局勢發展，蔣中正不得不被迫承認現實，轉而考慮再一次進行大幅革新國民黨的計畫。先是美方建議國民黨應在民主制度下朝向黨政分離的改革，而據司徒雷登所確知，蔣中正在去年八月已準備就一份有關美國兩黨的材料進行研究。¹⁹本年初，以《大公報》的文字肇始，一種以自由主義爲中心的討論浸然成形，是爲自由主義運動，爲美方與胡適等意見領袖所樂見，司徒雷登且在二月指出知識分子與受教育者可組一新黨，對政府作建設性批評，亦可成立若干團體倡導有關改革的主張及進步的運動；三月，一些學者與黨政官員在北平成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傳有演進爲政黨的可能，自由主義運動幾達高峰；²⁰司徒雷登嗣向美國回報國民黨高層核心(a nucleus within the party leadership)正策畫相仿的行動，並請求司徒爲他們謀取蔣中正的支持。四月，蔣中正親促其一度屬意的總統人選胡適出面組黨，遭胡適婉拒，胡適並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成兩三個政黨」。²¹接著，國民大會

與立法院開議後所衍亂象讓蔣中正確信國民黨內的秩序已然徹底失控，他在五月三十日公開嚴厲斥責：

現在一般黨員的心目中，卻沒有了黨權黨紀，沒有了主義，沒有了領袖。祇知一己的權利，你爭我奪，互相傾軋，不受黨的約束，不接受領袖的命令，這是他們行憲的自由，實在是自取滅亡。像這樣的自由愈大，也就亡得愈快。也不想，這樣離心離德，予共匪以可乘之機。如果共匪得逞，大家又將怎樣？^⑭

同日，蔣中正正在一午宴場合對五十三名應邀的國民黨高級幹部（僉為CC系重要成員與前三青團領導分子）表示，將於七、八月間召開一場全國代表座談會，用以強固國民黨的組織基礎，蔣中正聲稱倘使這個目的不能達成，則他寧肯讓黨分裂，「不願做國民黨黨員的人，可以脫離，也可以另外去組黨，我絕對願意支持」，他補充道。^⑮翌日，CC系領導人陳立夫赴美參加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大會及考察英美民主政治，陳並辭卸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與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二職，輿論有以「鍛羽出國」視之者，亦為蔣中正嘗試一新黨務空氣的若干表現。^⑯根據正在南京參加立法院第一會期會議的立法委員劉先雲的晚年憶述文獻指出，蔣中正這時曾邀集前三青團幹部會談，蔣一一徵詢在場者有關黨務在黨團合併後究應如何興革的意見後即席指出：黨團雙方成見太深，決難繼續合作，今後黨務應謀徹底改造，唯時間須在兩三個月內完成。會談後未久，蔣經國也邀請一批前地方團務幹部進行茶叙，蔣經國於

會中坦率主張國民黨分立，但不以原黨團單位的分立爲限，他表明最好是黨團均暫停活動，成立各級整理委員會，徹底整理黨務團務。經交換意見，與會者決定就蔣中正這次所鼓勵的黨務改造進行分組研究，同時擬具實際方案應對。⁽¹⁷⁾

司徒雷登曾建請蔣中正解散CC系，陳立夫暫放出國的政治意涵可爲蔣中正改革黨務的有力表示。人們普遍注視著本次國民黨改革消息，由於蔣中正構想中的全國代表座談會顯然只具有黨內公共論壇的功能，因此，這一次的改革運動最終還是要交由蔣決定它的深度與面貌。然則蔣中正所能容忍的改革極限爲何？至少在前三青團成員看來，蔣中正最近的言行比起一九四六年他們自認已感受到組黨的鼓勵性暗示，無疑要來得更加直接明白——儘管最近這類言語有的略顯情緒化，但是出之以雍容平和的時刻也不是沒有。⁽¹⁸⁾ 默察政局走勢，三青團併入國民黨雖未滿一年，這時的分離傾向卻已逐漸攀上數月來的最高點：團方立委於六月一日成立新政俱樂部，實以反對派自居；前三青團分子在中央青年部集議咸認應即採取行動改造國民黨，有關獨立組黨的建議也在會上提出，並獲得這些團方成員的廣泛同情，似愈認不失爲一改革契機。⁽¹⁹⁾

團方的分離色彩至爲鮮明，事實上，國民黨內高層也的確曾將「黨務組織的一元化或二元化」納入興革的討論範疇，這大抵是基於承認既有政治現實或部分人心所趨的緣故。國民黨的官方報紙南京《中央日報》即於七月十日社論《黨的改造與政治改革》裏主張，今日國

民黨的改造要以理想和政策為主，「儘管同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未嘗不可隨其理想與政策之不同，而結為不同的集團，各申訴其理想與政策於人民，以決其成敗」。早在中日戰時脫離CC系陣營的立委劉不同於十五日籲請將某一批獲得特許經濟利益的三民主義背叛者逐出國民黨外，否則只有在黨內組成保守與進步二派自由競爭，得擁護者參與中樞，從事領導，在野者准自由發表言論，形成反對派，國民黨始得以永久年輕，不致墮落腐化。¹⁵

一些黨員為蔣中正心目中用以強固國民黨組織基礎而擇期召開的座談會預先提供了幾件改革意見書，例如以李天民為首的二十八名前三青團地方團部領導人草擬的一份改造辦法建議，成立各級整理委員會負責改造，厲行定期退職制以消滅派系根源，提高黨權，黨魁以下絕不得以派系或個人為中心，黨高於一切，不採黨政軍政平行方式。¹⁶四十五名來自多個派系（包括團方）的成員提出另一份意見書，文中以未指名方式譴責了CC系與官僚資本主義，他們不同意國民黨再以全民性、超階級性自居，最起碼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大地主、大資本家不在他們歡迎之列，認為應注意爭取全國的農工大衆與進步的知識分子。這份意見書以既往革新運動與黨團統一的前車之鑑為慮，同李天民等人的改造辦法一樣，為謀徹底改造，他們也主張各級黨部一律停止活動，設各級改造委員會主持相關事宜。¹⁷

這樣一來，三青團一方就至少出現了分離主義（組黨）與從頭重整黨機器（成立各級黨部的替代組織以實行改造）的兩種聲音。各方對於本次改革運動的看法討論頗多，但是於八月

三日起一連兩天在南京舉行的座談會實際上以猛烈的即席批評獲得人們的注目，是爲國民黨史上著名的「黨務座談會」，留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與黨籍立監委、各部會首長具國民黨籍者凡四百餘人參加。與會者毫無掩飾的重提了多年來人們屢屢指摘國民黨的一切缺點，前三青團中央團部機關刊物《三民主義半月刊》主辦人楊玉清甚至要求取消已有十年歷史的總裁制度，認爲係黨務問題的癥結，唯此論點在會上僅獲得極微弱的公開呼應。一些人則覺得大家庭的制度實不易維持，三青團方面的黃宇人與羅貢華等人即主張分家，張群同表贊成。

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於黨務座談會結束後，即向蔣中正摘要彙報會議情形，並將各方發言意見歸納爲三大途徑：一、就現有黨的基礎加以改造；二、現有各級黨部一律暫行停止活動，重新派員限期整理，以謀徹底改造；三、國民黨分爲兩黨。八月十九日，國民黨中常會推定馬超俊等十五人研議黨務改革方案；二十四日起，十五人先後集會多次，交換意見，並推定其中六個人分就不同觀點草擬五個程度各異的案子，其中，國民黨一分爲二的觀點也單獨成案。¹⁶¹另一方面，黨務座談會後，三青團組黨之說仍然未絕，由於當下團方在權面欠缺具份量的領導人物，致黃宇人曾有政學系可以出面組織之語，雷震以此轉告，張群表示只要三青團願意，則不難組織。¹⁶²合衆社記者敏銳的偵悉邇來形勢，二十六日，該社根據未具名的國民黨高層消息來源指出，國民黨極可能於年底之前分成保守與進步的兩黨，消息

來源甚至聲稱蔣中正與許多黨內具影響力的自由分子都贊成分家，陳立夫與張群據信是兩黨的領導人，蔣中正則成爲兩黨的連結表徵，並且保持他的國家領袖地位。①

合衆社的報導指出，國民黨已組成十五人委員會負責起草該分家計畫。事實上，兩黨方案不過是構想中的五案之一，合衆社所稱不盡符合實情，似亦有爲某些政治勢力放話之嫌，但揆諸黨務頹局，正在草擬階段的兩黨分立或重整黨機器等幾個較受支持的大案均不失爲可能的興革傾向。以金圓券爲中心的幣制改革措施甫於日前推出，合衆社所傳兩黨分立消息不啻又一備受矚目的改革之舉，唯外電之言既不能證明全真，而局勢惡化至速：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蔣中正爲遷就CC與團方政治現實的立法院正副院長提名人選完全未受到雙方尊重，黨權已在崩解邊緣；徐蚌會戰中的政府軍殘部坐困愁城，南京行將曝於火線威脅之下。就在這同時，喧騰數月的國民黨改革運動終於形成一份具體辦法，並由十五人委員會於十二月三十日的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儘管依照常會上的報告得知，最終的整理人賀衷寒綜合了早先的五個案子的意見方才擬就，但是究其內容，這份名爲「本黨當前組織作戰綱領草案」的辦法顯然排除了已然不合時宜的兩黨分立案，內文指稱「今日之黨是」係實行戰鬥、團結、改革，反對妥協、分裂、腐敗，規定設一中央革命戰鬥委員會，由中常會授權辦理國民黨全盤組織作戰事宜。這個構想中的委員會似乎將是一個全新而具有高度行動力的單位，但其功能卻又與某些人們所要求的各級整理（或改造）委員會不同，綱領甚至沒有明白

規定革命戰鬥委員會在黨機器裏的地位，以及和各黨務部門的關係。^①

經討論後，三十日的中常會決議定期繼續研討十五人委員會提出的辦法，而一九四九年旋即踵至。徐蚌會戰告結，京中人語中央機關之解體，認爲無法挽救，只有崩潰一途；復稱蔣中正縱有改造決心，勢必無從著手。事實上，此時蔣中正爲下野壓力所苦，似亦無餘裕顧及所謂改革；雷震曾當面勸以「北伐時之勇氣改革現局」，蔣聞而不耐；某夜蔣告王世杰稱將下野，「因現局不能改造，棄之不足珍惜」，語間實見愠意；張治中則親聞蔣云其被國民黨而非共黨打倒，今後再不願意進中央黨部大門等憤激語。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蔣中正在官邸向國民黨中常委宣布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②四月，國共和談破裂，長江天險亦失。二十三日，南京入於共軍之手。二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發表告全體黨員書，內稱：「過去二十年，以吾黨糾紛迭起，同志與同志之間，或因意見權利之衝突，造成若干派系箇人之恩怨是非，當此生死鬥爭陣線分明之秋，自當各各激發天良，泯除私恨，一致團結於本黨中央領導之下，爲保國保民而努力。」^③

下野期間的蔣中正仍具國民黨總裁身分，這時他又回頭正視黨務改造的必要性，並多次與高級幹部交換相關意見。在蔣中正的主導之下，一套具體的國民黨改造方案在七月十八日於廣州舉行的中常會裏獲得通過。方案具有某種程度的清洗功能，規定中常會下設改造籌備委員會，選拔改造委員，訂定並貫徹執行吸收與整肅新舊黨員辦法；各省市設改造委員會負

責領導黨部工作，原黨部委員應即停止行使職權；最後，經由民主選舉程序，由下而上重新成立各級正式黨部。⑯按照蔣中正的構想，改造委員必須加入新血，擬以中委與非中委者各占半數，過去在黨方面負過責任者，此次不必參加。若然，則CC系首當其衝。唯改造幅度既大，自不免涉及整肅，整肅與團結的要求勢有扞格，因此，富政學系色彩的吳國楨及CC系余井塘在八月的一次台北會談中，對蔣中正表示此時發表改造委員恐不相宜，結果決定先從宣傳改造著手，實施則以台灣先行。⑰

整肅與團結的爭議沒有持續多久，國民黨政權即完全撤出中國大陸，退居台灣一隅。國民黨不僅未能在大陸實現改造理想，基於客觀形勢急遽變遷，業已通過的改造方案也必須在台重新加以檢討。蔣中正再度向黨人申明改造的決心，一九五〇年初並且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彙整討論原有的改造案與各方意見。改造的方向正朝著更爲有力的面貌前進，例如，中央改造委員會可能將取代中央執監委員會的威權地位。然而，小組成員對於一些焦點問題累有爭執，這些問題包括黨名是否更改、中央改造委員人選決定方式、現有中央執監委員如何安排，以及革命民主政黨的本質問題等，致使改造進度延宕不前，蔣中正頗表痛心。⑱此外，幾名CC系的中央執行委員曾在中央談話會上以民主程序相求於改造，在場的蔣中正大爲震怒，未出席的陳立夫同受蔣憤語殃及。⑲另一方面，蔣中正的總統職銜在一九五〇年三月恢復，他提名陳誠出任行政院長，提名案實際未受立法院內CC系勢力的過多杯葛，但其後陳

誠控制下的內閣與CC系立委仍有互動心結，陳誠甚至一度有行政院長除陳立夫外無人可勝任之怨語。^⑧

蔣中正改造意念既堅，而早有點退CC系勢力打算，至是改造進度既滲，CC系能量彷彿未減。六月十六日，中央談話會上傳出蔣中正拒閱並退還中央黨部公文的消息。其後兩次常會，蔣均不出席，CC系方面的中常委蕭錚表示常會同僚宜有自覺，應全體辭職以便總裁遂行改造，常會乃推請于右任、居正、鄒魯三人晉蔣，請求出席並指示方針。韓戰適於此時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權轉趨安定。在國民黨來台中央執監委員、候補執監委員聯名上書敦請蔣中正根據年來研討所得，徹底實施黨的改造之後，七月二十一日晚，蔣中正約集中常委談話，對陳立夫有所指摘，復稱國民黨應即改造。^⑨翌日（二十二日），國民黨中常會召開臨時會議，通過蔣中正交議的改造案，連同日後陸續所頒相關辦法，是為一九二四年以來的黨務最大興革，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會依規定停止行使職權，新設的中央改造委員會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之前，都將是新的黨務權力與執行中樞。蔣中正正在二十二日的臨時中常會上提出沉痛的長篇講話，他集中抨擊了國民黨派系傾軋、人事紛爭的積弊，並強調他從不敢輕易更張國民黨的組織——從其語意判斷，中日戰爭初期創立的三青團似乎是因應特殊時勢的例外。中日戰爭雖萬分艱險，卻也得到最後勝利；然而，戰後同樣為因應時勢所實行的黨團統一卻沒有達到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目的，派系傾軋之局反

而變本加厲了：

中正追隨中央諸同志之後，秉承 總理的遺志，接受革命的志業，對於黨的組織，從不敢輕事更張。抗日戰事發生以後，為號召青年參加抗戰，乃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黨和團在抗戰時期都盡了最善的努力，使抗戰在萬分艱險的局面之中堅持到底，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但是一支軍隊在戰場上打過了一場大仗，也要重整陣容，纔能再度作戰。我們中國國民黨自「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領導了十年訓政，四年剿匪，和八年抗戰。抗戰甫告勝利，又要在國力凋敝之餘，人心厭戰之際，接受蘇俄帝國主義者及其第五縱隊中共匪徒的全面挑戰。而憲法頒行之後，行憲與剿匪兩重責任，皆在於本黨之雙肩。如果我們的黨持有健全的組織，遵守嚴明的紀律，採取整齊的步伐，貫徹中央的政策，相信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喚起民衆為反侵略反極權的戰鬥而動員。如果本黨不能趁此實行改造，決不能擔當如此繁重的工作，完成兩重艱鉅的使命。因此中正於「民國」三十六年六月至九月之間，統一黨和團的組織，並屢次明白告訴中央諸同志說道：「黨團合併統一工作，應視為政治革命性的，而非技術的事務工作。」當時預期四中全會舉行以後，黨的改造工作在六個月以內完成，可於「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五日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革命劃一新紀元。豈意黨團統一組織，在實際上，不能達成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的目的；並且自中央至省縣，黨內派系排擠傾軋，更變本加厲，漫無止

境。到了「民國」三十七年一月，預料七全大會與國民大會時間衝突，來不及籌備，因而中央常會決定延期召開。這一次統一黨團組織，徹底改造本黨的努力，可以說是毫無成就。^⑩

蔣中正通常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場合對國民黨政權退出中國大陸的原因會有不同角度的檢討，因此，論者若單就某一文獻解析他的看法，並引申為唯一定見，則勢必陷入片面之嫌。儘管如此，可以發現蔣中正正在二十二日的講話全文確以派系人事為反省重點，而國民黨與三青團的惡劣關係（特別是中日戰後）顯然成了蔣中正編年式的慘痛回憶。他接著指出：「這次大陸反共軍事悲慘的失敗，並不是共匪有什麼強大的力量，足夠打敗我們國民革命軍，完全是領導國民革命的本黨，組織瓦解，紀綱廢弛，精神衰落，藩籬盡撤之所招致。」並表示：「我們今日對革命為成爲敗，對民族爲功爲罪，全在自己的抉擇。而惟一可循的途徑，就是擺脫派系傾軋的漩渦，滌除人事紛爭的積習，以從新做起的決心，改造本黨。」^⑪

事實上，國民黨內的改革聲浪從來即與派系政治或權謀機巧共棲，派系既是各方集矢批評之的，往往也是推動批評的原始來源。職是之故，國民黨的改造工程不能不以派系政治爲一對象，也勢將無法脫離派系政治的格局進行之。一九三八年以來，青壯的三青團成員從未遮掩他們濃厚的政治願望和興趣，這些願望和興趣曾經促使三青團以派系的身分參與國民黨內的派系政治，也促使三青團以自主性組織的身分同國民黨展開毫無保留的競爭。然而，黨

團爭逐權勢的利斧一步步斲損政權的礎石，以致三青團只得被迫於一九四七年放棄自己的自主性組織身分，但派系身分仍在，分離意識仍在。一九五〇年以後，三青團的政治願望和興趣終於在政權偏安的情況下，以當權者的姿態獲得較高程度的實現。在台灣，為要求對辦黨二十餘年的失敗承擔政治責任，CC系遭蔣中正刻意壓抑，陳立夫黯然出國，此後CC系無形時以黨內反對派自居（立法院內尤是）。另一方面，從改造階段開始，包括黃埔系、復興社、蔣經國系幾方面出身的前三青團幹部，終於取得他們在中國大陸時期從來沒有過的政治權力高度。儘管「團派」的集體意識從來沒有完全消失，但是政治價值透過重新權威性分配的結果，前三青團幹部的政治抱負與利益盡在國民黨內，分離意識早已不復存留。蔣中正曾經寄望三青團喚起國民黨的靈魂，現在，三青團真正走進了國民黨。^⑬

註釋

- ① 南京《新民晚報》，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
- ② 序，〈本團如何參加普選〉，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中央團訊〉，第三期（南京：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頁九。執筆人以「我們的老大哥」稱呼國民黨，但他也特別用引號標出「老氣橫秋」四個字，顯見這個「老」字不帶敬意。
- ③ 例如張宗良自一九四六年接任安徽支團部幹事長後即大舉擴充團隊與成員，一九四七年春，張宗良陸

續在幾個要城召集地方分團會議，反覆宣揚他的「以團代黨」理念，指摘國民黨已趨老化，盡失人民信仰，因此實有必要積極發展三青團的組織。結果到十月底止，安徽全省團員數已從一年前的八萬人擴充至十六萬人，即整整一倍。田世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頁六一七。參見：曾佩涵，〈新桂系在皖南及其與蔣介石嫡系的矛盾〉，頁一五六。

④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3.

⑤ 〈關於「團的改進」案原簽呈文〉，一九四七年，抄件，「二」七二八(四)／二。

⑥ 〈關於「團的改進」案原簽呈文〉。

⑦ 〈總裁指示：關於「團的改進」案批示〉，一九四七年，抄件，「二」七二八(四)／二。

⑧ 蔣中正，〈對黨與團統一組織的指示〉，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二」七二一(五)／二二七。

⑨ 周君羊，〈黨團統一經緯〉，〈新聞天地〉，第二八期（上海：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一日），頁一；林真，〈青年團「併」而不「合」〉，林真，〈中國內幕〉，第一輯（上海：新聞雜誌出版社，民國三十七年），頁三四；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03-105.

⑩ 一某，〈湖南「黨」「團」鬥法記〉，上海《文匯報》，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通訊稿。此段所指的婦女會選舉互毆事件發生在瀏陽，青年節槍戰事件起於保靖。

⑪ 「美」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 原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八十四年），頁二二二四，四〇〇—四〇一。金介甫這部作品並不只是一本沈氏專傳，事

實上，他也描繪了近代以來的湘西變遷。特別在該書第七章，金介甫對於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六年間湘西的動亂局面著墨頗多，頁三九九—四〇九，四二九—四三六。該書參考書目臚列了豐富而重要的湘西研究文獻。金介甫在另一本著作中也深入討論了湘西，金介甫（著），虞建華、邵華強（譯），〈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

⑫參見：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二〇五。張治中繼何鍵之後出任湖南省主席，他認為湖南的匪患「到底是一個政治的問題」，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巡視湘西各縣時就表達了同意地方士紳對於湘西問題根源的見解。這些人認為湘西問題「並不若何嚴重，但若千年來政府無好官，民間無正氣，或以湘西人民樸願性成，遂專以榨壓欺凌為事，於是治安日壞，民不聊生」。對此問題的認知，張治中與沈從文似無太大的差距。參見：頁一五二—一五三，一七四，二〇五，二〇八，二一三。

⑬上海〈文匯報〉，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通訊稿；以及新加坡〈南僑日報〉對大庸縣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間黨團歷次大規模械鬥的詳細報導，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通訊稿。並見：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頁一六四—一六五，一七一。團方在一九四八年二月自承有一兩千支槍，並估計黨方大約也是這個數目，長沙〈晚晚報〉，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前引新加坡〈南僑日報〉則報導大庸縣是湖南黨團鬥爭最尖銳的地方，也是民槍最多的縣份，「據估計，至少有一萬枝以上的槍枝，可能達到一萬五千枝。」

⑭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頁一六四—一六五；新加坡〈南僑日報〉，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此後大庸械鬥行為愈演愈烈，參見第二、三節。

⑮上海《文匯報》，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通訊稿。

⑯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頁七四、七九—八〇；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頁一七一。

⑰所謂黨團吸收對象特性頗具差異，指的是由於戰後三青團在台搶先發展組織，及其領導人人脈特性，使得三青團事實上已成爲所謂「進步分子」、「左翼人士」匯集的團體（這也成爲三青團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所採行動，及事後遭大力剷除整頓的主因）；而國民黨則多所謂「保守分子」和有力士紳，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頁二四三—二四五。另外一本專著也注意到了台灣三青團的社會主義傾向，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頁一〇三。當時台灣三青團左傾色彩之重，遠非中國內地的三青團所能及。學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學術專著仍然不多，陳翠蓮《派》書對三青團及事件中的派系政治較有著墨，筆者在此借重其見解頗多。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的台灣在內，三青團與中國各地政情關連甚鉅，但即使是陳翠蓮前述令人注目的作品，對三青團在二二八事件之前的政治表現仍然描繪不多。一九四二年，黃埔軍校出身的台籍將領李友邦在中國境內組成的台灣義勇隊中，即已奉令設立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部籌備處，並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在福建龍岩正式成立。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後

僅約半個月，三青團即搶先一步到台灣著手布置發展直屬台灣區團部事宜。台灣區團各地分團組成後，曾在國府軍隊、接收官員抵達之前的政治真空時期，有效發揮維護治安的功能。

18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頁二五四。

19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頁二六八—二六九。

20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頁二七一、二七九—二八〇。參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四），頁二九三—二九四；賴澤涵、[美]馬若孟(Ramon H. Myers)、魏粵（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三），頁二五九。本段所引文件，均出自「大溪檔案——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八十一年）。

21 楊亮功、何漢文致于右任報告，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民國檔案〉，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南京：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頁七六。七月一日，台灣支團整理委員會奉令成立，用以整理事變後停頓之台省團務。

22 從三青團二全大會確定黨團人事分立原則後，國民黨各地黨部即紛紛請示黨中央稱，三青團依上述原則是否還能在省縣黨部裏兼為執監委員。國民黨中常會決議併入黨與團關係案審查。一九四七年一月，國民黨中常會確定三中全會討論議題以黨務政治經濟革新，及黨政關係、黨團關係、憲政實施之準

備等項爲範圍。第四十七、五十二次會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六日，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三一五—三一六，三三四。

23 〈現階段黨務改革案〉，第六十一次會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附件，頁三九〇。另見：常務委員會提，〈現階段的黨務方針案〉，〈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提案原文〉，第一冊，一九四七年三月，鉛排本，頁八，「黨」六·二／四八，以下簡稱〈六屆三中全會提案〉。

24 龐鏡塘等十八人提，〈黨與團應統一領導案〉，〈六屆三中全會提案〉，第一冊，一九四七年三月，原件，「黨」六·二／四八；〈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七年三月，鉛排本，頁七六，「黨」六·二／一一，以下簡稱〈六屆三中全會紀錄〉。

25 彭國鈞等七人提，〈請改變三民主義青年團辦法，以利黨務進行案〉，〈六屆三中全會提案〉，第一冊，原件；〈六屆三中全會紀錄〉，鉛排本，頁七六。

26 同前註。

27 上海〈文匯報〉，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通訊稿。

28 〈六屆三中全會紀錄〉，一九四七年三月，原件，「黨」六·二／三三；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六八二。大會討論有關黨務改革的案子爲王德溥等十八人提，〈徹底改革黨務案〉，以及梁寒操等三十六人的臨時動議，〈推定改組委員，準備本黨根本改造案〉。

²⁹十一人晉謁名單爲于右任、孫科、居正、戴傳賢、鄒魯、張繼、谷正綱、梁寒操、吳鐵城、陳立夫、陳誠，黨內元老與CC系成員占多數。參見：第六十三、六十八、七十次會議，一九四七年四月二、三十日，五月十四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四〇二—四〇三，四一九，四三二；〈總裁批吳鐵城爲根本改造本黨及黨團關係經常會推定委員十一人晉謁簽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毛筆呈文。紅鉛筆批示，「黨」一三八/二四八；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六七九。

³⁰參見：周君羊，〈黨團統一經緯〉，頁一；梁上賢、田秉德，〈三青團在湖北的組織與活動〉，頁六六—六七。

³¹例如蔣中正在一九四五年對三青團一屆三中全會、一九四七年對團員總甄核督導人員的講話，〈團史資料〉，頁二〇三；〈青年團工作的新方針〉，頁一〇。

³²天津〈大公報〉，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七八二。

³³由於三青團在校園的組織與策略都遠遜於中共，以至於蔣中正在一九四七月份對三青團幹部說明「對黨團統一組織應有的認識」時就坦承，團部在學校被打擊得抬不起頭來，碰到中共或其外圍勢力就無法可施，蔣中正，〈團員同志對黨團統一組織應有的認識〉，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出席三青團二屆二中全會講詞，引自：朱高影，〈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頁一四九。戰後三青團與中共在校園的鬥爭，見：朱高影，〈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頁一四〇—一四九。朱高影指出三青團礙於外在與內在因素，無法阻遏中共吸收青年群眾以及制止中共推展青年運動，致使反政府學潮在中日戰後初期瀰漫全國

，成爲中共打擊國民黨政權的第二戰線。三青團失去青年運動領導權的原因，參見朱高影的討論，頁一七六一—一八六。關於學潮與戰後中國政局關係的較完整介紹，見：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

³⁴第三十七、六十四次會議，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二五五，四〇九；〈國立政治大學二十週年紀念冊〉，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頁一一—一二，「二」一—二（四）／一八三四；〈蔣經國與段教育長有關三青團中央幹校合併之來往函件及研究部第三期教育計畫綱要〉，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月，「二」一—二（四）／三三二一。

³⁵參見：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六五—一六九；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三五六—三五七；張金鑑，〈明誠七十自述〉（台北：中國行政學會，民國六十一年），頁二三二；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二冊，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頁一〇四九—一〇五〇。關於正江風潮，見：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頁八九—九一；政大九期同學（合著），〈政九憶往編輯組（編）〉，〈政九憶往〉（台北：里仁書局，一九九四），頁四五、五二，二六九—二七一，四〇七；承紀雲，〈我所知道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頁八四、八六—八七；徐詠平，〈陳果夫傳〉（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九年），頁三七六。陳立夫被懷疑與政大學生驅蔣風潮有關，不過他自辯該事件係出於教育部長朱家驊的疏忽，以及中共挑撥幾個青年軍出身的政校學生煽動使然。中日戰後，戴傳賢即一直提醒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等人注意中央政校不斷發生的「軌

外行動」，要求重視，范小方、包東波、李娟麗，〈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二九五—二九六。一九四七年五月印行的〈國立政治大學二十週年紀念冊〉裏的校史沿革完全以中央黨務學校／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的一線脈絡作為表述主體，卻未介紹中央幹部學校，可見所謂「合併」的實際。

36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Jun. 18-19, 1947,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117-118, 120-121. 共軍於六月三十日退出四平街，但主力無損，政府軍勢蹙的基本局面並未改變。

37 〈現階段的黨務方針案〉，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革命文獻第八〇輯」，頁四四三）。

38 學者李守孔指出黨團統一之舉為「改造之前奏」，許福明則視為改造的「醞釀階段」，參見：李守孔，〈中國國民黨改造之意義與價值〉，李雲漢（主編），近代中國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研究〉（台北：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八十三年），頁六九；許福明，〈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五年），頁五一—五二。如就一九五〇年逆推，此說具有相當的歷史縱深眼光，唯在一九四七下半年所談的改造，實即指涉黨團統一本身。蔣中正在六月三十日正式向黨內傳達

了黨團合併的指示，也提示研究應否明令討伐中共。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國府主席蔣中正交議的動員戡亂方案，全國進入動員戡亂時期。

39 參見：陳果夫，〈陳果夫先生民國二十五年至四十年日記摘錄〉，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頁九四四；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六一—一三七；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一〇三。

40 第七十四次會議，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四五四；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南京〈人報〉，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

41 蔣中正，〈當前時局之檢討與本黨重要之決策〉，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央聯席會議講詞，〈黨團統一組織重要文獻〉，頁一一—一。

42 蔣中正，〈當前時局之檢討與本黨重要之決策〉，頁一二。

43 蔣中正，〈當前時局之檢討與本黨重要之決策〉，頁八一—九。

44 蔣中正，〈當前時局之檢討與本黨重要之決策〉，頁一三。

45 蔣中正，〈對黨與團統一組織的指示〉，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頁四一六，二二—一三。

46 蔣中正，〈對黨與團統一組織的指示〉，頁二二—一三。

47 蔣中正，〈對黨與團統一組織的指示〉，頁二二—一四。

48 第七十五、七十六、七十八次會議，一九四七年七月九、二十三日，八月六日，〈六屆中常會紀錄〉

，頁四五六一四五七，四六三一四七五；〈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七年八月，頁四八一五八；〈黨國統一組織重要文獻〉，頁四八一四九，五三一五八；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二九六。

49 詳見：三青團各地會議卷，「黨」特〇二四／二〇。〈實施辦法〉第七條：「各省（市）黨部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人選，由中央組織部、中央團部就中央執監委員、中央幹事監察，及擴增後之該省（市）黨部執行委員或其他適當同志中，會同擬議，提經中央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通過後，提出中央常務委員會，並報告 總裁核定後任命之。」第八條：「各縣（市）黨部執行委員會書記長，由擴增後之省執行委員會就擴增後之該縣（市）黨部執行委員及其他適當同志中遴派，並報中央備案。」

50 陝西支團部書記翟文鳳的回憶，翟文鳳，〈三青團和國民黨在陝西的明爭暗鬥〉，頁一三六。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馬建中間接證實了這項報導，馬建中，〈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的内幕見聞〉，〈西安文史資料〉，第三輯（西安：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頁一三五。據翟的說法，反對合併、打算組黨的領導者是李俊龍、黃珍吾、李天民等人，依文意判斷，李俊龍似是李國俊之誤，這三人都是復興社分子。三青團湖北支團部書記劉先雲回憶蔣中正這時曾多次和三青團幹部談話以示安撫，唯還是有不少人反彈，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四〇。

51 南京〈大剛報〉，一九四七年九月六—七日。從某種角度而言，改名的提議當然也算是一種疑慮不安

的反動。蔣中正在三青團二中全會上則強調黨名不可因黨團合併而改變，以免中共利用反動分子冒名要用，以爲傀儡，蔣中正，〈團員同志對黨團統一應有的認識〉，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出席三青團二屆二中全會講詞，引自：朱高影，〈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頁一六六。

52 三青團中央監察胡庶華的見解大抵如是，他主張改名「中國國民黨」，胡庶華，〈我的黨團改造觀〉，〈三民主義半月刊〉，第一〇卷第一二期（南京：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一日），頁四。參見同期另一篇文章，葉青，〈黨團合併與黨政革新〉，頁六。

53 馬建中，〈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的內幕見聞〉，頁一三四。這些想法不只存在於國民黨四中全會之中。在八月，湖南省黨部就曾電頌中央稱「團員入黨應遵章個別審查，不能團體加入，不可保留原有建制，以維黨基」。三青團各地會議卷，「黨」特〇二四／二〇。

54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黨團聯席會議宣言，〈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黨團聯席會議紀錄〉，一九四七年十月，頁六四一六五，「二」七一（四）／一八四。參見頁三八一三九所載團二中全會對蔣中正的致敬電文內容。

55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黨團聯席會議紀錄，頁五〇，五三一五六；〈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黨團聯席會議宣言及重要決議案〉，一九四七年九月，「二」七一（四）／一八三；〈黨團統一組織重要文獻〉，頁五八一六三；〈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革命文獻第八〇輯」，頁九一—四九五。

56 上海《大公報》，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四〇。

57 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蔣經國即由此成爲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從此正式踏上國民黨黨務的中央舞台。

58 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植，《青年部長上台原因》，成都《西方日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周君羊，《黨團統一經緯》，頁二。青年部由團方勢力掌握。倪文亞於一九四九年四月繼任青年部長。

59 尼洛，《王昇》，頁一〇二；南京《新中華日報》，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九月七日；周君羊，《黨團統一經緯》，頁二。時王昇負有青年部職務。

60 第八十五次會議，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五〇〇，五〇三一—五〇六；《黨團統一組織重要文獻》，頁六八—八〇；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六九三。

61 例如一個標舉「反官僚，反貪污，反破壞統一」的團體就認爲黨團合併當不出協商、分贓、吞併、代替等方式，但任一方式都會產生不良的後果，他們指出唯有將黨團徹底改造，重新組織，才能解決問題。這些人撰寫的一本小冊子並且提供了具體辦法，王樹權（等），《我們對於黨團統一改造的意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三反壁報社，民國三十六年）。

62 南京《新中華日報》，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九月七日。

63 第七十六次會議，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附件，頁四六八。廣東支團部幹

事長黃珍吾在一份公開聲明當中也認為黨團統一是由兩元領導改爲一元領導」，〈廣東支團黃幹事長爲黨團統一組織告同志書〉，三民主義青年團廣東支團中山分團部（編印），〈兩年來團務特輯〉（中山：民國三十六年），頁五。

64 新的湖南省黨部主任委員爲張炯，書記長爲莫蒼元，重慶市黨部代理主任委員龍文治，書記長徐政，均屬黨方分子，團方只獲副職。在各自九個代行常委職權的黨團統一委員會委員的名額當中，兩個支團部也沒有占到便宜，〈湖南支團全體幹事監察致朱家驊電文〉，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與〈陳介生致朱家驊函〉，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近朱」；〈黨團統一組織重要文獻〉，頁七〇，七四。南京〈新中華日報〉認爲湖南、湖北、廣西、貴州、四川等省原本都是三青團的天下，「團在支配」，不過該報早先就指出黨團合併後的人事變動對三青團顯然是不利的局面。參見：南京〈新中華日報〉，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九月七日。事實上，似乎沒有多少人認爲國民黨在黨團合併後會比三青團吃虧，除非這種合併涉及更徹底全面的黨務與黨機器的改造工程，就像國民黨於一九五〇年在台灣所做的那樣。

65 梁上賢、田秉德，〈三青團在湖北的組織與活動〉，頁六七—六八；梁上賢，〈在恩施經歷的國民黨黨團活動〉，〈湖北文史資料〉，第一四輯（武昌：一九八六年四月），頁九一；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四一—一四三。由團方出任縣黨部書記長的縣份有利川、通城、江陵、石首、武昌、建始等。

66 田世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二輯（合肥：一九八三年四月），頁九—一〇。

67 南京《新民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通訊稿。

68 王進三，〈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始末〉，頁七〇—七一。

69 羅鑫，〈我所經歷的祁陽黨團摩擦〉，《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五三。

70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日。通訊稿。

71 湖南《中央日報》，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

72 長沙《晚晚報》，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三，十七，十九日；湖南《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二月一，十五日，三月二十六日，四月十一日；香港《華商日報》，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新加坡《南僑日報》，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列所有非湖南的報紙均採用地方通訊的報導。參見第一、三節。

73 霍文鳳，〈三青團和國民黨在陝西的明爭暗鬥〉，頁一三六—一三七；馬建中，〈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派系鬥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西安文史資料》，第四輯（西安：一九八三年六月），頁一〇〇。

74 田世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頁一〇。安徽省黨部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呈報中央指

出該省團員名冊尚未移結的情形，據稱這是因為團員總甄核後，各縣團員名冊尚未向團方報齊的緣故，黨部在呈文中表達了將積極催請的態度，中國國民黨安徽省執行委員會呈中央黨團統一委員會文，〈呈報本省省縣黨團統一工作辦理情形暨省黨團移交接管清冊〉，一九四八年三月，「黨」特〇二五／四·一二。至於安徽團方幹部名單則已列冊移交了。

⑦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有關數據出現在一九五二年國民黨七全大會的黨務報告中，筆者沒有發現到兩個年份之間可能提出的後續數字。形式上，黨員團員重新登記的期限經三次展延之後，已經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底屆滿，國民黨所提這年十一月爲止的統計人數大致能夠說明這次重新登記的總體成績。當然，國民黨中央在這之後仍在等待那些應到而未到的登記表冊，這有助於讓統計數字更加精確化，但當時中國政局動盪至鉅，黨權亦見鬆落的結果，可能使得這項努力相對變成不是頂重要的事了，這或也是七全大會上只能提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爲止，而非更晚年月的數據的原因。另須說明的是，筆者引用的文獻中，沒有黨團主動剔除不符登記資格的成員的相關記載，這使得筆者提出黨團總計「流失」八成正式成員的說法勢必也要涵括那些被黨團「淘汰」的人們——儘管筆者懷疑被淘汰的黨員團員能否形成一個較受注意的人數比例。參見：第一〇九、一三五、一四四、一五七、一六四次會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三月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四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五八一，六五九—六六〇，六八五，七一四，七四〇；〈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務報告」〉，上篇，（乙）各部會工作分述：組織部，一九五二年十月，引自：李雲漢（主編）

，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五四三—五四四；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六九四、六九六。七全大會黨務報告對黨員團員重新登記作業一再展延的原因有過條列敘述，大抵均屬實情，但並未提及黨員團員對組織失卻信仰與熱情的心理。

76 第一三八次會議，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六七二；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六九九。

77 易勞逸就認為，黨團的緊張關係使蔣中正不得不推延七全大會的舉行日期。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7.

78 七全大會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在台灣召開，但在此之前，黨團統一後人數遽增的中央執監委員在一九五〇年國民黨展開的改造運動中就已停止行使職權。

79 〈重慶市黨團統一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紀錄〉，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黨」五四五／九八。

80 南京〈大剛報〉，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通訊稿。

81 這是蔣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即獲選行憲首任總統翌日），在官邸訓練會報上的話語，既是總結數月來的沉痛經驗，實亦具有後驗的預言性質。本章接續的三節將繼續對相關主題進行論述。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頁三二三。

82 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五

五。

⑧第七十七、八十次會議，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八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四七〇，四七八—四八〇；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二九六—二九七。各省縣選舉指導會報組成分子大致以中央規定範圍為準。以湖北選舉指導會報為例，委員包括：（政）省府主席、省民政廳長、省社會處長、武昌市長；（黨）省黨部主委、省黨部書記長；（團）支團部幹事長、支團部書記；（議）省議會議長、副議長，另中央推派一名指導委員駐省督導，劉先雲，〈憶萬武樵先生二三事〉，〈湖北文獻〉，第八二期（台北：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頁八二。

⑨參見：劉先雲，〈憶萬武樵先生二三事〉，頁八二；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五六—一五八；梁上賢，〈湖北省偽大選一瞥〉，〈湖北文史資料〉，第五輯（武昌：一九八二年六月），頁一〇八一—一〇九。

⑩梁上賢，〈湖北省偽大選一瞥〉，頁一〇九—一一〇；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二九九—三〇〇。

⑪詳見：丁永隆、孫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頁一六四—一六七。

⑫馬五先生，〈詹詹錄（一）〉（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五十四年），頁一七三。參見〈詹詹錄（二）〉，頁一七一—一七三。馬五先生，即雷嘯岑。雷認為徐蚌會戰之前，當局的政治敗徵已逐漸顯現，其中以「世俗所謂『黨團之爭』」為主要促成因素。

88 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四二—二四三。

89 黃乃隆，〈詹鏡心先生的思想述要〉；倪豪，〈詹鏡公與江西青年團〉；徐芳楹，〈追隨鏡公三十五載〉，均見：詹純鑑先生的生平編輯委員會（編），〈詹純鑑先生的生平〉，頁二五，七四，九五。

90 楊幹民，〈我在銅仁主持競選「國大代表」的經過〉，〈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七輯（貴陽：一九八四年十月），頁二一九—二三二。

91 沈雲龍（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頁一六三—一六四。

92 一九四一年，雷嘯岑曾受陳立夫舉薦擔任重慶市教育局長。戰後國府還都後，雷嘯岑應黃少谷之請，擔任南京《和平日報》總主筆。提名與CC系、三青团均有淵源的雷嘯岑，應為縣內各派相持不下的妥協結果，但是派系屬性不純的雷嘯岑在競選期間顯然沒有獲得黨團任何一方的支持。爾後，因該縣國代遇害，雷嘯岑終得以依法遞補。馬五先生，〈我的生活史〉，頁一三六—一三七。

93 萬衡，〈我參加「行憲國大」的一幕鬧劇〉，〈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一五三—一五四。

94 蔡杞材，〈一九四八年「行憲國大」雜憶〉，〈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頁一三四—一三五。

95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頁四七八（上冊），八五四（下冊）；馬五先生，〈我的生

活史》，頁一三八；甘復初，〈〈中興日報〉親歷記〉，《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頁七六。

96 谷和邦，〈王恢先在沅江當選「國大」代表的見聞〉，《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頁一〇六一—一〇七。

97 宋躍遠，〈我所知道的大庸選舉「國大」代表經過〉，《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頁八九一—一〇四。

98 田世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頁一一—一二。張宗良本人也當選了國大代表。

99 國民黨退至台灣後，蔣中正仍不能忘懷這一幕黨團鬥爭的慘痛歷史，參見：臨時會議，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蔣中正，〈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六屆中常會紀錄》，附件，頁九三一；張其昀，〈大陸淪陷的痛史與光復大陸的努力〉（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二年），頁二七。

100 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革命文獻第八〇輯」，頁四九六—四九七）。

101 雷毅，〈第一個十年〉，第一冊，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頁一〇—一一。參見：尙老經，〈蔣主席拒絕當總統〉，《新聞天地》，第三八期（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頁一一二。

102 多數團方的中常委起初主張接受蔣中正不參選總統決定的記載，見兩名分別隸屬團方與CC系中常委的回憶：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二〇〇—二〇一；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三〇〇。程思遠的回憶錄並具體指出了賀衷寒與袁守謙的名字。雷嘯岑與尙老經提出了黃字人的名字，雷嘯岑，〈危詹錄（二）〉，頁一一五；尙老經，〈蔣主席拒絕當總統〉，頁二。尙老經還指出黃少谷。蕭錚提到何浩若。團方中常委在中常會的言論不見得與臨中全會裏的團方人士一致。國民黨的團方中常委支

持蔣中正的主張的原因可能不只一端，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政治的確需要煥然一新，蔣中正向黨人暗示屬意胡適競選總統之舉不失別開生面，有些人則覺得總統洵為虛職，自認可理解蔣中正意願不高的底蘊。這些既是團方建議蔣中正擔任行政院長的原因，自然也是中常會後來打算增強總統權力的提議能夠大致整合各方歧見的原因。另見：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六六；朱文伯，〈七十回憶〉（台北：民主潮社，民國六十二年），頁一七七；隱士，〈李蔣關係與中國〉（香港：自由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頁九三；〈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革命文獻第八〇輯」，頁四九六—四九八。

103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下冊，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四五一／三五六；〈第一屆會議主席團制定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二」四五一／五二八。

104 不過，CC系有意控制行憲後的立法院領導職位，因此他們反對孫科當選副總統後繼續兼任行憲第一任立法院院長。

105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下冊；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二〇三—二〇四；康澤，〈蔣介石為什麼叫我到襄陽去當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頁五一六；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六八；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五八二—五八三；邢又慈，〈競選副總統搬出殺手鐮〉，〈新聞天地〉，第四〇期（上海：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頁六一—一。

⑤《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下冊；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二〇四—二〇五；胡楚藩，《國民黨“國大會議”紀實》，《武漢文史資料》，第七輯（武漢：一九八二年六月），頁一一七；鄧公玄，《追懷哲公幾件事》，孫哲生先生治喪辦事處（編印），《孫哲生先生紀念集》（台北：民國六十三年），頁一〇二—一〇三。

⑥“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pr. 21, 1948, in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 210. 前湖北支團部書記劉先雲二十九日日記稱李宗仁當選可以「使國際上認識中國已走向民主途徑，並非獨裁，可以減少國際上對中國政局之疑惑」，引自：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六九。

⑦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覃澤漢，《我所知道的廣西三青團的內幕》，頁一五一—一五二；蘇民，《新桂系與CC在安徽的矛盾和鬥爭》，頁一七六—一七八；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三九五。聯繫各省三青團出身的國大代表，本即是李宗仁的參選策略之一，隱士，《李蔣關係與中國》，頁九三。

⑧劉先雲二十九日日記續稱李宗仁的當選「可以避免陷總裁於不民主」，「可以促使中共（央？）各方面之反省，即時至今日非領袖之招牌可以抹煞一切」，「使國民大會不致在歷史上留下污穢之一頁」，引自：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六九。參見：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一—二

八二；陳啓天，〈奇園回憶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頁二一九—二二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報告（二十六日）認為，蔣中正親自干預左右選局的作法肯定激怒了許多擁護他的人，多數國民黨員已經不受一些高級領導人的控制，國代傾向民主、反蔣，彷彿非常可能讓李宗仁當選。"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pr. 26, 1948, in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 214-215.

⑩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六八；南雷，〈副總統之選與立委之爭〉，北平《北平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一日。一份情節類似的報導說，當國方的代表接獲改投孫科的指示時，群情大譁，一些自黨團合併以來即蘊積不滿情緒的人大喊：「CC吞了我們，我們還要幫他的忙嗎？」新加坡《南僑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通訊稿。

⑪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二。關於正副總統選舉的整體記述，可參見：丁永隆、孫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頁一六七—一七五。李宗仁參選副總統的經過，見李宗仁、白崇禧、程思遠等人的憶述文獻，並見：申曉雲、李靜之，〈李宗仁的一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頁二六九—二八三。

⑫第一五〇次會議，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六九四。

⑬參見：陸寶千（訪問），鄭麗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三九六—三九七；公孫龍，〈

孫科與立法院》，〈新聞天地〉，第二六期（上海：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頁一—三；公孫龍，〈立法院長逐鹿記〉，〈北平日報〉，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林玲，〈陳立夫想做范登堡——立法院押冷門〉，〈北平日報〉，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冷彥冠，〈立法院副院長爭奪戰〉，〈新聞天地〉，第四一期（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頁七。孫科係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正式宣誓就職立法院長，至一九四八年已滿十五年。

⑩冷彥冠，〈立法院副院長爭奪戰〉，頁七—八；西方亮，〈問題立委傅斯年〉，〈新聞天地〉，第四二期（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六日），頁一三；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影本，第一五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〇），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之，〈立院反陳與倒張的兩股暗流〉，北平〈北方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上海〈字林西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規定：「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之規定，院長副院長由立法委員互選之。全體立法委員（以經政府公布之當選名單為準）均為當然候選人，不用簽署或任何其他方式提名。」第八條規定：「院長或副院長經全體立法委員十分之一以上人數之提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通過，得予以改選。」

⑪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立委反陳的「聯合陣線」（下）〉，張垣〈民生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參見：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三〇三；陸賈千（訪問），鄭麗

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二。關於此事，蕭錚與黃通二人所述時日有誤，黃通所記憶的尤其頗多舛誤，但是「黃湯事件」的原貌大致不差。

⑯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七〇；冷彥冠，〈立法院副院長爭奪戰〉，頁七一八。新桂系立委程思遠樂觀的宣稱這次陳立夫「總要被我們打倒了」。

⑰實際到會者三百餘人，簽名者二百九十六人。集會所需費用據說由新桂系支付。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冷彥冠，〈立法院副院長爭奪戰〉，頁八；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七〇—一七一。

⑱一般認為蔣中正正在副總統選舉中，以個人好惡，反覆決定選舉人投票對象的作法引起相當大的反感。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上海〈字林西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上海英文〈大美晚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⑲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May 18, 1948, in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234.

⑳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西方亮，〈問題立委傅斯年〉，頁一三。西方亮對傅斯年當選立委的經過有大篇幅的報導。

① 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上海《字林西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冷彥冠，〈立法院副院長爭奪戰〉，頁八。參見：之，〈立法院反陳與倒張的兩股暗流〉。這裏的出席人數是根據南京《新民報》的報導：「三百餘人」。至於冷彥冠的報導則為二百多人，上海《大公報》則指有四百餘人，南京《中央日報》甚至報導有五百餘人。《中央日報》的估計顯然過於誇大，有宣傳助威之嫌。筆者參酌其後陳立夫所獲票數而採用《新民報》的數字，但不排除冷彥冠的說法。

② 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人左右的數字係根據稍前立法院院會幾次動用表決的結果，以及綜合一些媒體的觀察與陳立夫的說法得來，參見：冷彥冠，〈立法院副院長爭奪戰〉，頁八；〈立法院內派系續紛錄（上）〉，張垣《民生報》，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立委反陳的「聯合陣線」（上）〉，張垣《民生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③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推選案〉，一九四八年，「二」一〇／〇三〇六；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冷彥冠，〈立法院副院長爭奪戰〉，頁八；〈立委反陳的「聯合陣線」（下）〉。

④ 上海英文《大美晚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⑤ 據說親孫科的老資歷立委另以「建國俱樂部」為號召，吳派，〈立法院八大家〉，北平《北平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

⑥ 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張垣《民生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梁肅戎，

《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頁八四。

⑩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四四。參見：梁肅戎，〈立法院時期的齊世英——追懷四十年情誼〉，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附錄，頁三七二；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七三—二七四。根據一九四八年七月一份報紙的報導，新政俱樂部的成員將近二百人，〈立法院飯碗——爭奪三部曲〉，張垣（民生報），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鄧元忠指出屬於前復興社成員的立委有一百七十九名，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六八八。

⑪張道藩這時係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社在一則追敘性新聞裏透露革新俱樂部由二百多位立委所發起；另，七月舉行的一次會員大會計有二百餘人出席，十一月的一次會員大會則有二百零七人出席；孫科在十二月抱怨立法院約有三分之一的票數被CC系控制著，這差不多也符合二百多人的估計。另外一方面，梁肅戎稱革新俱樂部成立會上席開三十餘桌，該俱樂部最盛時有三百餘人；張金鑑甚至說革新俱樂部在極盛時期達三百九十七人；齊世英也說支持陳立夫使之當選副院長的立委組成了革新俱樂部，若真，則以最大值計算，亦當在三百餘人左右。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七月五、二十二日，十一月十日：“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Dec. 19, 1948,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 287-288；梁肅戎，〈大是大非〉，頁八五；張金鑑，〈明誠七十自述〉，頁二〇六；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

紀錄》，頁二八三。

⑩《立法院與行政院——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第七次座談會紀錄》，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⑪更多的介紹可參見：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吳派，《立院八大家》；北平《北方日報》，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商日報》，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陸鐵山，《近看立法院》，北平《益世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台北《自立晚報》，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六—二十七；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七二—二七六，二七八—二八二，三九六—三九八；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二—二八三，三七二；沈雲龍（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頁一六七—一六九；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一〇三—一〇四。有鑑於報導人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以及若干情節彼此有所出入，讀者應該極爲謹慎的使用這些資料。

⑫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八，二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海《字林西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七一；馬五先生，《我的生活史》，頁一三九；"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May 22, 1948,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235.

⑭ 翁文灝派系色彩較淡（雖然也有人視其為政學系），張群前曾向蔣中正推薦，司徒雷登認為蔣中正相信翁將獲得外國新聞界的歡迎，同時也會是監督執行美援計畫的合適人選。參見：“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May 24, 1948,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 237-238；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二十五日；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翁文灝（遺稿），李若松（提供），〈翁文灝對中共的坦白書〉，〈傳記文學〉，第六二卷第六期（台北：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一八。

⑮ 第一五二次（臨時）會議，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六九九；翁文灝（遺稿），李若松（提供），〈翁文灝對中共的坦白書〉，頁一八；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⑯ 蕭公權的觀察，〈立法院與行政院〉。

⑰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三一七。

⑱ 孫科受命之初，曾喊出「舉黨一致」的口號，要求黨內六名有力分子入閣，這六人是張群、吳鐵城、陳立夫、翁文灝、張治中、邵力子。各員起先對此態度不一，最後，除邵力子外，餘皆應允。二張一陳一翁均任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吳鐵城為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此外，朱家驊與張厲生也擔任了不管部會政務委員。這些人大致可以涵括立法院內的革新俱樂部、新政俱樂部、民主自由社、朱家驊

派等幾個重要政團、派別的力量，南京《中央日報》社論認為可收破除各方成見之實效。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一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七，十二日，頁九一，一〇一—一〇三；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下冊，頁七八一；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三一七；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二；第一七三次會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七五二；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⑯第一七三次會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七五二；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冷彥冠，《立法院副院長爭奪戰》，頁八。

⑰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申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南京《益世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二—二八三；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頁九四；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二二三。

⑱一名立委甚至痛惜反陳陣營此時失掉聯絡，他甚至說只要有一餐飯，也許陳立夫就選不出來了。此話未必當真，然可見反陳陣營對此不無惆悵之意。北平《北方日報》，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⑲《選舉立法院正副院長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一〇／一四五；南京《益世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梁肅戎指陳願遠為新政俱樂部

部成員，梁肅戎，〈大是大非〉，頁八四。

④的確可以視之爲三青團對CC系的反動，也可以認爲三青團對國民黨頗表失望。從黨內各派系對蔣中正的一些提名（或意欲提名）人選做出反制行動來看，蔣中正的領導權威也正在逐漸下降。雷震在他的日記裏記下了這段期間包括三青團分子在內的一些國民黨人士對蔣中正的觀感，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一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八日，頁九二—九三。參見本章第五節。

④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頁九四；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三；新政俱樂部黃通憶稱：「這次選舉，真把國民黨搞得天翻地覆，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失敗了！」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三。〈中央日報〉在選舉次日相關新聞的首則報導當中，間接但並不含蓄的表達了他們對董冠賢、劉健群二人的嘲諷態度。

④南京〈新民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七月五日；南京〈益世晚報〉，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

④由立法院院長改選看國民黨前途，南京〈和平日報〉，社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④參見：第一章第二節、第二章第一節。

④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26. 本書第三章第三節曾提及，即使連蔣中正本人也對革新運動的權謀動機與作爲表示過不滿。

⑭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頁五九六。

⑮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七八三；參見：頁七七一一七八二。並見：江南，〈蔣經國傳〉，頁一九五。

⑯ 參見：方慶延，〈蔣經國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經過〉，〈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南京：一九八二年五月），頁六〇；徐炳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的「幹校系」及其活動〉，頁一〇六一—一〇七；並見：業衍璋，〈我所了解的中央訓練團縣政訓練班〉，〈江蘇文史資料〉，第二四輯（南京：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一〇五一—一〇七。在一九四八年七月舉行的杭州青年夏令會上，充溢著黨務革新之相關討論和建言。會方發表聲明，主張「一次革命，兩面作戰」，以掃除橫陳在民生主義之前的兩大障礙——「殘暴的共匪與腐敗的官僚」。會方發行的一份臨時期刊，特為黨的革新開闢專版刊布各方意見。蔣經國的思想成爲版面的主調。署名「一樵」的作者甚至指明對內作戰的對象：政學系、CC系、「孔宋張何等豪門資本」及「貪官污吏」。〈夏令新聞〉，第二期（杭州：杭州青年夏令會學員生活管理委員會出版夏令新聞社，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三十日）。

⑰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二一九；方慶延，〈蔣經國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經過〉，頁六〇—六三。參見：新加坡〈南僑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

⑱ 劉先雲，〈劉先雲日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十二，十七—十八日，引自：陳進金，〈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湖北（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頁一六六。

⑮ 田世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頁二一—一五。田世慶揣測這會是一個全國性的政黨，由黃埔系與三青團系統的某些骨幹成員發起的一個反CC但不反蔣中正的組織。不過，至少在安徽，這個團體胎死腹中，田世慶承認有關該團的實情仍不明朗，有待學界挖掘。

⑯ 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六八七—六八八。不少前復興社員一直認為三青團比不上復興社有力、有效能。根據鄧元忠的研究，一些復興社分子經過兩年的醞釀，在一九四八年成立一個名為「業餘聯誼社」的組織，很多人在聯誼社的會議上表示有必要恢復復興社的組織，賀衷寒主張尤殷。

⑰ 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頁二八四—二八五。

⑱ 蔣中正對司徒雷登表明他的改革意願，但他說不知怎樣著手。蔣甚至向司徒提出中美反共條約的問題，司徒對此不予鼓勵。“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Mar. 22, 1948,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 193-194.

⑲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ug. 11, 1947,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127.

⑳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Feb. 23, 1948 & Mar. 12, 1948,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 174-176, 188-189.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大公報〉發表社評〈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主張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相信理性與公平，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以大多數的幸福為前提；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反對任何的一黨專政；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

驅等。此文引起各方反響，〈大公報〉於二月七日再以〈政黨·和平·填土工作〉為題重申「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並綜合答辯各方批評。三月一日，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正式成立於北平，支持者為錢昌照、吳景超、蕭乾、周炳琳等人。該會提出三十二項主張，含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及其他方面，具體內容如「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國內應有並立的政黨，互為批評監督，爭取民意支持；全國土地以全部收歸國有為最終目標，獨占性及關鍵性之工礦交通事業原則上由國家經營，金融事業由國家經營……。

⑤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Mar. 17, 1948,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 191-192. 胡適，〈胡適的日記〉，第一六冊，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⑥ 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頁四一四。

⑦ 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頁四一五—四一六。

⑧ 六月二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陳布雷代理中政會秘書長。七月十五日通過谷正鼎代理中央組織部長，一九四九年一月真除。司徒雷登大使曾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向蔣中正建議讓陳立夫出國考察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蔣笑謂年底各項選舉將近，他不能沒有陳立夫。一九四八年五月，陳立夫競選立法院副院長時已聲稱當選後即辭職出國，司徒雷登繼於行政院長人選難產之際向蔣中正建議解散CC系，蔣中正大體同意。"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ug. 19, 1947 & Sep. 12, 1947 & May 24, 1948, in Rea and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 131-132, 137, 238. 更多的報導與

分析，見：岳克基，〈陳立夫鍛羽出國〉，〈新聞天地〉，第四二期（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六日），頁七一八，該文特別指出陳立夫忽視以三青团為代表的黨內新生力量。陳立夫在美適逢美國總統大選，關於行程的記載，略見：上海〈申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天津〈大公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三六七—三七一；萬迪，〈冷門杜魯門〉，〈新聞天地〉，第五二期（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頁一；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頁二七四—二七五。陳立夫回國後，在一場立委招待茶會上說道：「我知道廿年，我做的許多事，雖問心無他，然錯誤一定不少。爲了戡亂，爲了國家，爲了三民主義的實現，這一切，不管我是否無愧於中，總需要我依道德重整運動教條的提示，反求諸己，首先改變自己。」蔣，〈陳立夫在變〉，〈新聞天地〉，第四九期（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一日），頁八。

⑭ 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四四—一四五。外電把近來局勢解讀爲黃埔系與三青团打算推翻CC系的統治，新加坡〈南僑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

⑮ 一則二手報導指出，來自黨方團方的國民黨高級幹部在六月一場會議裏交相叱斥，黨方攻擊團方領導學運無功，團方諷刺黨方無法控制國大與立法院，雙方各不相讓，在場的蔣中正表示大家實在合不來，就分一個出去也好，不過他在世一天，總是國民黨。新加坡〈南僑日報〉，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這篇報導的細節仍有待證實，不過此處蔣中正的話語意涵與筆者前述幾段正文情節頗能呼應。

161 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七三。

162 〈黨的改造與政治改革〉，南京《中央日報》，社論，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國民黨將怎樣革新？〉，上海《申報》，社論，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

163 李天民等二十八人，〈中國國民黨改造辦法草案〉，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改革辦法及其黨政革新運動宣言〉，「二」七一一（四）／三五五。

164 許孝炎等四十五人，〈改造本黨意見書〉，一九四八年，「二」七一一（四）／三五五。除了李天民與許孝炎等人的兩份辦法之外，八月召開的座談會上還有兩份文件，一為去年黨團合併時通過的當前組織綱領，一為鄒志奮個人草擬的黨務改革方案。

165 參見：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一冊，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四，十日，頁三二—三三，三七；鄭一禾，〈國民黨怎樣革新〉、羅伯特，〈旁聽國民黨檢討黨務〉，〈新聞天地〉，第四六期（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六日），頁一—四；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頁七〇五。

166 〈總裁批吳鐵城為黨務座談會改進黨務意見處理辦法簽呈〉，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毛筆呈文·毛筆批示，「黨」一三八／二五一；第一六〇、一七四次會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十二月三十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七三—七三三，七五三—七五四。

167 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一冊，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頁三七。陳誠的參謀總長與東北行轅主任等

本兼各職已於五月正式免除，黯然下台。擔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的康澤則於七月被共軍所俘。並參見：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七三—二七四。

⑩上海《字林西報》，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⑪第一七四次會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六屆中常會紀錄〉，含附件，頁七五三—七五六。十五人委員會同時還提出一份同由賀衷寒綜合整理而得的〈戡亂時期本黨政治綱領草案〉。

⑫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一冊，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二十一日，頁二四—二五；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下冊，頁七八二—七八三；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二年），頁一〇—一一。

⑬第一八七次會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附件，頁七九七。

⑭第二〇四次會議，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六屆中常會紀錄〉，含附件，頁八二六—八三三。

⑮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一冊，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八月二十一日，頁二六七，二九〇。

⑯許福明，〈中國國民黨的改造〉，頁五五—五六；李守孔，〈中國國民黨改造之意義與價值〉，頁七六—七七。

⑰蔣中正表示：「如果你們不相信我來改造，你們跟陳立夫去好了！」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三八〇—三八一。

⑱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二冊，一九五〇年三月四、六、十一日，六月一—二日，頁五四—五七。

五九，一一八一—一一九；陳立夫，〈成敗之鑑〉，頁三八一—三八三；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三三六—三四〇；梁肅戎，〈大是大非〉，頁八八。

⑩ 蔣中正，〈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九三二；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三四〇；許福明，〈中國國民黨的改造〉，頁五六。

⑪ 蔣中正，〈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頁九三一。

⑫ 蔣中正，〈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頁九三一—九三二。

⑬ 在蔣中正的支持下，前三青團成員坐擁廣泛的政治資源，直到「後蔣經國時代」仍未盡褪。在黨務方面，如各級改造委員會與正式黨部，蔣經國甚至繼蔣中正之後成為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在政府方面，陳誠、蔣經國、李煥陸續（儘管並未連續）執掌行政院；在立法院，團方立委相較於CC，大致為擁護中央決策的一股所謂安定力量，劉健群與倪文亞均曾擔任院長一職，倪任期尤長；軍隊政工方面則由蔣經國與王昇長期控制；蔣經國、胡軌、李煥等人還合力打造了一個嶄新的青年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以作為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培養青年幹部的一個重要建制。學者陳明通分析，蔣中正為重建威權統治，對於在台中央派系採取拉攏團派、打壓CC、虛懸政學系、替換孔宋財經系統、整頓軍事系統等手段，一方面重新鞏固自己的權力，一方面則逐步栽培蔣經國系，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頁一一八一—一二一，一二九—一五〇。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四三六

結 論

一九三八年成立的三青團是爲配合中日戰時統一領導的構想所建立的組織，另一方面，也是在國民黨的形象欠佳、有失革命活力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團體。蔣中正認爲，國民黨本身的整頓改造將是吸引國內其他黨派參與合作的先決條件，因此，他要求包括復興社與CC系在內的黨政各派青年幹部進行統一合作，期能趨近改革的理想。面對戰時團結的需要，關係不睦的復興社與CC系只得遵行蔣中正的指示，解散各自的秘密組織；再者，隨著蔣中正的領導地位逐漸獲得黨內及舉國一致的承認，兩個擁蔣派系下的秘密組織也到了階段性功能結束的時候；加上國共在戰時開展的第二度合作氣氛，也使得以往因推行民族復興運動致與中共橫生摩擦的秘密組織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公開以三民主義與蔣中正個人名義爲號召的青年團，這一構想明顯承繼自蘇聯、德國、意大利、土耳其等國統一組訓青年的啓示，通常它意味著標榜行動價值、招納更多熱情且無利益色彩的年輕人，俾有利於擴大政權的社會基礎以及延續政權的活力，這些至少在蔣中正的眼中，以往的國民黨力有未逮。

從一開始，國民黨就顯露直接領導三青團的意圖，然而兩個組織的同一最高領袖蔣中正

未予支持。爲了避免國民黨掣肘，以及樹立足夠號召人心的吸引力起見，三青團大致以未擔負重要黨務責任，但與CC系同具組織基礎、人力資源的復興社爲重心。三青團經由復興社原有資源擴展而成的結果，使得這前後兩個團體之間具備令人注目的、廣泛程度的承繼關係。這種關係讓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八年間復興社與CC系的政治糾葛獲得延續——以三青團爲化身的復興社，和以黨務部門爲基本腹地的CC系重演了以往的對峙狀態。另一方面，三青團迅即被塑造成一個國民革命新血輪的形象，藉以對國民黨發揮良性刺激的功能，並擴大政權的社會動員面。而實情是，三青團團員主觀上多以國民革命的「新血輪」、「新生命」、「新細胞」等心態自命，客觀上和處於被改革地位的國民黨距離已遠。團內溫和者以新血輪意識有別於國民黨，急進者所持新血輪意識則不啻形同分離意識，更有甚者，乃意欲取國民黨而代之。

基本上，三青團具有自成一格的組織與可資動員的下層基礎，最高負責對象爲團長蔣中正而非國民黨，國民黨對三青團的組織、人事任免調遷始終無實質過問權力，團的經費也不仰黨鼻息。三青團也全非人們所想像的是國民黨用以吸納預備黨員的組織。雖然爲了迎接三青團誕生，國民黨在一九三八年廢除了總章有關預備黨員的條文，但是國民黨仍然致力招納青壯分子，三青團則始終保有自己號召來的成員。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在三青團仍以二十五歲爲入團年齡上限的同一時期，國民黨徵得二十五歲以下普通黨員的人數

，均穩定維持在黨員新徵總額的四分之一比例上下——依照國民黨與三青團雙方的文字規定，這些新黨員原來都應交由負責羅致年輕人的三青團所吸收。相較於國民黨降齡徵收成員，三青團亦有超齡吸納情事；再者，三青團原有成員已逾齡者得保有團籍，這使得那些未具任何黨籍（約占團員總數八五%左右）且脫離青年階段的團員能夠繼續留在他們熟悉的母體裏，以國民黨六全大會召開的前四年間（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為例，三青團累計只移交了三百一十二名逾齡團員給國民黨，比例微不足道。①

這樣看來，實際可視三青團為黨外的自主性組織。但是三青團與國民黨卻又共享政權下的一些政治資源，例如高級領導人（包括首魁）與三民主義的信念，以及「在朝不在野」的政治地位等。根據統計數字顯示，三青團團員兼具國民黨籍者大致總徘徊在團員總數的一成五上下，幹部兼有黨籍的比例尤高，唯其主要職務多在團部，本位意識強烈，儼然黨內又一派系。所以在最嚴格的意義上，三青團不是所謂的第二黨，而這也就是三青團羽翼漸豐後，來自地方與學校的代表們打算在一九四六年拋棄他們長久以來的尷尬身分，進而組建一個真實政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裏，「自主性組織」與「黨內派系」兩個交疊的概念將有助於澄清以往幾名學者對於國民黨與三青團關係的個別見解。

例如，汪榮祖與李敖所謂「黨內之黨」的比喻，可能流於菁英傾向或是黨內一個封閉性組織的聯想，這不適宜用來描繪三青團與國民黨之間雙軌競進的關係，不過若就共享政治資

源而言，倒是恰如其分的描述。至於費正清認為三青團係與國民黨「平行並立」的金字塔型組織一說，則正好與前說的得失倒置，費正清看到了三青團作爲一個自主性組織的面向，卻忽略了團的派系身分。②事實上，正是由於延續了黨內派系對峙的局面與黨團體制雙軌競進的混合結果，使得三青團的自主意識、政治興趣及其伴生利益與日俱增。蔣中正曾經寄望三青團能夠重振業已遭受國民黨遺忘的革命精神，爾後，至少在蔣中正與一些內部批評看來，三青團和需要改革的國民黨其實並無太多不同；另一方面，黨團的競爭面持續拉寬，彼此難能共濟，反成水火，以至於三青團成立不到一年，蔣中正與國民黨、三青團中央都開始爲了調整黨團關係而發出政策性宣示與制定多項法規。這些補救措施力促三青團以校園作爲主要活動場域，三青團且被期望加強組織的教育（而非政治）性格，團員入團年齡也爲著釐清黨團關係及分工區隔的需要而受到緊縮，不過這些措施很快就被證明難能填補黨團之間的鴻溝。就自主性組織與黨內派系兩個面向而言，三青團的政治興趣隨著國內政情與黨內的生態變化而愈見滋長，同時也逐漸成爲強有力的參與者。

作爲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系與黨外的自主性組織，三青團展現了靈活的政治手腕，並試圖在合縱連橫的過程裏求取最大利益。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個慣常模式是三青團聯合幾個派系或政治勢力共同向CC系提出挑戰。在一九四五年的國民黨六大大會的幕後，崛起不到七年的三青團至少聚攏了黃埔系與復興社兩支基本力量，並夥同多次合作的朱家驊系、政學系、

新桂系等派別，形成一聲勢浩大的聯合陣營，用以防杜原在黨機器裏占據主控地位的CC系續行壟斷，並謀求個別派系利益的擴充。三青團也加入自中日戰爭後期展開並延續到戰後的革新運動，他們和宿敵CC系一起針對孔宋集團與政學系，播佈激昂的清議式言論，要求這些憑藉姻親關係而起的政治豪門與所謂夤緣倖進的官僚，必須對國民黨大幅流失的形象與權力基礎承擔政治責任。文獻顯示，蔣中正對黨內派系糾合的政治動作頗感不悅，但他叱斥之餘所能作出最好的選擇只是設法開放更多的政治利益以資安撫，並將各派系的整體實力維持在一定的比例與部門之中。儘管幾次結盟的獲利程度不一，但總的來說，三青團的政治資本的確正在累積孳息，同時，經由歷次縱橫捭闔的政治運作，三青團儼然也已成爲國民黨政權的一方重要撐持力量；相對而言，三青團當然也助長了國民黨內愈發不可控制的人事傾軋與分贓政治。

在地方，三青團的自主性組織身分有助於擴大政權的基本隊伍；不過，相應於國民黨，三青團成員泰半具有本位、分離、取而代之等意識，其間程度之別，彷彿如漸層光譜，而與黨頹頹的心理則一。中日戰爭後期，大後方知識分子特別對國民黨治績發爲廣泛指摘，黨員同聲內抨；各界多論及憲政問題，實則開放政權，政局中人不能不表關切。這時三青團已有組黨之議，配合戰後團務發展成績斐然，本位意識幾達高峰，而組織地位始終無定，久之即起反動，於是一九四六年的三青團二全大會打算將黨團關係與團的地位問題作一徹底解決，獨

立組黨之說成爲多數與會人員歡迎的方案。三青團多年以來自主於黨外的面向以及不滿國民黨的情緒在廬山宣洩盡出，主要抱負與利益在團不在黨的地方與學生代表強烈要求三青團組建成一個真正的政黨。如果大會就此進行表決，組黨派很可能實現他們的願望，然而，蔣中正以個人權威止息了這場爭論——儘管不少人認爲蔣事前曾暗示他支持組黨的個人意向，最終三青團仍未能爭取到形式上的政黨名義，從某種角度來說，只是更加坐實自主、獨立的性格。

三青團自一九三八年成立以來，就以黨內派系與自主性組織的錯綜身分執行蔣中正賦予的使命以及擴展本身的權力版圖，時日既久，實力累增，而爭議恆在。三青團既是黨內派系政治的參與者，復爲整個國民黨的有力政敵，偏偏其身分不能和其餘在野黨派等同，此爲國民黨最大苦處，亦爲三青團發展的利便之點。拉開歷史的縱深觀察，黨團關係的面貌與一九三〇年代的復興社、CC系之爭的經驗多有重疊，例如昔日所謂的「社方」正是兼以黨內派系與獨立組織的身分，同CC系爲代表的「黨方」相互競爭。從一些線索分析，一九四七年黨團合併的決策背景也和一九三八年頗爲神似：交鬥日烈的兩造（復興社與CC系下的祕密組織與勢力／三青團與國民黨）爲了力抗政權的外來強力威脅（日本／中共），以及政權內部與黨機器有失活力足資回應的情況下，由兩造的共同領袖蔣中正勸令合作。合作的方式與內容則有差異：一九三八年係成立一個自樹格局的三青團，並以復興社爲重心；一九四七年則

以統一之名合併國民黨與三青團，三青團形同歸併，至此，三青團被迫放棄自己的自主性組織身分，但派系實質仍在，分離意識未減。

實際上，黨團統一作業未能全盤順利執行，尤以地方為最。做為國民黨因應戰後內外形勢需要所實行的重大調適和改革，開展於一九四七下半年的黨團統一曾經被蔣中正視為一次「政治革命性」的真正改造，但沒有多久，此舉也被證明不能達到振衰起敝的預期效果。國民黨與三青團進行了未臻融洽的機械式結合，以幹部人數為主要指標的國民黨新領導階層因此形成無效能的擴大，且當值中國政治環境丕變之際，黨機器勢有運轉欠靈之虞。相對於冗腫的新領導階層，國民黨與三青團自開始合併起的一年內，卻合計流失了高達八成比例的正式成員——儘管國民黨曾預期藉由黨團成員重新登記的辦法汰除部分腐惡份子，但是大部分的黨員團員似乎選擇了主動與國民黨道別，或者，至少也是消極的在重新登記的手續中缺席了。

黨團合併伊始，兩造復以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之交的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選舉為戰場，雙方競逐政治席位之激烈，有甚於一九四六年各地的參議員選舉，且國代立委選舉適值黨團統一期，二事合為負面因果，團結互信已不可期，黨團關係只能日趨谷底。國民黨政權稍早雖動員黨團二元機制掌控了各級代議機關，實則黨團互為仇讎，政權的代議基礎並不穩固；馴至選出更具政治影響力的國代立委，三青團的派系實質與分離意識也就跟著進入這

些爲了因應憲政需要而設計的中央機制當中。作爲一個重要派系，三青團在一九四八年的國民大會的副總統選舉與立法院的兩次正副院長選舉當中，均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四月，副總統選舉無提名而孫科實爲蔣中正屬意人選，然團方票源大舉倒戈，李宗仁當選；五月，第一任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有提名，而副院長提名人陳立夫只能險中求勝，團方實居反陳主力；十二月，立院首任正副院長孫科、陳立夫入閣，所遺立院正副院長二職依法改選，蔣中正的黨內提名名單係依CC系與團方實力平均分配，而雙方皆不以爲然，院長提名人選終至落敗，爲CC系一大挫折。三青團還在立法院裏成立一個政團：「新政俱樂部」，與院內其餘派系時相串連，僉以CC系的「革新俱樂部」爲政敵，黨機器顯已指揮不靈。時中國內戰方酣，民生動盪愈甚，蔣中正的領導權威正遭受源自黨內外不同勢力的侵犯，黨權亦現鬆落疲態，這使得國民黨的政府官員面臨政權空前的嚴厲挑戰時，絕難從他們的權力來源（領袖、黨，而非人民）那裏求取有力的挹注，俾進而作出適當且立即有效的回應。

就三青團與國民黨的關係而言，三青團一方面以派系身分投入黨內政治競爭，爲黨內派系政治的參與者（中央層級尤是）；一方面則以自主性組織的身分同國民黨時相頡頏，爲國民黨的有力政敵（地方爲最）。這種模稜兩可的雙重面向，使得黨團關係長期陷於低迷，三青團的形式地位亦始終無定；唯對於團方幹部參與政治而言，則此雙重面向反成有力護盾，頗有依違之利便。就國民黨黨內派系的面向析論，抗戰後期至戰後期間三青團參與黨內派系

政治尤深；一九四六年圍繞二全大會而起的組黨風潮，則是三青團作為一自主性組織面向的極致表現，期能取得政治地位之事實承認，以及形式上之黨名。上述雙重面向本已陷黨團關係於長期低迷，詎料戰後雙雙趨於頂峰，三青團組黨之議即令中控，然自主、獨立的性格反見坐實，至是黨團關係愈發治絲益棼，屢與國內的顛頓政局交相起伏。

在政權內部與黨機器有失活力足資回應中共武力威脅的背景下，蔣中正於一九四七年揭棄統一之名，合併國民黨與三青團，實際上三青團形同歸併。至此，三青團被迫放棄自主性組織身分，但派系實質仍在，本位意識未減。爾後，隨著黨內外局勢日蹙，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改革聲浪更爲震耳，前三青團若干菁英亟思另起爐灶，圖挽時局，組黨之念始終未絕。及至一九五〇年，在國民黨政權偏安的情況下，三青團的政治願望和興趣，終於獲得較高程度的實現——形諸一種積極參與黨內政治的姿態，而非尋求別樹旗幟。在台灣，儘管「團派」的集體意識從來沒有完全消失，但是政治價值透過重新權威性分配的結果，前三青團幹部的政治抱負與利益盡在國民黨內，分離意識不復存留。

註釋

①三青團團章雖對入團者的年齡設限，但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公布的首次團章修正條文裏規定逾齡團員仍得保留團籍，因此，這三百餘人還不見得都拋棄了他們的團員身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

會中央組織部工作報告》，一九四五年五月，引自：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四。

② 參見：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下冊，頁五五四；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 *East*

Asia, p. 802.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朱家驊先生檔案，台北：
學校黨務(一)(二)，函號一〇九。
學校黨務(三)(四)，函號一一〇。
三青團(一)，函號一三四。
三青團(二)，函號一三五。
- (二)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庫藏史料，台北：
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
上、下冊(台北：編者彙印，未載彙印年月)，未製號，鉛排本。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台北：編者彙印，民國四十三年四月)，未製號，鉛排本。

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

南京：編者彙訂，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六·二／三三，毛筆原件。

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

南京：編者彙印，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六·二／一一，鉛排本。

總裁兼團長手令批示

〈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不許團員任特務工作積極使左傾份子就範各地團務經費以團員養團爲原則手令〉，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一三七／五，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本部消極無聲望詳查實報并以團務爲主積極進行手令〉，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一三七／六，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飭擬青年營具體計畫手令〉，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一三七／八，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每週常會必須到會并應以青年團事務爲主要工作手令〉，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三七／一一，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各地青年團幹部每有幫會份子參雜藉勢招搖應由中央團部嚴加整頓手令〉，未載年份，一三七／一九，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青年團各級機構及團員今年應以新生活運動與勞動服務運動爲中心工作擬具體方案呈報手令〉，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一三七／二〇，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中央及地方團務日見消沈應謀改進擬訂具體辦法具報手令〉，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一三七／二二，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不論任何地區之團務工作皆應秉承當地黨部之指導絕對不許有與黨部發生磨擦或鬥爭手令〉，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一三七／二七，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目前青年團工作應注重改革社會弊端增進平民經濟生活調查民衆疾苦手令〉，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一三七／三八，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工作應以社會服務爲中心而社會服務應從推行新生活運動做起照此擬訂具體辦法通令實施手令〉，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三七／四〇，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下年度工作以充實三年來工作爲主非萬不得已切勿再設立新事業項目手令〉，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三七／四五，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青年團二全大會社會人士甚爲漠視茲將各項重要方針列示六項于一月內擬具體辦法呈核手令〉，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九日，一三七／四七，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據報共黨份子竭力煽動學潮有于五月間發動之可能應與有關各機關學校切實設法防範制止手令〉，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三七／五三，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研擬青年團改隸政府後如何加強業務方案限期呈核手令〉，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一三七／五四，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研擬整理團務之具體方案限期呈核手令〉，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一三七／五六，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青年團不得在各地任意設立檢查機關與調查統計局等對立手令〉，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一三七／六四，毛筆原件。

〈總裁兼團長親筆：以後青年團之工作應注重與有關各方之聯繫擬訂具體辦法手令〉，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一三七／六六，毛筆原件。

〈總裁親筆修正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第三條〉，一九三八年六月，一三八／一一四，鉛印本·毛筆修改。

〈總裁批示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案〉，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一三八／一一九，毛筆呈文·紅鉛筆修改批可。

〈總裁批葉楚傖報告審議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案〉，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三八／一九九，毛筆呈文·藍鉛筆批示。

〈總裁批吳鐵城報告黨團統一問題七十五次中常會決議情形案〉，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一三八／二一三，毛筆呈文·紅鉛筆批示。

〈總裁批吳鐵城爲根本改造本黨及黨團關係經常會推定委員十一人晉謁簽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一三八／二四八，毛筆呈文·紅鉛筆批示。

〈總裁批吳鐵城爲黨務座談會改進黨務意見處理辦法簽呈〉，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一三八／二五一，毛筆呈文·毛筆批示。

〈總裁批吳鐵城簽黨務改革方案實施辦法呈〉，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一三八／二五八，毛筆呈文·紅鉛筆批示。

特種檔案

教育部特種檔案，特〇〇三。

三民主義青年團資料，特〇二四。

黨團統一卷，特〇二五。

總裁官邸會報暨批回簽呈，特〇二七。

一般史料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提案原文〉，第一冊，一九四七年三月，六·二／四八，原件。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提案原文》，第一冊，一九四七年三月，六·二／四八，鉛排本。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提案原文》，第二冊，一九四七年三月，六·二／五〇，原件。

總裁訓詞《對當前黨政與青年團工作之指示》，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一三〇／二九。

朱家驊《黨務實施上之問題——總論》，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四〇／五二二·一。

《中央黨部黨務統計手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九三／九六。

《徵求黨員須知》，一九四二年四月，四九五／四七。

《中國國民黨黨員近十年來之發展趨勢》，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四九五／一〇八。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七中全會後黨部組織暨黨員統計提要》，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四九五／一三七。

《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紀錄》，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四九五／一四一。

《六屆四中全會宣言草案》，一九四七年九月，四九六／三。

《團員須知》，一九四三年，五一九／三。

張治中《本團性質與工作講評》，一九四二年八月，五一九／六。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附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三次聯

席會議·第一屆中央幹事會臨時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五年四月，五一九／四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一全大會中央及地方團部工作報告》，五一九／五〇

一、《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報告(二十七年七月至三十一年三月)》，一九四三年三月。

二、《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籌備處工作報告》，一九四三年二月。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一九／五四·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二十九年度工作計劃》，一九四〇年三月，五一九／五四·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五一九／五四·四。

張治中《三民主義青年團之任務及工作實施》，一九四〇年十月，五一九／七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報告(三十年一月至十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一九／七二。

《團員生活須知》，一九四一年一月，五一九／八〇。

《團員須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一九／八一·一。

《團員須知》，一九四二年七月，五一九／八一·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三十年度上半年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七月，五一九／八五。

閔仲瑤作《三民主義青年團團歌》、《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進行曲》，五一九／九〇，鋼筆

原稿。

《青年團創立六周年》，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五一九／九三。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手冊》，一九四四年三月，五一九／九四。

《廣東團務三年來籌備概況》，一九四三年二月，五一九／九六。

《三民主義青年團一屆中央幹事會二全會議提案》，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五一九／一〇五。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案彙錄》，第一冊，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五一九／一〇七·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案彙錄》，第二冊，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五一九／一〇七·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一次聯席會議議程》，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五一九／一〇八。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全體會議提案專案彙錄》，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五一九／一〇九。

《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第一屆團員代表大會會議彙編》，一九四三年二月，五一九／一

一四。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五一九／一—九·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幹事會有關資料》，一九三九年七月，五一九／一二〇。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常務幹事會一年來工作報告（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九日至二十八日七月九日）》，一九三九年七月，五一九／二二三。

《重慶市黨團統一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紀錄》，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五四五／九八。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冊》，一九四五年，孫逸仙博士圖書館藏，〇〇六·三一六／八〇四。

（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南京：

教育部，全宗號：五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關於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學校學生代表補課補考問題的來函》，一九四三年，五／〇一五七四。

《關於三青團邵陽分團占用學校作為團址的來往文書》，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九四四年一月，五／〇一五七六。

《關於湖北建始師範學校三青團與校長糾紛問題的來往文書》，一九四〇年，五／〇一五七七

七。

立法院，全宗號：一〇

〈選舉立法院正副院長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〇／〇一四五。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推選案〉，一九四八年六月，一〇／〇三〇六。

國立政治大學，全宗號：一一二

〈國立政治大學二十週年紀念冊〉，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一一二(四)／一八三四。

〈蔣經國與段教育長有關三青團中央幹校合併之來往函件及研究部第三期教育計畫綱要〉，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月，一一二(四)／三三二一。

中央設計局，全宗號：一七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民國三十一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配合案)〉，一九四二年二月，一七一／五〇〇。

〈臺灣調查委員會人事任免調遷〉，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一七二(二)／一〇二。

國民大會，全宗號：四五—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上冊，一九四八年三月四月，四五—/三五五。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下冊，一九四八年四月，四五—/三五六。

《第一屆會議主席團制定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四五—/五

二八。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處，全宗號：七一—

《國民黨統一黨團監察組織案及部分省市黨部負責人名單》，一九四七年，七一—(四)〇

七一。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六年三月，七一—(四) /—七一。

《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黨團聯席會議宣言及重要決議案》，一九四七年九月，七一—(四) /—一八三。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中央黨團聯席會議紀錄》，一九四七年十月，七一—(四) /—一八四。

《國民黨改革辦法及其黨改革新運動宣言》，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七一—(四) /三五五。

《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黨務報告》，一九四七年二月，七一（五）／一三三。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二冊，一九四五年五月，七一（五）／一五一。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一冊，一九四五年五月，七一（五）／一五二。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三冊，一九四五年五月，七一（五）／一五三。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紀錄》，一九四五年五月，七一（五）／一五五。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重要決議案》，一九三八年四月，七一（五）／一五八。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紀錄》，一九三八年，七一（五）／一五九。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原文》，第四冊，一九四五年五月，七一（五）／一六二。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一九四五年五月，七一（五）／一六五。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務檢討報告》，一九四五年五月，七一(五)／一六八。
《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央組織部黨務統計報告》，一九四六年二月，七一(五)／二〇七。

蔣介石《對黨與團結一組織的指示》，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七一(五)／二一七。

《蔣介石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關還政於民提案草稿》，一九四五年，七一(六)／〇一九。

大小《關於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諸派系的若干考察》(手稿)，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七一(六)／一一八。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全宗號：七一七

《河南省黨部工作報告及組織工作計畫實施總報告》，一九三九年十月—一九四二年五月，七一七(四)／〇三〇九。

《河南省黨部會議紀錄》，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九四四年一月，七一七(四)／〇三二〇。

《河南省黨部會議紀錄及工作報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三月，七一七(四)／〇三二一。

《安徽省黨部人事糾紛》，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九四三年一月，七一七(四)／〇四四九。

- 《安徽省黨部會議紀錄》，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四二年六月，七一七(四)／〇四七七。
- 《浙江省黨部工作報告》，一九三八年九月—一九四〇年八月，七一七(四)／〇五一五。
- 《江西省黨部的會議紀錄》，一九四〇年七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一七(四)／〇六〇七。
- 《湖北省黨部工作報告》，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九四二年五月，七一七(四)／〇六四〇。
- 《湖南省黨部及黨政聯席會議紀錄及全省黨務會議出席人員一覽表》，一九四〇年九月—一九四四年七月，七一七(四)／〇六八四。
- 《廣西省黨部的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十月—一九四四年一月，七一七(四)／〇七六〇。
- 《四川省黨部的組織工作報告及簡報》，一九四一年五月—一九四四年三月，七一七(四)／〇八三〇。
- 《重慶市黨部的工作報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九四二年八月，七一七(四)／〇八四九。
- 《重慶市黨部及所屬黨部會議紀錄》，一九三九年四月—一九四四年二月，七一七(四)／〇八五四。
- 《貴州省黨部的會議紀錄》，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九四一年二月，七一七(四)／〇八八一。
- 《西康省黨部工作報告》，一九三八年七月—一九四三年三月，七一七(四)／〇八九一。
- 《安徽省黨部關於黨員兼團員影響黨務工作應如何辦理的電文》，一九四〇年八月—九月，七一七(四)／二一五一。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爲消除黨內派別和小組織事致各級黨部及黨員書〉，一九四〇年，七二七(四)／二二一〇。

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全宗號：七二六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編印〈黨派情報〉，第一六六五號，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七二六／二一〇。

三青團中央團部，全宗號：七二八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手冊等〉，一九四四年三—四月，七二八／〇〇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幹事及各省市支團部負責人名單〉，一九四六年九月，七二八／〇〇四。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人員名冊〉，一九四三年四月，七二八／〇〇六。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手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七二八／〇〇七。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務概覽〉，一九四二年二月，七二八／〇一五。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七二八／〇一六。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二十九年度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一月，七二八／〇一七。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報告（三十一年一月至十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二八／〇一八。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三十二年四月至三十三年二月）》，一九四四年三月，七二八／〇一九。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三十二年四月至三十五年六月）》，一九四六年八月，七二八／〇二〇。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案彙錄》，第一冊，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七二八／〇二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總檢討報告》，一九四四年三月，七二八／〇二四。

《發展團務十年計劃總綱第一期實施計畫》，一九四四年三月，七二八／〇二五。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會工作報告（三十四年五月至三十五年一月）》，一九四六年，七二八／〇二六。

《團部工作會議第廿三次會議紀錄》，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七二八／〇二七。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常務幹事會第五次會議紀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七二八／〇二八。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八月)》，一九四七年八月，七二八／〇二九。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附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一次聯席會議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三年三—四月，七二八／〇三四。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四、五、七冊，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九月六日，七二八／〇三八。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附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第一次聯席會議第二屆中央幹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六年九月，七二八／〇三九。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錄》，一九四七年一月，七二八／〇四〇。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爲舉辦團員總甄核告全體團員書》，一九四七年一月，七二八／〇四三。

《團長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宣誓訓詞》，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七二八／〇五三。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須知》，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七二八／〇六三。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報告(三十一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八月)》，一九四三年九月，七二八／一六一。

《七年來團務工作總報告（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三年十二月）》，一九四五年，七二八／一六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監察會工作報告》，一九四〇年四月，七二八／一六四。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月，七二八／一六六。

《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支部第一屆團員代表大會宣言》，一九四三年三月，七二八／一八一。

陳誠《今後團務發展的途徑》，一九四六年七月，七二八／二一一。

朱家驊《青年團團務之進展》，一九三九年五月，七二八／二二一。

團長講《青年團工作的新方針》，一九四七年一月，七二八／二二四。

《團長告全國青年書、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一九三九年，七二八（四）／〇五。

《三青團政治綱領草案、三青團組織及訓練要旨草案、三青團的組織精神和根本任務、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青年書、為征求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告全國青年書及青年團團章草案》，一九三八—一九四七年，七二八（四）／一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表及代表名單等》，一九四六年，七二八（四）／一五。

《馮敬儒、吳梅筠、陸冠勳等三人之三青團員登記表、團證、宣誓書等》，七二八（四）／二

三。

(四) 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台北：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務案，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〇一四四·一〇／一〇七七。

二、史料彙編、日記

(一) 史料彙編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史資料第一輯初稿〉，上編(南京：編者印行，民國三十五年)。

司琦(編)，〈劉真先生文集〉，第三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九年)。

杜元載(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抗戰時期之青年活動〉〔革命文獻第六二—六三合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二年)。

李雲漢(主編)，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下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年)。

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下冊(台

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

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册「革命文獻第七六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七年）。

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第一，二册「革命文獻第七九—八〇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八年）。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

梁敬錚（譯註），〈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

陳果夫（著），陳果夫先生遺著編印委員會（編），〈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四十一年）。

黃埔出版社（編），〈總裁建國言論選輯〉，卷上（重慶：編者印行，民國二十九年）。

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册、記事年表上輯（台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八十一年）。

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集〉「革

命文獻第七〇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五年)。

《黨團統一組織重要文獻》(南京：黨內刊物，民國三十六年)。

(二)日記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影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九年)。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鉛排本(北京：群衆出版社，一九九二)。

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一，二冊，鉛排本(香港：編者印行，民國六十四年)。

阮毅成，《民國二十七年武漢半年日記(下)》，鉛排，收入《傳記文學》，第四三卷第三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七十二年九月)，頁五四—六〇。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二冊，鉛排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

胡適，《胡適的日記》，第一五，一六，一七冊，手稿影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〇)。

陳果夫，《陳果夫先生民國二十五年至四十年日記摘錄》，摘錄鉛排，收入：徐詠平，《陳果夫傳》(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七年)，頁八三九—九七〇。

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第一，二，七冊，鉛排本(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一九八九—一九九〇）。

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上册，鉛排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六）。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鉛排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

三、團印專刊

《三民主義青年團三十一年度灌縣青年夏令營訓練紀實》（重慶：青年出版社，民國三十一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實》（重慶：民國三十三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三民主義青年團二週年紀念特刊》（重慶：青年出版社，民國二十九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一集（重慶：民國二十八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二集（重慶：民國二十八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有關資料》（重

慶：民國三十四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青年夏令營手冊》（重慶：民國三十三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張書記長訓詞論文選》（重慶：民國三十一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團長訓示》（重慶：民國三十一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黨與團的關係》（重慶：民國三十一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安徽支團部（翻印），《全國青年對本團應有的認識》（民國二十九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支團部（編印），《團務建設大綱》（成都：民國三十二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幹事會（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正式成立特刊》（

贛州：民國三十二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廣東支團中山分團部（編印），《兩年來團務特輯》（中山：民國三十六年）。

王樹權（等），《我們對於黨團統一改造的意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三反壁報社，民國三十六年）。

青年出版社（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論文集》，第一，二合集（重慶：民國三十一年）。

陳復生（等著），《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漢》（重慶：青年出版社，民國二十八年）。

陳誠（講），《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宗旨及今後團務推進方針》（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

部訓練處印，民國二十九年）。

陳誠（講），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性質及其展望〉（重慶：民國二十八年）。

四、憶述文獻

（一）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憶述文集

大華晚報社（編），〈余井塘先生紀念文集〉（台北：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民國七十四年）。

方治，〈我生之旅〉（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五年）。

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

左舜生，〈萬竹樓隨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輯」（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五十六年）。

朱文伯，〈七十回憶〉（台北：民主潮社，民國六十二年）。

沈雲龍（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

沈雲龍、林泉、林忠勝（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九年）。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六）。

李樸生，〈我不識字的母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

私立台南家政專科學校（編），《唐乃建先生紀念集》（台南：編者自印，民國七十一年）。

余湛邦，〈張治中——張治中生前機要祕書的回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二）。

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民國五十八年）。

政大九期同學（合著），政九憶往編輯組（編），〈政九憶往〉（台北：里仁書局，一九九四）。

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政協贛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蔣經國在贛南〉（江西

文史資料選輯第三五輯）（南昌：編者印行，一九八九）。

胡國台（訪問），郭瑋瑋（紀錄），〈劉真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

胡維藩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胡維藩先生紀念集〉（台北：編者自印，民國六十五年）。

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二年）。

馬五先生（本名雷嘯岑），〈我的生活史〉（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五十四年）。

馬五先生（本名雷嘯岑），〈詹詹錄〉，第一，二冊（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五十四年）。

馬五先生（本名雷嘯岑），〈海嘯塵談薈〉（台北：藍星出版社，民國五十八年）。

孫哲生先生治喪辦事處（編），〈孫哲生先生紀念集〉（台北：編者自印，民國六十三年）。

梁肅戎，〈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

郭鏡秋先生紀念集編輯小組（編），〈郭鏡秋先生紀念集〉（台北：編者印行，民國七十年）。

曹雲霞，〈贛南憶舊錄〉（台北：自由時代，年代不詳）。

陳立夫（著），弘毅齋藝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毅齋藝文集〉，下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八年）。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三年）。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

陳啓天，〈寄園回憶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

陳敦正，〈動亂的回憶〉（台北：元霞書舍，民國六十八年）。

陳敦正，〈元霞閣叢稿〉（台北：元霞書舍，民國七十二年）。

陶百川，〈因勉強猶八十年〉（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三年）。

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八十一年）。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台北：谷風出版社，一九八七）。

程思遠，《政海祕辛》（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八）。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上、下冊（香港：一九八二）。

黃珍吾先生治喪委員會（編），《黃珍吾先生紀念集》（台北：編者印行，民國五十九年）。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下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

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八年）。

張金鑑，《明誠七十自述》（台北：中國行政學會，民國六十一年）。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下冊（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

董霖，《六十載從政講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年）。

詹純鑑先生的生平編輯委員會（編），《詹純鑑先生的生平》（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六十八

年）。

鄭彥棻，《景光集》（台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四年）。

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

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

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民國八十四年）。

劉健群，〈銀河憶往〉（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

鄧文儀，〈冒險犯難記〉，下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二年）。

樂恕人，〈動亂廿五年〉（香港：新聞天地社，民國四十九年）。

錢用和，〈半世紀的追隨〉（台北：作者自印，民國六十五年）。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台北：中國地政研究所，民國六十九年）。

蕭贊育，〈梅園文存〉（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四年）。

羅才榮，〈才榮文稿〉，正編，續一，續二（台北：川康渝文物館，民國七十二—七十九年）。

羅才榮，〈才榮自述〉（台北：親屬自印，民國七十四年）。

（二）憶述專文

千國勳，〈略述三民主義力行社〉，〈湖北文獻〉，第六五期（台北：湖北文獻社，民國七十一年十月），頁二〇—二六。

文傑，〈常德黨團爭權奪利的見聞〉，〈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五四—七一。

方慶延，〈蔣經國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經過〉，《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頁五九一—七〇。

王友直、張志俊（等），〈回憶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陝西省臨時參議會和參議會〉，《陝西文史資料》，第二〇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頁八〇—一二二。

王益昶，〈國民黨統治時期湖北教育界派系組織明爭暗鬥〉，《湖北文史資料》，第一〇輯（武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四年九月），頁九二—一〇四。

王華農，〈中國國民黨開封市（縣）黨部簡記（一九二四—一九四八）〉，《開封文史資料》，第五輯（開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開封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七年四月），頁一〇八—一二〇。

王華農，〈記解放戰爭時期開封的新聞團體〉，《開封文史資料》，第二輯（開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開封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頁九三—一〇〇。

王進三，〈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始末〉，《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五八—七一。

仇碩夫，〈中華復興社在湖南的活動〉，《湖南文史資料》，第三二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一四一—一八。

甘復初，〈《中興日報》親歷記〉，《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七二—八五。

田世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二輯（合肥：一九八三年四月），頁一一—一五。

田世慶，〈張宗良先生在安徽〉，《安徽文史資料》，第二一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頁九三—一〇八。

艾經武，〈一九三六年河南省國大代表選舉中復興社與CC派的鬥爭〉，《河南文史資料》，第一九輯（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六年九月），頁二三一—二九。

艾經武，〈復興社河南分社的片段回憶〉，《河南文史資料》，第五輯（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七年三月），頁一〇九—一一五。

艾毓英，〈政學系與CC在湖北的禍門〉，《武漢文史資料》，第一九輯（武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五年三月），頁一二六—一四二。

沈重宇，〈蔣介石的親信謀士與情報主管——唐縱〉，《江蘇文史資料》，第二四輯（南京

：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一六四—一八六。

宋躍遠，〈我所知道的大庸選舉〉，〈國大〉代表經過〉，〈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八九—一〇四。

李以劭，〈兩度相隨蔣經國的經過及見聞紀實（下）〉，〈傳記文學〉，第六七卷第五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頁九一—九六。

李帆群，〈新疆“三青團”的成立與結束〉，〈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頁二〇—二四。

李朋章，〈地下黨在三青團廣西支團的活動〉，〈廣西文史資料〉，第一七輯（南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三年七月），頁一三三—一四一。

李清悚，〈南京市參議會的派系鬥爭〉，〈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頁一四五—一五六。

李景春，〈復興社在福建的組織與活動〉，〈福建文史資料〉，第一八輯（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七年二月），頁一—一四。

邢漢三，〈我參加一九三六年國民黨國大代表選舉的簡況〉，〈開封文史資料〉，第四輯（開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開封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六年八

月），頁二二—二七。

谷和邦，〈王恢先在沅江當選「國大」代表的見聞〉，《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一〇五—一〇七。

余湛邦，〈張治中先生小傳〉，《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合肥：出版年月不詳），頁一七四—一八二。

何廉（原作），〈簡述國民黨的派系——何廉回憶錄之七〉，《傳記文學》，第六二卷第六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八二—九〇。

武靈初，〈國民黨改組派在山西的活動〉，《山西文史資料》，第一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六月），頁一八九—一九一。

吳紹澍，〈記上海統一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二九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頁七九—九三。

易演道、鄧中敏，〈三青團湖北省支團始末〉，《湖北文史資料》，第一四輯（武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六年四月），頁九六—一〇三。

承紀雲，〈我所知道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五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頁八三—一〇〇。

胡楚藩，〈國民黨「國大會議」紀實〉，〈武漢文史資料〉，第七輯（武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二年六月），頁一〇七—一二八。

胡夢華，〈CC外圍組織誠社始末〉，〈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一四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一四七—一六五。

席懋修，〈我在「軍統局」十四年的回憶〉，〈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〇輯（南昌：江西文史資料編輯編輯部，一九八九年三月），頁二二—一九九。

馬建中，〈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的內幕見聞〉，〈西安文史資料〉，第三輯（西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西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頁一三〇—一三八。

馬建中，〈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派系鬥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西安文史資料〉，第四輯（西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西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三年六月），頁八八—一〇一。

夏賡英，〈漫話CC派〉，〈安徽文史資料〉，第二一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頁一八四—二〇七。

翁文灝（遺稿）、李若松（提供），〈翁文灝對中共的坦白書〉，〈傳記文學〉，第六二卷第六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一六一—二一。

徐炳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的「幹校系」及其活動〉，《安徽文史資料》，第一七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頁九一—一二一。

梁上賢，〈湖北省偽大選一瞥〉，《湖北文史資料》，第五輯（武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二年六月，頁一〇七—一一三。

梁上賢，〈在恩施經歷的國民黨團活動〉，《湖北文史資料》，第一四輯（武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六年四月，頁八六—九五。

田秉德，〈三青團在湖北的組織與活動〉，《湖北文史資料》，第七輯（武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頁五七一—七二。

梁尚德，〈我所記憶的「誠社」〉，《文史資料選輯》（山東），第二〇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頁二〇五—二一八。

康澤，〈復興社的緣起〉，《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三七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頁一三三—一五〇。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四〇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頁一九七—二〇七。

康澤，〈蔣介石為什麼叫我到襄陽去當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湖北文史資料》，第一〇

輯(武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四年九月)，頁一一七。

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傳記文學》，第六七卷第三一六期，第六八卷第一一五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一十二月，八十五年一月五月)，頁一五一—二二二(第六七卷第三期)，頁四一—五一(第六七卷第四期)，頁一一二—一二二(第六七卷第五期)，頁一〇七—一二〇(第六七卷第六期)，頁一〇一—一一三(第六八卷第一期)，頁一〇九—一一七(第六八卷第二期)，頁一一二—一二二(第六八卷第三期)，頁一一五—一二四(第六八卷第四期)，頁一〇七—一一四(第六八卷第五期)。

許鶴，〈簡憶江西復興社組織〉，《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五輯(南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七年九月)，頁八〇—八一。

陳明仙，〈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貴州黨務〉，《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五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頁一三三—一六〇。

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七四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頁四〇—七二。

馮世欣，〈陳辭公軼事記聞——紀念陳誠副總統逝世三十週年〉，《傳記文學》，第六六卷第三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八十四年三月)，頁三三—四〇。

曾佩涵，〈新桂系在皖南及其與蔣介石嫡系的矛盾〉，《安徽文史資料》，第一七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頁一三七—一六四。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一三一—一四六。

黃立志，〈抗日戰爭初期的廣西三青團〉，《廣西文史資料》，第一七輯（南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三年七月，頁一九一—一九二。

黃雍，〈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變〉，《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一一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一一二〇。

辜達岸，〈對熊斌在陝西期間的見聞〉，《陝西文史資料》，第二三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三月，頁四一—七〇。

覃澤漢，〈我所知道的廣西三青團的內幕〉，《廣西文史資料》，第一七輯（南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三年七月，頁一四二—一五四。

張正非，〈CCC集團在江蘇的勵進社〉，《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二〇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頁一〇三—一二八。

張仲魯，〈回憶CC與復興社鬥爭的一幕〉，《河南文史資料》，第五輯（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七年三月），頁一一六一—一二四。

張香譜，〈金山憶舊（五）〉，《中外雜誌》，第二二卷第五期（台北：中外雜誌社，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頁四五—五〇。

張鳳吉，〈國民黨復興社和“CC”派在山東的明爭暗鬥〉，《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四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頁一三九—一四七。

楊幹民，〈我在銅仁主持競選“國大代表”的經過〉，《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七輯（貴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四年十月），頁二一九—二三二。

楊曉麓，〈衡陽市參議會選舉紀實〉，《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二〇—二二八。

業衍璋，〈我所了解的中央訓練團縣政訓練班〉，《江蘇文史資料》，第二四輯（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一〇〇—一一二。

葉國素，〈薛岳統治湖南時期的黨團鬥爭內幕〉，《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一一—二二。

萬衡，〈我參加“行憲國大”的一幕鬧劇〉，《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一五二—一五六。

趙澍，〈CCC的擴張活動〉，《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三七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頁一五一—一六四。

蔡杞材，〈一九四八年“行憲國大”雜憶〉，《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一三三—一五一。

蔡芷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河南的初期活動〉，《河南文史資料》，第一九輯（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六年九月），頁三〇—四一。

翟文鳳，〈三青團和國民黨在陝西的明爭暗鬥〉，《西安文史資料》，第一輯（西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西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頁一三〇—一三七。

潘志中，〈華容參議會選舉中的黨團之爭〉，《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三七—四〇。

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CC”團〉，《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四五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頁二三一—二五四。

劉先雲，〈憶萬武樵先生二三事〉，〈湖北文獻〉，第八二期（台北：湖北文獻社，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頁八二—八三。

劉岳厚，〈國民黨湖南甲乙派的鬥爭〉，〈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長沙：一九六二年十月），頁一一—三九。

劉恭，〈我所知道的中統〉，〈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長沙：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一七九—二一七。

劉鳴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概述〉，〈湖北文史資料〉，第一四輯（武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六年四月），頁五一—六七。

鄧中敏，〈“三青團”在武漢始末〉，〈武漢文史資料〉，第一八輯（武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頁五三—六一。

賴景瑚，〈何鍵和張治中——抗戰時期在湖南的一點回憶〉，〈湖南文獻〉，第九卷第一期（台北：湖南文獻社，民國七十年一月），頁二二—二七。

龍步雲，〈中華復興社內幕〉，〈湖南文史資料〉，第三二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一一—一三。

謝然之，〈從馬家寺到復興關——回憶經國先生創辦中央幹校的往事用以紀念他逝世一周年〉，〈傳記文學〉，第五四卷第一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七十八年一月），頁

一五—二四。

謝然之，〈三民主義青年團往事瑣憶〉，《傳記文學》，第七一卷第四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八十六年十月），頁一九—二七。

蕭作霖，〈復興社述略〉，《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一一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二一—七一。

藍奇，〈抗日戰爭時期我在貴州三青團的一些回憶〉，《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七輯（貴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一八二—一八七。

羅長安，〈國民黨青年軍及其廬山會議〉，《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二輯（南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三年九月），頁七九—八四。

羅鑫，〈我所經歷的祁陽黨團摩擦〉，《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四一—五三。

龐鏡塘，〈“中央俱樂部”——C.C.的組織及其罪惡活動〉，《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一八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三月），頁六二—七五。

蘇民，〈新桂系與C.C.在安徽的矛盾和鬥爭〉，《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長沙：一

九六三年六月），頁一五六—一七八。

蘇緒如，〈黨團鬥爭在邵陽〉，《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二八一—三六。

續約齋，〈也談國民黨改組派在山西的活動〉，《山西文史資料》，第三八輯（太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五年三月），頁一八五—一八七。

龔勵初，〈湖南省參議會CC派和三青團爭奪見聞〉，《湖南文史》，第三六輯（長沙：湖南文史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二二—二七。

五、專著

丁永隆、孫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

千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台北：私人發行，民國七十五年）。

千國勳（等著），〈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

王功安、毛磊（主編），〈國共兩黨關係史〉（武漢：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八）。

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四）。

王藍，〈長夜〉（台北：紅藍出版社，民國五十年）。

中國青年軍人社（編著），《反蔣運動史》，上、下冊（台北：李敖出版社，一九九一）。

申曉雲、李靜之，〈李宗仁的一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

〔美〕白修德、賈安娜（White, Theodore H. and Jacoby, Annalee原著），端納（譯），《

中國的驚雷》（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八）。

包遵彭（編著），《中國近代青年運動史》（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四十二年）。

尼洛（本名李明），《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

江南（本名劉宜良），《蔣經國傳》（台北：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

江漢鐘（編著），《中國黨派內幕》（出版地不詳：新中國出版社，民國三十五年）。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四）。

宋春（主編），《中國國民黨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

汪榮祖、李敖（合著），《蔣介石評傳》，下冊（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

五）。

沈醉、文強（著），《戴笠其人》（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

李敖（編著），《論定蔣經國》（台北：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四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

國八十三年)。

李象泰，〈中國國民黨今後怎麼辦？〉(黨內參考，民國三十六年)。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一年)。

范小方，〈二陳和CC〉(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范小方、包東波、李娟麗，〈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
林真，〈中國內幕〉，第一輯(上海：新聞雜誌出版社，民國三十七年)。

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

吳鐵城，〈黨政制度及其關係〉(重慶：獨立出版社，民國三十三年)。

〔美〕易勞逸(Eastman, Lloyd E.原著)，王建朗、王賢知(等譯)，〈蔣介石與蔣經國——毀滅的種子〉(台北：李敖出版社，一九九〇)。

〔美〕易勞逸(Eastman, Lloyd E.原著)，陳謙平、陳紅民(等譯)，〈流產的革命——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二)。

邱七七(編)，〈回憶常在歌聲裏〉(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

〔美〕金介甫(Kinkley, Jeffrey C.原著)，虞建華、邵華強(譯)，〈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

與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

〔美〕金介甫（Kinkley, Jeffrey C.原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八十四年）。

邱錢牧（主編），《中國政黨史（一八九四—一九四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
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台北：新銳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

殷海光，〈中國國民黨的危機〉（黨內參考，民國三十五年）。

徐浩然，〈蔣經國在贛南〉（台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三）。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

許福明，〈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五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

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

曹聚仁，〈蔣經國論〉（香港：聯合畫報社，一九七一）。

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七十八年）。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

陳浩、寇維勇（編著），〈透視黨內派系〉（台北：風雲論壇社，民國七十四年）。

陳寧生、張光宇，《蔣介石的戰爭機器》（台北：偉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

限公司，一九九五）。

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重慶：青年軍出版社，民國三十五年）。

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三年）。

黃嘉樹，《國民黨在台灣（一九四五—一九八八）》（台北：大秦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

張其昀，《大陸淪陷的痛史與光復大陸的努力》（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二年）。

張其昀，《黨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三年）。

張智強、陳勇（編著），《鐵血黃埔》（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

慈生，《論中國各黨派》（上海：讀者文摘出版社，民國三十六年）。

葉青，《黨派問題》（重慶：時代思潮社，民國三十六年）。

葉湖中（等撰），《三民主義青年團》「戰時綜合叢書第三輯」（重慶：獨立出版社，民國二十八年）。

說文社編輯部（編），《中國各黨各派現狀》（重慶：說文社，民國三十五年）。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重慶：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二年）。

蔡省三（本名蔡希曾）、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一九七九）。

潘嘉釗、鍾敏、李慕貞、侯俊華（合編），〈蔣介石特工祕檔及其他〉（北京：群眾出版社，一九九三）。

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台北：實踐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

賴澤涵、[美]馬若孟(Myers, Ramon H.)、魏萼(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三）。

謝本書、牛鴻賓，〈蔣介石和西南地方實力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

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

隱士，〈李蔣關係與中國〉（香港：自由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

蘇嘉宏，〈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一年）。

六、論文

卜萬平，〈從黨團關係看國民黨內部各派系的矛盾〉，《民國檔案》，一九九〇年第一期（南京：一九九〇），頁一一七—一一九。

王培智，〈抗日戰爭時期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運動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南京：一九八七），頁五七—六三。

王進義，〈三民主義力行社組織與策略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九年），計一七八頁。

朱高影，〈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七）——國府爭取青年運動領導權之努力及其挫敗〉（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一年），計二六八頁。

李守孔，〈中國國民黨改造之意義與價值〉，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研究〉（台北：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八十三年），頁六七—九五。

李國祁，〈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華學報》，第四卷第一期（台北：中華學報社，民國六十六年一月），頁八一—九二。

李雲漢，〈抗戰期間的黨政關係（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册（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民國八十五年），頁一一—一九。

林泉，〈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與抗戰建國——從幾件重要決議案分析探討〉，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三冊——抗戰建國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七六一—〇〇。

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和談——以「重慶會談」為例〉，《歷史月刊》，第八

九期（台北：歷史月刊雜誌社，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頁七一—七五。

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民國八十五年），頁九二〇—九三八。

吳錫澤（編著），〈陳辭修先生年譜簡編初稿〉，〈傳記文學〉，第六二卷第五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八十二年五月），頁一五一—二二。

陳存恭，〈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中委會及中常會初探〉，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四冊——台灣光復與建國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一六—一五四。

陳希亮，〈三青團述論〉（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畢業論文·申請碩士學位，一九九三），計四二頁。

陳進金，〈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湖北（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一期（台北：國史館，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頁一五一—一六八。

馮啓宏，〈法西斯主義對中國三〇年代政治的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計三二七頁。

遼耀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華學報》，第四卷第一期（台北：中華學報社，民國六十六年一月），頁九三—一〇二。

楊天石，〈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讀蔣介石《日記類抄》〉，《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册，頁二〇—三七。

賈維，〈三青團的成立與中共的對策〉，《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一九九五年三月），頁二二—二四二。

賈維，〈三青團的結束與黨團合併〉，《近代史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一九九六年一月），頁七七—一〇三。

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一九九六年七月），頁一〇〇—一一九。

蔣永敬，〈三民主義青年團與抗戰建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一五輯（台北：編者印行，民國八十二年），頁五〇七—五四九。

樊中原，〈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大專院校活動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五年），計二五二頁。

劉慶祥，〈力行社與安內攘外政策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七十七年），計二八〇頁。

鄧文儀，〈千國勛先生遺著——「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序言〉，《湖北文獻》

，第八二期（台北：湖北文獻社，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頁八〇。

鄧元忠，〈民族復興運動在民國史中的意義〉，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三冊（台北：編者出版，民國七十年），頁二二七—二四七。
盧國慶，〈抗戰初期的黨派合作〉（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計五九二頁。

七、工具書

李松林（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李雲漢（主編），林養志、宋正儀（編輯），〈中國國民黨一百週年大事年表〉，第一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

秦孝儀（主編），中國現代史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

秦孝儀(主編)，中國現代史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現代史辭典——史事部分(一)》(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四年)。

陳興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一九九三)。

八、期刊、報紙

(一) 期刊

《三民主義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第九卷第九一〇期；第一〇卷第一，一二期(重慶·南京：三民主義半月刊社，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一日；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十五日；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一日，九月一日)。

《工作通訊》，第四一—二期(恩施：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北支團部籌備處，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十二月一日)。

《中央團訊》，第一—四卷(重慶·南京：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青年通訊》，第三卷第四期——全國代表大會特刊(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民

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青年嚮導》，創刊號；第二四一四〇期；第二卷第二一七期（重慶：青年嚮導社，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七日；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八年五月二日；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日—二十九年一月十七日）。

《指導通訊》，第二卷第五期（立煌：三民主義青年團安徽支團部，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新聞天地》，第四一五二期（重慶·上海：新聞天地社，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團員訓練》，第二卷第一六一—一八期（耒陽：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部籌備處，民國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日）。

《團員訓練》，第一卷第四期（成都：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支團，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一日）。

《團員通訊》（三民主義青年團福建支團部籌備處，民國二十九年）。

《團員通訊》，第五期——元旦特輯（三民主義青年團直屬第二區團部籌備處團員通訊編輯委員會，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

《團務通訊》，第二卷第八，九期合刊（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直屬第二分團，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團務通訊》，第一二期（遂昌：三民主義青年團遂昌分團部，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團務通訊》（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民國二十九年）。

(二) 報紙

《大公報》，漢口·重慶·天津·上海。

《大會日刊》，第一一六號（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祕書處日刊社，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十三日）。

《中央日報》，重慶·南京·長沙。

《申報》，上海。

《自立晚報》，台北。

《自由時報》，台北。

《和平日報》，南京。

《夏令新聞》，第二期（杭州：杭州青年夏令會學員生活管理委員會出版股夏令新聞社，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三十日）。

《掃蕩報》，重慶。

《新華日報》，重慶。

(三) 剪報冊（中央通訊社徵集部製；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藏，台北）

- 《三民主義青年團（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三十七年三月）》
- 《三民主義青年團——一般概況與言論（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三十四年七月）》
- 《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外界評議（民國三十七年八—十月）》
- 《三民主義青年團——地方團務概況（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四年七月）》
- 《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夏令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十三年八月）》
- 《三民主義青年團——會議概述 I（民國三十二年三—四月）》
- 《三民主義青年團——會議概述 II（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三十四年八月）》
- 《中央政會（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三十七年十一月）》
- 《中央黨務（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三十七年十一月）》
- 《中央黨務總目（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十七年十二月）》
- 《中國報業（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三十七年十二月）》
- 《立法檔案 I（民國三十年七月—三十七年三月）》
- 《立法檔案 II（民國三十七年四—八月）》
- 《立法檔案 III（民國三十七年八—十二月）》
- 《民主憲政的開端 I（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三十七年四月）》
- 《民主憲政的開端 II（民國三十七年四—十一月）》

- 〈民治聲中的新黨派(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三十六年七月)〉
- 〈各省黨務 I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三十六年十二月)〉
- 〈各省黨務 II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月)〉
- 〈行憲後行政院院長人選問題(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五月)〉
- 〈行憲後第一屆立法院會議(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七月)〉
- 〈知識分子的出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月)〉
- 〈知識分子與民主政治(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七年八月)〉
- 〈故總統蔣公二、三事(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月)〉
- 〈政治協商會議——各團體及代表團會外活動(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四月)〉
- 〈政協以後諸慘案——南通、北平、徐州(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三十六年三月)〉
- 〈政黨選舉面面觀(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月)〉
- 〈國民黨內諸派系(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三十六年四月)〉
- 〈較場口慘案——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之前因後果(民國三十五年二月)〉
- 〈戰後政府內政 II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二月)〉
- 〈戰後政府組織之成立(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三十七年十二月)〉
- 〈學校黨務(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十四年八月)〉

《黨史工作（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三十七年十二月）》

《黨政革新（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七年八月）》

九、英文著作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

— 19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Eastman, Lloyd E., "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49 (Jan.-Mar. 1972), pp. 1—31.

Eastman, Lloyd E.,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Eastman, Lloyd E., "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Yunnan and

Chungking," in Paul K. T. Sih,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icksville, N.Y.: Exposition Press, 1977), pp. 329-372.

Eastman, Lloyd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Fairbank, John 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Fairbank, John K. and Feuerwerker, Alber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Fairbank, John K., Reischauer, Edwin O. and Craig, Albert M.,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Furth, Charlotte,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Gillin, Donald G., "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the Kuomintang,"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4 (Aug. 1970), pp. 835-850.

Huang Jianli, "The Formation of the Guomindang Youth Corps: An Analysis of Its Original Objectives," in *East Asian History*, 5 (June 1993), pp. 133-148.

Huang Jianli,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Peter Lang, 1996)

Israel, John,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Israel, Joh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ervation as an Ultimate Value," in Paul K. T. Sih,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icksville, N.Y.: Exposition Press, 1977), pp. 131-166.

Israel, John, "Chungking and Kunming: Hsinan Lienta's Response to Government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arty Control," i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上册(台北:編者出版·民國七十四年)·頁三四三—三七九。

Rea, Kenneth W. and Brewer, John C.,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Vol.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Tung, William L., *Revolutionary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1926-194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索
引

〈黨與團的關係〉 144

二十一畫

顧希平 206

顧毓琇 209

〈讀者文摘〉 見[Reader's
Digest]條

二十三畫

龔舜衡 212

二十四畫

贛南 97-98, 274, 284,
293, 300

十八畫

- 韓文溥 54, 212, 290, 312
 韓家蘭 213
 韓國 364
 韓復榘 24
 韓戰 395
 瀋陽 380
 簡貫三 26, 104
 鎮天錫 312
 閻仲璠 99

十九畫

- 魏進軒 211
 廬山 34, 286, 292-294,
 296, 303, 348, 442
 廬山談話會 32
 羅才榮 53, 128-129, 211,
 223, 226, 287, 300, 311
 羅正亮 52
 羅光華 293
 羅貢華 391
 羅衡 382
 羅鑫 360
 譚平山 42, 44, 46, 101
 蘇嘉國防線 35
 蘇聯(蘇俄) 35, 98, 229,
 238, 240, 243, 350, 396,
 437

二十畫

- 「黨五團四」 357
 〈黨內不許樹立派別與任何
 小組織案〉 40

- 黨內民主 240, 242
 黨方 6, 87, 102, 125, 132
 -133, 141, 196, 200, 214
 , 292, 308, 341-342, 355
 , 358-362, 367-370,
 373, 442
 「黨正團副」 357, 359-
 360
 〈黨的改造與政治改革〉
 389
 「黨政融化」 126
 「黨政聯繫」 126
 黨政關係 126, 177-178
 黨派合作 32-33, 35, 38
 -39
 黨員團員重新登記 356,
 362-363, 443
 黨務座談會 391
 「黨部官化·團部黨化；黨
 員官僚化·團員黨員化」
 199
 「黨部停閉」 1, 92, 148,
 385
 黨團工作會報 125
 黨團統一(黨團合併) 1
 -2, 6, 131, 315, 337, 340
 , 344, 347, 351-367, 370
 , 372-373, 378, 383, 386
 , 388, 390, 395-397, 442
 -443, 445
 〈黨團統一組織原則〉
 354
 〈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
 法〉 110, 142

- 「質量並重」 114-5, 118
 , 172
 鄭介民 34, 233
 鄭代恩 51
 鄭彥棻 46, 207, 307, 310,
 313-314, 371
 鄭通和 207, 309
 鄧文儀 17, 25, 205, 213,
 242
 鄧飛黃 208
 鄧發清 312
 魯冀參 199, 312
 魯蕩平 26-27
 黎光明 211

十六畫

- 學潮 130, 349
 憲兵司令部 345
 憲法 290, 371, 396
 憲政 215, 218-219, 221,
 224, 229, 274-276, 278,
 289-290, 337, 349, 369
 -370, 441, 444
 穆提義 311
 縣特別小組會議 127-128
 縣黨政秘密會議 127-128
 興中會 356
 蕭公權 379
 蕭吉珊 233, 235
 蕭作霖 25-26
 蕭忠國 312
 蕭錚 232-233, 235, 238,
 242, 244, 365
 蕭贊育 233, 235, 309, 343

- 蕭灑 23-24
 「融政於黨」 23
 「融黨於軍政」 23
 親愛精誠 241
 賴璉 233, 235, 242
 賴鐘聲 294
 閻錫山（晉閻） 15, 46,
 130
 霍爾 見 [Hausey, Erne-
 st] 條
 駱力學 207, 310
 勵志社 19
 聯合座談會 379-380

十七畫

- 龍雲 130
 幫會 115, 136-137
 戴之奇 45, 47
 戴仲玉 310
 戴笠 17, 49-50
 戴傳賢 8, 40, 201, 303
 總理紀念週 31, 90-91,
 94, 198, 243, 298, 302,
 306, 341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日 42
 「總裁獨裁，中正不正」
 228
 「舉黨一致」 381
 薄毓相 54, 212
 薛岳 123-124, 129
 「還政於民」 215, 274
 鍾天心 46, 209
 鍾鼎文 210
 藍衣社 58

-], 17, 20-21, 30, 32, 137, 340, 352-353, 397
 : 論黨團關係, 1, 89-93, 133-135, 144, 146, 295
 -296, 303-306, 340, 352-353, 356, 365, 396
 -397; 對黨務與黨人的
 批評, 1-2, 30-32, 34, 90-94, 150, 198-199, 240-241, 256, 304, 351
 -352, 383, 385, 388, 393
 , 395-397; 對團務與團
 員的批評, 115, 136-139, 142, 146, 198-199, 222, 231, 240, 255-256, 296, 304, 340, 349, 352-353, 355-356, 364-365, 387, 440; 黨人、團員對~的
 批評, 2, 50, 228, 231, 233
 , 240, 302, 373, 375, 391
 ; 與第一任正副總統選舉
 , 370-373, 380, 383, 444
 ; 與立法院第一、二任正
 副院長選舉, 373-376, 381-383, 444; 與一九五
 〇年的改造, 2, 6, 394-
 397
 蔣宋美齡 211, 301, 305,
 375
 蔣廉儒 293
 蔣經國 97-99, 274, 283
 -285, 287, 293, 300, 315
 , 345, 348, 350; 一九三
 九年以前的~, 97; 在贛
 南, 97-98; 與江西支團
 部, 53, 97-98, 212, 284,
 287; 與青年夏令營, 97-
 99, 153, 293; 論革命, 97,
 99, 386; 與三青團一全大
 會, 98, 205; 在三青團中
 中央幹事會, 205, 208, 210,
 213, 308-312, 314; 與
 中央幹校, 284-285, 287,
 293, 314; 與青年軍, 284
 -285, 287-288, 293,
 300-301; 與三青團二全
 大會, 288, 293, 300-301,
 306-307, 308, 314; 在
 第二處, 314, 345; 論團
 的改造, 287, 293-294,
 300, 306; 論黨的革新,
 300, 386, 388-389; 與
 政大教育長任命風波, 350
 ; 與第一任副總統選舉,
 371-372; 與一九五〇年
 國民黨的改造, 398
 蔡希曾 287, 293-294,
 314
 蔡勁軍 51, 311
 〈請遵照團長訓詞《黨與團
 之關係》具體規定實施辦
 法以謀團務發展案
 〉 142
 調整黨團關係措施 87, 139
 -147, 283, 440
 「誰有青年, 誰有將來」
 28
 諍友社 379, 382

- 劉不同 390
劉文島 343
劉文質 129
劉文輝 243
劉世達 208
劉先雲 212, 312, 359, 378, 388
劉志寰 54
劉岳厚 24
劉峙 22
劉真 312, 314
劉健群 35-36, 40, 206, 216, 242, 308, 354, 365, 381, 383-384
劉詠堯 206, 309
劉業昭 52-53, 212
劉廣瑛 312
劉樹勛 312
劉瀛洲 361
德國 35, 210, 217, 437
德意志民族運動 25
慶深庵 281
潘公展 26, 233-234, 376
潘佑強 28
潘廉方 362
滕傑 17, 34, 206
〈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 143
〈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實施細則〉 143
蔣中正（蔣介石、校長、委員長、領袖、總裁、團長、國民政府主席、總統、蔣） 1-2, 4, 6, 15-23, 25-26, 30-43, 49-50, 87-95, 97-106, 108-109, 111-115, 118, 123, 126-128, 131-146, 197-201, 203-204, 211, 213-228, 231-233, 235-238, 240-244, 273-274, 277-278, 284-288, 292-296, 299-309, 313-315, 337, 339-340, 343-345, 348-357, 363-365, 367, 370-376, 379-381, 383-398, 437-438, 440-445；的下野，16-17, 383, 393；與黃埔系，15, 17-21, 35, 37, 137, 142, 398；與復興社及其勢力，15-19, 21, 25-26, 30, 33-42, 49-50, 56, 60, 93, 101, 137, 226, 381, 387, 398, 437, 442；與CC系及其勢力，15-19, 21, 26, 30, 33-36, 39-40, 42, 50, 60, 63, 106, 216, 219, 224-226, 228, 235, 242, 303, 308, 348, 351, 371, 373-376, 381, 388-389, 392, 394-395, 398, 437, 442, 444；與政學系，15, 22-23, 35-36, 63, 218, 225, 236-238, 240, 242, 244, 379, 381；論「反動派」，20-21, 255, 304；論「革命失敗

楊生霖 212
 楊虎城 227
 楊雨瑛 53, 129, 209, 212,
 310, 362
 楊綽庵 23
 萬昌言 54, 115, 208, 218,
 310
 節制資本 232
 經天祿 312
 經濟部 240
 葉秀峰 233
 葉楚傖 219-220
 葛武榮 52, 54, 129, 207
 董霖 126
 「衙門」 91-93, 99, 138
 -139, 198, 240
 誠社 28, 205
 詹純鑑 210, 212, 310, 367
 資源委員會 380
 較場口事件 237-238
 鄒魯 395
 雷嘯岑 367-368
 雷震 391, 393
 福建省政府 128
 蒙古 377

十四畫

粵系 15, 44-47, 53, 206
 -208, 212, 310-311
 僑務委員會 368
 團方 3, 5-6, 87, 102, 124
 -125, 127-129, 133,
 195, 197, 199-202, 204,
 213-214, 216, 222, 224,

228, 231, 245, 275-276,
 282-283, 305, 307-308,
 341-342, 346, 354-355,
 357, 359-363, 365, 367
 -371, 373, 389-392,
 444
 〈團的改造〉 293-294
 團派 398, 445
 〈團員入團臨時登記證〉
 278
 〈團員須知〉 144-145
 團員總甄核 306, 315
 〈團務改進方案草案〉
 306
 〈對本黨政策之建議案〉
 235
 廖磊 218
 熊式輝 23, 218-219, 223,
 240
 熊斌 23
 監察委員選舉 338, 365
 監察院 238
 翟文鳳 362
 臧元駿 310
 裴存藩 54-55, 212
 趙仲容 54, 208, 212, 307,
 309, 314
 趙恆惕 282-283, 341
 齊世英 233
 齊錫生 139
 廣東省政府 228

十五畫

暨南大學 26

貴州全省青年抗敵救國會
105
項定榮 207
馮玉祥 220
黃少谷 207, 309, 314
黃宇人 51, 54, 124-125,
206, 211, 235, 242-243,
302-303, 308, 311, 314,
374-375, 377-378, 384,
391
黃旭初 51, 53, 212
黃老燾 342
黃季陸 46, 103-104, 207,
233
黃金風潮 243
黃珍吾 54-55, 207, 212,
310
黃埔系 15-19, 21, 35, 42,
45, 47, 51-53, 123, 137,
142, 202, 204, 210-211,
216-217, 222, 227, 234,
238, 309, 311, 313-314,
378, 440；學生系統，16
-18, 20-21, 25, 29, 45
-49, 51-54, 199, 205-
208, 210-213, 217, 227,
309-312；教官系統，44
-48, 52, 142, 204-205,
213, 217, 219, 223, 227,
309, 381
黃埔軍校 18, 42, 98, 199
「黃埔精神」 18
黃郛 23
黃統 376

黃通 281, 367
「黃復青」 222-223, 225
, 233-234, 242
黃穎川 361
雲南大學 199

十三畫

「傳子政策」 284
傳習學舍 296
意大利 35, 437
戩亂 358, 361, 386
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
229
「新生命」 89-90, 94-
95, 98, 100, 133, 136, 139
, 145, 150, 289, 437
「新血輪」 87, 94-95,
98-100, 118, 133, 139,
141, 150, 230, 289, 301,
372, 437
新政俱樂部 378-379, 381
-382, 389, 444
新派 367
新桂系 15, 44-46, 48, 51,
53, 130, 207, 210, 212,
217-219, 223, 227, 253,
276, 310-311, 373, 375,
379, 382, 441
「新細胞」 90, 100, 133,
141, 150, 437
《新聞天地》 292
新疆省政府 286
楊永泰 23, 63, 236
楊玉清 210, 310, 391

- 河南, 22-24, 26-27, 62, 66-67, 207; 在山東, 24, 64, 208; 在陝西, 206; 在甘肅, 207; 在四川, 206; 在湖北, 23, 27-28, 206, 210; 在湖南, 24-25, 65, 67, 129, 206; 在江西, 23, 25, 29; 在安徽, 23-24; 在江蘇, 206; 在南京, 206-207; 在上海, 25-26; 在福建, 24, 64, 67, 207; 中央軍校分社, 206; 歐洲分社, 205, 210; 與三青團的籌設事宜, 33-38, 41-42, 86, 93, 101, 108-109; 組織的結束, 39-41, 77-78, 437, 442
- 復興社(一九三八年之後的前復興社勢力) 16, 39, 43-56, 87, 103-104, 115, 123, 127, 137, 139-140, 142, 196-197, 200, 202, 204-214, 216-218, 222-223, 225, 227-228, 234, 281-282, 284-285, 309-314, 348, 378, 381, 387, 398, 438, 440; 與三青團中央團務人事, 44-50, 204-211, 213-214, 284-285, 309-314; 與三青團地方團務人事, 51-55, 97, 124, 128-130, 211-213, 281-282, 284, 314
- 復興關 223
- 曾擴情 29, 216
- 湘西 124, 282, 341-342
- 湖北女子師範學校 27
- 湖北省政府 43, 137
- 湖北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59
- 湖南《中央日報》 341, 360, 368
- 湖南省政府 142, 282
- 渭河 362
- 湯如炎 48, 115, 151, 206, 250, 310, 314, 374
- 湯恩伯 205, 213
- 無錫 375
- 皖南行署 218
- 程天放 224, 233, 381, 383
- 程思遠 43, 45-46, 51, 207, 223, 227, 301, 308, 310, 314
- 程登科 210
- 程潛 371-373, 383
- 程懋筠 99
- 童冠賢 381-382, 384
- 粟裕蒙 53
- 覃異之 311
- 費正清 見 [Fairbank, John K.]條
- 賀衷寒 17, 34, 40, 45-47, 205, 216, 223, 225-226, 233, 242, 307, 309, 314, 371, 392
- 賀燧初 282

陳惕廬 135
陳雪屏 207, 307, 311, 357
陳博生 201
陳逸雲 207
陳開國 209, 285, 287, 300
陳誠 39-40, 43-47, 49,
53, 81, 94, 99, 101, 109,
118, 121, 131-135, 137,
140, 142, 185-186, 203,
205, 208-213, 217-218,
223, 225, 227, 242, 268,
286-288, 301, 303, 307
-309, 310, 312-314,
338, 345, 348, 351, 354,
394-395
陳翠蓮 344
陳蒼正 54, 210, 212
陳儀 23-24, 64, 240, 243,
344
陳慶雲 223, 225
陳顧遠 382
陶百川 48, 201
陶維琪 312
眭光祿 311
開封《青年日報》 130
開封新聞記者公會 130

十二畫

〈爲克服當前之困難與爭取
最後之勝利對全體團員之
指示〉 230
〈爲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
全國青年書〉 42, 88-
90, 112

第一任正副總統選舉 370
-373, 375, 378, 380, 383
, 444
第五戰區 218
第五縱隊 396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有關事
宜審議委員會 220
第六戰區 43, 137
〈統一中央黨部團部組織案
〉 356
傅丘平 281
傅作義 54, 208, 212, 309
傅啓學 124-125
傅斯年 374-377
彭正宇 369
彭國鈞 24
復興社（一九三八年之前的
力行社金字塔型組織通稱
） 5, 15-19, 21-30,
33-42, 49, 216-217,
234, 236, 437, 442；的組
成, 16-17, 49, 56；的成
員數, 68；與黃埔系, 17
-21, 25-26, 42, 217,
234；與軍隊黨部及政工,
18-19, 21, 25, 29, 34；
與地方保安, 18；在黨務
部門, 22-24, 29, 34, 38,
216；在文化教育界, 25-
28；與學生軍訓, 28-29
；與CC系的競爭, 15, 18
-19, 21-22, 24-30, 34,
41, 56, 64, 236, 438, 442
；在河北, 206, 210；在

231, 234-236, 242, 268
-269, 277, 285-286,
310, 364, 381, 393
張炯 24, 124, 282-283,
341, 347
張桓 48, 210-211, 282
張強 233
張鈞 360
張義純 218
張群 23, 218-219, 240,
244, 377, 379-380, 391
-392
張道藩 105, 206, 219, 233,
234, 248, 365, 374, 377-
378
張厲生 40, 45-47, 203,
205, 219
張蔭梧 212
張學良 227
張興周 212, 312
張鎮 233, 345
張蕩真 208
教育部 95, 219, 349
曹俊 287, 300, 311
梁化中 47
梁寒操 47, 103, 206, 233,
238, 240, 242
梁幹喬 210
清黨 396
異黨分子 26
盛世才 227
符繼麟 361
莫國璋 213
莫德惠 371

許伯超 311
許素玉 311
〈「這一代比上一代更好」
〉 201
郭仲隗 24
郭廷以 349
郭澄 310
陪都黨政革新運動座談會（
陪都座談會） 239-240
, 243
陳大榕 343
陳介生 51, 210, 281, 310,
358
陳元 294
陳布雷 45, 205, 219, 243,
307
陳立夫 2, 17, 26, 35-36,
40-42, 44, 46-47, 50,
93, 101, 105, 124, 141,
203-205, 215, 217, 219
-220, 222-225, 234,
237-238, 257, 273, 281,
292, 303, 308, 350-351,
354, 365, 371, 373-379,
381-382, 384, 388-389,
392, 394-395, 398, 444
陳志明 52, 54, 211
陳良 206
陳其美 17
陳果夫 17, 41, 103, 217,
219-220, 225, 235
陳泮嶺 22
陳炯明 42
陳烈甫 311

43, 87-88, 94, 98, 135,
138, 230, 397, 437
「國民革命同盟會」 33
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總司令侍
從室 49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訓
處 49
國民參政會 33, 39, 231,
238-239, 374, 378
國共內戰 3-4, 286, 370,
379
國共合作 33, 437
國共停戰協定 286
國防參議會 32
國防部 345
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
處 288
國家主義派 24, 64
國家總預算 105
《國歌》 99
寇永吉 51-52, 54, 209,
212, 310
常德普 311
康澤 一九三八年以前的～
, 17, 34-36, 38, 40-42,
49; 與三青團的籌設, 35
-36, 41-42, 101, 109;
與三青團組織人事, 45-
46, 48-50, 84, 204-205,
211, 217, 284-285, 308-
309, 314, 319-320; 與
地方團部, 50, 53, 84-85,
97, 130-131, 284-285
; 與中央青幹班, 50-51,

202-203, 287; 與三青團
中央幹部學校, 202, 248,
284; 與蔣中正, 41-42,
146, 226, 233, 254, 285,
287, 309, 321; 與蔣經國,
97, 213, 248-249, 284-
285, 306-307, 314, 334
; 與陳誠, 81, 84, 101,
109, 213, 287; 與張治中,
320-321; 與陳立夫, 50,
225; 論黨團關係與團的
性質, 103, 131-132, 140
; 論三青團團務, 138,
173; 與三青團一全大會,
202-205, 248; 與國民黨
六全大會, 220-221, 223,
225-226, 254, 258, 285,
321; 與革新運動, 233;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間
的「出國考察」, 285,
321-322; 行憲和國共內
戰中的～, 365, 371, 434
張一清 285, 287
張公甫 290
張作謀 310
張伯謹 53, 208, 212
張其昀 208, 309, 314
張宗良 218, 310, 359, 363,
369, 386
張治中 43, 46-47, 54,
108, 121-122, 132, 137
-138, 142-143, 146,
189, 202-204, 208-209,
214, 217-223, 225-226,

倪文亞 48, 206, 212, 250, 285, 297, 307-309, 314
 倪志操 213, 300
 原春輝 51, 54
 唐伯球 282-283
 唐冠英 52
 唐清和 361
 唐縱 225, 233
 夏威 218
 孫中山(國父、總理) 42, 290, 375, 396
 孫玉琳 281
 孫伯騫 52
 孫科 15, 44, 46-47, 206, 209, 211, 220, 233, 258, 371-373, 375, 377, 381-383, 444
 孫逸仙大學 49, 97
 徐日太 293
 徐君佩 47, 208, 211-212
 徐恩曾 233
 徐蚌會戰(淮海戰役) 380, 392-393
 徐傅霖 371
 徐會之 311
 徐瘦秋 209, 311
 晉江槍擊事件 360
 桂永清 52
 秦啓榮 24, 51, 54-55, 64, 208
 翁文灝 233, 240, 380-381
 袁永履 209, 311
 袁守成 129

袁守謙 206, 223, 309, 313-314, 371
 訓政 15, 63, 119, 215, 396
 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 28
 財政部 240
 馬步芳 131
 馬家寺 198
 馬紹強 52
 馬敦靜 311
 馬超俊 105, 233, 391
 馬歇爾 見 [Marshall, George C.] 條
 高一涵 341
 高雲裳 212
 徐公遂 206, 310

十一畫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371
 區長 279, 282
 參政俱樂部 379
 國民大會 219, 278, 337, 362-363, 370-371, 373, 387, 397, 444
 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6, 22, 62, 337-338, 361, 363-370, 443
 國民大會堂 376
 國民政府(國府) 19-20, 37, 230, 236, 286, 338, 344-345, 349, 383, 386
 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 28
 國民革命 17, 20, 30, 35,

段錫朋 45-47, 205, 349
-350
洪瑞釗 208
派系主義(宗派主義) 15
, 239, 244, 386
<省執行委員會組織條例>
102
省黨政聯繫會議 127-128
胡木蘭 206, 311
胡宗南 45-46, 53-54,
129, 205, 212, 362
胡定安 209
胡長怡 250, 360
胡軌 52, 208, 211, 284-
285, 287, 310, 314
胡健中 233
胡庶華 307
胡漢民 15, 46, 206-207,
233
胡維藩 51-52, 54-55,
310
胡德馨 53
胡適 357, 376, 387
范予遂 47, 206
范爭波 132
苗培成 224
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 49,
64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142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43, 105
, 137-138, 225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
統) 50, 130, 282

軍校官邸 35
軍閥 342
郎維漢 53, 210
重慶大轟炸 137
重慶《中央日報》一九四
三年四月的社論事件, 200
-202
重慶市政府 282
重慶安樂廳(與安樂廳集會
) 375-377, 380
重慶青年夏令講習會 143
重慶《新華日報》 238
「重質不重量」 115
革命先烈殉國紀念日 38,
198
革命青年同志會 17, 206-
207
革命政府紀念日 215
革命軍人同志會 17, 205-
206, 210
革命黨 31, 90, 92, 241,
304
革新俱樂部 378-379, 381
-384, 444
《革新週刊》 244
革新運動 5, 195, 229-
244, 276, 302, 379, 385,
390, 441
<革新黨務之要道> 241

十畫

韋潤珊 311
韋贊唐 210, 212, 311
倒孔運動 231

社方 442
 祁宗漢 312
 竺可楨 311
 虎崗 99
 〈虎嘯歌〉 99
 金介甫 見 [Kinkley, Jeffrey C.]條
 金圓券 380, 392
 長江 393
 長沙〈中興日報〉 341, 368
 青白團 17-18, 33, 39-41, 50, 55, 68, 205-206
 青年派 129
 青年節 341
 〈青年團工作綱要〉 286, 288
 青年遠征軍(青年軍) 284-285; 的復員, 287-288, 292, 301; 第二批~, 288; 與三青團二全大會, 288, 293, 297, 300-301, 305
 青年遠征軍政工人員訓練班 284
 青年遠征軍總政治部 284, 288
 青洪幫 22
 美國 35, 49, 123, 147, 229, 233, 238, 274-275, 286-287, 308, 350, 374, 380, 387-388
 美國第七艦隊 395
 英國 35, 388

九畫

保甲長 279, 282
 〈促進憲政實現之各種必要措施案〉 224, 279
 俞季虞 285, 287, 314
 俞濟時 309
 俞鴻鈞 240
 南京〈中央日報〉 307, 377, 389
 南京〈中國日報〉 49, 205-206, 210
 南京〈和平日報〉 307, 384
 南昌〈掃蕩日報〉 206
 姚大海 233
 姚從吾 209
 宣鐵吾 54
 帝國主義 37, 214, 396
 建國俱樂部 379
 政治大學(政大) 349-350
 政治協商會議(政協會議) 237-238, 240-242, 290
 「政客」 20, 23, 137, 140, 236, 242, 340, 353
 政學系 15, 22-23, 35, 44, 46, 48, 217-219, 223, 225, 227, 231, 236-238, 240, 242-244, 268, 281, 344, 368, 377, 379, 381-382, 384-385, 391, 440-441
 柳克述 209, 242

李善後 361, 369
李雲漢 214, 227
李敬齋 22
李壽雍 311
李漢魂 53, 207, 212, 228,
301
李蒸 302, 310, 314
李樹森 53, 55, 206, 212,
307
杜元載 311
杜心如 28
步天凱 301
沈祖懋 209, 213, 311
沈從文 342
沈鴻烈 23
汪兆銘 15, 35-36
汪秀瑞 312
汪榮祖 275, 439
谷正鼎 45, 52, 233
谷正綱 36, 45, 48, 203,
205
谷深甫 54, 212
赤硃嶺 98
辛亥革命 30, 92
余凌雲 132
泛土耳其主義派 311

八畫

「兩廣決戰，取決兩湖」
372
周天賢 210, 310, 343
周世光 311
周自新 210
周南 212, 310

周雍能 368
孟民希 54
季天行 54, 211, 290, 310
季福生 52
「官僚（官僚主義）」 20
, 23, 91-94, 98-99, 137
-140, 198-199, 230,
234, 236, 239-240, 242
-243, 302, 340, 353, 387
, 441
官僚資本主義 230, 236,
239-240, 264, 390
居正 395
忠義會 22
「忠實黨員」 63, 132,
236
拔提書店 55
易勞逸見 [Eastman,
Lloyd E.]條
杭立武 209
東北 240, 243, 350, 380
林一民 312
林一鵬 290
林民鎔 312
林永年 290
林能士 237
林彪 350
林翼中 208
松花江 350
武漢行轅 371
武漢會戰 114
河南大學 27
河南《民國日報》 130
法西斯蒂組織 140

七畫

- 何浩若 48, 205, 274, 307,
309, 314, 370
何廉 23, 35, 218
何義均 208, 301
何漢文 345
何應欽 35, 236, 380
何聯奎 210, 309, 314
何鍵 24-25, 342
余井塘 207, 220, 233, 235,
240, 242, 394
余文傑 297
余拯 250, 310
余紀忠 208, 309
余英時 229
余琪 51
吳兆棠 207, 211, 310
吳春晴 290, 310
吳國楨 23, 394
吳紹澍 208, 213, 307-
308, 310
吳菊芳 207, 311
吳鼎昌 23, 35-36
吳鐵城 23, 25-26, 146,
218-220, 223, 225, 228,
240, 242, 347, 354, 381,
391
宋子文 240, 242-244,
374, 384, 441
宋恪 212
戒嚴 383
〈我們的呼聲〉 239
〈我們對團的建議〉 293

- 抗戰(中日戰爭、戰時)
1-3, 5, 15, 30-31, 33,
35, 38, 49, 124, 130, 195,
215-216, 218, 223, 227,
229-230, 233, 236-237,
274-276, 281, 283, 347,
379, 385, 390, 395-396,
437, 441, 444
抗戰建國 37, 43, 88, 105
《抗戰建國綱領》 88
改組派 15, 28, 33, 35-37,
46-47, 206, 208
〈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
案〉 39, 126
李友邦 310, 345
李天民 51-52, 210-211,
310, 390
李文範 219
李四榮 53
李名章 54, 209
李佑琦 369
李伯申 377
李宗仁 218, 371-373,
375, 378, 383, 393, 444
李俊龍 209, 310
李品仙 218
李國俊 51, 53, 207, 212,
310
李國柱 282
李培基 381, 383
李惟果 46-47, 205, 211,
214, 309
李敖 275, 439
李揚敬 45

田培林 311
〈由立法院長改選看國民黨前途〉 384
甲派 24-25, 65, 129
白崇禧 219, 223, 227, 276, 345, 383
白瑜 299
立法委員選舉 6, 337-338, 361, 363-370, 443
立法院 (與立法院長) 238, 337, 371, 373-384, 387-388, 392, 394, 398, 444
立法院第一任正副院長選舉 373-377, 382-383, 444
立法院第二任正副院長選舉 381-384, 444

六畫

任卓宣 208, 301
任國榮 311
任覺五 45, 51-53, 55, 104, 206, 211, 310
光明之夜 97
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運動 129, 284
共軍 341, 350, 386, 393
同盟會 92, 199, 356
各省市綜合性抗敵青年團體 (省青抗會) 105-107
各級參議會 (及參議員選舉) 244, 278-283, 338-339, 341-342, 360, 366-367, 370, 443

各級選舉指導會報 365-366
各級臨時參議會 279, 282
各級黨團統一委員會 354-355, 357, 362
〈各級黨團統一組織實施辦法〉 354
地方自治 278
地方自治協進會 281
地方建設協進會 281
地方實力派 130, 216
「奸黨」 237
安內攘外 30
安徽省政府 218
朱永寶 54
朱施民 212
朱家驊 40, 43-44, 47, 51, 53-54, 123-125, 132, 135-136, 141, 146, 184, 204-209, 211-213, 216-219, 223, 225, 235, 310, 358, 374-375, 379, 440
老派 367-368
自由主義運動 387
艾沙 311
行政院 (與行政院長) 128, 231-232, 240, 243-244, 368, 371, 377, 379-382, 394-395
「行新政，用新人」 378
西北農學院 129
西安事變 37-38
西南青年社 205

- 王公度 26
 王友直 209
 王文俊 51, 54, 212, 250
 王世杰 23, 40, 142, 218—
 224, 238, 240, 242, 257,
 303, 393
 王汝泮 52, 54—55, 207,
 212
 王志遠 311
 王宗山 362
 王明德 54, 212
 王昇 274—275, 294, 300
 王東原 45—46, 49, 131,
 205, 301, 341—343
 王芸青 24
 王政 210, 285
 王啓江 207, 223
 王添灯 345
 王煥彬 310
 王寧華 311
 王學緒 312
 王潞 281

五畫

- 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大
 會 388
 「以青治青」 131
 「以黨統政」 126
 包華國 53, 208
 北方立委聯誼會 379
 北平行轅 371
 北伐 30, 216, 274, 393
 北伐誓師紀念日 43
 北京大學 357

- 北溫泉會議 231—232
 司徒雷登 見 [Stuart,
 John L.]條
 台北 6, 244, 394
 台灣 6, 243, 337, 340—
 341, 343—345, 394, 398,
 445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344
 「四大皆空」 368
 四平街 350
 外交部 240
 外蒙古 377
 左手右手論 141, 375
 左鐸 34
 市政系 129
 平均地權 232
 〈本團四年來工作總檢討〉
 203
 〈本黨當前組織作戰綱領草
 案〉 392
 正中書局 55
 民主自由社 379, 381
 民主集權制 105, 196, 242,
 245
 民生主義 240
 民族革命同志會 130
 民族復興運動 25, 33, 60,
 65, 437
 「民衆對民衆」 237
 甘乃光 218
 甘家馨 374
 田弘茂 227
 田廷鈺 342—343, 361
 田恩沛 27

會206
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 17
-18, 28, 41
〈中國國民黨當前組織綱領〉 356
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全大會) 5, 100, 195, 215-216, 219-220, 222-226, 363-364; 一全大會, 198; 三全大會, 39-40; 五全大會, 1, 29, 31, 60, 216, 385; 臨全大會, 32, 37-39, 41-42, 60, 88, 93, 100, 126, 216-217; 六全大會, 107, 195, 214-216, 219-229, 235-236, 241, 244, 276-277, 279, 285, 363, 439-440; 七全大會, 348, 356, 363-364, 395-397
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全會) 100, 219, 233, 241; 四屆二中全會, 56; 五屆二中全會, 31; 五屆三中全會, 31; 五屆四中全會, 7, 39-40, 42, 100, 126; 五屆十二中全會, 219, 222, 233-235, 244; 六屆二中全會, 239-244; 六屆三中全會, 243-244, 345-348, 350; 六屆四中全會, 355-356, 396; 六屆臨中全會, 370

-371
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中常會) 1, 37, 100, 108, 110, 128, 142-143, 215, 219-221, 242, 276, 346, 348, 350-351, 357, 363, 365-366, 370, 373, 380-381, 391-393, 395, 397
「中國國民黨黨務改革促進會」 386
中華革命黨 291
「中華革命黨」 355
中華復興社 17
五七事件 343, 361, 369
五五憲法草案修正案 237
內政部 25
內蒙古 377
六臘之戰 27
「反飢餓, 反內戰」 349
夫人派 46-47, 208, 211
太平洋戰爭 229
孔祥熙 219, 231-233, 236, 243, 374, 384, 441
方少雲 132
方治 218, 225, 237
方采芹 85, 140-141
方覺慧 235
日本 16, 37, 442
日軍 35, 130
毛飛 24
毛慶祥 43
毛澤東 386

委員會), 29, 38-39, 44, 100-102, 215-216, 220-228, 235, 238, 242, 251, 284, 286, 307-309, 356, 364, 391, 394-395; 中央監察委員(與中央監察委員會), 101, 215-216, 220-228, 235, 242, 284, 286, 307-308, 356, 364, 391, 394-395; 中央常務委員, 241-243, 276, 284, 308, 370-371, 374-375, 393, 395; 中央黨部, 20, 31, 43, 92, 132, 134, 142, 238, 354, 375, 380, 393, 395; 中央政治委員(與中央政治委員會), 1, 100, 351, 388; 中央黨務委員會, 38, 100, 128; 中央訓練委員會, 38, 100; 中央組織部(與部長), 31, 36, 38, 49, 104, 107, 123-124, 143, 146, 217, 219-220, 235, 273, 292, 351, 354, 357, 363, 388; 中央宣傳部(與部長), 201, 220, 223, 248; 中央社會部(與部長), 105-106; 中央海外部(與部長), 223; 中央青年部(與部長), 36, 140, 273, 292, 347, 356-357, 378, 389; 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 378; 的學校黨部,

107-108, 130; 的軍隊黨部, 29, 222, 257; 的「改組」, 103, 356, 358-359; 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改造」之議, 1, 38, 92-93, 337, 347-348, 351-352, 357, 362, 385-386, 388-394, 396-397, 437, 443; 「兩黨說」, 274, 286-305, 387-392; 在一九五〇年的改造, 2, 6, 337, 394-398, 445
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 217
中國國民黨地方黨務與人事 354, 357-359; 在河南, 22-24, 102, 130, 359-360; 在山西, 130, 181; 在陝西, 129, 362; 在甘肅, 355, 364; 在青海, 131; 在重慶, 105, 119, 237, 281, 358-359; 在湖北, 23, 27, 359, 366; 在湖南, 124-125, 127, 282-283, 341-343, 347, 358-362, 368-369; 在安徽, 23-24, 106, 114, 125, 359, 363, 369; 在江西, 23, 367-368; 在南京, 367; 在浙江, 106, 366; 在福建, 24, 355, 360; 在貴州, 105-106, 124, 367; 在台灣, 344
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

大庸慘案 361
千國勳 40

四畫

中山陵園 35
中正大學 278
中央大學 301
中央改造委員會 394-395
中央政治學校(中央政校、政校) 202, 314, 349-350; 芷江風潮, 350
「中央革命戰鬥委員會」 392-393
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 17, 59
中央訓練團 94, 131, 133
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 131-135, 140-141
〈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 100, 102, 259-260
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 365-366
中央黨務學校 49, 202
中央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 354
中央黨團聯席會議 355-357
中社 379
《中國之命運》 213-214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26
中國文化學會 25-26, 205-206
中國共產黨(中共、共黨) 1-2, 16, 26, 33, 35, 129

-130, 214, 229, 236-238, 240, 274, 291, 296, 300-302, 305, 341, 350-352, 383, 386, 388, 393, 396-397, 437, 442, 445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387
中國青年挺進隊 34
「中國青年團」 387
中國青年黨 35
「中國革命黨」 355
中國國民黨(國民黨、黨) 1-6, 15-24, 28-44, 48-50, 55-56, 87-95, 97-115, 117-119, 121-128, 130-147, 195-196, 198, 200-203, 214-224, 226, 228-230, 232-244, 273-276, 278-280, 282-286, 288-293, 295-296, 300-309, 313-315, 337-398, 437-445; 的名稱, 355, 394; 的黨治, 15, 63, 229; 總章, 39-40, 93, 100, 102-103, 224, 438; 預備黨員, 39, 103, 141, 347, 438; 黨員的年齡問題, 110-112, 117, 438-439; 黨員的職業成分, 117-118; 的黨員徵收, 110-112, 116-119, 438-439; 的黨員總報到, 111-112; 「小組織」, 35, 38, 40, 144; 中央執行委員(與中央執行

53, 96-99, 212, 246, 284, 293-294, 299, 367; 在蘇北, 52; 在上海, 213, 287; 在南京, 281, 367; 在浙江, 54, 106, 212, 299; 在福建, 54-55, 128, 212, 279-280, 290, 299, 360; 在廣東, 51, 53, 212, 246; 在廣西, 51, 53, 85, 130, 212, 373; 在貴州, 51, 54, 96, 106, 124-125, 211, 279-280, 290, 367-368; 在雲南, 54-55, 130, 212, 279-280, 289; 在台灣, 279-280, 340-341, 344-345
〈三民主義青年團改組方案草案〉 306
〈三民主義青年團改進方案〉 307, 314-315
《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進行曲》 99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選舉辦法〉 307
〈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案〉 7, 40, 42, 100
〈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置綱要草案〉 278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歌》 99
三民主義青年團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全代會) 5-6, 195-196, 198-204,

213-214, 231, 274, 283, 286, 292, 294-297, 299, 307; 一全大會, 44, 98, 110-111, 114-115, 123, 138, 147, 150, 195, 197-214, 231, 287-288, 313; 二全大會, 6, 245, 273, 278, 283, 286-288, 291-294, 296-314, 337-339, 345, 347, 350, 441, 445; 「三全大會」, 306, 315
三民主義青年團歷屆歷次中央幹事會全體會議(中全會) 277; 一屆三中全會, 221, 232; 二屆二中全會, 355-356
三民主義青年團歷屆歷次中央幹事監察聯席會議 138, 274, 287, 299, 303-304, 313, 356; 一屆三次幹監聯席會議, 221; 一屆四次幹監聯席會議, 294, 296
「三聯主義」 369
「三體合一」 99, 214
上官業佑 250, 311
上海《大公報》 273, 292, 387
于右任 371, 395
土地改革 233, 240
土耳其 35, 437
土豪劣紳 135, 139, 230, 339, 342, 390

357, 374, 391; 中央組織處(與處長), 45-46, 48-50, 115, 197, 211, 217, 219, 223, 284-285; 中央訓練處(與處長), 45-46, 48-49, 211; 第二處, 314, 345; 第五處, 314; 女性在~, 97, 99, 206-208, 211, 222, 311; 青年夏令營, 95-99, 292-293; 的學校團部與團務, 105, 107-108, 130, 162-165, 197, 199-200, 222, 284, 291, 297; 團營事業, 277; 的改隸, 215, 221, 224, 276-278, 283, 290; 的組黨之議, 6, 244, 273-274, 283-284, 288-297, 299-305, 337, 345-346, 348, 355, 389-391, 439, 441-442, 445; 與一九五〇年的國民黨改造, 2, 6, 398, 445

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人員訓練班(中央青幹班) 8, 50-51, 84, 94, 103, 198, 202-204, 231, 284, 287, 293, 300; 同學會, 203-204, 287, 300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中央幹校、幹校) 202, 223, 284-285, 287, 293, 300, 314, 345, 349-350; 校友會, 287, 293

三民主義青年團全國幹部工作會議 121, 146, 198

三民主義青年團地方團務與人事 50-55, 197-198, 211-213, 279-281, 297, 354; 在平津, 213; 在河北, 173, 212; 在河南, 52, 54-55, 130, 212, 359-360; 在山東, 51, 54-55, 212; 在山西, 51, 54, 130, 181, 212; 在綏遠, 54, 212; 在陝西, 52-54, 85, 129-130, 212, 279-280, 362; 在甘肅, 51-52, 54-55, 96, 212, 289, 291; 在青海, 51, 54, 131, 212, 279-280; 在西康, 52, 54, 211, 279-280, 299; 在四川, 51-53, 55, 95, 128-129, 145, 180, 211, 279-280, 299; 在重慶, 51, 53, 86, 105, 211, 223, 237, 246, 279-282, 287, 299, 358-359; 在湖北, 53, 94, 120-121, 212, 230, 246, 279-280, 299, 359, 366; 在湖南, 52-53, 55, 123-125, 127, 129, 212, 279-280, 282-283, 299, 340-343, 358-362, 368-369; 在安徽, 54, 115-116, 125, 212, 218, 299, 359, 363, 369, 373, 386; 在江西,

「三民主義共和黨」 290
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青年團、團） 1-6, 16, 32-56, 87-115, 117-147, 195-203, 211, 213-225, 227-232, 234-238, 240, 242-245, 273-296, 298-309, 312-315, 337-375, 378-391, 395-398, 437-445；的名稱, 36, 41, 93；的簡稱, 1, 7-8；的籌設, 33-43, 74, 101-102, 108；的成立, 2, 43, 385；性質的爭論, 2-4, 35-36, 43, 88-89, 94, 103-104, 123, 132-134, 136, 140-141, 144-146, 187-188, 277, 295；團章, 42, 79, 88, 93, 101-102, 104, 108-111, 113, 136, 141-142, 196, 213, 313；國民黨總章裏的~, 39, 100, 102, 224；團員的黨籍問題, 4, 99, 113-114, 125, 128, 143, 200, 221, 273, 276, 285, 291-292, 356, 439；團員的年齡問題, 42, 108-113, 117, 135-136, 141, 143, 146, 170-171, 199, 213, 282, 288, 313, 438-440；的團員徵收, 111, 114-122, 135, 139, 147, 170-171, 275-276,

343, 439；團員的職業成分, 117-122, 139, 173；的本位意識, 4-5, 125, 139, 195, 200, 204, 214, 275-276, 278, 281, 283, 286, 307, 364, 439, 441, 445；的經費預算, 104-105, 138, 161, 314, 438；指導員, 308, 348；中央臨時幹事（與中央臨時幹事會），43-45, 110, 136, 142, 217, 312；中央幹事（與中央幹事會），43-49, 102, 113, 115, 119, 128, 196, 200, 203-211, 213-214, 220-223, 235, 238, 277, 279, 286, 288, 291, 297, 299, 301, 306-314, 343, 351, 356；中央監察（與中央監察會），200, 203-204, 213, 218, 220-221, 223, 235, 252-253, 277, 286, 288, 291, 297, 299, 301, 306-308, 313, 351, 356；中央常務幹事（與中央常務幹事會），43-44, 46-49, 141, 201, 203-204, 211, 214, 274, 277, 284, 288, 292, 301, 313-314, 355；中央團部, 91, 94-95, 103, 107, 114, 121, 136-137, 143-144, 203, 222, 273, 288, 306, 338, 354,

索 引

CC 系 2, 5, 15-19, 21-30, 33-37, 41-42, 44-52, 54-56, 59, 62-65, 76, 87, 103, 105-106, 108-109, 124-125, 129, 160, 162, 196, 200-207, 209, 211, 213-220, 222-228, 232-238, 241-242, 244, 253, 276, 281-283, 292, 303, 308-309, 311-314, 346, 348, 357, 362, 366-368, 371-385, 387-390, 392, 394-395, 398, 437-438, 440-442, 444

Eastman, Lloyd E. (易勞逸) 4-5, 29, 89, 95, 109, 112, 130, 229-230, 233, 237, 239, 244, 385

Fairbank, John K. (費正清) 229, 275, 440

Hausey, Ernest (霍爾) 147

Kinkley, Jeffrey C. (金介甫) 341

Marshall, George C. (馬歇爾) 238, 286

Reader's Digest (《讀者文摘》) 147

Stuart, John L. (司徒雷

登) 350, 380, 387, 389
United Press (合衆社)
377-378, 391-392

一畫

一二八事件 361
一四座談會 379, 381
「一次革命，兩面作戰」
386
一號作戰 235
一黨專政 229
乙派 24-25, 65, 129, 282

二畫

丁作韶 140
丁惟汾 132
二二八事件 243, 343-345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344

三畫

三民主義(主義) 25, 32, 35-36, 39, 42-43, 88, 94, 110, 133, 140-141, 143, 274, 286, 289, 295, 301-302, 367, 386, 388, 390, 437, 439
三民主義力行社(力行社)
17, 33, 50, 205-208, 210
《三民主義半月刊》 391



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叢書 第四種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

(一九三八—一九四九)

著者 王良卿

出版者 近代中國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四段五〇五號地下室

電話／二七二九五七四六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〇一〇九六七七——九號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三段五三號七樓

電話／二八六一一五二一

承印者 裕華彩藝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寶中路九五之八號

定價 精裝 新臺幣四五〇元·美金三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九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王良卿著．——初版．——臺北市：近代中國．民87

面； 公分．——（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叢書；第4種）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591-148-2（精裝）

1. 中國國民黨—歷史

005.29

87006446



Kuomintang History Library

No. 2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N-MIN CHU-I YOUTH CORPS
AND THE KUOMINTANG

1938-1949

by

WANG LIANG-CHING

HISTORICAL COMMISSION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July, 1998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